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在全国尚有170余万土匪没有放下武器……



剿匪大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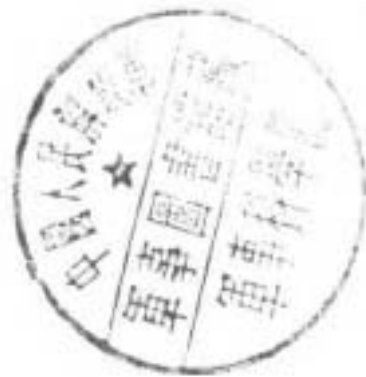
冯力 编著

剿匪

大纪实(上)

冯力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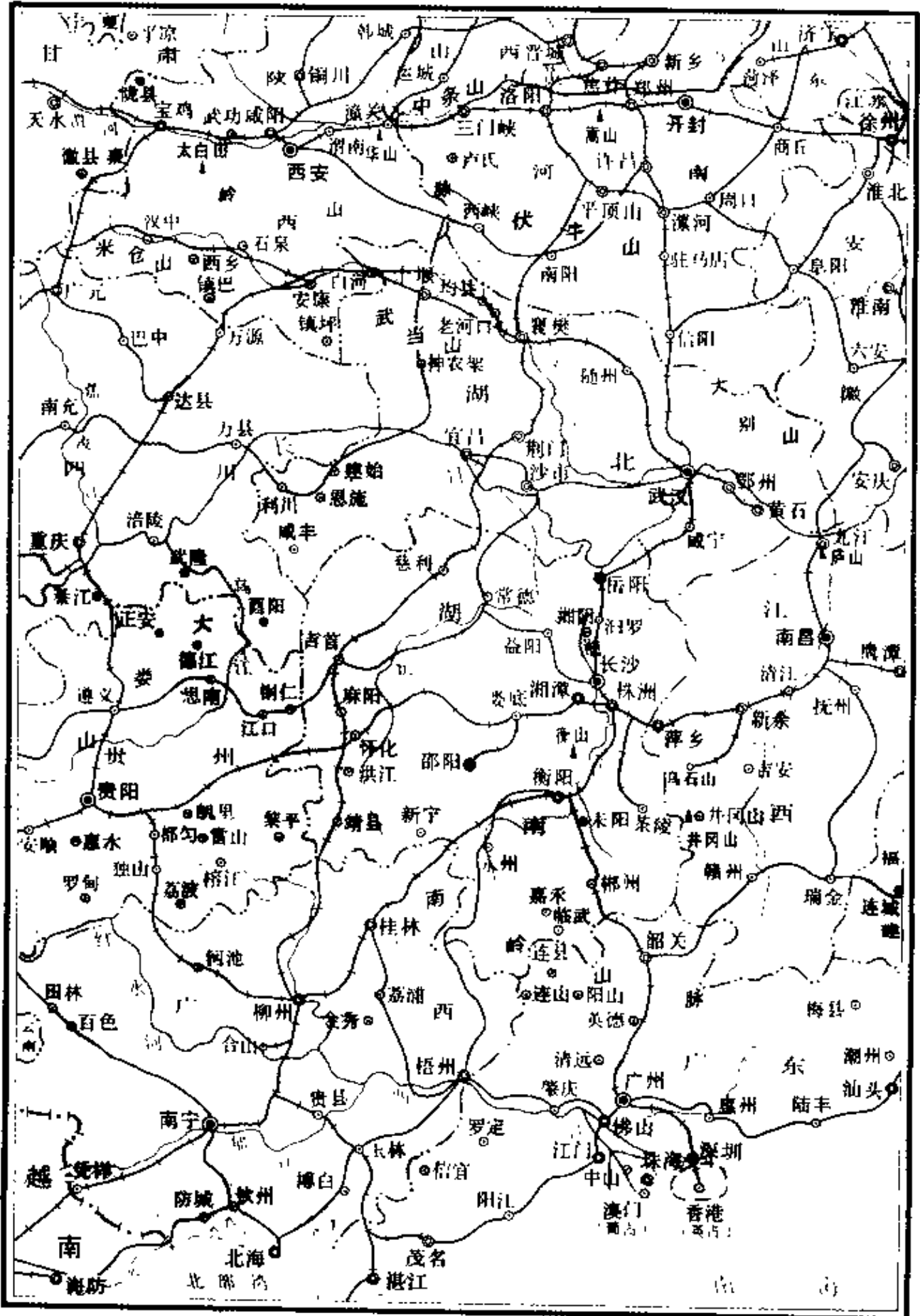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
在全国尚有170余万土匪没有放下武器……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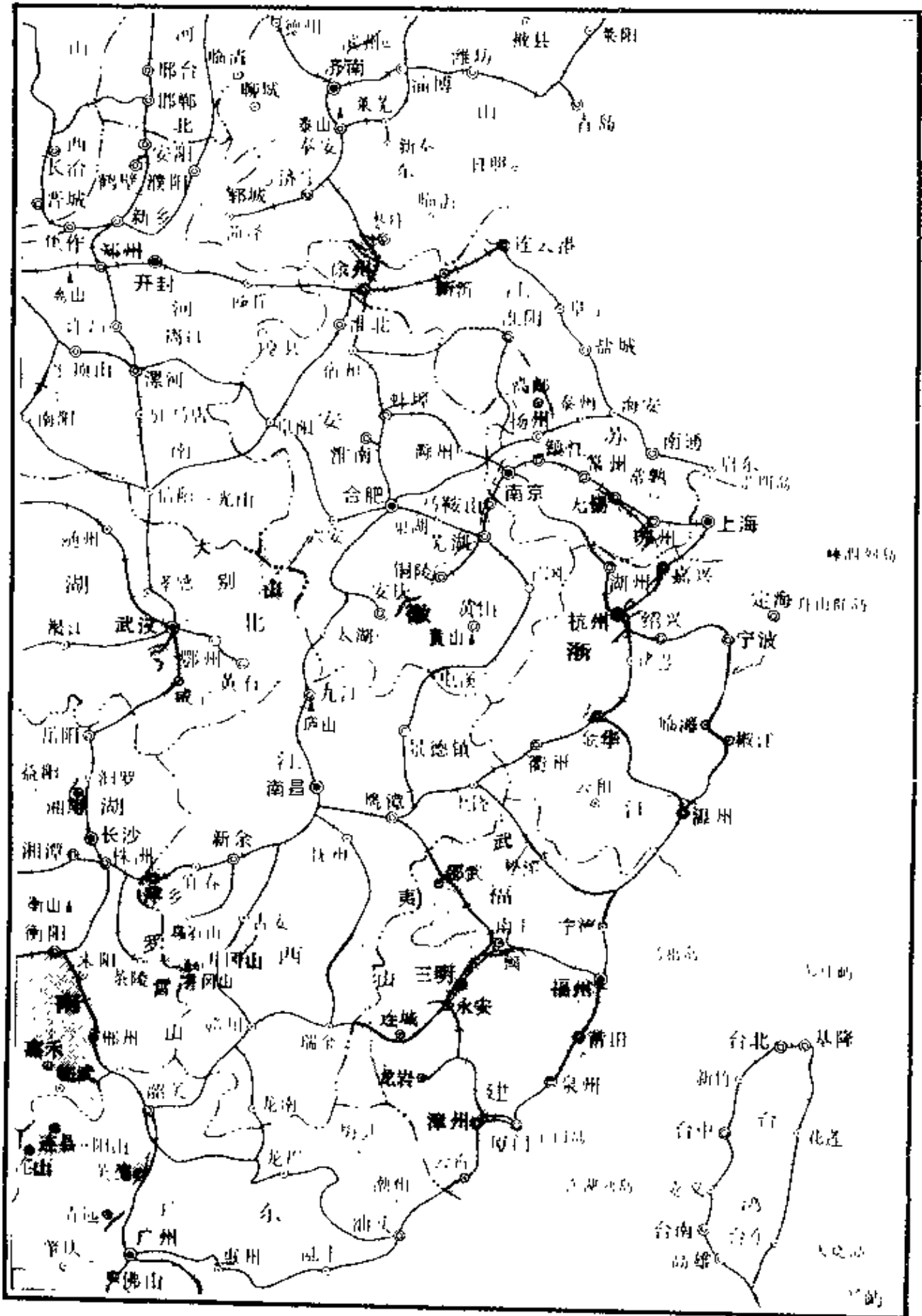
中南地区土匪分布示意图

(1949年5月-1951年5月)



华东地区土匪分布示意图

(1949年5月 - 1951年5月)



我剿匪部队缴获的武器装备



青海骑兵支队行进在青海省南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

追剿顽匪。



进山剿顽匪。





在当地村民带领下研究地形。



南清武装匪特。

人民解放军战士跋山涉水，奔赴剿匪战场。



向白崇禧残部发起冲击。

前 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由此，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军继三年解放战争之后，又抽调出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百万大军，在全国各地实施剿灭土匪的一系列重大军事作战行动。在历时三年的剿匪作战中，我军在西北地区歼匪9.09万人，西南地区歼匪116万余人，中南地区歼匪115万余人，华东地区歼匪24.6万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

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史实，以纪实手法再现了我党我军在这一重大举措中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充分显示出了新生政权的强大生命力。

本书作为一部为纪念建党80周年而撰写的纪实性读物，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疑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编 者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天山高

- 第 1 节 东北丢失,兵败长江,“代总统”李宗仁电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火速率兵入关。何去何从? 10 万官兵生死存亡,全在其一念之间 …………… (3)
- 第 2 节 漫天皆白,马蹄飞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召见王震,指示一兵团三军立即做好进军新疆的一切准备,8 万将士誓师西征 …………… (10)
- 第 3 节 秘密联络,策划应变,乌斯满自称“哈萨克王”打出“保护宗教”旗号加紧武装,发动暴乱破坏和平解放,罪恶幽灵开始在林区牧场飘忽 …………… (14)
- 第 4 节 马匪亲信,军统特务,美国间谍,“主战派”威逼,身边人各谋出路,起义还是反对起义,统

——还是分裂？张治中发来密电 …………… (18)

第二章 大抉择

- 第 5 节 孤注一掷，叛军出营，“主和派”包尔汉、陶晋初、屈武危在旦夕，陶峙岳单刀赴会，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密赴迪化 …………… (29)
- 第 6 节 三路挺进，日夜兼程，战车五团哈密险遭鸿门宴，我军首次实施大规模空运行动 …… (40)
- 第 7 节 抢劫银行，捣毁商店，强行扣押解放军 40 辆运兵车，杀害押车队长及战士，战斗力颇强的国民党起义部队骑 1 师 2500 人一夜暴乱，打死区委书记，包围当地解放军驻军，王震闻讯大怒 …………… (56)
- 第 8 节 国共两党，红白相较，毛泽东待人热情诚恳，而蒋介石召见连手也没有伸给他。对此，就任解放军第 22 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感慨万千，决心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建设发展倾尽全力 …………… (66)

第三章 猎狡狐

- 第 9 节 奸商头脑，政治土匪，既反盛世才又投宋希

- 濂, 乌斯满 10 年翻云复雨, 坐上专员宝座, 傲视草原群枭 (71)
- 第 10 节 卖身投靠, 密设电台, 掩护美国领事越境出逃, 悍匪袭我粮队, 残害我战士, 马刀挥舞肆虐南北疆 (85)
- 第 11 节 伊吾告急援兵受阻, 我军数百战士牺牲, 40 天防守战, 重挫乌斯满、尧乐博斯联合进攻计划 (92)
- 第 12 节 急电部署, 王震指挥, 我军神速闪电夹击乌、尧二匪魔窟 (104)

第四章 平匪患

- 第 13 节 长途奔袭, 围追堵截, 顽匪“伤马逃命”, 尧乐博斯匪帮全军覆灭, 贾尼木汗被擒, 乌斯满率往甘肃 (111)
- 第 14 节 穷寇末路, 单骑狂奔, 我军两连骑兵猛追不舍, 孤胆英雄拼死一搏, 力擒匪首乌斯满 (119)
- 第 15 节 血泪控诉 庄严审判 王震当庭宣布: 人民要求惩办他们是公正的、正义的! 乌斯满等匪首先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27)
- 第 16 节 发动群众, 政策攻心, 以匪制匪, 最后一股残

匪投降。驻疆部队总结重大作战成果,屯垦戍边,保卫国防…………… (132)

第五章 祁连风

第 17 节 夺西安,克兰州,马步芳寄希望胡宗南将我军主力吸引至大巴山一线,以保青宁两省平安,无奈如意算盘落空…………… (141)

第 18 节 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马家残兵败将密谋“应变”,万余残匪疯狂反扑,我数座县城被匪攻陷,英勇战士血染磨儿沟…………… (153)

第 19 节 三路进攻,攻打县城,匪首放言:“谁不去就杀谁的头!”门源县城失守,副县长等 40 余名中共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被杀…………… (158)

第 20 节 重兵出击,两路围剿,我第 1 军 3 师开赴门源,众匪内乱,试图顽抗者全部被歼…………… (162)

第六章 贺兰雪

第 21 节 反动军官,山匪蠢贼,依托险关要隘切断交通,为祸商旅,宁青大地岂容悍匪自称“小台湾”…………… (167)

- 第 22 节 少年绿林,拉竿剪径,火并匪首,独霸贺兰山,马鸿逵变剿为抚,终于当上保安司令…… (174)
- 第 23 节 匪性难改,企盼“变天”,借开会之名煽动叛乱,宣称:“共军是从华北平原来的,山里打游击没经验”…… (178)
- 第 24 节 打死营长,夺走机枪,我军向前方运送给养部队屡遭伏击;“黑虎军”逞凶一时,我区乡党员干部多人惨遭杀害。…… (182)

第七章 灭黑虎

- 第 25 节 自立军区,拼凑旅团,四处烧杀奸淫,狂呼有朝一日“打宁夏”…… (187)
- 第 26 节 县府被攻,电台被毁,县委书记一行开会途中遇匪惨遭杀害,军事打击刻不容缓…… (189)
- 第 27 节 政治争取,军事为辅,土匪利用政策空子“跑宽大”获得喘息。群众不解,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担心匪患日甚…… (191)
- 第 28 节 步步紧逼,合围聚歼,匪首历经奔突败落山洞,吃人“猛虎”终被我进剿部队一举生擒…… (195)

第八章 走秦川

- 第 29 节 占领西安,夺取宝鸡,敌第 19 绥靖区布置地方武装实行“联防”,大土匪周寿娃自封“司令”拉队伍…………… (201)
- 第 30 节 拜把换贴,兵匪合编,征粮派款,贩运鸦片,占山为王坐等“胡长官反攻西安” … (206)
- 第 31 节 黑白两道,钩挂三方,恶狼本性难改终落天网,一枪伏法昭天理…………… (210)
- 第 32 节 秦川鏖战,泾渭硝烟,川陕联防追穷寇,不让匪徒一人还 …………… (212)

第九章 蜀道难

- 第 33 节 战略迂回,刘邓南下,意欲“拼光”的敌 5 兵团最终投降,30 万蒋军就歼于“成都战役”。…………… (217)
- 第 34 节 岷江两岸,交通干线,我军以“集中对集中”,8 个师对付川东匪乱,7 个师清剿川西悍匪…………… (229)
- 第 35 节 “避实就虚”,窜往山区,各股土匪化整为零

与我周旋,我军掀起“捉匪首运动” ……………
…………… (237)

第 36 节 川康草地,“游击走廊”,敌特组织股匪妄图
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
…………… (246)

第十章 怒江涛

第 37 节 兜击云南,一路横扫,陈赓率四兵团组织滇
南战役,下令全军“敌逃必追,追必到底”
…………… (251)

第 38 节 2 军 7 师“分片包干”,夺回被匪攻占的十余
座县城。滇越边境,强盗遇上打劫的,国民
党第 26 军财物落入匪手 …………… (261)

第 39 节 台岛下令,李弥挂帅,逃缅“国军”发动两次
“大反攻”,云南军区打响围剿残匪战斗 …
…………… (272)

第 40 节 作恶边境,为害邻邦,十年偷袭与反偷袭大
战,中缅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我军两度入
缅作战清除匪乱 …………… (277)

第十一章 黔山雨

- 第 41 节 隐蔽集结,兵发贵州,杨勇率 5 兵团插入黔境,贵州解放后,国民党残军、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将原有的 8 个保安团扩编为 6 个师番号,欲为“游击战”创造条件…………… (287)
- 第 42 节 城乡隔绝,政令不通,五分之二县城被匪占领,我五兵团司令员杨勇途中遇伏,141 团 200 干部战士牺牲…………… (294)
- 第 43 节 全面清剿,主力出击,坚决镇压顽固匪首,迅速扑灭黔东、黔北两地匪焰…………… (306)
- 第 44 节 直捣匪穴,无路可逃,贵州剿匪取得全面胜利,最后一个顽匪巢穴李家寨据点灰飞烟灭…………… (313)

上 卷

当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之际，全国仍有170万土匪没有放下武器；剿匪，成了年轻共和国的当务之急。在西北战区，我军共投入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1个旅又3个团与顽匪进行了历时3年的艰苦作战，共歼灭土匪9.09万人……

第一章 天山高

第1节 东北丢失，兵败长江，“代总统”李宗仁电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火速率兵入关。何去何从？10万官兵生死存亡，全在其一念之间。

1948年秋，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紧邻滹沱河北岸的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落——西柏坡村悄悄设立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这里，诚如周恩来所言：“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西柏坡，从春天到秋天，在一座土墙灰瓦的普通农家院落中，伴着一盏汽灯，毛泽东手中那支不停在军用地图上划动的红蓝铅笔，最后有力地一挥，以长江为界，迅速圈定了沈阳、北平、徐州、汉口、西安等5个长江以北的重点城市，决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三大战役的初步构想。

在东北，以主帅卫立煌出战、陈诚督师的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46个师的精锐主力，竟被黄埔四期生林彪衣袋里装着几把黄豆，手中拎着一根打狗棍，随心所欲的横敲竖打，三下江南，四下临江，最后在北宁线的山海关锁定了四野挥戈入

关的胜局。

在徐州，素有“福将”之称的刘峙，尚未从刘伯承、邓小平统领的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突然会合的滚滚铁流面前惊醒，当年项羽兵败垓下——徐州沱河集的四面楚歌即已响起：黄伯韬兵困碾庄，拔枪自杀；黄维死守双堆集，沦为阶下囚；杜聿明败走陈官庄，“成仁”不成，作了俘虏。65天，蒋介石的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余人灰飞烟灭。

在华北，雄踞平津的傅作义60万大军“长蛇阵”，一夜间被切成了5块——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随着“王牌军”35军在新保安的全军覆灭，中共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主力150万大军兵临平津。眼见东逃塘沽出海口已被东野扼制，西窜绥远的退路亦被堵死，傅作义终于下了和谈决心。至此，平津战役共歼灭、收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31日，人民解放军浩荡入城，北平成了共产党的“红都”。

蒋介石下野了。他在1月19日于南京黄埔路官邸召开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不无悲哀地说：“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此言不差。蒋确实恋栈，若无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的逼宫，他岂肯轻易让出总统宝座？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环顾江南半壁江山，可供守卫长江防线的军队，只有白崇禧的第2兵团25万人是自己的嫡系，而归京沪杭司令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45万人则是根本无法提调的。

在江防之争中，第一个回会他即败给了躲在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

李宗仁上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召集军事委员会委员研究制订江防作战计划。

这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根据李宗仁的意图提出了一个大致构想：“要防止共军过江，必须将国军主力沿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宽阔不易强渡，因而无须重兵防守，可将汤司令的主力部署在南京附近，以加强江防。”蔡文治在掌心轻轻敲打着一根指示杆，身子围绕着桌上的长江布防沙盘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唔，有道理。”顾祝同与何应钦听罢连连点头称是。

“我不同意——”此刻，一直闷声不响的汤恩伯扬起脸：“这个方案有违总裁旨意！”

“请汤司令直言。”蔡文治讨教道。

“我认为江防主力应集中在江阴以下地段，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务为好。”其实，这并不是他的意见，而是蒋介石给他的密令中提出的。

“你的意思是守上海不守长江？”顾祝同问。

“当然。”汤恩伯颇为自负地哼了一声。

蔡文治对汤恩伯不容商量的态度甚为光火，讥笑道：“只要稍微懂一点军事，就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守上海，无异于自杀！”

汤恩伯两眼一瞪：“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我便怎么做。”

“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压人？违抗李代总统和

剿匪大纪实

顾长官的作战计划，如果共军打过江来，你能守得住上海吗？”蔡文治抬出了李宗仁和参谋总长顾祝同，试图让汤恩伯不便违抗这个已经李宗仁首肯的长江防务计划。

岂料，蔡文治不说便罢，这一说，犹如火上浇油，汤恩伯“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蔡文治是个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了你再说！”说罢将面前的椅子一踢转身即走。

蔡文治讨了个没趣，恨恨地说：“真该撤掉他。”

顾祝同、何应钦面面相觑，苦笑一声，没有表态。他二人知道汤是老蒋的亲信，又手握重兵，奈何？

此事传到李宗仁那里，李宗仁沉思良久，一言不发。

他为此坐卧不安。嫡系将领三天两头往溪口跑，请示汇报，而老蒋的电报亦不停地往外发，自己实际上只是个牵线木偶。他自知自己不是当年的刘备，可以凭借长江天堑令曹操83万人马折戟赤壁。

毛泽东何许人也！三大战役的迅雷不及掩耳，令他不寒而栗。

果然，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第二、第三野军的第7、第9两个兵团首先在中路突破。仅24小时，30万大军便占领了长江南岸广大地区，其后，由陈赓指挥的西路解放军第4兵团亦在九江以东，从彭泽到当涂地段的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结合部猛插一刀，腰斩了李宗仁以长江为界建立“南北朝”的梦想。21日黄昏，随着长江北岸解放军万门大炮的轰鸣，江阴要塞失守，司令戴戎光被生俘，面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则干脆带着25艘舰艇公开起义了……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兵败长江，让李宗仁感到坚守淞沪显然也是徒劳的。既然与中共的和谈很难获得实际效果，那么，多拉一些队伍在自己这个“代总统”的身边，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和万分必要的。

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此时远在天边的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李宗仁与陶峙岳的关系，可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

1926年2月，国民党领导的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北伐。3月初，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倒戈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湖南督军赵恒惕，以响应北伐。6月，唐生智被国民革命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7月9日，当国民革命军高歌北伐之际，原赵恒惕属下的湘军贺耀祖第1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其时陶峙岳在该师第3旅任上校团长。

1926年10月18日，贺耀祖奉命率独立第2师由平江经修水到达王家铺，划归李宗仁的北伐军左翼军指挥，准备聚歼北洋军孙传芳在江西的10万重兵。此际，左翼军在江西战场的主攻方向为涂家埠至九江一线，而南昌的门户德安和马回岭，则是首当其冲的目标。11月1日，陶峙岳所在的独立2师杀向关系整个战局成败的马回岭。11月2日，总攻打响，孙传芳深知此役不仅关系到南昌的外援将被断绝，九江门户的洞开，而且还将截断自己后撤南浔路的通道。故此，下令属下颜景崇旅，上官云湘的第7师第3旅和马登瀛旅三部拼全力死守。由于北洋军依托坚固工事踞险顽抗，独立2师打得异常艰苦，向山头敌军阵地发起一波波冲击的士兵不断倒下，陶峙岳见此，

剿匪大纪实

仍坚持率队冲锋，整整一天，反复与敌拼杀。

李宗仁见战况危急，当即抽调第7军第1旅和第4军第12师增援独立2师，他担心贺耀祖的湖南杂牌军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强攻！必须拿下阵地！”李宗仁下令发起全线总攻。

战斗持续一夜，马回岭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呐喊厮杀声不绝于耳。

11月3日晨，当李宗仁闻知独立2师陶峙岳团已攻占山头主阵地，敌已向九江溃逃之际，不由长舒了一口恶气，叹道：“湘军能打嘛。”随后再次下令：“命独立2师继续出击九江！”

夺取马回岭之后，独立2师未得一丝喘息，又马不停蹄地直扑九江。按贺耀祖的部署，除第6旅何培基部进攻瑞昌之外，独立2师主力第1、第2、第3旅又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回岭横出莲花洞，指向九江；一路则向敌兵溃逃的黄老门、沙河方向追击前进。

陶峙岳率领自己的团队，沿黄老门、沙河一路急行军，他不时鼓励士兵们：“赶紧走，别让江西老表笑话咱们脚底板软！”

11月5日，独立2师攻克九江。7日，复又夺占湖口。在湘军独立2师的强势攻击配合下，李宗仁所指挥的左翼军于8日终于攻克孙传芳在江西的老巢——南昌，其10万主力基本上被北伐军歼灭。

李宗仁不得不对湘军的能征善战刮目相看了。

1927年3月初，年轻气盛的陶峙岳在陌镇攻击战中，身先士卒力溃守敌，因功被晋升为少将团长，当月底独立2师攻

克南京后，即扩编为第40军，陶峙岳又升任第3师副师长，不久又当上师长，其时年仅24岁，可谓少年将星。

此后，尽管陶峙岳在国民党军界升迁沉浮，甚至于参加过蒋介石策动的讨伐桂系的一系列大战，但关于他的褒贬及为人，从1927年至1949年的20余年间，不少事还是令李宗仁过目难忘的。

作为桂系的资深高级将领，他深知非嫡系将领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他之所以关注陶峙岳，除了当年独立2师为自己统领的左翼军攻克南昌立下头功，令其北伐征战大书了辉煌一笔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曾为自己属下的陶峙岳首开了中国军队痛击驻华日军的济南一战。

1928年5月1日，陶峙岳率部进驻济南。5月3日，长期驻扎山东半岛的日军突然向济南发动袭击，陶峙岳见日军竟敢公开反对中国的北伐革命，不由怒火中烧。

“打，把这些东洋鬼压下去！”他毫不迟疑地向全师将士下达了作战命令，第3师将士顿时大刀挥舞、杀声震天地向日军发动了英勇反击，将日军击溃。正当陶峙岳部欲实施追击时，蒋介石却下令第3师撤出战斗。

“搞什么鬼？我们正在追呢。”陶峙岳红着双眼望着军部传令兵大声吼道。当传令兵再次复述这是军长奉蒋总司令的命令而下达的指示后，只得忿忿地集合全师后撤。5月8日，济南被日军攻陷。日军进城后，疯狂屠杀城内百姓，使中国军民死伤1万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事后，由于陶峙岳及不少将领愤愤不平的言论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介石竟责怪陶部惹怒了日本人方酿此惨祸，下令将这支非嫡系的40军缩编为国民革

剿匪大纪实

命军第8师，并指派其亲信担任师长，不仅原军长贺耀祖从此赋闲，陶峙岳也降职为该师第24旅旅长。此事当年曾在军界引起一片哗然，李宗仁正是众多为陶峙岳鸣屈抱不平者之一。

时下，李宗仁代行总统，虽然名义上可号令三军，但除白崇禧那里的桂系部队外，可调往关内的非蒋嫡系将领和部队实在屈指可数。于是他想到了远在塞外的陶峙岳，想到了他手中掌握的那10万或许可供自己使用的兵马。

李宗仁当即命人给陶峙岳发去加急电报，要他除留1个旅担任新疆的边防之外，其余人员全部调入关内。并明示接此电报后，责令陶峙岳立即赴南京面议军机……

接到李宗仁的电报，陶峙岳十分为难，一则他不愿意南京方面将自己这支队伍用来打内战，二则他又感到如不去岂不是犯上违抗军令？

驻守新疆归陶峙岳指挥的部队有整编第42师、整编第78师、骑兵第1师约6万8千余人，加上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及地方武装的3万余人，共计有近10万人马。

此时，陶峙岳走与留的决断，无疑关系着新疆10万官兵的生与死……

第2节 漫天皆白，马蹄飞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召见王震，指示1兵团三军立即做好进军新疆的一切准备。8万将士誓师西征。

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

伴着一场纷纷扬扬的瑞雪，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这天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中央办公厅去面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这位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将军急急忙忙地来到办公厅，只见会议室内三位中央最高领导人已在等他了。

“你好啊！王胡子——”毛泽东笑着首先招呼他。

“主席、总司令、周副主席——”王震进门一见此阵势，忙向三位中央领导分别敬礼。

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说道：“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

朱德问：“王胡子，你晓得我们请你来干啥子吗？”

“报告总司令，不知道。”王震实话实说，憨厚的笑着。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挥手招呼他坐下来：“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打破胡宗南的机动防御没有？”

见面后，以为主席等领导要了解西北战场的情况，王震详细向中央三位领导汇报了一兵团自春季攻势以来的各方面情况，还不时回答周恩来和朱德的插话提问。三位领导人显然很满意，不时相互会意地点着头。

“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周恩来听完他的汇报，神色严肃地说。

“太好了！”王震高兴得站起身来，“我们一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

剿匪大纪实

争做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接着，朱德又就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向王震做了交待，并告诉他有关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同志请示，由他统一指挥进军大西北的战斗。

临走前，周恩来又对王震交待说：“新疆是我国最大一个省份，有十多个民族，希望你们在一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团结各民族群众，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立即行动。”

王震回到部队后不久，一野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把进军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王震兵团及其所属的第2军和第6军，同时要求一兵团加紧开始对部队的各种训练和物资准备工作。

自接受党中央和野司彭总的命令后，王震率领兵团机关干部全部深入到了基层检查布置工作，几乎整天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担任一兵团司令员仅一月余，现在主席又将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搞砸了那还得了！

他最先走马来一兵团所属的第2军。

自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根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下达后，原西野第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军，原2纵队司令员王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由于工作需要，不久他又升任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次参加中央会议并领受任务回来，他当然要回娘家走一趟。

王震带着参谋和警卫员一路打马来到第2军军部，在这里与自己的两位副军长郭鹏、顿星云和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左齐等人亲热地谈起了工作。

“2军是359旅的老班底，这回又要当模范哟！”王震拉住老搭档2军副政委王恩茂的手说。

“南泥湾大生产我们受到中央表扬，南下七省都不在话下，这次进军新疆走的还是近路嘛。”王恩茂快人快语。

郭鹏和王恩茂都是1944年10月随王震率领的由359旅主力组成的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开赴华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当时郭鹏任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副政委，是司令员王震得力的左右手，两人都一直在359旅以及改建制前担任2纵队军政主官。

“中央什么时候要我们入疆？”郭鹏问。

“说快也快，这要看新疆时局的变化，主席说这是个政治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王震在熟悉而又亲切的几位老战友中，以往常跟他们开开玩笑，互相打趣，可这一次他格外严肃：“西北的最后一仗就握在我们手里，打好打坏我们个人受表扬挨处分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得对历史有个交待。”说罢，他似乎觉得气氛不似往常那么活跃了，不由拍拍2军参谋长张希钦的肩膀：“老弟，这回你的大炮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了。”

“那用什么呢？”张希钦笑道。张希钦1930年入国民党南京军官学校，1933年在察绥抗日同盟任连长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到西安杨虎城部任炮兵队长，“西安事变”时以杨虎城警卫营连长的身分参与了捉蒋行动，在西北国共双方多年

的斗争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靠脚板呀，新疆那么大，天山、大沙漠、大戈壁，不作好充分的准备，走都要走死人哩。”王震见与军部的几位领导谈得差不多了，便招呼2军政治部主任左齐：“走，一起下去看看！”

左齐当然知道司令员所说的“政治仗”意味着什么，他知道王震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全军指战员的情绪，对此，他并不担心。

果然，王震一行在2军和6军等所属各师团营连部队驻地，看到的都是干部战士请战表决心的热烈场面，连一些马夫、炊事员都一口一个“到了新疆如何如何”，听得他浑身上下冒热气。

在策马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王震遥望天际，心中默念着：“天山再高，我王胡子也要和你打个照面！”

第3节 秘密联络、策划应变，乌斯满打出“保护宗教”旗号加紧武装，发动暴乱破坏和平解放，罪恶幽灵开始在林区牧场飘忽。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主政，毛泽东、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不仅在国民党阵营中引发了一场场“地震”，而且在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们心目中激起波澜。战局如何发展？美国是否出兵干涉？中共能否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如何管理国家？……

就新疆而言，除了隶属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政人士

外，还有一个人格外关心时局的变化，这个人就是后来新疆军区剿匪令中要缉捕的头号要犯——乌斯满。

乌斯满是哈萨克族人，属莫力合、阿衣吐汉部落，文盲，年轻时做小商贩，主要往来于阿勒泰山与中蒙边境一带贩卖牲口。山区纵马，草原奔波，养成了他强悍的野性，而残暴多疑是多年外部环境压力和内心愚昧及反叛性格的一个可怕的融合。他动辄杀人，闻风即逃，仅10年时间，竟在马背与刀光剑影中，从一个当初仅在哈萨克族部族武装也斯木汗营中管伙食的小兵，摇身成为北疆阿勒泰地区的巨寇，甚至自称“哈萨克王”。

1949年8月，正是牧场草青羊肥的季节。

在阿勒泰切别湖河流上游的渠根大夏牧场一座硕大白色毡房里，房中央的铁皮炉上奶茶飘香，在色彩绚丽的壁毯映照下，镶银嵌花的几案上，几大盘熏肉、马肠、馕饼、伊犁蜂蜜、马奶子和鲜果显示出了主人的殷实富足与热情好客。

当10余人鱼贯而入之后，主人乌斯满示意大家坐下拿起酒杯：“各位能远道而来，足见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刚才，我杀了一匹两岁的小马驹，也表示我的诚意。从今以后，我们大家要联合在一起，做大事，没有诚意不行。”

年轻的客人们不时点头，目光中流露出敬畏。

按哈萨克族习惯，长辈说话时年轻人不得打断或插话，因此，出席这次会议的哈米提尽管代表父亲贾尼木汗而来，但事实上只有听命的份儿。见实力不弱的贾尼木汗的二儿子恭恭敬敬，其余的代表自然不敢贸然发言。

“共产党要来了，国民党要和他们打仗，我们呢，必须抓

住这个机会，搞我们自己的事，保护我们自己的宗教，保卫我们的民族。国民党打过我们也拉过我们，最后又能怎么样？我不是一样在这里喝马奶子弹冬不拉？你说呢，哈密提？”

哈密提脸微微一红，他知道乌斯满话里有话。老爹贾尼木汗在自己还小的时候曾是盛世才面前的红人，被委派作过阿山专区的副专员，当年卡哈拜部落的热斯汗率众反抗盛世才收缴哈萨克族武器，因病住到自己家中，是老爹贾尼木汗奉盛之命用毒茶毒死了他。老爹事后说是医生下的毒手，可哈萨克族人却不这么看，四处传说老爹是盛世才的“黑狗”。

“乌斯满大叔说得对。”哈密提呐呐地连连称是。可他心里却十分不服，你不也投靠过国民党的宋希濂吗？你难道不也是“黑狗”？

会议在乌斯满的主持下，贾尼木汗的二儿子哈密提、哈力别克、阿不斯旦拜、哈德万的儿子扎克汉、吾热孜拜毛拉、卡依毛尔旦、塔克曼巴图尔等 15 人，一致同意了乌斯满的行动计划。

“我这个行动计划并不复杂，主要有四点。第一，由贾尼木汗、吾热孜拜毛拉、卡依毛尔旦负责组织昌吉、呼图壁地区哈萨克族人集中起来暴乱；第二，由哈力别克、萨力斯在南山一带组织哈萨克族人集中动手；第三，由阿迪力汗·莫木拜、阿不都热合曼拜负责阜康一带哈萨克族人行动；第四，由我和胡赛因、沙力克指挥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等地区的哈萨克族人，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视时机自己决定。”乌斯满踌躇满志地吩咐道。他对自己此次能够毫无阻碍，在没有意见纷争的情况下号令哈萨克各部落的结果非常满意。因为，自己

的权威总算树起来了。

“各位都是我们哈萨克族人的巴图尔（英雄），阿勒泰是我们的，将来迪化我们也要去，这三天大家谈得很高兴，下一步的行动我们都商定了，回去后，尽快把事情搞起来，争取共产党到新疆之前拉起队伍。” 乌斯满在酒杯交错中，满嘴流油，热汗直淌。眼前这帮年轻人能够俯首听命，令他实在太开心了。他的脑子热了，一挥手：“唱起来吧，跳起来，好好乐一乐！”

年轻人跳起来了，在歌声和琴声中，乌斯满歪靠在茶炊旁，香气四溢的奶茶热气在他眼前袅袅飘散着。

10年间，他闯过了多少草原风暴，经历了数度追杀，谁又能把他怎么样？从1939年秋盛世才派兵在阿勒泰地区收缴民间枪支开始，他就参加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国民党政权的残酷战斗。当时，盛世才还从迪化派来飞机扫射参战，哈萨克族作战队伍被打散了，一路宰马杀骆驼。从北塔山到阿尔曼特的必经之路达布生，盛世才驻有5000兵马，为闯过这条封锁线，他们总共打了8仗，血战6天，如果不是自己果断决定甩开大队人马，带着40人用柳木做成筏子渡过额尔齐斯河上游逃往自己在库尔特的冬牧场，哪还能活到今天？他每每想起自己单独干的那桩大买卖便充满自豪，他带着这40人在富蕴县通往承化的公路旁抢劫了一个邮政局，从抓获的两个邮差口中得知由承化县出来了200峰骆驼，驮的全是军用品，要邮局护送到巴拉也尔克郎站，交给富蕴驻军收。弄清情况后，他们又伏击了这支没有军队护送的骆驼队，结果发现，其中100峰驮的是米麦，90峰是军用被服，还有10峰是各种子弹，他把这

剿匪大纪实

支骆驼队押到了巴拉也尔特斯草原，并用铁皮包着木头做的假枪让草原上的人们相信他兵强马壮，纷纷加入进来。一年后，连过去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热斯汉、苏来曼和也斯木汉的三支队伍也赶来与他汇合，竟然将盛世才的军队从山区打回了城里，并一举包围了富蕴县城。

盛世才慌了，只得派飞机撒传单求和……

乌斯满玩味着这段风光的历史，共产党的军队又能比国民党的军队强多少，听说他们还没有飞机呢。何况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撤离新疆，两党这一仗势必难免，现在就发动暴乱，他们两边都无法抽出兵力来作战，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说不定，到头来共产党同样会派人前来求和……

他笑了，用手使劲拍着巴掌为在毡房里的舞蹈者们喝彩。

当天下午，乌斯满送走了酒足饭饱的同盟者。

望着渐渐在草原深处消失的马队背影，他相信，草原又将喧嚣起来，将会有更多的马队在阿勒泰驰骋……

第4节 马匪亲信，军统特务，美国间谍，“主战派”威逼，身边人各谋出路，起义还是反对起义，统一还是分裂，张治中发来密电。

陶峙岳自李宗仁电令部队入关及要他赴南京一事后终日坐卧不安。连续几天，他既无心公务，又不愿应酬访客。在他的心底里，只有一个巨大的悬念紧攥着他的一切思绪：新疆怎么办？

自1907年春15岁考入湖南陆军小学，至1916年秋从保定

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毕业，从军报国就是他的人生第一志向。那时，血气方刚的他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护法战争”，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其后又是孙中山北伐的第二次“护法战争”，讨伐广东叛军陈炯明以及讨伐湖南军阀赵恒惕，参加北伐军进攻江西……

那是一个风云突变，革命激荡的年代，作为军人，他无役不战，只企盼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早日成功，为中华民族雄踞世界民族之林甘洒一腔热血，可是，这一切他认为人生最有意义的理想，转眼间就被蒋介石主政后的所作所为无情地粉碎了。

讨伐李宗仁的蒋桂大战战火刚熄，又是兵挫张发奎、唐生智，其后又是蒋、冯、阎中原大战烽烟四起，再之后，又是兵发江西，围剿红军的一、二、三、四、五次军事行动，马不停蹄，征衣带血，而国家民族前途呢？仍是一片渺茫……

这些年来，陶峙岳经历了众多的调防，职务变更，但在蒋氏眼里，他这个湖南杂牌军出身的第37军第8师师长，除了要他去打仗之外，物资装备不予补充，军饷长期拖欠，部队的维持全靠他凭个人关系上下奔走方得以保存。

1935年9月，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为巩固个人实力和地位，防止出草地的红军经甘肃开往陕北，特请将驻防江西的陶峙岳第8师调往甘肃，以在陇西的武山、华家岭一带阻击红军北上。陶峙岳对上司部署的进攻北上抗日的红军十分不满，更不愿意把部队这样不明不白地拼掉，故对红军主力只是虚张声势，让开通路，任凭红军一路东去。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陈诚、朱绍良等人被张学

剿匪大纪实

良、杨虎城扣留，其时陶峙岳率第8师正驻防海源，海源距西安并不远，按说出兵西安解救，那怕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动作，都不会在事后授人以柄，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因为他赞同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营救蒋介石奔走忙碌的人都因“护驾”有功而纷纷得到升迁或赞赏，惟独陶峙岳受到指责，用事后朱绍良转达给他的话来说，就是他对“委员长没有诚意”。

为了要他效忠领袖，陶峙岳被调往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期间第8师被编入胡宗南部，名义上胡任命陶峙岳为其属下的第76军中将军长兼第8师师长，但在实力雄厚的胡宗南军事集团中，显然大受钳制，而且束缚他的绳索越勒越紧。

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事吃紧，陶峙岳求战心切，当即率部南下。9月19日，抵达上海，连夜挥兵发起蕴藻战役。在装备陈旧、补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日军激战21昼夜，直到10月10日撤出战斗。第8师全师除少数后勤人员外，战斗兵员仅余700余人。就连胡宗南见了他，也不得不当面夸奖道：“想不到你们几杆破烂枪，竟打得这样不错！”

陶峙岳善于指挥，又会带兵，眼见76军经抗日战火洗礼，战斗力不断得到加强，胡宗南看不过了，突然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名义，下令第76军军长陶峙岳与第1军军长李铁军对调。

李铁军为胡的心腹亲信，对胡的旨意心领神会，趁对调之机，把第一军军部全部班底和精良的重装备都带走了。其实，

这正是胡宗南吞掉别人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的一贯作法。有蒋介石做靠山，陶峙岳只能把这口气咽进肚里，重新开始治军。当陶峙岳把第1军在抗日战场锤炼成一支备受同僚关注的劲旅时，胡宗南又眼红了，随即指派心腹丁德隆接任第1军军长，调陶充任第34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将其彻底架空闲置一边。尽管此后胡宗南部在扩编为三个集团军时，曾任命陶峙岳为其第37集团军总司令，但同时又任命心腹蔡荣担任该集团军参谋长来监视他。就这样，陶峙岳在这个职位上也仅仅干了一年。1943年秋，胡宗南下令解除陶峙岳第37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调往酒泉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而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所能指挥的仅有一个特务营，驻河西的胡部，他连一兵一卒都无法差遣……

往事如烟，可那一幕幕又是那样清晰地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调动对他来说，没有哪一次是令人愉快的，排挤、打击、欺骗、落井下石、背后捅刀，这一切都让他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

“报告——”一位参谋走进来，打断了他的沉思。“南京方面电报，问陶长官何时飞赴南京，以便他们与空军方面联系飞机。”参谋报告说。

“慢，再等等。”陶峙岳从窗前转过身，沉吟片刻，复又对参谋说：“回南京电报，就说我正在拟定详细的部队入关计划，不日即报。”

参谋领命而去。

说到计划，陶峙岳似乎有所触动。他心里有诸多想法，很想找人谈谈。进入8月以后，他曾私下找驻南疆喀什的副总司

剿匪大纪实

令兼第42师师长赵锡光谈过考虑以北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一事，赵当即表示同意，并保证负责南疆方面的军事行动。同时他还明示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负责东疆行动，北疆则由他掌握。可是，在这严重关头，事态发展很快，不时冒出的有些话和想法，却又不能随便找人述说，就连时常出人司令部的人，亦不敢畅所欲言，这委实让他心绪烦乱。

他曾简单地在脑子里排了一个“钉子”名单：骑兵第11师师长马呈祥，是青海土著军阀马步芳的外甥；第78师师长叶成，为胡宗南的嫡系，掌握着国民党军在北疆的全部兵力；第179旅旅长罗恕人，不但是胡宗南嫡系，还是直接受南京政府保密局指挥的军统特务。罗恕人平日与马呈祥过从甚密，连师长叶成也只得倾附其间，谁也不得罪。实际上这3人是个小联盟，虽然以马呈祥为中心，但主谋则是军统特务罗恕人。此外，还有美国驻迪化领事马克南也不是个安份的人。据说这位洋人两年前就曾带人窜到阿勒泰地区，要哈萨克族头领乌斯满送他到北塔山最高峰阿勒特怒巴测绘中蒙边境地形图，结果被蒙方巡逻的边防军发现，开枪打掉了他头上戴的帽子……

有这些危险人物聚集在迪化，加上还有不少师旅团级军官的态度尚不明朗，这两天仅对人关不人关问题，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事实上，他知道在自己身边的警备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兼第42师师长赵锡光，参谋长陶晋初两人不主张入关，希望以“北平方式”为新疆民众赢得和平解放，他也清楚他们经常与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等人暗中晤商与中共和谈事宜，并不时来家试探自己对新疆前途的想

法。虽然他赞同他们的想法，但眼下迪化情势如此复杂，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旦表明态度，自己赔上身家性命不说，新疆局势的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正是他近来彻夜难眠、茶饭不思的症结。

“不能再拖了——”他想起了在几天前召开的那次简短的会议上，观点各异的两派人士对新疆前途的两种主张已经开始明朗化了。

在那次以“整编部队”为名的师旅长军官会议上，尽管自己抱着静观军中动态的态度，正襟危坐，没有多谈意见，但马、叶、罗三人的态度则是令他万分担忧的。

“陶长官，说到打，我新疆有天山屏障，有10万将士踞守，无论怎样，共军也不可能一日就攻下来的。当然，现在南京方面有令要我们入关，我们亦该应命，迅速行动。”叶成代表胡宗南集团表态说。

“叶师长说得有理。我们值此危难之际，更应该效忠党国，如抗命不从，部属也可能不服，日久恐生变故！”罗恕人紧接着不阴不阳地附上一句，并提示说：“马师长也谈谈看法吧。”

“我赞同叶师长和罗旅长的意见。新疆地域广大，人不入关，我们老马家骑兵走到哪儿都可以与共军周旋，还说不定谁吃掉谁呢？！”马呈祥大大咧咧道。

这三位“主战派”的抢先表态，使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一些不赞同入关的军官不便吭声了。

“人不入关还要看看实际条件。”赵锡光发言了：“自新疆民族联合政府夭折后，各民族关系日趋紧张，局势甚为动荡，何况入关不是说一声就走。诸位想想，10万大军要在千里戈

壁滩上行军，车辆、汽油、沿途补给都不是小事，我粗算了一下，光是开拔费就需要 800 万元以上，这些事务没准备好，我们走得了吗？”赵锡光替军官们算了一笔账。

“副总司令说得是，应该有所准备。”几位旅团长听说开拔费还没拨下来，顿时有些丧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叫南京先给了钱再说。”更多的军官趋向暂缓入关了。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应该向南京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吧，走不走是一回事，表不表示对党国的忠心又是一回事。”罗恕人不安地与马呈祥交换了一下眼神：“陶长官体恤部下令人佩服，但我等身为党国军人，现江南战事吃紧，连胡长官也非常关心我们在疆部队的安危呢，我们可不能让共产党把我们堵在这儿等死，大家说对不对？”

见罗恕人又搬出胡宗南来压自己，陶峙岳不由心底怒火陡升，他沉着脸宣布道：“关于新疆的防务，岷毓（陶峙岳字）自当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到底！”说罢一挥手：“散会——”即起身径自离去。

现在思忖，这样的会不能再开了，再开只能害己害人。既然有一些人和自己走不到一块儿，又何必勉强呢，人各有志嘛！想到这儿，他心里又释然了许多，于是决定召集包尔汉、刘纯孟、赵锡光、陶晋初和屈武等主张不入关并愿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朋友碰碰头，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当他正欲拔腿出门之际，侍从又送来一封电报。细看署名，发电人竟是自己多年敬重的老长官——张治中将军。

展开电文细读，一行行充满关爱与厚望的肺腑之言映入眼

帘：

今局势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疆孤悬，尔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极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毛泽东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甚望尔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①

老长官电报的到来，使陶峙岳眼前一亮。总算得到中共和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了。这封电报，无疑是张治中应毛泽东和中共方面的提议发来的。

说起与张治中的交往，那是在1946年的3月底了。其时张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于同年4月4日赴迪化就职。上任之初，素来赏识陶峙岳人品与才干的张治中对屈困河西走廊的陶峙岳的处境非常同情，加之自1944年11月起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反抗盛世才统治的武装起义持续不断，长期与国民党军队相对峙。为贯彻自己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主政方针，张治中认为陶峙岳是再合适不可的人选了，于是一纸调令任命陶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入疆后，积极协助张治中召开各次大小会议，并在张治中“驻军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的指令下，认真整肃部队，加强维护地方治安，并与张一道努力促成三区代表到迪化举行正式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并于当年6月6日成立了新疆省民族联合政府，使新疆一度紧张的局势逐渐得以缓和。

^① 参见《张治中回忆录》，第581-582页。

剿匪大纪实

新疆局面刚刚打开，陶峙岳又被张治中调往兰州担任自己的副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负责处理公署的日常事务。这期间，西北甘肃、宁夏、青海的形势比新疆更为复杂，将这些棘手之事交给陶峙岳处理，可见张治中对陶的器重与信赖。

陶峙岳调往兰州后，宋希濂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张治中免兼省政府主席之职后，由长期竭力推行狭隘民主主义政策的原省府监察使麦斯武德主政，此人与宋希濂采取强硬措施解决民族矛盾，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此事被受青海马步芳支持的阿山专员乌斯满所利用，不断挑起事端，策动暴乱，不仅使民族联合政府夭折，而且令局势更加恶化。

为扭转局势，1948年8月，张治中再次选定陶峙岳，令他以西北军政副长官之职入疆兼任警备总司令。同年12月底，张治中又电令改组省政府，命包尔汉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并要他有事多与陶峙岳沟通。新疆军政首脑的最后一任人事安排，显然是张治中苦心构架的。

张治中因参加过三次“国共和谈”，素有“和平将军”之称。自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4月23日国民党总统府和行政院由南京迁往广州。此前，国民党政府派专机飞赴北平欲接其和谈代表返宁。中共方面考虑到国民党代表与中共和谈后所形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必为蒋介石所不容，对他们回去后的安全甚为担心，因而恳切地加以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代表们及其随从人员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留下脱离蒋介石政府，转向人民一边。张治中将军留下后，毛泽东多次与之见面晤谈，新疆的问题自然也在议事之中。

这年7月，张治中就国民党政府任命马步芳接替张治中为

西北军政长官之事亦曾致电陶峙岳，要他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包尔汉、屈武共商对策。

其时，张将军公开了劝已下野的蒋介石出国的信，在国民党将领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那句对蒋“暂时出国，以免负混乱之责”的劝辞，气得蒋脸上青筋直暴，大骂“文白（张治中字）丧权辱国！”骂过之后，又听说张的家眷去向不明，遂立即叫来毛人凤，下令：“把于右任监视起来，接到台湾去，勿要让屈武把他弄走了。”

国民党元老于佑任是迪化市市长屈武的岳父，蒋以为扣留了于就可以控制屈武……

耳闻目睹蒋介石的种种不得人心之举，陶峙岳由衷地赞同张治中在“劝蒋信”上的仗义直言：“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频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于十日以来所见所闻，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最后张治中甚至正告蒋介石：“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①

“文白兄所言极是啊。”陶峙岳放下张治中的这封电报，自语道：“是该作出最后的选择了。”

^① 见《张治中回忆录》第800-801页。

第二章 大抉择

第5节 孤注一掷，叛军出营，“主和派”包尔汉、陶晋初、屈武危在旦夕，陶峙岳单刀赴会，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秘赴迪化。

陶峙岳的分析判断一点儿也没错。

张治中将军9月10日的电报，的确是他两天前在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晤面谈话之后发来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张治中说：“解放军已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时不待我，新疆的军政负责人何去何从，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你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在那儿的旧部多，影响大，我们想请你帮我们多做做工作，促成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

张治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帮助感激不尽，很愿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尽一点自己的努力，因此很乐意做这件事。

“毛主席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去做好。”张治中回答道。

“我们希望你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

剿匪大纪实

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和影响，促使他们尽快和平起义。”

“好的，我马上去做这件事。”张治中爽快地一口应承，随后构想好了电文内容，经中共中央审阅后，当即直接拍发给了陶峙岳和包尔汉。

陶峙岳非常感激张治中对自己的关切，更明白他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起义，拥护新疆和平解放已到了刻不容缓之机。尽管他与赵锡光等几位将领事实上已密谈过此举，也知道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驻新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总部政工处处长梁克浔等人7至8月间即已暗中从事和平运动，并分别向有关方面联系，以策动起义。这些事情，他们并没有瞒着陶峙岳进行，甚至认为陶峙岳在默许他们加紧活动。

在陶峙岳身边的人都知道，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后，张治中受周恩来的委托，找陶商议如何将1942年至1943年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的方志纯、杨之华、马明方等130余名共产党员及家属送回延安，陶当即毫不犹豫地就表示赞同，并秘密找来自己信得过的总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要他拟定一个周全的护送计划，嘱咐他可安排10辆美制10轮大卡车运送，就连车上配备多少军医、军需和通讯人员等事项都考虑到了。为防止意外，他还要求刘亚哲带一个排兵力武装护送。刘亚哲果然不辱使命，在从迪化向兰州进发以及进入包围陕北的胡宗南兵力控制区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多次化险为夷，使车队终于7月8日安全抵达西安。

陶峙岳的所作所为和政治态度，在“主战派”的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眼里看来，自然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亲共者”。自上次旅团长以上军官会议结束后，他们发觉陶峙岳显然是在有意拖延部队入关的时间。尽管会议结束后他抽调驻哈密的一个团东移至安西、酒泉一线，说是作为入关的先头部队，而实际上这个团到了玉门油矿之后就没有继续东行了，看来陶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个团是为保卫油矿而扎营的。

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兰州。这时，陶峙岳又积极行动起来，同意挂念关内家属的马呈祥率骑兵第1师入关，并为此专门召开了有关骑1师开拔及交出防地的会议。

“马师长入关心切，目前集中迪化总部的所有车辆一次即可完成，看来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陶峙岳说，他做出此举，是在兰州解放，马步芳有可能率部撤往新疆的情况下决定的。马呈祥不走，势必会招引来已被解放军击溃的马步芳残部，这将给新疆带来更大的动荡不安。

“感谢陶长官的关心，我们这就着手准备出发。”马呈祥显得非常兴奋：“我们此举就算作是陶长官入关部队的先遣队，相信陶长官随后就会入关接应我们的。”

“我建议78师也随同马师长一起开拔入关。”罗恕人这个老奸巨滑的军统特务突然插话。他的这一手，倒有些出乎陶峙岳和参谋长陶晋初的意料。

“是啊，马师长势单力薄，现在入关，恐遭不测。不如我78师配合他们行动，并在星星峡一带设防，防止共军人疆，此事对陶长官来说，不是两全其美吗？”78师师长叶成这时也建议道。

剿匪大纪实

“叶师长所言不差，我亦有此种打算。可是，人关之路遥远，两个师一起行动，车辆和物资无法保证啊，你说是不是？晋初——”他将后面的话交给了参谋长陶晋初。

“是的，光送马师长上路就已经满打满算的把我们的车辆和现有物资用光了，实在无能为力了。”陶晋初心领神会，一本正经地报告说。

会议在一片唉叹声中草草结束。

一出警备总司令部大门，罗恕人拧着脖梗抱怨说：“我老早就主张撤退，大家总是迟疑不决，现在弄到这个地步，可就生死难料啦。”

马呈祥咬牙切齿道：“逼到这一步，大不了鱼死网破！”

叶成劝慰道：“着急也没用，你那边还是和马长官联系一下，看下一步怎样行动，我这边再向胡长官报告情况，届时大家再碰头议一议。”

“就看来来不及了。”罗恕人一副欲哭无泪的懊恼，悻然道。

9月5日，西宁失守的消息传来。

马呈祥叫来叶成、罗恕人两人，劈面一句：“马长官坐飞机跑到香港去了！”

叶成、罗恕人一听，不由怔住了。

“消息可靠？”叶成仍不放心地问。

“唉，错不了。”马呈祥急得直跺脚。

“人关无望，现在倒是解放军要人疆了。”罗恕人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气哼哼的直喘粗气。

“陶长官有请——”门口传来侍卫的报告声。

叶成与罗恕人面面相觑。

马呈祥解释道：“别紧张，这两天陶峙岳每天派卧车来接我到他家吃饭。”

罗恕人问：“别是鸿门宴吧？”

马呈祥有些不快：“吃饭就是吃饭，什么‘红门宴’、‘白门宴’的？是清真宴！”

叶成一摆手：“不要说吃饭问题了。饭桌上陶峙岳都和你谈了些什么？”

“还不是什么要保持新疆稳定啦，要对官兵的生命安全负责啦，走与不走都不能盲动啦，嘿，还不等于废话一通。”马呈祥气咻咻地说。

“你得当心。”罗恕人提醒道：“共产党惯于搞策反。陶峙岳虽然不是共产党，可他身边和身后的人就很难说了。我接到情报，这几天连物质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克浔等人都在一些部队走动，向中下级军官宣传要走和平道路，此事可是山雨欲来的前兆啊。”

“你是说是陶峙岳派他们去的？”马呈祥不安了，复又转向叶成：“叶师长，你跟胡长官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胡长官正在转进四川方向构筑新的防线，他命令我们必要时把陶——”他攥紧手心，将拳头在马呈祥面前一亮。

“那我们这边怎样行动？”马呈祥又问。

“立即采取行动，把主张投共的包尔汉、陶晋初和屈武这些人杀掉！”罗恕人抢过话头，替叶成说出了胡宗南的授意。

“陶晋初是不是先不动？他可是陶峙岳的族弟啊，这样做

剿匪大纪实

会不会打草惊蛇？”叶成道。

说到此处，马呈祥也犹豫了：“陶峙岳还有赵锡光的第42师可依靠，此外，驻张掖的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也与他关系尚可。”

“还有120军副军长彭铭鼎是不是？”罗恕人打断马、叶两人的话：“这些情况我都做过调查，他们的关系并非你我三人的关系，事实上应该说是冷漠。”

叶成有些不放心：“我可听说不一样。”

罗恕人不屑的皱起眉头：“党国内，始于称兄道弟，后又刀兵相见的事还少吗？”

马呈祥见侍卫挽着披风一直在门外等候，不想再耽搁时间了，整理了一下军装领口，对叶罗二人说：“下一步的事，等我吃了饭回来再说。”

罗恕人在与马呈祥分手时，特别交待了一句：“马师长赴宴回来后，咱们还是在老满城你们骑1师的军营里见面，那地方比较安全。”

马呈祥迟疑了一下：“迪化不是还在咱们手里吗？怕什么？”

“小心驶得万年船，非常时期，万事小心为妙。”罗恕人又叮嘱了一句。

当晚，马呈祥、叶成、罗恕人果然在老满城马呈祥的师部碰头密商如何采取行动，并决定在9月24日出动部队，杀掉所有主张投向共产党的人，同时扣押陶峙岳。

“至于陶长官，我看还是再观察观察吧，要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叶成自入疆以来，与陶峙岳相处尚可，平素见陶

峙岳一直对自己以礼相待，两军部队也无磨擦，因此不主张绑架陶峙岳。

马呈祥一连几日都在陶峙岳家赴宴，交谈中，也没有发现陶峙岳有主张投共的迹象，倒是在陶家发现了一个“新闻”——陶晋初当面要向陶峙岳请辞参谋长一职。

“想想看，如果陶峙岳和陶晋初是一路的，他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辞职离队吗？”

罗恕人一脸狐疑：“哦？有这等事？”

“我亲眼看见的。两人当时很难堪，话不投机，一点儿也不像装出来的。”马呈祥肯定说。

三人研究了一阵，决定由叶成面见陶峙岳，要陶峙岳亲口明确表态是否同意抓捕他们拟定好的名单上的人。

意见统一后，叶成立即乘吉普车直奔陶公馆。

时值午夜，陶峙岳早已就寝，听到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和警卫们的问话声，得知是叶成到访，忙披衣起身，在客厅内相迎。

“陶长官，兄弟深夜打扰，实有急事相告。”叶成神色焦急地坦言道。

“没关系，请坐吧。”随即高声向客厅外吩咐道：“给叶师长上茶！”

厢房外响起警卫们急促的脚步声。

“陶长官不用客气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叶成似乎听见门外至少有10余人在走动，知道陶府警戒森严。忙道：“马呈祥和罗恕人认为陶长官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到了包围，为了‘清君侧’，决定要把主张起义投共的包尔汉、陶晋初、屈武抓

剿匪大纪实

起来，现在部队已经准备出动。”他抬腕看了看表，故作紧张状：“哦，也许出动了，我提议先会知您一声，以免大家造成误会，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陶峙岳平静地聆听着，脸上没有一丝的惊慌，待叶成说完，只是轻轻抛来一句：“那你们的第二步又准备怎么走呢？想过没有？”

叶成一时语塞：“这，这倒还没有……”

“就是了吧，凡事当三思而后行嘛！”陶峙岳随手抓起桌上的电话机，摇通了骑1师马呈祥的电话，告诉他叶成在陶公馆，此事事关重大，要他立即下令部队不得妄动，马上和罗恕人一道来陶家而议。

马呈祥见叶成迟迟没有回来，也不知道陶峙岳究竟要作何打算，两人商量了一阵，对部队略作布置，决定驱车赶往陶公馆探个虚实。

马、罗两人见到陶峙岳时，见叶成一脸无奈的正坐在沙发上抽闷烟，气氛倒并不显得紧张，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肚。

“你们要抓人，抓了人以后又怎么办？”陶峙岳劈头一句：“如果枪一响，能保证不两败俱伤？新疆情势复杂，你们这样做，能占多少便宜？”

见陶峙岳而色严峻，马呈祥、罗恕人的语气软了几分。

马呈祥叹了一口气：“我们不这样做，万一别人先动手搞我们，我们岂不吃亏？”

“谁有这样的胆子？我陶峙岳也是个打仗出身的，什么恶仗险仗没有打过，现在新疆的治安由我负责，我是无论如何不允许再出大乱子的。”陶峙岳说完，又耐心地询问起骑1师的

军饷到了没有，关内的家眷是否安全等个人情况。

“五万元饷额还没到。”马呈祥沮丧的嘟囔道。

“看看，部队都快揭不开锅了，再闹事，说不准还要闹到自己头上呢！”

马呈祥等三人本来是想说服陶峙岳的，不想陶峙岳却条理分明地一一替他们分析了眼前的处境和国内时局，谈话直到天亮，三位说客只得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

没能说服陶峙岳，但见陶峙岳也没有为难他们，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倒真有些搞不明白了：陶峙岳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第二天下午，当他们三人在老满城再次开会密谋之际，陶峙岳却来到了骑1师师部。

陶峙岳的突然光临，陡地使三人十分惊异，但见他一个警卫也没带，只身来见，倒也消除了不安。

“昨晚时间仓促，有些事还没谈透，我今天登门拜访各位，就是想再听听你们的意见。”陶峙岳若无其事的随便往会议桌前一坐：“接着谈吧。”

陶峙岳的反客为主，使马呈祥等人面色窘迫，连声说：“还是请陶长官发表意见。”

陶峙岳除了重复昨晚的观点之外，主要还是设身处地从他们自身利益和新疆的前途命运娓娓而谈。弄得三人自己又拿不出解决当前处境的办法，又驳不倒陶峙岳的说理。最后，还是罗恕人横杀一枪：

“陶长官，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罗恕人的想法，实际上正是马呈祥和叶成与他这几天一直在琢

剿匪大纪实

磨的一个疑问。他们认为陶峙岳之所以要保持新疆 10 万官兵的稳定，肯定是欲拿这些部队来与共产党讨价还价，好在今后的谈判中多几块筹码。

陶峙岳笑道：“我个人的生死毫不足惜，只要新疆 10 万官兵及家属的安全有保障，我即刻解甲归田，到山林处终老残生。”

陶峙岳此番话，大出马呈祥等人的意料，知道陶峙岳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他们走到一块儿去了。

经过两次长谈，陶峙岳与马呈祥等人之间仿佛订立了彼此不相伤害的默契。

转眼，一个多星期过去了。9 月 15 日，中共中央派往新疆的特派员邓力群从伊犁秘密来到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向他们表示了慰问，他把毛泽东发给陶峙岳的电报亲手交给了陶峙岳。根据上次张治中电报上有关新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民族等实际情况，陶峙岳在这次会见中详细向邓力群作了介绍，并当面向邓力群表示，他将不顾个人安危，不辜负毛泽东主席和张治中将军的期望，选择时机，和平起义并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

会后，陶峙岳即以个人名义就和平起义事宜拟就了一份电报回复张治中。

安排好邓力群的住处后，陶峙岳立即找来陶晋初，命他带领可靠的警备部队担负警卫。

陶晋初听罢陶峙岳的布置，这才恍然大悟：“大哥，我差点儿错怪了你！”

陶晋初自北伐起即一直跟随陶峙岳，平时喜爱看些进步书

刊并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还曾会见过徐特立、叶剑英等中共高级干部。蒋介石下野后，他积极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奔走，但7、8月份后见陶峙岳对和平解放新疆一直保持低调，而且一再争取马呈祥、叶成等人，以为他动摇了，变卦了，因此给大哥写了一份意见书表示不满，要大哥不要再为独夫蒋介石效劳了，并提出了辞去参谋长之职的请求。

现在他一切都明白了。

“老弟呀，有些事我也是身不由己啊！两个月前，我就和赵副总司令谈过了，我们约法三章，一是待解放军接近新疆，即派人去接洽，把部队交出去接受和平改编，二是事成之后，解甲归田；三是部队改编时不惊动三区民族军，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动荡。现在看来，这三件事都快要实现了。”陶峙岳说到这里，不胜感慨。

“大哥还有什么吩咐？晋初一定万死不辞！”陶晋初问。

“我已命曾震五乘车去兰州了，要他协同彭铭鼎稳住河西局面，有机会迅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以保持与我们一致行动。”

陶峙岳向陶晋初面授机宜后，兄弟二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近来少有的笑容。

“老弟，马呈祥他们那几个人，还不能放松，特别是邓先生的到来，更要注意他们的动向。”陶峙岳在与陶晋初分手时，再次叮嘱道。

和局初定。

第6节 三路挺进，日夜兼程，战车五团哈密险遭鸿门宴，我军首次实施大规模空运行动。

为加速大西北的解放，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第18、第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并命其于6月先后西渡黄河入陕，使第一野战军的兵力由22万人猛增至42万人，为我军在西北实施大兵团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自1949年8月12日，我军各兵团开始西进，9天追击700余公里。由王震率领的左路第1兵团，于8月16日在临洮击溃敌新编军后继续向临夏进攻，而我右路的第19兵团和中路的第2兵团，则于8月20日兵临兰州城下。

此时，河西走廊之敌第120军、第91军在兰州被我军攻击后，正由景泰西撤古浪，在乌鞘岭布防，并于9月初在古浪以北的双塔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步兵乘汽车逃窜，骑兵担任掩护，企图利用我军步行无法追赶汽车的困难，退至玉门一线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根据战场态势，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决定，以第2兵团3个军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第1兵团之第2军由西宁北越祁连山，直达张掖，截击逃敌，并在此与第2兵团会合后再行西进。

第1兵团率第2军出发后，自9月10日至19日共前进600余公里。一路顶狂风，冒雨雪，不惧严寒，虽然行军途中冻死冻伤百余人，但指战员们杀敌心切，终于一鼓作气越过海拔5000米的祁连山，在民乐歼敌骑兵第15旅32团，于六霸

又歼敌第 245 师之 735 团，之后以 30 分钟战斗攻克张掖，歼敌第 245 师第 733 团、734 团全部。19 日晚，由山丹西逃的敌第 172 师骑兵团到达张掖后，见张掖已被我军攻占，到此等于自投罗网，无奈之下只得下马投降。9 月 20 日，张掖以西敌第 91 军第 246 师之第 736 团亦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投降。至此，敌第 120 军、第 91 军已基本就歼。9 月 21 日，第一野战军的第 1 兵团与第 2 兵团在张掖胜利会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张掖后，河西走廊地区已无敌之正规军了，所剩仅酒泉第 8 补给区部队及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残部。

这些一夕三惊的国民党军残部，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部队中的指挥官今天不知明日的行动方向，士兵除了想逃命就是等待何时缴枪回家。9 月 24 日，与陶峙岳已有约定的西北军政公署参谋长兼 120 军副军长彭铭鼎以陶峙岳名义在酒泉率部通电起义，同时曾震五在兰州会见彭德怀，商谈新疆和平问题。酒泉敌军残部解决后，我军即以汽车 20 余辆，步兵 1 个营、山炮 6 门，配合同年 8 月由第四野战军调拨的战车营组织起快速纵队，于 9 月 25 日一举抢占了老君庙油矿。26 日，起义部队又以汽车 100 辆运送第 1 兵团第 2 军第 4 师进至玉门，27 日抵达安西。

至此，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北上，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一线集结行动的完成，入疆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曾震五代表陶峙岳在兰州与彭德怀见面商谈后，当日下午陶峙岳即派刘孟纯与包尔汉商量，决定军队比政府早一天起义，以稳定军心和民心，包尔汉同意了陶峙岳的意见。

剿匪大纪实

事实上，当胡宗南得知彭铭鼎在酒泉以陶峙岳的名义通电起义后，便马上给陶打来电报质问，并在电话上大骂陶峙岳跟共产党走太糊涂，逼他明确答复是否是其指使彭铭鼎在酒泉起义的。

陶峙岳以“处境困难”及“为官兵及其家属安全”着想为口实，草草回了电报，便不再理会胡宗南了。

准备就绪后，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领全疆近10万官兵通电起义，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发出起义通电，至此，新疆全省宣布和平解放。

当迪化全城军民为和平解放而奔走相庆之际，陶峙岳正连夜致电在兰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请求他迅速派部队入疆。

9月27日，在迪化新疆省政府西大楼面前的广场上，隆重召开了庆祝新疆和平解放大会。陶峙岳、包尔汉等军政首脑出席大会并向全疆各地发了通电。在会上，中共中央代表邓力群还发表了热烈欢迎新疆军政界人士加入人民阵营的讲话。

9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给全体新疆起义人员复电慰勉，称赞其“立场是正确的”，“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全体起义人员“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在天山南北为和平解放而欢呼之际，新疆的形势依然十分

复杂。陶峙岳并没有忘记仍然手握兵权的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

在通电起义前夕，陶峙岳、包尔汉不时轮流宴请三人，召集他们聚在陶家打麻将，使之与部队中断联系，并在谈话中力劝三人选择明智之举，交出部队，听候改编。

陶峙岳这套“太极拳”打得外柔内刚，但马、叶、罗三人实际上在最后关头仍没放弃组织部队暴乱的主张。马呈祥得知家属已安全到达广州，有“人质”在押，自然不敢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要他此刻为“党国尽忠”指挥部队暴乱，又担心不是陶峙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对手，内心矛盾至极。而叶成则是个怕老婆的人，其太太闻知丈夫欲参加并将指挥部队暴乱后，在家里大闹了好几次，骂他这样做将死无丧身之地，搅得叶成左右为难。罗恕人尽管坚决主张暴乱，却又一时无法与马、叶就暴乱取得一致意见。

这天，当他们三人再度被陶峙岳请到家中作客时，陶峙岳终于向他们摊牌了。

“诸位与我共事多年，现在新疆时局已到了关键时刻，近来我们谈过多次和平起义之事，既然各位与我有不同的主张，大家走不到一起，那我们就互不勉强了。你们的有些事情，我也不追究了。从即日起你们把部队交出来，争取有一条好的出路。”陶峙岳开门见山地说。

“交出部队可以，但是我们希望陶长官给一条生路，放我们离开新疆出国，只要能保证实现这一条，我等决不再羁留迪化。”叶成说。

“事已至此，我们也不愿意和陶长官对抗。”马呈祥附合

道。

其实，这三人之所以能够比较统一地当面向陶峙岳提出出走的请求，是因为他们已经计划好必要时将所属部队撤往南疆喀什一带，以与正在暗中煽动哈萨克族群众叛乱的乌斯满等人汇合。

“走是下策，还是留下来为和平事业出力为上，只要各位愿意留下，我陶某愿与大家同生死共患难！”陶峙岳仍恳切挽留他们三人。

“败军之将，留下又有何颜面，请陶长官恩准我等之最后的请求。”一向说话刻毒的罗恕人，此时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 and 圆滑。

“既然各位去意已决，那我就礼送各位出境。”陶峙岳见三人并不反对交出兵权，已经排除了起义的最后障碍，目的达到了，没有必要再与他们纠缠不清，但仍当面为他们今后回心转意留下余地：“各位走后，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回来，我陶某举双手欢迎。”

就这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走了。

由于马叶罗三人的突然离去，其所属部队参加起义后，一些官兵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加之少数顽固分子的从中捣乱滋事，迪化一时谣言四起，有的说：“陶峙岳害怕被人刺杀，已经坐飞机跑到内地去了。”有的说：“三区民族军要与解放军打仗了！”还有的说：“共产党要毁灭宗教”等等，除了造谣生事，天一黑还有人乱放黑枪，少数军官公开带领士兵闹事……

事态是严重的，为了尽快保持部队稳定，陶峙岳于10月5日前往酒泉。6日，彭德怀从兰州赶到酒泉，两人于7日见

了面。

“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彭德怀紧紧握住陶峙岳的手说。

“我这次来就是迎接解放军入疆的。”陶峙岳与彭德怀及在场的王震均为湖南人，大家以乡音彼此问候，自然格外高兴。

“陶司令这次在酒泉多住几天，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干几杯酒呢。”王震知道彭总此次来酒泉主要是为了主持1兵团党委扩大会，研究部署部队入疆的具体行动计划，但他还是抽出时间陪同陶峙岳参观了部队驻地，了解指战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军事训练情况。

“解放军纪律严明，军容整齐，而且高级将领生活朴素，实为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陶司令今后可就要和我们一起吃这样的苦啰。”王震打趣道。

陶峙岳在酒泉待了3天，向彭总与王震等人介绍了新疆军政机关起义的经过，汇报了新疆的复杂形势，商谈了起义部队的整编及改造工作。

“王将军，有一件事我要向彭总和你检讨。”陶峙岳解释了他为何同意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离境的问题。

见陶峙岳有些不安，王震说：“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是不是有人说你放走了坏人？”

“王将军如何看？”陶峙岳谦逊地问

“陶将军放心，我已经代你澄清了。这件事做得没有什么不好，与我们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相通的，不仅不应该受到指

剿匪大纪实

责，而且还应该表扬。”王震的一番话，说得陶峙岳又惊又喜，解放军果然是仁义之师，高级将领个个虚怀若谷，与国民党阵营的主政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10月10日，一身轻装，心情愉悦的陶峙岳离开酒泉返回迪化。

在彭德怀主持的第1兵团党委扩大会上，他向全体师以上干部传达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关于进军新疆的命令。

“新疆现在和平解放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这些边防线都亟待我军尽快去接管防务。还有近10万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需要进行统一改编。同时，那里的敌对势力还在活动，一些国民党军的顽固分子千方百计破坏和平解放。因此，我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火速进军新疆，把它真正控制在我军手上。”

会议制定的三路进疆计划为：第一路以战车5团附一个加强步兵连为先遣队首先行动，开进新疆首府迪化；第二路的第1兵团2军之4、5、6师由480辆汽车分两路运送进疆；第三路的第1兵团6军则分乘飞机和汽车向北疆、东疆和迪化开进，从而完成全部进军行动。

毛泽东对解放军进军新疆极为关注。他曾亲自电示彭德怀：“凡由一野准备的事项，如粮秣、被装等应当抓紧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帮助入疆部队解决300~400辆汽车、50万块银洋及单独在新疆使用的货币，并商定由苏联民航派来30架运输机，从华东军区抽调了425辆汽车、华北军区抽调了100余辆汽车，又从原国民党军起义部队中筹集了320辆汽车加上原1兵团自己的车，这样，总共约有700余辆汽车担任

了王震1兵团进军新疆的陆运任务。此外，还有许多商车和近千匹骡马也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行动。

西北广大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仅用20多天时间就筹集了多达几千吨的粮草衣物和御寒物质。加上东北解放区军民的大力支援，进疆部队的一切物质准备就绪。

1949年10月7日，我战车5团在团长胡鉴的率领下，首先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开始了向迪化挺进。

隆隆的战车在茫茫戈壁上昼夜不停地开进着，指战员们斗志高昂，克服了大沙漠、大戈壁干燥缺水、炎热难耐等困难，向着新疆奋勇开进。

东疆，哈密。

战车5团一路风尘仆仆的开到了这个总算人烟稠密的地方。

驻哈密的国民党军为整编第78师第178旅，旅长莫我若。尽管该旅在莫的带领下已宣布响应陶峙岳的通电起义，实际上作为胡宗南的嫡系，这支部队中的不少旅团级军官包括莫本人在内却并非心甘情愿的拥护新疆的和平解放。他们此时对尚未受到致命打击的胡宗南集团仍抱有幻想，加之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的不了解，敌对情绪依然存在。

当178旅派人与解放军战车五团接洽时，胡鉴团长受到了进城“洗尘接风”的宴请。

“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先遣队感谢贵军的盛情接待。”胡鉴对那位满脸堆笑的联络官说。

“是。”联络官向胡鉴敬礼：“请长官随我来。”说罢跳上引路的美式吉普车，作为前导引路开道。

剿匪大纪实

胡鉴坐在车上，他将身子探出车窗，不时打量着车队行进道路两边的地形。汽车颠簸着，他的心也开始随之打起鼓来。

这是一个只有一条通道的沙石遍布的干河套，如果河套两边的山坡上设有伏兵，那么，整个车队都将处于对方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走这条路，无异于是钻进了178旅预先布置好的“口袋”。

山头上果然出现了骑兵的影踪。马队一会儿跃上山头，一会儿又消失在沙丘后面，时隐时现。胡鉴一眼就看出那并非当地骑马的牧民，从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向车队张望的行动来分析，显然在监视我解放军车队的行动。

“奶奶个熊，跟俺耍起了花枪！”从东北战场转赴西北战场，胡鉴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儿——打不能打，骂也不能骂。

这算什么接待？一个劲儿把我们往死胡同里领，真要是打起来，战车5团非吃亏不可！胡鉴心里暗想。可这是和平进军呀，对方是已经宣布起义的部队，过分小心还容易引起误会，对我军形象和诚意都将造成不利的影响，可是万一大意了，这些家伙真动起手来，部队受到损失，又怎么向兵团领导交待？

“命令各车加强警戒，保持战斗队形，车队照常前进！”胡鉴下达了进入哈密前的第一道命令。这时，他才头一回领略到王震司令员所谓“打政治仗”的棘手之处。

引导车在哈密城郊停下了。那位联络官又是一路小跑前来向胡鉴报告：“请车队在此暂停，几位长官随我前往旅部赴宴。”

车队依旧停在河套中，此处地形比刚才经过的地方看起来更为险恶，且天色渐晚，战士们经过一天颠簸劳顿，早已人困

马乏。

“真是个好窝儿。”胡鉴跳下车，小声骂了一句。

“团长，你看——”通讯员凑近胡鉴小声提醒道。

又是那队尾随车队的骑兵，而且人数显然大大的增加了。

178旅联络官察觉胡鉴神色严峻，忙打着哈哈解释道：“那是我们旅的骑兵团。旅长交待过，为保证和平协议的顺利实施和贵军的安全，特意为贵军护驾。嘿嘿，请别误会。”

“是啊，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难得贵军美意。”胡鉴是个心里不会绕弯的军事干部，看来这联络官也不是个一般的小角色，你的心思还没说出口，他就知道该在那儿等着你了。现在，既然对方已经把话挑明了，解放军岂能当草包？

“回去告诉你们莫旅长，我们准时前往，该去的人一个也不会少！”胡鉴神态坦然，磊磊大方地说。

“那好，我这就回去复命，做好迎接各位的准备。”联络官见胡鉴明确表示赴宴，使命已经完成，便作告辞。

“团长，这顿饭怕是不好吃咧！”这时各营干部们都赶到胡鉴身边，一位营长望着拖着一路烟尘远去的吉普车，俏皮的说。

“讲什么怪话？！”胡鉴扫他一眼，“人家不是说了吗，一切为了顺利执行和平协议嘛，你难道还没有他觉悟高？”

“我看今天他们就差点包了我们的饺子。”那营长仍不服气。

“我眼睛又不是瞎的。奶奶个熊，真请也好，假宴也罢。我们非去不可！”胡鉴实际上心里也对这种异常现象持有几分疑虑，可是作为兵团入疆行动的先遣队，每走一步都是应该慎

剿匪大纪实

之又慎的。

别看胡鉴嘴上说得没事儿似的，如果他知道就在二三天前这个旅的第533团已发生暴乱，不仅在哈密中央银行抢劫了准备作为全疆驻军饷秣的1万另26两黄金，并纵火烧毁民房211栋，连带所掠的当地群众的财物，整整装满了20辆大卡车扬尘而去的话，他绝不会如此从容地跟着那位联络官在河套里转悠老半天了。

此外，他也不知道178旅旅长莫我若已接到宋希濂密电，正拟率该旅官兵出走祁连山，而且已将所有车辆备好，准备立马出动了。试想，战车5团在这个时候来到哈密，莫我若能不紧张吗？抢银行有他的亲信参加，533团叛变出走他也没有阻挡，这一切在任何人眼中看来，只能用预谋来解释。

但莫我若毕竟害怕我解放军兴师问罪，他的目的是安全出走，最好能逃到国外去，因此，他尚不主张对人少车旧的战车5团贸然下手，坚持请胡鉴赴宴，并以起义将领的身份蒙混过关。

然而，这一切，胡鉴当时并不知情，所以，十分大方的接受了邀请。

“团长，你这一去，出了意外怎么办？”那位营长似不放心。

“人家现在已经起义了，大面子上是友军了，咱们行动反应过头了，人家会说咱解放军没气度，那还当个鸟先遣？我们去后，你们立即把部队和车辆转移到城北的制高点上，车辆集中，放好警戒哨。”

“是。”几位营长听胡鉴这么一说，顿时明白了。看来，正

如团长所说，他的眼睛亮着呐。

宴会按时进行。

当胡鉴等人满身征尘的出现在 178 旅旅部时，莫我若忙双手抱拳对胡鉴等人说：

“欢迎欢迎，蒙胡长官赏脸，兄弟代表 178 旅全体官兵为贵军入疆接风洗尘，请——”说罢将胡鉴等人让入席间。

胡鉴望了随行的几位同志们一眼，示意大家不要拘礼。他此时心里真是万分感慨，没想到这一路拼杀，打到头来竟会和满屋子穿国民党将校呢军装的敌军将领坐在一起喝酒。

“莫旅长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新疆人民的安全着想，毅然率部起义，实在令人高兴。来，我敬你一杯！”胡鉴是个爱喝酒的汉子，此时酒香扑鼻，早已令他那饥肠辘辘的肚皮忍不住咕咕作响，但他深知手中这杯酒的份量，谈好了，工作做到家了，自己或许才能率领部队顺利出城，反之，一场突如其来的恶仗，无疑将使他肩负的先遣入疆的使命顷刻化为泡影……

其实，他们一行刚到 178 旅驻地，就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对方如临大敌的气氛。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在大门口端着冲锋枪一字排开的全副美式装备的警卫们，既像是列队欢迎，又像是在无形示威。

这顿饭让胡鉴几人吃得并不踏实。除了胡鉴，其他几位干部也不时抽眼瞟瞟团长，那神色好像在说：“车队现在怎么样了，在家的同志可不能麻痹大意啊。”

胡鉴明白大家的心思，此时此刻，他尽量将在军部开会时听来的有关新疆和平解放的政策和宣传提纲上的词汇收集起

剿匪大纪实

来，并力图用“官话”来应酬场面，直听得几位随行暗自好笑，“团长啥时候也变得文绉绉的了？”那个稍不留神就溜出口的“奶奶个熊”，今天还真给管住了。

敬酒、干杯，胡鉴平生头一遭给面前这位旅长戴了一大堆高帽子，直乐得莫旅长不时起身鞠躬：“感谢夸奖。”

宴会至深夜结束了。

胡鉴一行离开时，发现 178 旅旅部门口的警卫早已撤去，那些奔跑了一天的马匹在马厩里老老实实地打着喷鼻、嚼着草料。

皓月当头，满天繁星，大漠竟是那样的宁静。

胡鉴一行走出几里路，突然见附近沙山上跑出几十位团里的干部战士，他们提着枪，有的手上还握着手榴弹。他们担心团长等人的安危，已经在这儿忍饥挨饿地守候了好几个钟头了。

“奶奶个熊，上车，立即出发！”胡鉴朝他们一挥手，大着嗓门喊道。

战士们簇拥着团长，一路疾步向临时宿营地走去。

战车 5 团当夜按计划驶出 178 旅驻地，沿途穿过沙谷戈壁，经吐鲁番盆地，历时 13 天，于 1949 年 10 月 20 日下午胜利开进迪化市，并全面接管城防，控制了机场，保证了后续大部队的顺利到来。

比战车 5 团提前 10 天到达迪化的为 1 兵团第 6 军的少量先遣人员。该部人员按总部指示，乘坐一架由苏联提供的运输机于 10 月 10 日飞抵迪化，在机场建立了空运指挥机构，拉开了我军史无前例的首次大规模空运部队的战略行动。

在战车5团的护卫下，从1949年11月5日开始，由苏联民航提供的40架大型运输机，陆续将1兵团指挥部、直属部队，和第6军的一部份先后空运至哈密、迪化等地接防。到1950年1月20日止，由酒泉飞往迪化的空运飞机共543架次，共运送兵员15000余人；从酒泉飞往哈密的飞机共160架次，空运兵员4185人次。此外，还空运了近13万公斤的物资入疆供部队需要。在这前后700余架次的运输飞行中，由于苏方人员同我军进疆部队合作得很好，没有发生一起事故，圆满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一点，也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如果说战车5团是机械化行军，兵团直属队和6军部分部队是航空运输，两者皆较为顺利的话，那么，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的徒步行军的进疆部队，则经历了一场事后令野司彭大将军感慨万端的艰苦战斗了。

茫茫戈壁，千里荒漠，人烟渺无，气候恶劣，这一切都对我军指战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严重考验。从陆路徒步行军入疆的部队于1949年10月8日出发，西出嘉峪关，进入了日夜温差极大的浩瀚沙海。

这里录下了一个十分令人难忘的场景——

长长的行军队伍，昼夜顶着铺天盖地刮来的滚滚风沙，指战员们腰拴草绳，一个牵住一个、一人拉住一人，缓慢地一步步艰难行进着。有人倒下了，马上就有人上前将他扶起来，有人走不动了，立即就有指挥员主动让出坐骑。沙漠行军，水就是生命，部队有时走上几百公里也找不到水源，一路上的饥渴加上以“塞外三怪”著称的安西大风、巴里坤的奇寒和吐鲁番

剿匪大纪实

的燥热，都成了部队的拦路虎。

面对这些艰难险阻，解放军战士们却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困难再大，没有我们的决心大！障碍再多，也阻挡不了我们进军新疆的脚步！”

伤员和病号在不断增多，尽管饮水几乎断绝，但只要伤病员需要，都会有人把自己身上携带的最后一口“生命之源”拿出来。战友情、同志爱，是这样金子似地珍贵。夜晚戈壁气温骤降，沙漠里无法宿营，指挥员一声令下；“继续走——”战士们便一骨碌翻身爬起，二话不说就行军赶路。

沙漠里行走困难，不少指战员就用棉絮和破布把脚包起来，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向前挪动，许多战士的腿脚被沙子磨破，血肉模糊，但他们个个咬紧牙关，谁也不肯哼出声来，仍然坚定执着地跟上部队……

就这样，向东疆挺进的第1兵团第2军部队在吃大苦、耐大劳、团结一致、奋勇前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鼓舞下，长途跋涉2500余公里，于1950年3月，终于征服沙漠戈壁，先后胜利的进驻南疆的喀什、和阗、疏附、阿克苏、焉耆等地区，全面接管了自己的防区。

在这期间，第1兵团2军5师步行13天抵达南疆的阿克苏后，突然得到报告，和阗地区有人企图制造暴乱破坏我军进驻。

2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商议后，立即命令该师15团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和阗，以稳定那里的局势。

15团遵照军首长的指示，当即派出先遣队乘汽车开赴和阗，团主力紧随其后出发。12月5日，全团开进，徒步向南

疆挺进，直插和阗。

这又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行动。

南疆人把通往和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称为“死亡之海”，但为了争取时间，15团官兵还是毅然绝然地选择了这条最为艰险的道路，踏上了和阗故道。

“解放军要向和阗进军了！”

消息震动了阿克苏人民群众，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在不到一星期时间内即筹集了5余万公斤粮草，300余峰骆驼和200多匹马及足够的饲料。当地的几位维吾尔族老人还自告奋勇为部队当向导。

艰难的征程开始了。

在这条千年故道上，流沙早把道路掩埋，使人很难辨清方向，迷途掉队的事经常发生，就连担任尖兵的15团侦察分队也因无法判定站立点而常常迷失方向，被困在沙海里摸索着前进，有时一困就是好几天，缺粮断水，弄得全团上下反而为他们揪心。

有的迷路的战士，孤身奋战沙海，硬是凭借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和顽强意志找到了大部队，一些在战场上炮声隆隆不眨眼，子弹横飞不弯腰的汉子，从被困的沙海深处走出来重又见到首长和战友时，竟孩子似的一头扎在他们怀里激动的失声痛哭……

侦察分队终于打开了通道，团主力循道前进。行军至第7天时，全团断水10余个小时，担任向导的维吾尔族老人好容易记起前方有一个坎儿井，但当战士们找到它时天已黄昏，一探水井，干枯的井底硬梆梆的。官兵们只得紧咬着干裂的嘴唇

剿匪大纪实

继续前行。

塔克拉玛沙漠的风沙大得惊人，沙尘暴一起，连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挣扎着四处逃散。但15团官兵紧密团结，互相鼓励，硬是顶着飞沙走石坚持行军。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停下就意味着死亡，1营2连的一位排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风沙夺去生命的。

经过12天的顽强拼搏，15团终于走出“死亡之海”，随即又马不停蹄的赶到离和阗不远的阿塔提斯，以兵临城下的态势震慑住了企图发动暴乱的反动分子，稳定了局势，为南疆的和平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直入新疆的这场大进军，正如后来彭德怀所赞叹的那样：“我军将士进军新疆，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第7节 抢劫银行，捣毁商店，强行扣押解放军40辆送兵车，杀害押车队长及战士，战斗力颇强的国民党起义部队骑11师2500人一夜暴乱，打死区委书记，包围当地解放军驻军，王震闻讯大怒。

1949年9月26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仅两天，一连串的自由国民党特务策划，有散兵游勇及当地部分国民党驻军参加的抢劫和暴乱活动即频繁发生。

9月28日深夜，驻哈密国民党军178旅533团部分官兵在反动军官煽动下，抢劫了国民党中央银行哈密分行金库及一些

商号，并放火烧毁大量的民房。

同一天，驻景化 179 旅 536 团 2 营 2 连连长刘少农，聚众反对起义，开枪打死营长李明海，策动该旅部分官兵叛乱。

10 月 6 至 7 日两天，驻库车的国民党军 65 骑兵团副团长郭壁田率领部分官兵携枪冲出营房，上街抢劫银行和商户，连一些民宅也不放过。

10 月 7 至 8 日，65 旅驻吐鲁番的 194 团 1 营营长李先锋反对起义，率手下士兵冲入县警察局抢劫枪弹、马匹、破坏电讯设施，并洗劫银行、商号及民宅，刺伤当地警民 20 余人。

10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 兵团 2 军 4 师 12 团抵达鄯善时，65 旅 194 团营长丁少斋支使手下便衣排长将欢迎我解放军入城的县长司马义打死，并趁乱在城内放火焚烧建筑和大肆抢劫。

10 月 5 日至 28 日，驻轮台第 128 旅 382 团 1 营的 3 个连和团直 3 个连（共 6 个连）的官兵，在团长杨升桂的授意唆使下，在驻地疯狂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勒索金银及货物。

这其中最为令人震惊的为“七角井事件”。这是一起由国民党起义部队中顽固反对起义、坚持与共产党为敌的反动军官策划的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杀害解放军官兵的严重暴行。11 月 18 日，驻七角井国民党军 178 旅 2 个营扣留我第 1 兵团 2 军东返运兵汽车 40 辆，后奉该旅旅长莫我若之命将随车人员及车辆劫至哈密旅部，其后将我押车队长 1 人、战士 13 人残酷杀害……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这些触目惊心的叛乱及严重暴行，令主政新疆的陶峙岳深感事态棘手，必须稳定军心，消除民众顾

剿匪大纪实

虑，强化和整顿社会治安。

作为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此时惟一能够选择的就亲自出马，深入部队进行劝戒和宣慰。他相信，广大起义部队官兵是真心拥护和平，愿走光明之路的，煽动暴乱和参加闹事的仅是少部分人。

当他听说驻纳斯县城的部队出现叛乱迹象时，当即率领几位随行人员前往，召开军人大会向官兵们说明为什么要起义的道理和部队官兵今后将会得到妥善的安置。

正当他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讲话时，突然从会场一角冒出一阵狂呼乱叫。

“我们不听共产党的宣传！”

“再不发饷就造反！”

“当官的都跑了，把我们扔下不管了！”

“不能坐等解放军来解决我们……”

……

会场顿时骚动起来。在士兵们的叫骂声中，隐约可以听到拉枪栓上子弹的声音。

“陶长官，赶快离开这里吧。”随行人员紧紧围拢陶峙岳，有人小声劝他赶快走下讲台。

“弟兄们，静一下——”陶峙岳腰板挺直，神态凛然的向台下挥手示意：“我陶某身为你们的长官，在新疆局势的危急关头，早已舍弃了自己的一切，你们想一想，我既然放得下这个总司令的官位，也没有坐飞机跑到香港、台湾去，我图个什么？还不是放心不下你们大家和新疆民众！坦而言之，起义之前，我曾有过打算，那就是把和平解放事宜安排好了，立刻回

家种田。我现在对大家还负有善后的责任，谁要开枪，就朝这里打吧！”他用力手拍胸口，大声说罢，举目环视着台下的官兵。

会场安静了。

“陶长官说得有道理。”

“是啊，再闹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不能把气撒在陶长官身上……”

士兵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那些想闹事的，干吼了几声后便给四周一片嘘声压制下去了。

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叛乱，终于为陶峙岳的临危不惧所震慑。

为了稳定部队，陶峙岳亲自执笔撰写了《告全疆将士书》，他首先就当前的利害、是非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指出：“忘掉了利害和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只要弄清了利害是非，就不会有愤慨，就不会有牢骚，就不会有怨恨，更不会有任何不幸的事件的发生。”他在文中从新疆特殊的军事、地理、环境、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分析，指出只有走和平道路，才不至于“十万军队盲目的牺牲和地方秩序的紊乱，人民流离失所乃至引起民族的仇杀”，从而“保全了国家的元气、拯救了人民、保护了袍泽”。

陶峙岳在《告全疆将士书》中还说：“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们的行动是光荣的，大家不要上反动分子的当。”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陶峙岳以自身的理解和认识，告诉新疆广大军民：“我们今天认清了共产党，认清了人民解放军。以往的宣传有错误，知道他们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受了

剿匪大纪实

一些无稽的诳话的欺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个暴戾的集团……解放军开驻新疆，完全是因为国防的需要和努力新疆的建设，不是来解决任何部队，对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

最后，陶峙岳向全体将士提出了三点要求：

1. 严守岗位，遵守纪律；
2. 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
3. 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除了身体力行，陶峙岳还派出警备总部的检察课长刘尊贤组织军法组，分赴各出事地点调查事件真相，并视其情节轻重予以惩处，还组织救济组，携带钱财和衣物前往灾区救济民众，这两项措施，不仅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还提高了起义部队的声誉。当然，陶峙岳深知每一次叛乱的背后都有国民党特务作祟，正是这些蒋家王朝的死心塌地分子，在新疆境内呼风唤雨，制造罪恶。为此，他责令总部高级参谋银豫章负责处理和制裁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其中顽固不化者，坚决予以镇压。

应该说，陶峙岳以宣慰为主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全面接管全疆防务之前，能够基本上保持 10 万军心动荡的官兵情绪的稳定，已是相当不容易了。

10月20日，王震率领解放军第1兵团大部队陆续入疆，随着各大城市防务的易手，骚乱势头一天天被平息下来。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彭德怀，张治中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

12月9日，彭德怀和张治中抵达迪化。在陶峙岳、包尔汉的陪同下在市中区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上检阅了第1

兵团举行的隆重入城式。

12月10日，彭德怀、张治中与陶峙岳、包尔汉举行会议，就新疆起义部队的安置作出了部署。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为作好改编工作，彭德怀指示从第1兵团抽调1650余名干部到起义部队，以加强各级领导力量。

12月17日，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新疆军区正式成立。

命令任命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领导人赛福鼎为副司令员。

12月19日，起义部队开始集中改编。改编前，陶峙岳又以起义部队最高指挥官名义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协共同纲领“军事制度”一章中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陶峙岳对起义部队郑重指出：一、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二、人事作公正合理调整；三、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实建立；四、劳动生产要尽力做到。

在这次整编中，在陶峙岳领导下参加起义的警备总部计有3个整编师、2个独立旅及边卡守备部队共6.8万余人，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参加起义的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系统驻疆分部和空军地勤人员共3万余人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他部队。

12月30日，第22兵团在迪化宣布正式成立，陶峙岳担任司令员、王震担任兵团政治委员，原警备总部副总司令赵锡光

任兵团副司令员，原警备总部参谋长陶晋初任兵团参谋长。

在整编工作中，除驻镇西 179 旅骑兵团部分官兵在排长王振华带领下发动叛乱，事后率 200 余骑逃入山中外，和平解放的新疆，总算在一派蓬勃的生机中，较为顺利地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个月。

针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前夕和进军途中，新疆起义部队中发生的一系列性质严重的暴乱抢劫事件，当时一野指挥机构曾制定了如下处理暴乱事件的方针政策：

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未到达前发生的抢劫和叛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后即停止抢劫和叛乱，并欢迎解放军开进和承认自己对此有责任者，均采取宽大争取的政策，只对首恶分子进行处置。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后，仍杀人、放火、抢劫并阻止解放军前进的，则坚决镇压、逮捕凶犯，交群众公审。

根据这一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对发生在哈密、鄯善、镇西、七角井、吐鲁番、绥来、迪化、焉耆、轮台、昌吉、景化、奇台、木垒河等地起义部队中发生的暴乱事件做出了处理，很快平息了暴乱，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改善了治安环境。

然而，在对驻疆 10 万官兵的整编和改造过程中，仍发生了一起直接威胁当地新生政权存在的大规模的暴乱事件。

这一事件的主角，就是原隶属新疆警备总部的整编骑兵第 11 师。骑兵第 11 师下辖骑兵第 4、第 6、第 7、第 9 等 4 个旅，是甘肃土著军阀，后担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的外甥和心腹爱将马呈祥所指挥的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骑兵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当红军西路军西征时，这支“马家军”

曾积极参与了对红军西路军的疯狂围追堵截，杀害了大量红军指战员。解放战争期间，该师奉马步芳之命入疆。几年来基本上未受到过大的军事打击，是一支建制齐备、训练有术，战斗力较强的骑兵部队。

新疆和平解放前夕，该师师长马呈祥在得悉家小已安抵广州之后，匆匆离职出走，经边境入巴基斯坦转往土耳其。

马呈祥虽然离队，但是他的亲信和国民党安插在该师的特务分子却保留了下来，他们对改编工作百般破坏，并在起义后一直暗中策划部队叛乱。

1950年3月5日，骑兵第11师驻昌吉地区的第20团4个连1000余官兵在“要回家”的煽动和唆使下，集体离营叛逃。其后在该师反动军官的组织指挥下，该师驻永丰渠、阜康、老奇台、木垒河等地的部队亦相继叛乱，叛乱官兵人数达2500余人。这支相当于两个骑兵团兵力的叛乱部队，在近20余天的叛乱活动中，不仅打死了中共木垒河区委书记，抢劫了阜康县政府的军火仓库，夺走步枪180支，轻机枪21挺，子弹2万发，包围袭击了新疆军区警卫营驻该地的生产部队，同时还发动了对奇台县城的进攻。

骑兵第11师部队在上述5个地区相继发生叛乱的情况发生后，第1兵团司令部很快得到了情报。

“‘马家军’跟我们打了10多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我们绝不手软！”王震火了，在兵团司令部拍案而起，当即命人通知兵团6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正锡等人前来研究此事。

“这些部队是讲封建迷信的，我们苦口婆心，他们全当耳

剿匪大纪实

旁风，别以为我王震在新疆占不住脚，对这些顽固分子，一定要坚决剿灭！”王震在与6军领导商议后，经两天时间的紧张部署，第1兵团司令部于3月7日向第6军下达了火速剿灭骑兵第11师叛乱分子的命令：

新疆军区关于平定骑七师中叛变事件的命令

(1950年3月7日)

一、驻昌吉之骑11师第二十团四个骑兵连于昨〔六〕日晚发生叛乱，由昌吉向乾德^①方向窜去，有投乌斯满匪部企图，该叛匪已抵乾德附近与我第六军驻乾德部队对峙中。

二、军区为彻底歼灭该匪，决定以战车第五团战车拾辆，第六军一个加强步兵连附山炮两门，统由第六军陈海涵参谋长指挥，于今〔七〕日由迪化出发，应于明〔八〕日十二时前进至奇台城（古城子）协同骑七师警卫奇台，确保骑七师之安全，并随时准备歼灭东窜之叛匪，镇压可能发生的一切叛乱，并以战备姿态注意侦察乌斯满匪部之动态，随时报部。

另驻乾德之第六军骑兵团及战车五辆（由战五团配属）统由第十七师袁学凯副师长指挥，警卫乾德并有配合骑七师消灭该叛匪之任务。

三、第六军陈海涵参谋长由奇台返迪后，六军之加强连及战车即由骑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指挥（六军之加强连归战五团营长雷刚指挥）。

四、第六军陈海涵参谋长应带电台一部，以便及时与此间

^① 乾德 即今新疆米泉市。

联络报告情况。

五、陆空联络法：

①当我机飞抵上空时，我军应急铺设红色长布条（在部队之左侧方，以识别敌我）。

②当我机侦察敌人后，以红色通讯袋投给我军，但需将红色符号铺出后行之。

③此项红布条由机站供给之。

战五团、六军之加强连可逕往航空办事处领取之。

此令

代理司令员 王震
兼政治委员
参 谋 长 张希钦

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

奉命执行此次剿灭骑兵第11师叛乱部队任务的领导人为6军参谋长陈海涵、17师副师长袁学凯，共指挥解放军3000余兵力，立即对叛乱分子实施军事追剿及政治争取。

在这场历时20余天的追剿战中，第1兵团出动了战车和飞机，作战规模可谓非同小可。经我军的快速打击，除逃跑200余人和投向乌斯满匪帮的600人，其余被阻截者皆被迫返回了原部队。

此后，王震再次下令，对该师进行严格的全面改造。

值此，新疆起义部队中发生的规模最大，性质最为严重的一起叛乱，终于被彻底平息了。

但是，各地漏网的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纷纷投奔乌斯满，为日后不断发生的匪患留下了伏笔……

第8节 国共两党，红白相交。毛泽东待人热情诚恳，而蒋介石召见连手也没有伸给他。对此，就任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感慨万千，决心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建设发展倾尽全力。

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后，在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各级军政委员会或军政小组，兵团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副司令员赵锡光、参谋长陶晋初和政治部主任李铨等5人组成。

1950年1月，第22兵团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在所属各部开展民主运动和诉苦三查等新式整军运动。广大官兵通过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党、人民政府与反动政府两个政府、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两种军队的对比，联系部队和个人实际谈体会，使官兵们进一步认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在这期间，陶峙岳十分注意自身的学习，反复研读毛泽东主席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书籍，给整个部队的学习带了个好头。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为此，新疆军区向第22兵团下达了一年垦荒20万亩的任务指标。

“我曾说过，待新疆和平解放，我就去种田，没想到现在

真得种田了！我们去的是生产前线，种树、种粮，好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大干一番。”陶峙岳对此十分高兴，还特意拿出多年积蓄的1000块银元和几根金条，用于部队购买农垦机具。

在第22兵团工作期间，王震对陶峙岳不仅尊重，而且对他高度信任，尽管陶峙岳作为党外人士，但王震仍邀请他参加由共产党所主持召开的各种军政会议，并欢迎他在会上发表意见，令他时刻感到自己有职有权。

“陶峙岳同志，你应该争取加入共产党啊！”在一次交谈中，作为兵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对陶峙岳关心地说。

陶峙岳非常感谢王震对自己政治生命的爱护，虽说他这时已开始向往做一名共产党员，但面对这个严肃的课题，他自认为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还不太符合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于是回答说：“是所愿也，不敢请也，我不敢轻易启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跟党走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向王震表示，愿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你老兄呀，等你认为自己经过考验合格了，就交入党申请书吧，我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王震曾两次要陶峙岳争取入党，见他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表示理解和尊重陶峙岳的考虑。

由于对陶峙岳的人品加深了了解，从此两人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直到1988年12月26日陶峙岳因病去世，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作为他的亲密战友，还亲自撰文表示自己的深切悼念。

陶峙岳从与王震共事的第一天起，就切实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干部的朴实与心胸开阔，而他自1950年2月进京受到中共

剿匪大纪实

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后，更坚定了他与共产党人共同追求国家兴盛和民族繁荣伟大前途的信心。

那天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

陶峙岳汇报完新疆情况后，毛泽东勉励他说：“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和诚恳，全然没有陶峙岳最初所想的严厉和威严，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就像与一位老乡在拉家常，只不过他的话十分具有条理性和哲学意味罢了。

自从毛泽东当面要他过好“三关”以后，他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更严格了，并由此才面对王震谦称自己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不够，需要在长时间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改造提高。

从北京回来的路上，陶峙岳曾将毛泽东接见自己的情形与当年蒋介石召见时的情形做了一番比较。那是1930年，陶峙岳所部向南京开进途中，他在蚌埠火车站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国民革命军师长，听说蒋总司令接见，曾以为遵循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的蒋介石定是一位充满潇洒、刚毅，具有统帅风采之人，岂料一见到蒋介石，经旁人介绍完陶峙岳，蒋介石仅略一点头，从鼻子里哼了声“晓得了”，竟连手也没有伸出来让一脸诚恐的属下握一握，那种傲慢与自负，完全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就这样，陶峙岳在将毛泽东与蒋介石做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才有了他在《告起义将士书》中的认识：共产党之所以成

功，是由于“他们有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有代表人民的党，更有毛泽东这样气度非凡的领袖……”

陶峙岳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就是这样抱定了跟随共产党为新疆人民造福的信念，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第三章 猎狡狐

第9节 奸商头脑，政治土匪，既反盛世才又投宋希濂，乌斯满10年翻云复雨，坐上专员宝座，傲视草原群枭。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奉命入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在接管防务的同时，将主要精力及部署都放在了改编起义部队和平息发生在一些起义部队中的叛乱方面，但当叛乱平息之后，逃跑及被打散的叛乱部队官兵，有不少人投向了盘踞在阿山地区的乌斯满，使其的存在一下子凸现在新成立的新疆军区面前。

1950年3月中旬，乌斯满率领3000余匪众，聚集于距奇台东北约50公里的冬窝子，准备在散布于天山、阿尔泰山、北塔山广大地区的40余万哈萨克族部落中发动全面武装暴乱。

乌斯满此时不仅收集了国民党军叛乱官兵中的反动分子，同时还收容了流窜到中国境内新疆北部的白俄匪帮数十人，使其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及提高。

这一动态，当即引起了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的高度重视。

当马呈祥的骑兵第11师600余叛乱官兵暴乱失败后投向乌斯满的当天，王震即向军区所属部队下达了关于作好剿灭乌

剿匪大纪实

斯满股匪准备工作的通令。

在这一通令中，王震明确要求应力争将乌斯满匪帮一网打尽，故令军区进剿部队驻镇西的第6军46团、驻奇台的49团、驻承化的第5军骑兵团1个营、驻迪化的40团等近一个师的作战兵力作好充分战斗准备。

王震是在战场上拼打出来的，无论是当年的小规模游击战，还是时下的大兵团出击，他都指挥得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正可谓闯过大风大浪，眼下以第1兵团的主力部队来打乌斯满几千之众的匪帮，倒真有点“牛刀杀鸡”的味道。但他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略战术专家，知道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该采取什么样的打法，做到“知己知彼”。

从王震在通令中的细致要求，便可略见一斑。

王震要求进剿部队应作的准备工作共有4点：

1. 搜集乌斯满股匪近来活动情况及其战斗特点，作一详尽之研究，并拟出对策进行教育。

2. 于10天之内实施3次对各种目标(尤其对骑兵目标)之实弹射击。

3. 准备10日之干粮(于进剿期内食用之牛肉等准予实报实销)，弹药配带两个基数。

4. 骡马鞍具及蹄掌，确实检查，每骡马并备蹄掌一副。

从以上部署中，可以看出，王震作为堂堂新疆军区司令员，在亲拟的仅200余字的命令中，不仅要求进剿部队各级指挥员应将乌斯满匪帮的活动规律与作战特点烂熟于胸，而且还要制定出对策向所属部队传达布置下去，同时要求部队抓紧对快速游动目标——骑兵的射击训练，甚至对部队在开进中改善伙食，

马鞍马掌的配备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一切,只有熟悉部队情况,爱兵如子的军事指挥官才能做到。

王震之所以要敲掉乌斯满匪帮,并非仅仅是因为稳定新疆的地方治安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气焰嚣张,狂妄自大的乌斯满自新疆和平解放后一直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向新成立的新疆军区和新近上任军区司令员的他王震挑战。

他能不应战么?

乌斯满此刻也在琢磨刚入疆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当然,他也没有放过四处打听那个叫王震的新疆军区司令员为何许人也。

不过,有关“王胡子”的消息太少了,零零碎碎,主要是那些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们提供的,瞧着他们一副丧魂落魄的模样,乌斯满就知道这个“王胡子”不好惹了。可是他转念一想,当年“新疆王”盛世才不也是个杀人的祖宗吗?那手段不也够黑的了么?他还不都是九死一生的闯过来了?

那年10月,盛世才派他的岳父邱前来阿山议和,说是完全接受哈萨克族武装的条件,并任命领头起事的布哈提担任阿山专区的专员,贾尼木汗、塔滨担任副专员,协议规定,由他们负责将哈萨克族各部落的枪支收集起来交给政府,但乌斯满却不吃这一套,坚持藏匿了一枝步枪和一架望远镜。

1941年4月,当200名汉人从富蕴县来阿山挖金子时,他乌斯满又多留了一个心眼,他怀疑这批精壮汉子是盛世才派来的士兵。果然,不久这批人借口说阿山金子很多,采金队需要增加劳动力,于是一夜间从富蕴又来400多人,到6月,竟增加到了800多人。不久,当被招安的富蕴县公安局长卡得尔拜突然失踪时,他就知道情况不妙了,盛世才要下毒手了,于是连夜逃出

富蕴，躲到山里去了。事后证实，那 800 采金人确实是盛世才的士兵装扮成的。

不久，当贾尼木汗代表盛世才再度出面邀请各哈萨克族部落头领举行谈判时，有人听到贾尼木汗当众起誓说：“我向胡达起誓，只要你们停止打仗，政府就会遵照以前的谈判协定，将所有的汉人调离富蕴县，让我们哈萨克族人自己选举县长自己作主。”见其如此虔诚，哈萨克族头人们都相信了。

当时，有人问乌斯满对此怎么看，乌斯满耸耸肩：“贾尼木汗的胡达就是盛世才。”

对此，一些人说，乌斯满因为没有当上官儿，因此才对贾尼木汗心怀不满，也不愿意参加选举。乌斯满见说服不了众人，便预言说：“谁去选举，谁将完蛋。”

尽管人们对乌斯满的话半信半疑，但他毕竟不是阿山专员，毕竟没有贾尼木汗的号召力大，于是，哈列力台吉、也斯木汗、哈力曼、热哈提、卡日衣等 17 位哈萨克族部落的头领都兴高采烈地随贾尼木汗来到了哈热塔斯(地名)，商议选举之事。

在哈热塔斯，贾尼木汗又说他们将被安排在政府里作事，现在，盛世才要亲自在迪化接见他们，谁不去，谁就没有诚意。结果，这 17 人就这样在贾尼木汗的巧言哄骗下，登上了迪化方面事先派来的飞机。

事实正如乌斯满当初所料想的那样，这些谈判代表一到迪化，就给盛世才关押起来，最后只活下 3 人，其余的 14 人都死在盛世才的大牢里。

乌斯满庆幸自己没有上贾尼木汗的当，谈判代表一登机，他就带着帐篷逃到沙漠里去了。

有人说乌斯满是草原之狼，沙漠之狐，独来独往，从不合群。

有人说乌斯满胆子大，从来不遵照部落头领和政府官员的旨意行事。尽管阿山专区曾以盛世才新疆省政府的名义册封切内其部落的苏来曼、卡哈拜部落的热斯汗、莫力合·阿衣吐汉部落的乌斯满三人为“巴图尔”（英雄），但结果却是热斯汗被贾尼木汗毒死，苏来曼因大闹富蕴县公安局，在与追捕的官兵激战中被打死，只有他没被套住手脚，只有他还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

1941年的冬天来临了。

乌斯满带着30余人在山里安营扎寨，筹集粮草准备过冬，这时，承化政府又派3名代表来找他。

“你们代表谁？阿山、青河、还是承化？”漫天大雪，山林里一片冰天雪地，当代表阿山的美拉赞根，代表青河的鲁瓦提汉、代表富蕴的马高维亚扎楞三人走进乌斯满的毡房时，乌斯满劈头喝道。

“我们代表三县政府前来议事。”美拉赞根等人搓着几乎被冻僵的双手，一边说，一边欲凑近火炉取暖。

“议什么事？你们以为我会为你们准备奶茶吗？”乌斯满一脚踏在火炉上：“贾尼木汗怎么样，没有你们高明吗？想让我们钻你们的套马杆子，简直是做梦！”

三县代表见他满脸杀气，忙躬身解释：“我们只是来捎个信儿，下不下山由您自己决定。”

“来人——”乌斯曼大喝一声，对从毡房外冲进来的手下吩咐道：“扒下他们的衣服，马匹留下，让他们滚下山去！”

三县代表连滚带爬地回去复命了。

剿匪大纪实

整个冬天平静地过去了。当1942年春天来临之际，富蕴县政府再次出动官兵进剿乌斯满的营地。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后，只有乌斯满单骑4人冲出重围，一路摆脱追兵，逃往北塔山附近的哈玛依力。

在哈萨克族的各个部落，人们开始知道乌斯满了。热斯汉和苏来曼之死，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他视作惟一幸存的“巴图尔”。因此，乌斯满所到之处，仍能吃到马肉，喝到奶茶。人们不知道他下一站将逃往何方，也不知道他何时会被追兵捕获，总之，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位敢于抵抗盛世才的哈萨克族人死去。

乌斯满就这样幽灵般的生存着，他从不靠近城镇，也不在一个地方连续呆上几天，他让身边的4个人，包括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谢尔德曼和那比，每人准备三匹马随行，这种随时换马的逃生之计，一直是他摆脱追兵的法宝。

然而，无休止的流浪、奔逃也曾让他感到沮丧。他在家乡有牧场，有成群的马匹和羊，还有终日在惊恐中度日的妻儿。事实上，每一次谈判他都希望是真的，但现实却总是那么的严酷，被骗、被抓、被杀，这种双方间早已种下的仇视所留下的惟一选择，就是攥紧刀把子，一刻也不能放松。

1942年5月，乌斯满决定重返富蕴县家乡。这时候，他弟弟惦念家中妻小，提出与他就此分手。

“看你也跑不动了。这样吧，你回去告诉政府的人说，我也准备投降了。”乌斯满实际上是想借此让兄弟回家乡去探探口风。

“好吧，回去他们问我就这么说。”他弟弟同意了，说着便开始收拾行装。

“你带一枝枪回去，万一有什么动静也好防身用。”乌斯满对自己惟一的弟弟很关心。这几年来，他毕竟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拼杀，又受过伤，身体也拖垮了，否则他是不会同意他冒险回去的。

乌斯满最后的一线希望还是破灭了。

他弟弟一回富蕴县家乡土尔根，即有人向县警察局告发，结果还没等他在家里喝上一口热茶，就让士兵们抓住了，先是关在县里，半年后又押往迪化，最后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

乌斯满得知这一凶讯后，发誓要和盛世才的官府血战到底。

但是，怎么斗呢？自己身边除了两个儿子之外，再也没有可靠的人了。这确实令他有些心寒。

然而，正当他感到绝望之际，切内其部落的克列斯带着儿子从富蕴跑来投奔他了。

“克列斯，你怎么也跑出来了？”乌斯满甚为惊讶。

“警察局传我去，我抢过他们的马。”克列斯又说卡得尔拜被招安任命为警察局长后，不久又突然离奇的失踪了，于是苏来曼邀集了一伙哈萨克族人前往警察局兴师问罪，叫他们交出卡得尔拜，在警察局大闹一场后，抢了10余匹马回家了。现在，警察局传自己去，他担心去了会被关押，因此就带着儿子一块儿逃出来了。

“看来，我们只有去北塔山了。”乌斯满与克列斯父子商议了一阵，克列斯有个亲戚在那里，5人遂打马朝北塔山飞驰而去。

到了靠近北塔山附近的哈热玛依力，为了安全起见，乌斯满决定叫克列斯一个人先到他亲戚处打探一下消息，待弄清四周环境后再落脚。

剿匪大纪实

克列斯单骑窜入牧区后，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他的那个亲戚。这时，牧区里的哈萨克族人已经知道他是富蕴县通缉的逃犯了，于是将他拦住盘查。

见一时脱不了身，克列斯灵机一动，说：“我是来找马力克阿吉达尔毛拉的。”在沿途的打探中，他已知道牧区有此名望甚高的一位毛拉了，于是编出谎话。

“你找他干什么？”几位牧民仍不肯放他走。

“我们是想通过他转告北塔山的警察局长马尔提，说我和乌斯满愿意向他投降，请他派代表来。”列克斯顺水推舟，将谎言编得天衣无缝。

“是吗？”牧民们将信将疑，但还是同意把他带到马力克阿吉达尔家里。

在这位未曾见过面的毛拉家中，克列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哄人：“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你明天去警察局报告，就说我和乌斯满愿意投降，请马尔提派人到沙尔也西克来找我们谈判。”

马力克阿吉达尔见他说得恳切，就点头答应下来，第二天便去北塔山警察局报告去了。

马尔提局长得知此事，显得非常高兴，当即要马力克阿吉达尔带上两个人去约定的沙尔也西克找乌斯满。

事实上，乌斯满他们根本就不在那里，这3位马尔提的代表白忙活了一天，那儿找得到乌斯满等人的影子呢？

“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想去找，你们是不是乌斯满一伙的？！”马尔提局长见了3人空手而归，一下子起了疑心：“明天再去找，找不到就把你们按通匪罪抓起来！”

出了北塔山警察局大门，马力克阿吉达尔三人一合计，认为

在当地不能呆了，决定干脆去投奔乌斯满。

乌斯满见不断有人投奔自己，心情渐渐好转了。

“在北塔山站不住了，还是回富蕴去吧，那里毕竟人熟地熟。”乌斯满等人星夜逃离北塔山，又窜回了富蕴。

在乌斯满的老家土尔根，乌斯满认为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8个人不宜再聚在一起活动，那样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故决定乌斯满仍带着两个儿子为一路活动，克列斯父子为一路，马力克阿吉达尔3人为一路，同时还约定，他们三路人马在3个月后的9月10日晚在沙尔布拉克的一个大沙山顶上再次碰头，到时候哪一路如果没来，就说明这一路人马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他人则另谋生路。

这次分手后，乌斯满父子当即逃向湖苇森林，克列斯父子逃到富蕴的多尔根沙尔哈热哈衣，马力克阿吉达尔3人则逃往北塔山区。

整整一个夏天，乌斯满等人销声匿迹了，当时有人传说，他们逃出国境，窜入蒙古了。

当年9月10日，约定的时间到了，蛰伏了近百天的三股土匪终于又会合了。

“快入冬了，冬天我们还是到阜康去，那里靠近沙漠，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又去了那里。”对于下一步的行动，乌斯满早已考虑到了。

今年冬天，乌斯满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不少从官府里逃出来的亡命之徒，纷纷打探乌斯满的行踪，仿佛自己惟一的出路就是投靠这支队伍。

以往，凡是那个部落出了事，盛世才的兵就到那个部落抓人

剿匪大纪实

问罪,抢走马匹羊群以示惩罚,这样,又难免激起这些部落的一些青壮年的反抗,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官府获胜,但官府却把失败者无形中又推给了乌斯满。

乌斯满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他的名气也不断远扬,作为哈萨克族早年被册封的惟一幸存的“巴图尔”,他现在兵强马壮了,也不需要再像兔子一样四处乱窜了。而且,他要马,会有人送马来,他要粮,会有人悄悄的送上……

正当官府准备组织兵马围剿乌斯满时,震动全国的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了。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哈萨克、维吾尔族贫苦牧民,不甘忍受国民党政权的长期压迫剥削,拿起武器组成了一支以新疆各民族群众为主的民族军。民族军所到之处,民众群起响应,其势锐不可挡,很快即夺取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及军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民族军风起云涌之日,乌斯满率领他的骑兵曾参加过一些大小战斗,客观地说,他毕竟也算是为“三区革命”出过力。“三区革命”胜利后,民族军并未对乌斯满给予重用,事实上仍与他保持着距离,划有一条界线。

乌斯满认为民族军的兴起,不仅严重抵消了自己的影响,而且正在日益成为自己登上“哈萨克王”宝座的巨大障碍。

在此情形下,他又使出了他的一贯作法,溜到沙漠中去了。

在一般人眼里,乌斯满好像天生喜欢独往独来不大关心政治,其实这是一个假像。乌斯满历来具有奸商头脑,他善于把每一件事都当作买卖来做,他知道该如何应付买主,如何增加自己

的成交砝码。

你三区革命政府不用我么？那我就去投靠国民党政府，找他们当靠山与你对抗。

乌斯满的卖身投靠说来颇具戏剧性。他先叫自己的亲信到迪化去找贾尼木汗，希望通过贾尼木汗与国民党新疆省政府搭上线。他的这位亲信在迪化见到贾尼木汗后说，“阿山赤化了，乌斯满对我们也不好，如果我们投向迪化政府，会不会有好处？”

贾尼木汗此时正竭力为国民党政权分化瓦解新疆各族群众及武装组织的团结与联合而一筹莫展，于是马上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上去，当即获得了上司的首肯。

这个贾尼木汗老奸巨滑，他看穿了乌斯满的把戏，知道此人就是他的代表，只不过他本人不愿出面罢了。他一方面假意安慰来联系的人，一方面又专门给乌斯满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乌斯满决心反对“三区政府”，什么条件迪化方面都可以答应。信上还规定了具体联络方式、联络地点和联络人。贾尼木汗在这封密信的结尾，还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代他在迪化办理一切相关事宜。

一条秘密渠道终于打通了。

1945年10月，三区政权宣布举行选举。

考虑到乌斯满在阿山哈萨克族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三区政府邀请他参加，但被他拒绝了。然而，选举结果却大出意料，人们推选他为新的阿山地区专员。

由于已经和迪化的国民党政权勾结上了，乌斯满自然不会去做三区政府的官儿，但他很满意自己所处的两方都在积极拉拢争取自己的处境，因为谁也不敢小瞧他。

剿匪大纪实

1945年12月中旬，三区政府欲与新疆国民党政权举行谈判，要乌斯满出席。乌斯满自被选为阿山专员之后，事实上一天也没有到专区所在地承化任上做事，而是留在富蕴老家吐尔根与迪化派出的联络员终日饮酒作乐。

当时在新疆的宋希濂，早就希望能够掌握一支像“民族军”那样的劲旅，听说乌斯满欲投向自己，于是便决定将乌斯满作为第一个拉拢目标，希望在他身上打开一个缺口。

由10峰骆驼驮着的礼物——收发报机、皮大衣、呢绒、布匹、砖茶由迪化启程了。

贾尼木汗由于拉拢乌斯满有功，后来当上了新疆税务局局长，不久又升任新疆省政府的财政厅厅长。

尽管乌斯满与宋希濂拉上了关系，但面对哈萨克族群众，他并不想撕开这层面纱。在一般人眼里，他永远好像是个从不卖身求荣的人，因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他还想保持他那“巴图尔”形象。

由于有了宋希濂的暗中支持，他开始大肆扩编人马。当他手中拥有数百骑精悍武装后，便公开对三区革命政府表示敌意，出动人马将各地通往承化的道路封锁，同时四下派粮拉夫，谁若不答应，他便出动武装抢劫那里的牲畜，毒打不从命的人，在牧区形成一股巨大的邪恶势力。

乌斯满名义上是阿山专员，因此，许多部落头领不得不遵从他的旨意行事，使之得以在当地呼风唤雨，逞凶一时。然而，三区政府却不能容忍他的无法无天。其时，代表三区政府的副专员达列力汗，就看不惯乌斯满的为非做歹，调集力量开始与其对抗。

乌斯满这时已经开始在富蕴县拉夫修建机场,由于掌握了电台,凡有需要,他便叫宋希濂派来的汉族通讯兵向迪化发报,飞机即可将所需武器弹药及物资运来。

这样,由在迪化的贾尼木汗协助,新疆军政当局宋希濂的第一批援助即向乌斯满提供了300余支步枪,20挺机枪和数万发子弹。

乌斯满依仗国民党政权的扶持,对三区政府及民族军更是有恃无恐,挑衅事件不断,磨擦日益升级,终于在1947年初与达列力汉指挥的三区武装打起来。

但乌斯满小看了三区武装,战火一旦挑起,他便连吃败仗,仅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通知迪化的贾尼木汗,叫宋长官派兵支援我们!”乌斯满守着电台向迪化呼叫求援。

贾尼木汗回电表示:迪化方面保证阿山是乌斯满的,一定会帮助将其夺回来。如有需要,宋长官可命驻奇台的韩师长派兵驰援。

在宋希濂的支持下,乌斯满与三区武装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当年夏天。

乌斯满第一次在“大部队”作战中败北。

他打惯了偷袭战。以往与盛世才驻各县的士兵交火,那些人并不真敢玩命,即便是追踪他们少数单骑,也是追上一程,放上一阵乱枪交差了事而已。

达列力汉则不同了,他是哈萨克族人,所辖亦以哈萨克族骑兵为主,而且个个精通马术,枪法甚准,作战勇敢,两相比较,人数少于达列力汉的乌斯满岂能占到便宜?

剿匪大纪实

1947年7月，乌斯满兵败，不得不仓皇向北塔山撤退。为了安慰伤亡惨重的乌斯满，并掩护其安全撤退，宋希濂令驻奇台的国民党军第78师师长韩友文调拨一个连士兵增援乌斯满，同时以200峰骆驼运送来大量枪弹物质予以补充。国民党军的增援，特别是帮助他顺利地完成了对达列力汗部队的阻截，总算平息了乌斯满对迪化方面没有帮助自己拿下阿山的怨气。

乌斯满撤到北塔山后，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物资援助，多次派人前往迪化找贾尼木汗与宋希濂联系，而宋希濂亦有求必应，不断增加对乌斯满的粮弹接济，同时增兵一个营协助作战。由于战事不断，牧区哈萨克族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难以保证，因而不少部落头人表示愿意迁往乌斯满部队的控制区。尽管乌斯满实力有所增加，但在对手的不断进攻下，在北塔山地区仅坚持了不到一年，于1948年5月又被迫率部移师吉木萨尔县驻扎。

为了实现“哈萨克王”的梦想，乌斯满在这年7月再度派儿子谢尔德曼与同伙胡赛音前往迪化求援，宋希濂在满足他的要求的同时，还向乌斯满发出了到迪化会晤面商的邀请。

乌斯满欣然应邀。

为了大摆“哈萨克王”的威风，乌斯满特意从青河、富蕴两县的270余人的各部落头领中，挑选出70名所谓的“体面者”随侍左右，同时在哈萨克族群众中强征40匹骏马作为送给宋希濂等新疆要员的见面礼。

乌斯满是狡猾的，尽管宋希濂对其大施军事、经济援助，但他还是一再表示即使到迪化，也不愿意住在城里。为此，迪化方面只好在市郊的水磨沟为他准备了10顶毡房、20顶帐篷供其下榻。

当乌斯满率领 70 余名部落头领和百余白俄骑兵组成的“访问团”威风凛凛出现在迪化市郊时，新疆国民党政府亦出动百余官员前往迎接，场面甚为浩大，此后还大摆宴席，着实热闹了一番。

乌斯满此次迪化之行，与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宋希濂签订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的核心是：将乌斯满的武装扩充到 1000 人，驻军地点为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军饷由迪化政府负担，同时迪化派 100 名军官协助训练乌斯满武装……

乌斯满在返回时，宋希濂还当面馈赠给他一只精美的小手枪，一架望远镜和一把指挥刀及大量砖茶和布匹。

乌斯满回到吉木萨尔后，便开始公开征兵，并任命了 4 名手下——哈帕斯、马那提、胡尔曼、奴热克为团长级军官。

值此，乌斯满正式登上了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权的战车，成为坚决反共的一支地方武装。

第 10 节 卖身投靠，密设电台，掩护美国领事越境出逃，悍匪袭我粮队，残害我战士，马刀挥舞肆虐南北疆。

1949 年 9 月 27 日，正当迪化各族群众聚集在街头隆重庆祝新疆和平解放之时，有一个人却坐不住了。他就是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

马克南是通过乌斯满的协助出逃的。早在两年以前，马克南带人秘密潜人中蒙边境绘制地图时，就住在乌斯满在北塔山安扎的帐篷里。自那次相识后，乌斯满整整有两年多时间没有

剿匪大纪实

见到这位美国人。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时，乌斯满已经作为宋希濂的贵客来到迪化了。在这次迪化之行中，宋希濂曾专门安排乌斯满和他的侄儿哈布力巴里及女婿额布西旦三人与马克南又见了一次面。

见面地点在宋希濂的办公室。

宋希濂待乌斯满一行到来后，起身向他们介绍在座的客人说：“这位是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先生，你们在北塔山见过面的，还记得么？”

乌斯满连声说：“不错，记得。”

马克南微笑着上前用生硬的汉语说：“你来宋长官这里，很好。美国和中国是好朋友，你是中国的一个英雄。”

乌斯满听到马克南的夸奖，顿时来了劲儿，忙恭维道：“我们是好朋友，你们美国的科学是最高明的，我请求你们支援给我新式武器。”他一边说，一边怕这个美国人听不懂，不断用手比划：“听说你们有一种可以从山这一边打到山那一边的武器，还有可以看到山后面的望远镜，这些，我们都需要。”

“完全可以。”马克南一口应允，并补充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后迪化受到共产党威胁的话，我们只要出动飞机，很快就会解决问题。至于你需要的新式武器，你可以先派人来学习如何使用。”

“非常感谢。”乌斯满没想到自己所提的条件这位美国人竟然毫不犹豫的全部答应了，颇有些喜出望外。

“今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宋长官来进行，你要派个人在宋长官这里当联络员。”马克南吩咐说。

“很好！我们会很好执行这个计划的。”乌斯满再三表示一

切遵照美国领事的安排行事。

这次与马克南会面后，乌斯满便派自己身边4个人前往迪化马克南处学习无线电收发报通讯技术。

然而，正当乌斯满梦想依靠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在新疆大展拳脚之际，新疆和平解放的现实，却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现在，又轮到那位傲慢的美国副领事来向他求救了。

马克南通过电台，告知乌斯满，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迪化。于是，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当即开始策划如何将马克南送出国境。

关于这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美国间谍离开新疆的经过，《新疆日报》1950年1月31日曾载文予以揭露：

前驻迪化美副领事马克南间谍 罪行被揭露

勾结乌斯满匪徒 反对中国人民 逃走前曾
周密布置其破坏计划

（新华社迪化二十九日电） 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前副领事马克南，已被证明是与新疆境内股匪相勾结的间谍，这是新疆著名惯匪乌斯满部下三名白俄人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后所揭露的。

美国驻迪化前副领事马克南在去年新疆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后，突于九月二十八日失踪，直至此次三名白俄人投诚才使马克南的神秘行踪为世人所知。马克南利用了新疆和平解放初期

剿匪大纪实

反动匪徒尚未肃清的条件，由迪化潜往新疆东部的匪窟镇西地区，沿途集合重要匪首乌斯满、贾尼木汗和苏勒唐，指示他们继续反抗新疆省人民政府，并送给他们黄金二十五两，然后折向西南，进入印度。

投诚的三名白俄人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来到迪化的。他们供述马克南潜离迪化后的详情如下：

马克南和美国学生白智仁、白俄瓦西里、兹范佐夫及其他白俄两名，带电台两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乘自备吉普车离开迪化潜行东去。在这些人中，瓦西里是匪首乌斯满的主要帮凶，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起被派来马克南处学习，利用无线电作秘密通讯。

马克南在出发的第二天到达孚远，把吉普车丢在孚远附近山中，而与该处的白俄匪徒一同乘马于九月三十日到达古城以北的萨尔卡木希（地名），与乌斯满会面，并在该处停留了三天。十月三日，马克南和乌斯满一同继续向东前进，并在经过莫里河（木垒河）时，与匿居山中的贾尼木汗匪股一百余人会合。匪徒们于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先后到达了苏勒唐匪部活动中心的镇西。

马克南在和匪部一同行进途中，特别是在到达镇西以后，向匪徒们着重地宣传了破坏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方法。马克南指示乌斯满、贾尼木汗和其他匪徒们继续反抗新疆省人民政府，并保证美国将给他们以援助。马克南告诉他们在目前应当积蓄力量，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瓦西里对匪徒们说他和马克南将要折往罗布诺尔地区，这是为了替他们侦察将来在必须撤退时的退路。马克南提议把乌斯满、贾尼木汗、苏勒唐

三人的儿子带往美国训练，到第三次大战时好送他们回新疆举事。但是马克南的这个提议没有被接受。乌斯满等三人找了另外三个哈萨克族青年代替他们的儿子随马克南到美国去“留学”。乌斯满派苏勒唐把马克南等一行送往罗布诺尔，并送他们十四匹马，马克南则送给匪徒们二十五两黄金。

据投诚的三名白俄人说，与乌斯满匪帮联络的美国人不止马克南一人。三名白俄人证明，比马克南早离开迪化的美国前领事派克斯顿也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和七月间到过乌斯满的匪窟，每次都停留一两天，给匪徒们以各种指示。

尽管乌斯满已经走到了投靠外国敌对势力，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的严重地步，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新疆的稳定、民族团结的大局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挽救。直到乌斯满已经秘密偷送走马克南的一个多月后，王震仍派艾买提·瓦吉提携亲笔信和礼物前往乌斯满处，向他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明确表示，只要乌斯满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今后仍可以当阿山专员或参加省政府的工作。直到1950年春，还派人去做争取工作。

但是，人民政府所做的这一切，乌斯满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他一心想的是让美国人援助他新式武器或干脆直接派飞机来同共产党作战，把解放军赶出新疆。

按照马克南临别时的部署，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加紧了在牧区组织叛乱的活动。

由于乌斯满的顽固抗拒，新疆参与叛乱的土匪气焰非常嚣张，使解放军的剿匪作战，不仅艰苦，而且斗争异常激烈、残酷。

剿匪大纪实

在如前所述的我军剿灭阜康地区国民党起义部队骑兵第7师叛乱的战斗中，骑兵第7师特务营的反动军官马占林、冶生林等人，就首先将我军派往该部进行整编工作的干部全部杀害。

当年参加直接指挥剿灭该股叛匪战斗的第6军17师副师长袁学凯曾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阜康是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由于叛军的抢劫和屠杀，弄得人心惶惶，商店关门，街上见不到几个行人，一片凄凉景象。我们到达阜康时，县委书记王帮玉同志（原49团一位教导员，是个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已等在街上了，见到我们高兴地说：‘你们可来了，这就好了。我们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紧接着，他讲到叛匪的情况，‘这些叛匪坏透了，不但抢劫财物牛羊，打骂群众，烧毁房屋，而且将我们派去的军队干部全杀了。杀头不算，还开膛破肚，真是太残忍了……我们派去的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据叛乱后跑回来的人讲，解放军派去的干部没有一个孬种，当这些同志被害时，还痛斥这伙叛匪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袁学凯还通过当年该师40团团长玉苏甫向其汇报的情况披露了顽匪的野蛮罪行：“早晨，40团的部队从我们营地通过。团长玉苏甫特来向我们报告：我们押送军粮的一个班和几十头驮粮的牲口遭敌伏击，11个人全被他们杀头剖腹挖眼了，真残忍。我们的口粮成问题了，你看战士们有的就是拿死马充饥……”

叛匪马占林、冶生林部在攻占，洗劫章康县城后，窜往甘河子一带牧区，用枪来的财物作“彩礼”，强迫牧民将女儿

“嫁”给他们，在此狂欢三天，错过了与乌斯满匪帮的会合时间，因而遭到解放军 17 师先头部队的突然围剿。除少数叛匪侥幸脱逃外，大部分被歼。冶生林被击毙，马生林被生擒。

除甘河子被歼 400 人外，其余叛匪大部投奔了乌斯满，使乌斯满部叛匪达到 700 余人。这些叛匪在乌斯满率领下，在哈密至安西的交通沿线大肆袭击军车，抢劫商旅财物。

1950 年 4 月 1 日，解放军第 6 军第 16 师奉命由甘肃酒泉入疆进剿乌匪，年仅 31 岁的我军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副师长罗少伟遇伏击牺牲。毛泽东主席为此专门发来唁电，并命令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务必将这伙土匪一网打尽。

部队在一连数月的剿匪作战中，不仅经常饿肚子，而且被装损耗也无法补充。在桥龙沟剿匪战斗中，由于不少战士的鞋子早已磨破，17 师骑兵 5 团、51 团的许多战士竟然是光着脚追击土匪，后来大家发明了一种用牛皮和马皮作成的“窝子”，这才暂时解决了“走路问题”。

我军广大指战员除了与狡猾凶残的顽匪斗，还得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斗。在天山雪线之上的险地，即使是现代化登山装备齐全的登山队员见了，或许也要搔头发愁，可当时剿匪部队连最起码的气象预测都无法获知，更何况还是饿着肚皮呢。

对此艰辛，袁学凯回忆说：“向前望去，部队已开始上山。当天的宿营地是骆驼弯山顶。骆驼弯名不虚传，像骆驼脖子一样的一条山梁挂在天山雪线下。翻第二个山梁时，东南方向雪山深处，一股乌云升起，随着东南风向西北飘移，很快布满了整个天空。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下起了暴雨，随着霹雳雷鸣，暴雨转为冰雹，打得驮炮的骡子和马乱蹦乱叫。我怕战士

们被冰雹打坏冻伤，叫警卫员传令，让指战员用衣服顶在头上继续走（因无处躲避）。到达山顶时，气温急剧下降，冰雹变成了鹅毛大雪，穿上皮大衣还觉得冷，风刮得人站不稳，部队宿营要架帐篷十分困难，后来发现绝壁下风小些，就在那里架起了第一顶帐篷。这时天已黑下来，通信员报告说，5连有一名战士冻昏过去了。我叫卫生员小梁来，对他说，‘你就在路边，等病号一到，赶紧送到帐篷去，给他将大衣盖上，想办法给搞点开水喝。’”

雪线上寸草不生，根本无法找到燃料，因此，当时的“病号待遇”，竟然仅是一杯开水！

在这不毛之地，牛粪就是宝贝，只有捡到牛粪，部队才有可能生火做饭，战士们此时的最大愿望，就是烤烤火、吃上一口热汤饭……

第11节 伊吾告急，援兵受阻，我军数百战士牺牲，40天防守战，重挫乌斯满、尧乐博斯联合进攻计划。

自1950年2月初国民党军起义部队中不断发生叛乱后，不少漏网官兵投向乌斯满。乌斯满纠集这支人数达6000余人的土匪武装，并裹胁4.5万余牧民，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与蒙古接壤的北塔山等广大地区流窜袭扰我军政机构，杀害干部群众。

叛乱之始，乌斯满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占奇台。在他眼里，拿下距迪化仅200余公里的奇台，即可向西扑向迪化，直接威

胁新疆省会我人民政权。

乌斯满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只要自己在巴里坤大草原上振臂一呼，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牧民便会拍马飞来，聚集在他的旗下效命，尤其是国民党军叛乱士兵的加盟，各路大小股匪的策应，更使他头脑发热，一心想与共产党和解放军决个高低。

与乌斯满遥相呼应者主要有以下几人：

贾尼木汗，哈萨克族，新疆承化人，时年67岁，长期混迹于迪化军政界，参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曾任国民党新疆省财政厅厅长，1949年8月率40余众投奔乌斯满。

尧乐博斯，维吾尔族，原国民党哈密地区专员，新疆和平解放后，就任我哈密专员。1950年3月开始公开组织伊吾地区叛乱，手下匪徒近千人。

乌拉孜拜，维吾尔族，原国民党前景化县（今呼图壁县）副县长。伙同前迪化市自卫大队长司迪克组织“保卫哈萨克族人民革命军”，自任副军长兼政治部长（军长为司迪克），纠集匪徒5000余人，裹胁群众2万余人。1950年3月与乌斯满取得联系，成为叛乱土匪中较大的一股。

哈里伯克，国民党迪化政干班毕业。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任沙湾县县长，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12月率350余匪逃往若羌东南山区铁木里克。1950年3月与惯匪胡赛音会合。

胡赛音，惯匪，原为木垒河乃曼部落头领，手下有匪众600余人，当哈里伯克与之会合后，二股匪徒后又与乌斯满匪帮会合。

我军在与这几股势力较大的叛乱土匪的战斗中，规模最

剿匪大纪实

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伊吾县城保卫战。

伊吾为我国与蒙古国接壤的天山北麓下的一座小山城。南北山峰之间为河谷，东西两面的石门成为进出该城的惟一通道。由于地处边防，国民党军在此设有边防骑兵大队和物资补给站，储存有可装备一个团的枪支和大量枪支炮弹等军用物资，驻站人员有20余名官兵。此外，还有国民党设在当地的一个警察局，有警员60余人。

当时，我军担任接管伊吾这座边境小城防务的部队为第1兵团第6军16师46团1营2连。

该连最早是兵团指定为平息哈密国民党军178旅叛乱的先遣小分队，是在1营副营长胡青山的率领下，由酒泉机场乘飞机空运至哈密的。2连到达哈密后，首先担负机场警卫工作，以保证兵团参谋长张希钦带领的两个营后续部队空运至此。

哈密叛乱解决后，胡青山奉团部命令当即率2连前往伊吾接管防务。

从团部领受任务后，2连130余人及以军队干部为主的地区工作队16人，分乘4辆大卡车由哈密出发，至沁城后，部队又换乘骆驼和战马向伊吾行进，于1950年2月19日到达该城。

在我军进驻伊吾之前，该县县长艾拜都拉，副县长李树贤，警察局长伊建中等人即已密谋组织暴乱。1950年1月5日，伊建中秘密前往哈密与尧乐博斯取得联系，在尧“你们放开手干，不要怕”的指示下，伊吾的叛乱活动终于3月下旬开始了。

叛乱活动的第一步是煽动当地自卫团及牧民抗拒缴枪，割

断伊吾对外联络的电话线，炸毁通往外界的桥梁，偷袭分散驻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分队……

3月29日，当胡青山率通讯员骑马外出去70余公里外的淖毛湖看望在当地搞生产的一个班战士时，途中即遭到艾拜都拉指使的7名武装土匪的袭击。胡青山两人闯过这一险境之后，行至另一山沟时，再次遭到伏击，所幸没有受伤。

土匪暴乱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乌斯满等土匪已经开始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同时，伊吾县也将出事，但当我驻伊吾的2连准备逮捕艾拜都拉时，他却在自卫团副团长的接应下逃跑了，并组织匪徒与我追击战士发生激战。

这时，全伊吾县城的群众在艾拜都拉的煽动下，先后跑光，仅留下一个没人管的小男孩和一个维吾尔族皮匠的妻子。

情况十分险恶。艾拜都拉一逃出城，当即纠集一批国民党军的游兵散勇和伊吾县所辖的6个自卫团的武装700余人，裹胁全县3100余人参加暴乱。

这时，通往伊吾的所有道路已被封锁，小股土匪甚至趁夜晚摸进城内企图劫走被2连扣押的警察局长尹建中、副县长李树贤、国民党补给副站长蔡林泽等叛乱匪首，被我军击退。

3月30日，叛匪开始占据踞高临下的北山向2连营区攻击，胡青山立即组织战士们出击，夺下了这个制高点。叛匪小股偷袭与大部队攻城解救其匪首的两次行动的失败，令艾拜都拉大为光火，扬言攻入城内，一定“要把伊吾的共军杀光，一个不留！”

叛乱武装第二步进攻伊吾的行动是由一部分土匪攻打警察局，抢出尹建中等人，一部分骑兵攻打补给站，夺取枪支弹

剿匪大纪实

药。同时，另分出两路匪兵，一路攻打南山，一路攻打北山，这样南北夹击，东西猛攻，妄图一举将我2连和工作队消灭在伊吾城内。

1950年4月1日，匪首乌斯满的大女儿依丽尔率领700余名骑匪再次发动了对伊吾的进攻。

依丽尔是哈萨克族中著名的神枪手，从小随其父南征北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依丽尔又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她认定的事，就要干到底，谁劝都不行。

依丽尔率七百多名骑匪将伊吾围得水泄不通。解放军凭借工事击退了骑匪八次大规模的进攻，粉碎了数十次偷袭。叛匪损失了马一百多匹，伤亡五十多人。

伊吾守军在土匪的连续攻击下，也伤亡很大，有的一个班只剩下两个人。依丽尔见强攻不能奏效且伤亡大，于是改变策略。她派一位汉族老太婆去送“劝降书”。这位老太婆被逼得没法子，只好冒着被子弹误伤的危险先后五次进入解放军阵地，她送去的“劝降书”次次都被胡青山扯得粉碎。胡青山也不让她空手而归，每次都让她捎上一封信。信里说：

“少来这一套，有本事就来攻。老子保管教你们这些叛匪堆尸如山，血流成河！”

于是，依丽尔派少数善于骑射的匪徒，骑马飞速接近解放军阵地，进行冷枪偷袭。她这一招在最初发挥了一些作用，伤了不少解放军战士。但是，胡青山想出了对策，他命令战士听见马蹄声由远而近时，不要理他。骑匪在阵地前见不到偷袭目标，又不敢久待，只得调转马头慌乱离去。一旦听见马蹄声由近而远，就立即瞄准射击。这样一来依丽尔伤亡了许多神枪手

和好马。

4月5日，伊吾下了一场大雪，是夜，攻打警察局的土匪在其头目吐尔贡江的指挥下，反穿皮大衣，蜂涌而至。冲在前面的一名原国民党补给站的士兵甚开公开打着一面国民党旗，一边冲一边喊：“伊局长，我们救你来了！”

胡青山沉着的指挥战士们以猛烈火力杀伤土匪。这时，他担心守卫警察局的工作队同志战斗力较弱，当即带领一个班战士冒着弹雨前往支援，刚刚打退攻入警察局的土匪，胡青山又接到坚守北山补给站碉堡的8班长的报告，说那里情况危急，已有两名战士牺牲。他立即又带9名战士奔赴北山，因为补给站内存有武器弹药，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他赶至后，立即指挥将土匪打退，并击毙率部攻打北山的自卫队队长合力尼亚孜。

此时，防守南山的我军战士，在2连副指导员罗中林的带领下，连续向土匪发起反冲击，将其击溃。

土匪以7倍于我军兵力的四路进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暂时停止了。

为了不使补给站内的大量武器落入土匪手中，胡青山决定将其全部转移到2连驻地去。因为战斗中，他在补给站房顶上发现了两挺机枪，显然是有人提供给攻入院内的土匪使用的，而8班此时正守在院外北山的碉堡里。

果然，当胡青山提出要转移武器时，原国民党军中校站长石振河不同意，但在胡青山不容置疑的命令下，战士们当即上前肩扛人抬，把武器弹药全部转移走了。事后表明，那两挺机枪确是已参加叛乱的军统特务、副站长蔡林泽故意留给攻入院

剿匪大纪实

内的土匪使用的。

利用补给站搬出的6挺机枪，加上原有的6挺，2连的火力大大增加，战士们与土匪决一死战的信心也极大的提高了。

宣称“三天拿下伊吾”的艾拜都拉见数天强攻不下，深知城内已完全与外界隔绝的2连不可能突围出去，于是下令切断水源，使解放军无法利用水磨磨面，也无法饮水，妄图将2连困死、饿死在城内。

为此，胡青山只得组织战士利用清晨和夜间出城“偷水”，2连战士聂元生就是在运水途中牺牲的。

2连是个红军连队，转战西北屡建战功，如今被土匪堵在城内的碉堡里打，战士们都咽不下这口气，胡青山及时纠正了部队出现的急躁情绪，号召战士们要树立长期坚守作战的思想准备，并积极想办法研究破敌战术。

于是，战士们开始把手榴弹挂在土匪常窜入的一些空房的门上，还把从补给站搬来的八二迫击炮弹改制成地雷埋在土匪必经的要道路口，使前来偷袭的土匪尝到了解放军“地雷战”的滋味。

正当2连信心百倍坚守伊吾城时，上级领导对已中断联系的2连的安危十分关心。

6军军长罗元发十分焦急的电令16师师长吴宗先、政委关盛志尽快派人查明情况。16师领导当即按军首长指示，派出侦察小分队前往，但由于伊吾城内的群众都被赶到山里去了，小分队途中遇上的几个“老百姓”，其实就是土匪。他们对小分队的人说，伊吾城里的解放军全完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小分队信以为真，立即赶回师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罗元发军长接到 16 师师部的电报后，摇头表示不信：“一个红军时代建立的连队，在西北打了许多恶仗，竟会被土匪全部吃掉？”

再次发电询问，16 师师领导们也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

“再派部队去！”罗元发有些冒火，他此时既对 2 连的安危焦虑，又对土匪的作乱震怒：“如 2 连在，立即支援他们，如 2 连不在，就坚决歼灭伊吾匪帮，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16 师按罗元发军长的指令，于 4 月 4 日派出 48 团两个营共 300 人从哈密乘车出发，5 日抵达沁城，部队在此击溃下河一带的小股土匪后，于 8 日拂晓进至上马崖，9 日晨终于来到距伊吾县城仅 7 公里的白杨沟。

率领这两个营兵力的为 16 师 48 团参谋长王谔录，伊吾遥遥在望，为探明情况，他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要侦察班找两名当地向导带路前往伊吾侦察。

岂料，侦察班外出找到的两名向导又是装扮成牧民的土匪。他们对侦察班长说，2 连已经转移到下马崖去了。

王参谋长刚听完侦察班的报告，还未作出下一步行动方案，突然听见对面山上土匪喊话：“共军听着，2 连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你们也被包围了，快投降吧！”

伴随着一阵狂呼乱叫，整个山沟枪声大作。

王谔录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由于地形不利，部队只得且战且退，行至白杨沟一段狭窄山沟时，几度陷入土匪重围，在激战中部队损失严重，20 余名官兵被捕，除个别士兵投敌外，其余在淖毛湖、泉埡两地牺牲，部队携带的八二迫击炮、六〇炮和轻重机枪及部分弹药被土匪截获。

剿匪大纪实

我军援兵受阻白杨沟，而坚守伊吾的2连并不知情，只是当4月15日土匪用截获我军的八二迫击炮轰击2连阵地时，战斗经验丰富的胡青山顿时警觉起来，土匪是从何处搞到迫击炮和炮弹的呢？

“各排注意隐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他吩咐战士们说。

18发迫击炮炮弹在解放军阵地轰然炸开之后，土匪们见“共军”阵地上没了动静，以为2连的人全给炸死了，立时胆壮了，骑兵、步兵一齐冲入城内，向2连的各个阵地扑来。

然而，待匪徒们距我军阵地不足百米时，我军的机枪、手榴弹便向他们横扫猛砸，早已憋足了劲的战士们如出山猛虎一般飞身跃出工事，杀向众匪，一阵刺刀捅、枪托砸，将其打得落花流水。

可是，尽管2连官兵顽强坚守，但战斗减员的不断增加，令胡青山深感形势危急。仅2连副指导员罗中林带领坚守南山碉堡的7班8名战士，在土匪一次夜间偷袭中，就有2人牺牲，6人负伤，现在全靠他一人交替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轮番作战，打一阵子换一个地方迷惑土匪。

眼下，匪众又开始围攻8班阵地，那里的情况也非常危险，稍一松懈即可能失守……

所幸艾拜都拉并不知我军阵地实情，见伊吾久攻不下，这时又寄希望于“劝降”。在将伊吾铁桶一般围住的同时，先后6次派人入城诱降。其中一个人原为国民党军士兵，在酒泉起义后被补入我48团当炮兵。48团在白杨沟遭土匪伏击中被捕叛变，现在他竟打着白旗到我2连阵前诱降，令胡青山等人气愤万分。

“副营长，这个狗杂种简直丢我们解放军的脸，不能让他跑了。”

“对，打死这个叛徒！”

……

2连战士们见了这个叛徒，都叫副营长不能手软，于是胡青山心生一计，以谈谈条件为名，将其骗入我军阵地扣押起来，战后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土匪见2连“软”的一套也不吃，于是又开始攻城。就这样，胡青山带领2连及工作队的同志，在正面长达3公里战线的13个碉堡、战壕中，英勇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同时还派兵监视着城内100余名国民党政宪人员，以及照料群众没有带走的牛羊。

伊吾城牢牢地在我军控制之下，但分散在外的2连一排2班和二排6班的战士们却不幸全部遇难。

2连进驻伊吾县城后，一排2班的15名战士由连长赵富贵带领驻扎在淖毛湖畔搞生产，3月23日，2班到后不到一星期，伪装成牧民的土匪便来对赵说要商量修水渠之事，请赵连长到一“牧民”家中商议此事。赵连长不知有诈，便去了，结果人一进屋即被土匪捆绑，其后不久，赵连长奋力挣脱绳索跳出院墙向驻地飞奔，但被土匪骑马哨兵发现，追上开枪将他打死。

随之，土匪们又假借赵连长之名让2班的8名战士去田间浇水，8名战士在途中被土匪设伏将他们全部捆绑。此后，土匪们又冲入军营行凶。一排副排长何文年见土匪闯入急欲回屋取枪，却被从后窗跳入的一名匪徒拦腰抱住，俩人扭打起来。

剿匪大纪实

另3名战士中，一人翻墙报信时被土匪开枪打伤，另2名战士也被土匪捆绑起来。

此事说明，我军刚入新疆，对社情和敌情的判断不像在内地那么容易，加之语言不通，土匪经常装扮成牧民，防范确实不易。

这时，2班在外打柴的两名战士，尽管听到营区响起了枪声，也看见了许多牧民装束的人在营区，却仍然背着柴火拼命向营区跑来，结果又被10余骑马叛匪围住落入敌手。当时，如果他们稍稍留意观察，就能发现敌情，也许可以跑回伊吾向连队报信。

第二天，2班的10余战士被土匪们带到戈壁滩上一阵乱棍活活打死。

二排6班全体战士遇难的经过是这样的：

3月29日上午，6班班长熊光明带10名战士正在地里劳动，土匪们摸来后先在四周埋伏，然后派出16人手持农具上前，说是帮助解放军搞生产，结果一近身即将6班架在田头的枪支全部抱跑了。6班长熊光明一面抡起铁锹砍死一名抢枪的土匪，一边大声招呼战友们当心，战士们当即以铁锹与众匪搏斗，4名战士当场牺牲。随着土匪援兵的增多，6班长熊光明及8名战士全部被敌枪杀。

土匪们在偷袭6班搞生产的11人的同时，还派人冲入营房，将那里的两名看守战士用马鞭活活打死，吊在营房门前的的大树上示众。此后，土匪们又乘夜攻入当地派出所，将正在熟睡中的我7名警察绑架并杀害……

土匪的野蛮性和疯狂性，应该说是这些曾参加过保卫延

安、解放兰州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解放军官兵所始料不及的。如2连长赵富贵就是在翻墙逃生之际，被一农妇发觉并大声喊叫，引来了土匪而牺牲的。另如6班，当土匪化装成牧民前来“帮助生产”时，没有及时发觉，结果枪被抢，人被杀。当然，这些现象只有在新解放区，在暂时缺乏群众基础的民族地区才会发生。

从3月29日伊吾发生匪乱起，至5月7日我16师副师长任书田率两个营援兵赶到，2连已经在伊吾整整坚守40天了。

在任书田率领的援兵中，第5军50团3营全为维吾尔族民族军骑兵，干部还佩戴着三区革命时的军衔，以至胡青山在城头上看见，还险些误认为是敌人的援兵，下令开枪射击，好在这时40团3营赶到，战士们忙向城上喊话：“我们是解放军骑兵团”，2连战士们听了，这才确信自己的援兵来了。

伊吾保卫战胜利的消息经6军军长罗元发向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报告后，彭总非常高兴，于5月19日专门向2连发电嘉奖。

嘉奖电全文如下：

四十六团副营长胡青山同志转2连全体同志：

你们在伊吾保卫战的报告，我已收到。你们被乌斯满、尧乐博斯土匪包围40余日，匪众我寡，在你领导下的2连同志，打退了敌人的7次猛攻，并给予匪徒以极大的杀伤，使匪终不得逞。你们这种坚强、勇敢、能够克服困难、善于学习的精神，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称号。望你们今后继续发扬这种顽强、英勇的精神，彻底、干净、全面歼灭乌斯满、尧乐博斯匪

剿匪大纪实

徒。为保卫新疆人民的治安而光荣殉职的指战员永垂不朽！

此后不久，彭总特地前往哈密，亲自听取了16师领导的汇报，当即命名2连为“钢铁二连”光荣称号，并授予胡青山“战斗英雄”称号。

第12节 急电部署，王震指挥，我军神速闪电夹击乌、尧二匪魔窟。

当尧乐波斯匪帮气焰嚣张地大举围攻我驻伊吾守备部队，并伏击我增援部队之际，新疆军区在各地的剿匪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少股匪在我进剿部队的攻击下，纷纷就歼。大量被裹胁的哈萨克和维吾尔族群众得以解救，陆续返回家园。在当地政府的妥善安置下，重新开始生活，这使王震得以将拳头握紧，集中兵力清剿乌斯满和尧乐波斯两支股匪。

为此，新疆军区作出了如下部署。

新疆军区关于追剿乌尧股匪的作战命令

(1950年4月29日)

一、乌斯满、尧乐波斯股匪经我进剿后，乌匪仍盘踞于纸房地区，尧匪率叛兵800多人已东窜到小红柳沟有继续东窜模样。

二、我三军九师正在安西敦煌及其以北地区进剿叛匪。

三、军区为彻底消灭乌尧等股匪，巩固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决集中十六师全部、十七师一个团、六军骑兵团、炮兵团一部、五军四十团及战车部队于奇台、木垒河、哈密、镇

西、沁城、三塘湖一线，准备首先歼灭伊吾小红柳沟地区之尧匪，得手后集中全力剿灭乌匪，其部署：

1. 十六师四十八团构筑堡垒守备七角井、回井子、哈密、猩猩〔星星〕峡、沁城、南山口之交通线，形成对伊吾方面乌尧匪之封锁据点。

2. 四十六团附战车拾部集结于口门子、天山庙、镇西、北地诸点，构筑工事控制之，并以一个营的机动兵力随时准备参加主力进剿。

3. 四十七团全部附战车拾部集结于哈密，准备向伊吾小红柳沟地区进剿或堵击歼灭南窜之匪。

4. 十七师〔十〕九团以一个加强营进至三塘湖构筑坚强工事控制三塘湖、沙沟线，防匪西窜。

另一个营位木垒河、大石头、色必口线，维护交通、剿抚散匪，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建立人民政权，五十一团之一营担任奇台守备。

5. 五军四十团、六军骑兵团集结于木垒河、奇台地区并积极作剿匪之准备工作。

6. 十六师四十七团达板城、托克逊、吐鲁番线之守备任务由六师教导大队接替，鄯善守备由鄯善游击队担任。

7. 上述部队统限于五月八日前进到指定集结地区，准备在五月中旬开始进剿并即协同当地党政及群众向匪进行侦察。

四、剿匪部队统归第六军罗元发军长、战车团胡鉴团长指挥，指挥所设哈密、镇西、三塘湖地区，各部队则由十六师吴师长统一指挥，奇木线部队统由十七师程悦长师长指挥。

五、各部队除应切实保持密切联络外（有线电、无线电），

剿匪大纪实

凡派出之独立部队均应配属无线电台或话报机。

六、粮秣补给除就地购买一部外，由安西、吐鲁番、鄯善向哈密运送。镇西配卡车三十部、哈密配卡车四十部作载运步兵及输送粮秣弹药之用。

七、剿匪政治工作计划由迪化军区政治部颁布。

此令

代 司 令 员	王 震
兼 政 委	
副 司 令 员	陶 峙 岳
	赛 福 鼎
参 谋 长	张 希 钦
副 参 谋 长	曾 震 五
	哈 沙 诺 夫
政 治 部 主 任	徐 立 清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曾 涤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按照军区的部署，北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6军军长罗元发在巴里坤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就清剿尧乐波斯匪帮的作战部署，与16师领导及46团、40团的干部们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将进攻目标锁定在了匪众麋集的小红柳峡。

“四天前，逃出奇台的萨马辽夫白俄匪帮在白山一带遭我40团和17师部队痛击后，匪徒们从芨芨台子迁到了小红柳峡。看来，他们是准备把这个高山作为据点。因此，我们当前的作战目标就是这一地区。”16师参谋长阎正贤在军用挂图前

就敌我态势作出了说明。

此次清剿，指挥部决定我军兵分三路出击：西路骑兵部队附装甲车1部行动，北路为乘车的快速部队，南由南疆北上，以形成三面合围小红柳峡之势。指挥部命令各路部队务必于4月18日前投入战斗。

红柳峡位于巴里坤草原东北部，有大、小的峡之分，两边高山屏障中夹着一条河流，是一个水草丰美的优良冬牧场。

“我们这次作战，还是以争取群众为主，军事行动为辅，特别要注意不要伤害被土匪裹胁的群众，要宽待俘虏，照顾好伤员。”罗元发军长作完指示，又专门同准备执行作战任务的40团3营营长司马义诺夫·买买提了解了一些部队情况。

自1949年12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后，第5军抽调了40团协助第6军剿匪。40团为骑兵团，隶属16师。

40团3营营长司马义诺夫·买买提曾率3营进驻哈密，当时受包尔汉和16师政委关盛志的指示，多次向当时的哈密专员尧乐波斯做工作，规劝他站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一边，为建设新疆出力，但尧乐波斯听后总是出尔反尔，态度暧昧。

新疆省政府准备将尧乐波斯调往迪化担任省民政厅厅长时，曾邀请其先往迪化商议。接到这一邀请后，尧乐波斯专门派人请司马义诺夫·买买提来家商议是否启程的问题。

当时，司马义诺夫·买买提极力劝他前往迪化和首长们见见面，但尧乐波斯却说乌斯满的人在到处拦路抢劫杀人，路上不安全。司马义诺夫·买买提当即提议由3营派一个班护送或请尧坐飞机前往迪化。

剿匪大纪实

然而，尧在坐的军统特务小老婆廖咏秋却以尧有高血压不能坐飞机为由不同意。

走与不走以及如何走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几天后，尧乐博斯借口要去自己的领地察看，带着小老婆、儿子牙合甫伯克、玉素甫伯克及一个佣人，乘自己的座车逃跑了……

3月20日，根据师部的作战方案，40团3营作为骑兵部队奉调巴里坤大草原驻防。4月15日，3营一路骑兵作为先行向红柳峡开进，另一路由40团团长任书田率领的1、3营则乘汽车前往。

40团的这次作战，是在草原罕见的暴风雪天气中进行的，沿途可见被土匪裹胁的牧民留下的被冻死的几千只羊和羊羔尸体。部队在行进中也冻死了4匹马、3头骡子。全营近400人中，有80人被冻伤了手脚，许多人还得了雪盲，只能靠人搀扶行走。

尽管如此，这支由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骑兵部队依然坚定不移地执行军首长下达的战斗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直插匪穴——小红柳峡。

3营抵达小红柳峡附近时已是午夜，战士们在积雪中挖个雪洞宿营，无法生火做饭，只能啃几口干粮充饥。

第二天天一亮，与团长率领的1、2营汇合后的3营，才发现部队昨夜仅与土匪营地隔着一个山头，彼此相处一夜竟互不知晓。

当司马义诺夫·买买提随团长等人登上一处山头察看地形时，土匪的哨兵已经发现了解放军的到来，一声枪响，射来的子弹竟把司马义诺夫·买买提举在眼前的望远镜打成两节！

“1营从左面沿山脚打，3营从正面攻，骑兵营从右面峡谷往里冲！”团长任书田见土匪发觉了我军的到来，当即向身边的3位营长下达了战斗命令。

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在雪山峡谷之间震荡，激烈的枪声响成一片。那些曾在攻城掠地、残害百姓中不可一世的乌斯满匪徒、白俄匪军和国民党军的残兵散勇，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只有丢下大量尸体，四散逃命，腿短的转眼之间当了俘虏。

仅一个半钟头，40团便全部攻占了小红柳峡。

此次战斗，40团缴获了3万余只牲畜，解救了数千被土匪裹胁的牧民群众。

红柳峡实际上分为大、小红柳峡，为乌、尧土匪的一个巢穴，但乌斯满并没有把指挥部设在这里。他知道这么多人聚集在此，迟早会受到解放军的攻击，故躲在距小红柳峡15公里处的另一处地方，因此，从逃跑回来的匪兵口中得知小红柳峡受到攻击后，乌斯满当即率数百白俄卫队及部下开溜。

这只老狼又闻到气味了。

然而，当他仓皇率众逃往小堡时，又遇我装甲车团、17师部队和6军骑兵团的堵截，重重的挨了一刀，损兵折将，落荒面逃……

至此，我清剿部队东西线经大小战斗66次，共俘、降匪3127人，击毙599人，缴获重机枪9挺、轻机枪47挺、冲锋枪16枝、步马枪1091枝、短枪35枝，战防枪5具、六〇炮1门，掷弹筒4具，各种枪弹161万余发，马3118匹，骆驼707峰，牛羊3.8万余头。

第四章 平匪患

第13节 长途奔袭，围追堵截，顽匪“伤马逃命”，尧乐博斯匪帮全军覆灭，贾尼木汗被擒，乌斯满窜往甘肃。

红柳峡战斗，为我军对乌、尧匪帮的第一战，此战打破了原在牧民中流传的许多说法。什么乌斯满等人骑术精，善打仗，枪法百发百中，结果呢？在解放军大部队面前，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1950年5月7日，16师40团前往伊吾为2连解围后，尧乐博斯忙将匪徒全部撤往八大石（地名）。这儿有他过去的领地和别墅，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

但是，此时乌斯满与尧乐博斯就今后去向问题产生了分析。

乌斯满认为应尽快率匪军撤向老窝北塔山，而尧乐博斯却坚持按马克南离境前的布署要匪部窜往青海，以便在必要时逃往西藏而后出境。

由于行动方向不统一，乌斯满不辞而别，率领自己的部下溜烟开拔了。

尧乐博斯自知自己很难说服乌斯满，也根本不可能指挥其

剿匪大纪实

行动，于是准备在八大石稍作休整，再做打算。

岂料，我军在解围伊吾之后，一刻也没有停息，连在伊吾保卫战中伤亡较大的2连也坚决要求参加追歼尧乐博斯匪帮的战斗。

战斗在八大石打响后，尧乐博斯匪帮在我军强攻下，被歼200余人，尧本人及亲信被我军赶至后山。

此时，尧身边尚有20余名白俄卫队和30余骑兵。

“看来我们得走了。”尧乐博斯在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中惊魂未定地说。

“可我不会骑马呀——”他的小老婆廖咏秋哭啼道。

“那也得走！”他向大儿子牙合甫伯克使了个眼色，牙合甫伯克当即转身到帐篷中割来一段白布：“只好用这个把你捆在马上了。”

“快走！”见一切收拾完毕，尧乐博斯命令手下的幸存匪徒上马，沿后山的小路，突出了我军的包围圈。

尧匪经此南窜青海及西藏，后经印度逃往台湾。

然而，贾尼木汗却没有如此幸运了。

6月27日，6军军长罗元发得知乌斯满经奇台地区的山路窜到哈密与贾尼木汗会合后，正在大红柳峡一带集结手下，即命令16师师长吴宗先派出一支轻骑队先行围剿，大部队随即跟进。7月1日，接到命令后，116师46团团长沙玉昆迅速率3个营兵力向大红柳峡出击。

赶到大红柳峡的当夜，46团冒雨与土匪展开激战。由于土匪与被裹胁的牧民的帐篷连在一起，待战斗结束清查到乌斯满与贾尼木汗的帐篷时，里面的皮箱、布匹、元宝及枪支都没

动，只有贾的老婆和小女儿在里面嚎哭。据被俘的警卫交待，枪声一响，这两个匪首便骑上马跑了。

决不让匪首漏网，46团团长向各营下达了命令。

第二天清晨，清剿部队冒雨继续追击。

鉴于漫长的二道白杨沟只有一条出路，姜玉昆命7连绕山梁搜索，4连顺着河沟追击，其余部队堵住沟口。

果然，部队追出不到5公里，便发现土匪们群聚在沟中。姜玉昆一声令下，我军八二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顿时打得乌斯满匪兵人仰马翻。乌斯满忙命他的白俄卫队架起机枪顽抗，但很快即被我歼灭80余人。当时，由于河水暴涨，绕山梁行进的7连隔河无法配合作战，使得乌斯满再次脱逃。

在打扫战场清点俘虏时，46团团长姜玉昆发现一个穿着十分漂亮的哈萨克族姑娘，怀里还抱着两个金元宝，经查问才知是贾尼木汗的女儿。据她交待，贾尼木汗此时还在山上。姜玉昆对她耐心开导说服，她这才上山去叫出了贾尼木汗。

这个匪首，终于落网了。

大、小红柳峡战斗，宣告了尧乐波斯和乌斯满、贾尼木汗等匪帮的彻底覆灭。为此，剿匪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全力清剿已逃往北塔山的乌斯满。

事实上，乌斯满在北塔山停留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北疆为我军重点清剿地区，在此难以立足的乌斯满很快又率领残匪200余人，马400余匹窜往甘肃的马鬃山，与胡赛音股匪会合，并于当年8、9两月转辗逃往敦煌的南山地区蛰伏。

乌斯满的数度漏网，倒并非是因为他的腿长，而是他有一招残忍的绝活——“伤马逃命”。

剿匪大纪实

所谓“伤马逃命”，即在逃跑时以匕首猛刺马臀，使马因巨痛而狂奔，越跑越痛，越痛越跑，其速度自然是普通乘骑所难以相比的。等马跑到血竭而亡，再换马，再如法炮制，往往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摆脱追兵。乌斯满虽为哈萨克族人，但哈萨克族人嗜马如命的秉性却在他身上变成了血腥的弑马保命。

随同乌斯满从新疆流窜至甘肃敦煌一带活动的受蒙蔽的牧民有近万人，能参加战斗的约有3000人。乌斯满窜往此地的目的，主要是幻想依靠长年积雪的祁连山作为屏障，熬过严冬后逃往印度或巴基斯坦，实现美国领事马克南临走时所允诺的美国可在境外接应的计划。

为了坚决消灭乌斯满匪帮，西北军区紧急部署了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会剿”作战计划。

在这一计划中，新疆的骑兵团由南疆进入昆仑山进击，青海方面以骑兵2团配合。由于乌匪主要落脚甘肃，三省会剿以甘肃为主，由一野第2兵团第3军军长黄新庭负责指挥。

黄新庭年仅38岁，是我军一位年轻有为、战功显赫的军长。接到军区的命令后，他当即决定由军部骑兵大队和骆驼团组成一个团，指定第3军侦察科长李文彭代理团长，原骆驼团政委安骏任这支新建团的政委，以高东生领导的步兵27团为后援。

由于剿匪作战区域远离公路，清剿部队的给养主要靠骆驼运输，为此，酒泉地区专门抽调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南、敦煌等7县大批干部，组成了50余个骆驼运输大队及众多向导随军支援剿匪作战部队。

1951年2月14日，第3军军长黄新庭率剿匪指挥部及新

组建的骑兵团在敦煌集结，15日开始进山剿匪。

部队进入高寒缺氧的山区后，大风扑面，冰滩难行。10余公里的路程，这支骑兵部队竟行进了整整一个通宵，有的连队报告说，在山口甚至有人连人带马被大风吹走了！

16日清晨，骑兵团侦察分队发现了乌斯满匪帮的哨兵。我军侦察兵绕过帐篷，活捉了这几个“舌头”，通过翻译交待政策，并以砖茶、布匹、粮食接济这些被裹胁来的哈萨克牧民。了解了解放军的政策后，他们同意为部队带路，使剿匪部队很快掌握了敌情。

隔着一条冰滩，已运动至此的我骑兵团与乌斯满的大本营仅相距千米左右时，黄新庭命令部队迅速展开，以迫击炮和重机枪为掩护，各部队按指定目标发动攻击。

战斗打响后，叛匪夹在群众中四散狂奔逃命，顾及到老人和孩子，骑兵团只得边追击匪徒边收容群众，到当日黄昏，总算将俘虏和收容的近3000人 and 大群牛羊集中起来。

然而，经清点搜查，乌斯满又跑了。

事实上，我军在此次清剿乌斯满匪帮之前，本着一再规劝其停止作恶的原则，尽量争取以不流血的方式平息匪患，曾多次派人前往劝降。

曾两度以敦煌县政府代表身份与土匪打过交道的来推夫，这次也曾专程前往担任劝降工作。

来推夫曾在敦煌县上永渠口村务农，维吾尔族人，因懂哈萨克语并与一些哈萨克族头领有过来往，因此县政府曾两次派他代表政府前往迁居南山的哈萨克族去做安抚工作，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邀请哈萨克族群众到敦煌县城进行商贸活动，

剿匪大纪实

以及解决他们与当地汉族人的一些纠纷。

当时南山由毕善录土匪控制，经常外出抢劫农民放牧的牲畜，哈萨克族头领与之搅在一起，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社会治安。为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我军在实施军事进剿之前，主要依靠当地政府派人通过关系规劝，力争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

来推夫由于两度进山劝降，对南山地区比较熟悉。当乌斯满匪帮窜至此地时，敦煌县领导要他再次进山，一是探明乌斯满的动向，二是对被裹胁的哈萨克族群众做说服争取工作。

没想到，来推夫和同行的县府干部李万祥这次一到南山，走进的第一个帐篷，便迎面撞上了乌斯满！

“你们是啥人？”房内的一个黑胡子大汉厉声喝问道。

“我们是敦煌县人民政府派来的。”尽管来推夫有些吃惊，但因南山地区不少人皆知他的“说客”身份，放直言相告。

“干啥来的？”

“政府要我们告诉你们大家可以做生意。”

“你们认识乌斯满吗？”黑胡子大汉突然抛来一句。

“不认识。”来推夫和李万祥相视一眼，一种强烈的预感产生了：“他莫不就是乌斯满？”

“听说过吗？”黑胡子大汉见两人摇头，似乎有些失望。

“没有。”来推夫佯作不知。

“我就是乌斯满。”黑胡子大汉突然说。

“是新来的头人吧？”来推夫用哈萨克语探问道。

“嗯。”乌斯满警觉的瞪他一眼，不想再继续自我介绍了：“你们有茶吗？”

“有的。”来推夫从马搭中取出 10 块砖茶放到他面前的茶炊上。

“可我没钱也没羊和你换。” 乌斯满阴沉着脸，一双布满血丝的眼中闪着令人捉摸不定的寒光。

“没关系，送你 10 块。” 来推夫尽量装出很随便的语气和他说话。

“好了，回去以后不许说见过我。” 他一挥手，示意来李二人离去。

然而，正当二人出门庆幸没有被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扣押时，没走多远却被乌斯满手下一个叫加那布里的土匪小头目给抓了起来，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奸细，关押了整整一个星期。

幸好哈萨克族群众和部落里的一些小头目以往通过来推夫的关系在与敦煌县城的群众交易中尝到了甜头，仍希望这次随他赶着牛羊去敦煌，使得听命于乌斯满的加那布里不敢犯众怒，只好放了他们。

临行前，狡猾的乌斯满又露面了。

“你这次回去，给我弄 150 公斤面粉来。” 他拉来一峰高大壮实的骆驼，把缰绳塞到来推夫手中：“不过我还是没钱。”

“好吧。” 来推夫知道他这是活抢人，但为了下一步的行动，还是一口应承下来。

回到敦煌汇报了此行经过之后，县政府立即划拨出 150 公斤面粉，仍以来李二人的名义托进城交易的哈萨克族人带给了乌斯满。

尽管我党我军对乌斯满等人做了大量的规劝工作，并在劝降信上一再表示对其属下一个不抓、一个不杀、既往不咎，并

剿匪大纪实

保证一切生活物资由国家供应，而前提条件仅为从此不再抢劫杀人。但这个顽固不化的土匪，仍死抱着与人民政权为敌的决心，死不悔改。

自南山获得一阵喘息之机后，他又率领叛众逃往海子。

我剿匪总指挥部给乌斯满的最后一封劝降信无效后，黄新庭决定，立即出击海子，全歼乌匪。

东路骑兵大队与西路的骆驼兵团按命令于1951年2月19日拂晓进抵海子。

为骑兵大队担任向导和翻译的，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来推夫。

“开始行动！”进入预定位置后，东、西两路的指挥员同时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时天色未明，战士们迅速摸进一顶顶帐篷，下枪捉人，干净利索，片刻功夫，解除了50余顶帐篷中匪徒的武装。

眼看我军将兵不血刃地完成这场突袭，殊料那个曾扣押来推夫和李万祥的土匪小头目加那布里睡觉惊醒，听到帐篷外似有响动，翻身爬起来提着枪就往外走。出屋见情况不妙后，又鸣枪报警，一些匪徒闻讯冲出帐篷顽抗，当即遭到我早已布置好的轻重火力的猛烈压制，群匪顿时阵脚大乱，除少数人夺马飞奔而逃之外，大多数人四散躲避。

战斗结束时，顽匪加那布里在押解途中，夺枪打死我战士2人，后被我战士当场击毙。

这次突袭战斗共俘获和接受投降土匪及被裹胁群众2000余人，但经仔细清点，乌斯满又不见了。

第14节 穷寇未路，单骑狂奔，我军两连骑兵猛追不舍，孤胆英雄拼死一搏，力擒匪首乌斯满。

乌斯满率少数几骑匪兵冲出营地时，天空黑云沉沉，大风骤起，戈壁滩上飞沙走石，使人辨不清东、西、南、北。

由于一时无法辨认乌匪逃向，加之需要收容众多群众，指挥部决定集中部队，待研究制定下步计划后再行动。

经分析，指挥员们认为眼下东、南、西、北四面除我军重兵把守之外，大沙漠和冰山都是乌斯满等人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惟一逃路只有西北方向的安南坝。那里水草茂盛，且有向我军投诚后又叛乱的铁有才部残匪活动，乌斯满又与之有联系，其去安南坝的可能性极大。

敌情明朗了，东、西两路部队的指挥员经向黄新庭军长请示后，当即决定由李文彭率骑兵团两个连轻装向安南坝追击。

此时，由新疆入甘的我骑兵团进入昆仑山后即迷失了方向，雪山下的戈壁寸草不生，断绝了给养的部队处于极度困难之中，指挥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杀马。骑兵战士们抱着马直哭，这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啊，一些人直到饿死，也没有杀马充饥为部队留下了马！

得知这一情况后，黄新廷下令骆驼团派出一个连进山救援，经艰苦的找寻，终于救出了骑兵团的大多数指战员……

为了清剿乌斯满匪帮，三省会剿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然而，他们的英勇无畏，流血牺牲，终于化作了胜利的欢

笑。

这天，我军两个骑兵连循着乌斯满向安南坝的逃跑路线紧紧追赶，经数小时的快马加鞭，渐渐地发现了一些掉队的匪兵，这些人困马乏、又冷又饿，统统当了俘虏。经俘虏交待，战士才发现有一个黑点正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子南岸移动……

“那就是乌斯满。”一名乌的警卫哭丧着脸说。

“追——”骑兵团政委安骏大声向战士们喊道：“同志们，为人民除害立功的时候到了，谁捉住乌斯满就给谁请功！”

“快上马！”战士们顿时来了精神，连续多日的艰辛追击，这下子总算到头了。

我军上百匹战马齐奔，在戈壁雪原上扬起阵阵白尘。

乌斯满仗着地形熟，骑着他那匹白马拼命狂奔，竟把我军追兵逐一甩下，拉开了相当一段距离。

为了活捉乌斯满，战士们都没敢开枪，如要尸体，我几十骑追兵齐射，乌不死也得重伤。

这时，骑兵团3连文化教员孔庆云骑着一匹好马上来了，团领导命令这个从小在张掖长大，善骑马的小伙子卸下了马鞍，轻装上阵追匪。孔庆云接令后，立即招呼连部炊事员刘华林，通信员段生茂和3名战士：“从海子冰上抄过去！”

海子在不结冰时是一个湖泊，此时从海子冰面上抄过去，就等于“切半径”，比沿着海子追要缩短一半距离。但是，由于冰层厚薄不一，弄不好也会连人带马陷下去。

孔庆云等6人顾不得这许多，一抖缰绳便策马跃上了冰面，向乌匪疾速追击。可是没追多远，就有2名战士连人带马

重重的摔倒在冰滩上，人马受伤难以动弹。

“追，一定要追上乌斯满！”孔庆云奋力鼓舞剩下的3名战士不要松劲。

500米，400米，300米，200米……已经接近乌斯满了。

眼见追击的解放军越来越近，善打回马枪的乌斯满回手一枪，将通信员段生茂打伤落马，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炊事员刘华林和另一名战士的马也被打倒在地。偌大的海子冰原上，只剩下了被3连战士们笑称“书生”的孔庆云。

乌斯满见近前的仅有一名解放军，料想不是自己的对手，居然不慌不忙的翻身下马，将叉子枪架在冰面上，准备一个“点射”将孔庆云打下马来。

孔庆云此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抓住乌斯满。因此丝毫不顾个人安危，拍马而来，直取匪首。

也许是乌斯满被孔庆云的拼命劲头震慑得心里发虚，也许是天冷手指僵硬，总之他打出的原以为是致命的一枪，却只打穿了孔庆云的一只裤脚管，第二枪又打在马蹄前的冰面上，冰花飞溅后，战马受惊，仿佛急于脱离冰面似的，嘶叫着直窜到岸边乌斯满身前。

趴在地上射击的乌斯满，见孔庆云来到眼前，忙爬起身来，举起叉子枪阴狠地直戳孔庆云的双眼。

孔庆云头一偏，一股钢叉叉在了他的颊面上，顿时，血流如注，他一把抓住枪管，拼命想将抢夺下，那知乌斯满体壮力蛮，一用力，竟将孔庆云拽下马来。

别看孔庆云是个文化教员，人急了，拼命了，也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剿匪大纪实

在跌下马的一瞬间，他居然死抱住那枝枪不放，人在落地的当儿，竟把枪抓在了手里。

乌斯满此时已如一条疯狂的野牛，根本没去夺枪，而是一把抓过孔庆云，一个“大背”将孔庆云面口袋似地仰天重重摔在地上，然后死命压在他身上。他想活活掐死这个敢于跟自己拼命的解放军。

孔庆云被 100 余公斤的乌斯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忙将手中的枪扔到一边。

乌斯满一手捏着孔庆云的脖子，一手从皮靴内拔匕首，孔庆云手疾眼快，伸手用力抓住乌斯满的右手，使他无法抽出匕首。

生死关头，炊事员刘华林骑马赶到了。他的马被打伤后，为了不让匪首跑掉，他又抓来负伤战友的马，岂知那马性烈认生，死活不肯让他骑。他飞身上马后，还没来得及接过战友手中的枪，那马已脱缰而去。见孔庆云与乌斯满扭打滚动在一起，刘华林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快捡枪——”孔庆云提醒道。

刘华林捡起被孔庆云扔在一边的叉子枪，趁乌斯满再一次翻身将孔庆云压在身下之机，端起叉子枪狠命向其后背用力捅去。

随着一声嚎叫，乌斯满被锋利的钢叉刺得歪身倒地，孔庆云忙爬起身与刘华林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乌斯满眼见要当俘虏，对着地上乱撞脑袋企图自杀。

这时，剩下的 4 位战友也相继赶到，为了核实乌斯满的身份，几人七手八脚地搜身，从其身上搜出伪新疆警备总司令部

印章一枚、委任状数张及一些重要文件。

2月19日下午，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战士们将乌斯捆绑在驼峰上，押往指挥部报喜。

这只大漠之狐、草原之狼，终于栽在了我大智大勇的剿匪战士的手上。

乌斯满被押解到了敦煌，后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军区将乌斯满押往新疆迪化市公审。

新疆各族人民得知乌斯满落网的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热烈祝贺我军剿匪部队获得的这一辉煌战绩。

为此《新疆日报》连续几日发表文章反映民意——

迪市各族各界人民控诉

匪首乌斯满罪行

要求把乌匪押到新疆来依法惩办

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某部活捉美蒋武装匪特乌斯满的消息，振奋了迪市各级各界人民。各界人民连日来欢欣谈着这一件大喜事。受过乌斯满迫害的人民更纷纷控诉乌匪的罪行，并要求把乌匪押到新疆来依法惩办。

在迪市五区的青年代表会上，代表们在热烈讨论抗美援朝与肃特治安工作，一致为活捉匪首乌斯满的大喜讯而欢腾鼓舞。曾惨遭乌匪蹂躏的维吾尔族代表哈山在会上愤慨地控诉乌匪罪行，他说：“乌斯满贼娃子在阿山一次就杀了四百多各族人民，我的几个朋友都叫他活活用针给扎死了。”他卷起袖子，

剿匪大纪实

手臂上露出一块块伤疤，他说：“这是乌斯满贼娃子给打的，这种仇恨多少年来我只能记在心里，今天可让咱人民解放军给报了。”在木垒河被乌匪把东西抢光、房子烧光，逃到迪化来的徐中义代表为乌匪被活捉的消息兴奋地流下了热泪，他频频地说：“我们要请人民政府把贼娃子押到迪化来游街示众，让大家都看看贼娃子的丑恶面目。”

曾被乌斯满匪首抢走了三匹马、十九头牛、七百多只羊的回族老汉聂生元感激地说：“人民解放军真是为人民，把这个与国民党勾结、横行多少年的贼娃子给除了。”他接着说：“在国民党手里，贼娃子抢了我那么多牛、羊、马，在沙梁子又把我仅有的一头驮粮的骡子抢走，衣服剥光，我跑到乾德县告状，国民党狗官理都不理。现在我可看清楚了，共产党、人民政府才真是为人民办事情的。”

乌斯满匪首被我军活捉的消息，同时振奋了各寺坊的阿訇、香老，南大寺赵永龙阿訇说：“我们万分感谢活捉乌斯满匪首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他们为新疆五百三十万各族各界人民除了大害，使我们能安居乐业地过生活。我们今后更要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并请求政府把乌斯满匪首押解到新疆来，交给各族人民公审，依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惩办，为受害受难的各族人民报仇。”

二区三街巡逻组的组员们在听到乌匪落网的消息后，举行了座谈，他们说：“乌斯满贼娃子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遭殃，现在这个害人的贼娃子已经被我们活捉，我们除了要求政府依法严办以外，并要提高警惕，加强巡夜、放哨，防止一切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乌斯满匪首被我人民解放军活捉的消息，也振奋了各族各界妇女。在迪市各族各界妇女纪念“三八”筹备委员会第三次筹备会议上，大家为了这一喜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萨克族妇女扎努兰激愤的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乌斯满匪首杀害新疆多少人民，尤其哈萨克族同胞的牲口、财产被乌斯满贼娃子抢走不知有多少，要不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来了，新疆各族人民哪能过安定的日子。”她要求人民政府对乌匪及其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匪特严厉惩办。会上大家一致提出，为了感谢人民解放军，各族各界妇女要给活捉乌斯满匪首的人民战士写信慰问，并要求政府把乌匪押解到新疆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加惩办。同时通知游牧区哈萨克族同胞参加公审，让他们亲眼看看曾经欺压过他们的乌斯满贼娃子的下场。

(选自1951年3月3日《新疆日报》)

第二篇文章为——

乌斯满匪首押解来迪

迪市各族人民欢呼人民解放军万岁

残害新疆各族人民十余年的美蒋武装特务匪首乌斯满，于十四日押解来迪。消息传来，各族各界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衷心感谢为人民除此大害的人民解放军；纷纷要求迅速组织公审，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处决，为受害的全疆各族父老、兄弟、姊妹报仇雪恨。

当乌匪于十四日下午解抵人民解放军某部时，该部直属各

剿匪大纪实

单位指战员和区党委地干班学员以无限愤恨的心情，齐集大操场，怒视着横行十余年、杀人无数的美蒋武装匪首。迪化军区玉素甫夫副司令员（哈萨克族）激愤地指着乌匪对大家说：“这就是美蒋匪特、残杀新疆各族人民的刽子手乌斯满匪首，今天让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给活捉来了！”一时全场高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

迪化区党委地干班各族学员指着乌匪痛骂，该班全体哈萨克族学员悲愤地控诉乌匪罪行。曾被逼迫着在乌匪手下当过兵的十九岁的被害者阿合买提，含着热泪控诉乌匪杀害他的表兄以及他被逼着到北塔山，沿途渴得喝马尿的悲惨情景，他说：“因为经常喝马尿的缘故，使我得了一身的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被乌匪抓去了姐夫的地亚尔学员悲痛地说：“我那可怜的姐姐及她的孩子们还在盼望着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回来呢，他们如果知道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乌匪活捉了，该是多么高兴啊！”

为满足各族各界人民的要求，该部特于十五日下午把乌匪拉出来，让大家看看匪首的丑恶面目。当押解乌匪的汽车在街头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呼声融成一片，各族人民忘记了街上化雪后的泥泞，跟着专车指着乌匪高声痛骂。在西盐池曾遭乌匪抢劫、被乌匪剥光衣服并用石板压得半死的宋登文老乡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并且说：“我这多少年来的仇恨，让咱们人民解放军给报了。”在人民公安学校及省一中门前，各族同学及无数群众指着押解乌匪的汽车，高举着拳头怒吼：“我们要报仇！”并向车上的解放军同志高呼：“向活捉乌匪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南门外一直通到南梁的大街上无数的维、哈、回等族同胞围着汽车控诉乌匪罪行，维吾尔族老乡阿合买提阿山怒视着乌匪痛骂：“乌斯满，你在阿山、塔城杀死了多少老百姓，拆散了多少人家的父母子女，今天你也让我们人民解放军给捉到了！”哈萨克族老乡阿不都热合满大声地吼着：“枪决民族败类！”维吾尔族妇女塔金莎哭诉着说：“乌斯满你杀死了我哥哥，我要求人民政府把你枪决，为我哥哥报仇！”

在南梁大街上一千余各族人民热烈鼓掌欢呼，为替他们除害的人民解放军欢呼万岁，为日后幸福安乐的生活欢呼万岁。

1951年3月17日《新疆日报》

第15节 血泪控诉，庄严审判，王震当庭宣布：人民要求惩办他们是公正的、正义的！乌斯满等匪首先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自新疆军区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展大规模剿匪作战以来，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纷纷落网，经公审后，人民政府对这些罪不可赦的匪首执行枪决。

于1950年11月22日第一批被枪决的罪犯是：煽动与组织起义部队骑7师部分部队实行武装叛乱的马占林、冶林生、马占德、王振华、马森林、苟喧才等6人。

这6人煽动叛乱后，枪杀解放军政治干部、公安人员多人，并与乌斯满匪帮合编，公然组织起“翻身革命独立师”，大肆抢劫国家与人民财产，疯狂破坏社会秩序。马占林为该师副师长、冶生林为其第3团团长、王振华为该师副参谋长、马

剿匪大纪实

森林为第3团第3连连长。第1团军需主任苟喧才、马占德等均以叛国罪被于当日枪决。

1950年12月30日，奇台县法院以反革命叛乱罪判处匪首安岐峰、高天才、张富元死刑。

安岐峰，29岁，曾任伪宪兵队长，长期利用职权敲诈、暗杀、贪污、奸淫、无恶不作。解放后与匪首刘香明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对抗解放军入疆，在奇台拉拢高天才入伙猖狂活动。骑7师一部叛乱时，安趁机纠合匪徒王双全、胡占林、顾生义等42人，在孚远武装叛乱，袭击县城，抢走枪支，弹药，马匹，枪伤我干部3名。事后与骑7师叛匪马占林、冶生林、谭贵等纠合，抢劫奇台农民马200余匹，并以连刺10余刀的残忍手段杀害我干部杨希武。后又与乌斯满取得联系，攻打奇台县城，被我军击溃后，逃至白墩子沟与匪首尧乐博斯会合，任尧匪部副参谋长，亲自参加并指挥匪徒进攻哈密、沁城、伊吾等地直至被俘。

高天才，52岁，帮会地痞。与安岐峰组织叛乱，充任匪部骑炮连连长，在进攻奇台县城时，曾率部攻打东门，战斗中被俘。

张富元，22岁，惯盗，投靠安匪后在奇台吉拜库乡，杀害我革命干部赵海雄，后被当地我联防队员捕获。

1951年2月4日，新疆省人民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第一项原则公审匪首贾尼木汗，判处其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

1951年3月19日，新疆省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审匪首司迪克、布伦加夫、艾力坎、别

开等4人。在法庭上，受害人揭发了其组织叛乱残杀群众、抢劫、轮奸幼女等血腥罪行。会后4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51年3月20日，新疆省人民法院听取群众意见，将匪首乌拉孜拜押解至受其抢劫杀戳最惨重的景化县城，组织临时人民法庭进行公审。

乌拉孜拜，39岁，承化人。曾任景化县副县长。1946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任景化县特务组长，疯狂破坏三区民族革命。1946年向新疆伪警备司令部领取电台1部，步枪20余支，亲率匪徒抓走民族军战士70余人，勾结美国间谍马克南并接受其武装叛乱的指示。新疆和平解放后不久，又联络匪首乌斯满，组织反革命武装，充任匪“副军长”兼“政治部长”，先后杀害我军战士14人，群众17人，烧伤1人。在法庭上，64岁的受害人张宝应老汉质问他：“你杀了我5个儿子，4个小舅子，把我怀胎7个月的女人开了膛，剖了肚，害得我绝了后，断了根！你害得我好惨呀……”南山牧民艾木铁勒控诉道：“这个贼娃子在去年竟把我82岁的老父亲也打死，还把牙齿拔掉，把头砍下来喂了狼。把我的媳妇也强奸了，把我抓走了。今天，我要报仇，请你们让我先挖掉他的眼睛再枪毙！”

哈萨克族老妇卡尔曼哭诉：“乌拉孜拜，你把我儿子打死，过门不到5个月的媳妇被你们轮奸了一天……”

群众争先恐后的血泪控诉，不断激起愤怒的口号声，审判结束后，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第九条及第十条规定，宣判对匪首乌拉孜拜执行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

1951年4月29日上午，新疆省会迪化市8万群众举行公

剿匪大纪实

审大会，公审危害新疆人民 10 余年的匪首乌斯满以及盛世才的主要帮凶李英奇、富宝廉、张光前，军统特务刘汉东、彭家友、张思信、林储才、何贵庭等罪大恶极分子。

在公审大审上，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发表即席讲话说：“同志们，各族同胞们，今天这个大会的召开，代表着人民胜利了！为巩固胜利，这些屠杀各族人民的刽子手，破坏人民革命事业，抢劫人民财产，出卖国家的罪犯和匪徒们，今天要由人民国家的法律制裁他们！人民要求惩办他们是公正的，正义的！代表和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要坚决接受人民的要求，将人民的一切公敌，依法严办镇压，否则，人民胜利的果实就不能保护，人民革命事业亦不能向前发展！因此，我代表驻新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国家惩治反革命的条例，坚决拥护各族人民的正义要求！”

王震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曾在 4 月 25 日向中共西北局发出一封电告——

王震就处决一批惯匪头目情况致西北局的报告 (1952 年 4 月 25 日)

西北局并中央、并致邦英^①同志：

四月二十三日西北局关于游牧区平定匪患的指示奉悉。对于哈萨克族的反动头目和惯匪的严厉镇压是游牧区人民所极端赞成的，他们的叛乱抢劫，使哈萨克族人民也受到很大损害，

^① 邦英：即张邦英。

哈萨克族人民批评我们政府“宽大无边”，故我们根据刘少奇副主席对惯匪采取严肃镇压的指示，已在伊犁处决了七十多叛乱的反动头目和惯匪，哈萨克族人民人心大快，要求政府严肃处理。对于惯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都引起哈萨克族人民纷纷要求立处死刑，经过说服后才通过的。特此报告请示。

王震

四月二十五日

上午11时，当这批匪首、敌特分子被押上台，新疆省人民检察署刘奋生、舒慕同两人以汉、维语分别对美蒋武装匪特乌斯满反革命案，盛世才帮凶李英奇等反革命大屠杀案提起公诉后，各族各界群众代表及受难家属随即拥至控诉台前进行控诉发言。

木垒河维吾尔族代表叶尔逊控诉了乌斯满匪帮在该县共杀死了无辜牧民366人，焚毁房屋2480间，抢走各种牲口无数，并将妇女脱光衣服任意凌辱……

王喜凤的丈夫是被李英奇等匪大卸八块惨杀的……

刘护平代表被盛世才杀害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32名共产党员提出控诉……

公审前，仅提交省人民法院的控诉书即达270余件。公审大会进行至下午4点，审判长包尔汉、副审判长饶正锡以维、汉语宣判，上述受审的匪犯均系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匪首，其罪行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七等条之罪，均处以死刑。

剿匪大纪实

宣判之后，上述罪犯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随着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的伏法，新疆境内危害甚烈的大股土匪武装基本上被我军清剿，大规模的军事清剿作战宣告结束。

第16节 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以匪制匪，最后一股残匪投降。驻疆部队总结重大作战成果，屯垦戍边，保卫国防。

大股土匪就歼后，新疆最后的一股土匪武装是乌斯满长子谢尔德曼率领的400余骑匪。

1951年夏秋，乌斯满之子谢尔德曼从甘肃敦煌纠集起一些旧部，重新窜回老窝北塔山，与奇台县副县长季奎、哈密的阿同拜克、东山的胡赛音等人秘密取得联系后，又将自己的人马扩充到400余人，继续在吉木萨尔、三台、阜康一带的草原烧杀抢掠，危害群众。

为打击谢尔德曼股匪的嚣张气焰，新疆军区第5军16师决定派40团的两个骑兵连，前往达坂城的萨尔达坂和阿克苏达坂截击企图翻越博格达峰窜往迪化南山活动的谢匪。

我40团两个骑兵连在已担任团参谋长的原3营营长司马义诺夫·买买提的率领下，于7月20日中午自迪化骑马出发，经11天的长途跋涉，于7月31日傍晚占领萨尔达坂和阿克苏达坂。

8月1日清晨，我军在当地附近一片森林河谷中与谢尔德曼匪帮遭遇。经激战，我骑兵连击毙匪徒7人，缴获战马42

匹以及驮运食品的牛马 19 头。匪徒见无法冲出被我军扼守的沟口，只得沿着一条荒沟朝东逃去。

我骑兵部队寻踪沿吐鲁番通往古城的小道，经天山深处的大、小黑沟，一直猛追到木垒。

此时，谢尔德曼已从木垒沿着准噶尔沙漠东边窜回了北塔山。

在这次我军多路骑兵围剿谢匪的战斗中，51 师 50 团的一个骑兵连在准噶尔沙漠堵截谢匪时，因地形不熟，在沙丘中遭敌偷袭，受到很大损失。12 名落入匪手的战士，全部被活活压死在一堵土墙下，匪徒夺走我军两门六〇迫击炮、3 枝冲锋枪及一些步枪和弹药后，随即逃往富蕴县以西的库额尔齐斯山。为追击到此的谢匪，阿勒泰骑兵团奉命派出一个连进山搜索，结果又遭谢匪偷袭，该连多数人牺牲，连长赛得瓦哈斯被俘，被匪徒活活打死扔下深谷。

在这次战斗中，谢匪又夺得了部分枪支弹药。当我军增援部队赶至时，众匪又窜入萨尔托海河中游的温都尔喀拉山峰。

我军经短期休整，并在富蕴县更换了大批疲惫不堪的军马之后，于 10 月中旬再次出击温都尔喀拉。

由于我军专门组织的三支骑兵部队展开紧追不舍的围剿，已丧失老窝，无法在一处地方长时间落脚的小股土匪，惶惶不可终日，一夕三惊，稍有风吹草动即落荒而逃。由于没有食物和需要更换疲马，他们只得靠抢劫为生，因此被哈萨克族群众恨之人骨，亦看清了其真实面目。

鉴于土匪已显示出以躲避为主的态势，已从根本对我各基层政权构不成直接威胁，于是从 1952 年 9 月起，在保持一定

剿匪大纪实

军事压力的前提下，我军即转为展开宣传攻势。以政治争取为主，借用社会力量及各方面关系做劝降工作，尤其利用已投降的大、小土匪头目及其家属出面劝降，形成了以匪制匪的局面。使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侦察匪情，劝降匪众，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匪首。

谢尔德曼经我军追剿，牛羊殆尽，居无定所，其百余匪众更是军心涣散、思家心切。眼看冬季即至，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对此，我军特派出5人代表前往招降。

谢尔德曼见到我军政谈判代表后，心存疑虑，但经我代表反复做劝导工作后，仍坚持说谈判是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在欺骗他，是想利用谈判之机来消灭他们。

尽管我方代表一再解释，谢尔德曼仍坚持提出了8个条件：

1. 暂不缴枪。
2. 尊重民族政策。
3. 既往不咎。
4. 集中分散在阿山专区之牧民原始部落地点。
5. 不参加政府会议，不去承化，愿去山区游牧。
6. 投降后政府予以生活照顾。
7. 告知乌斯满埋葬何地。
8. 告知甘省西岫（即酒泉）、专区东汉（即敦煌）县等地逮捕之青年予以宽大。

以上8条，实际上正是谢尔德曼既有投降意向，又担心政府“变卦”杀他的头的真实心理写照。

经数次谈判，政府代表惟对其第1条“暂不缴枪”与谢尔

德曼发生分歧。为此，谢大为不满，宣布不再与我方代表谈判。

这时，中共新疆分局及时指示谈判代表：不要设想一次成功，应深入细致地做政治争取工作，应适时揭露其阴谋或无诚意之处，多往来、请客及送茶、烟等以消除其顾虑，以争取达到全部争取其投降的目的。

为此，政府又派出代表争取谈判，并对谢尔德曼所提的 8 项条件作了 6 点答复：

1. 不继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家法令。
2. 立即停止破坏各族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放下武器，保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政府决不咎既往，一律宽大，不杀、不判。投降后政府给予生活出路，适当的救济安置。
3. 政府保护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政策贯彻实行。
4. 对在甘肃河西走廊被捕跟随乌斯满之人员，政府将请省府转报西北军政委员会，呈请宽大释放。
5. 投降以后，依例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迁徙居住及人身之自由权利。
6. 乌斯满埋葬地点可以告知。

为配合政治争取工作，在这一期间，新疆军区清剿部队在各守备要点都停止了对股匪的围剿合击。

经连续三天的谈判，并在政府为其提供 250 公斤面粉、150 公斤大米、纸烟 70 条、砖茶 20 块及砂糖等物资解决当前无饭吃的困难后，谢表示愿派代表去承化与政府谈判，并在派人去奇台接回家属后，即正式向政府投降。

为表示一点诚意，谢尔德曼和胡尔曼缴出 9 枝步枪、1 挺

剿匪大纪实

轻机枪。

谢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参谋长哈那提拜，秘书胡尔曼拜、胞弟那比，（谈判）组长哈拜耶夫和胡马尔汉共5人，同时另派3人前往奇台一带接家属。

此后，谈判争取工作进展顺利，谢部家属被接回后，谢部将保留的武器全部交清，彻底解除了武装。

9月17日，谢尔德曼放弃了“不去承化”的原有主张，随我谈判工作组坐车来到承化。

可是，到了承化，谢尔德曼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些反复，称其已向政府方面写有保证书，坚持要政府方面也给予书面“指令式”的宽大保证。

于是，我方经请示，给予了谢、胡及全体投降人员用“公文”写下的一纸“保证”：

1. 诚意投降，回心向善，不再抢劫，不再反对人民政府，政府决予宽大对待，一律不咎既往，不杀、不判罪，并保证其财产。

2. 随乌斯满去甘肃在河西被俘人员，当其开出名单，说清被俘地点后，政府即报省府，呈请西北军政委员会宽大释放。

3. 留奇台等之家属，政府负责派请干部与接家属人员一同前往政府请示，准予搬回阿山，如有畜力自己驮运，无畜力者政府派车送回。

4. 为照顾谢、胡等全体人员之生活，政府暂发面粉1000公斤、羊10只及火柴、肥皂、莫合烟等日用品。

5. 谢尔德曼要求一顶蒙古包毡房，政府为照顾其生活，

可予发给一顶。

经 10 余天的政治争取工作，谢、胡股匪终于向我人民政府投降。

除此之外，影响力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七角井附近开枪打死我 16 师副师长等人的卡赞部落，被送至镇西县政府后，政府考虑其为不明真相的普通牧民，未追究此事，表明了我军的宽大政策，使广大群众开始真心向政府靠拢，并根据此事在部落头领间及群众中形成了检举揭发那些顽固不化坚决与政府为敌的反动分子的高潮，使真凶难逃法网。

谢尔德曼投降后，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政策，将其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胡尔曼任富蕴县畜牧科副科长，乌斯曼之女也安排在富蕴县妇联工作，哈那提巴依任该县第二区副区长。几人从此作为“国家干部”开始了新的生活。

北疆地区除谢尔德曼外，1952 年 11 月 6 日起，又对铁木里克的胡赛音、马五宋等股匪进行政治争取，使之全部投降，服从人民政府的安置。

新疆地区经 3 年时间的清剿土匪后，我参剿部队均对剿匪战斗及时进行了总结。

其中部分部队在不同年间的战绩如下：

[1950 年]

第 6 军：投入兵力万人、参加大、小战斗 120 余次，共毙伤匪首毛鲁哈乌鲁、冉哈木、乌斯曼长子等 576 人，俘匪 3351 人，其中包括匪首贾尼木汗、乌拉孜拜、司迪克、瓦里、布尔布加甫、伪奇台公安局长克维依、镇西公安局长哈台、伊吾县土鲁红副团长、公安局长伊建中、乌斯曼秘书海来依、乌拉孜

剿匪大纪实

伯参谋长库尔西、团长阿不都拉、哈布哈里斯等匪首 40 余人。投降者 4215 人，共计 8138 人。缴获步马枪 2139 枝、轻机枪 48 挺、重机枪 12 挺、冲锋枪 23 枝、短枪 53 枝、枪榴筒 4 个、六〇炮 9 门、战防枪 1 枝、子弹 46578 发、手榴弹 919 枚、望远镜 19 副、电话机 1 部，收音机、留声机各 2 部及其他部分军用品。缴获牲畜：马 10601 匹、牛 8247 头、羊 83510 只、骆驼 1820 峰、骡子 5 头、驴 25 头，共计 104208 头（只）。同时共有大、小 25 个部落归顺政府，人数约 21553 人，内有国民党时期任过专员、县长、团长、参谋长等 10 余人投降。清查登记国民党特务 471 名，游兵散勇 1400 余人。

6 军战斗损失：伤 236 人。其中团级干部 3 人、营级干部 1 人、连级干部 8 人、排级干部 12 人、班以下 97 人。阵亡 157 人。其中师级干部 1 人、营级干部 2 人、连级干部 5 人、排级干部 15 人、班以下 129 人。另有轻、重冻伤共 330 人，其中残废 30 人。倒毙马共 728 匹，骆驼 29 峰、骡子 15 头，共 772 匹。损失武器：长短枪 170 枝、轻机枪 12 挺、八二迫击炮 2 门、六〇迫击炮 2 门。

[1951 年]

第 6 军（第 16、17 师）：参战兵力 2700 人

第 5 军（骑 1 团、40 团）：参战兵力 2300 骑

第 9 军（第 25、26 师）：各一部

装甲车 24 辆、汽车 74 台、骆驼 700 峰

我军对流窜于南起迪化南山之大西沟，北至奇台、阜康之热水泉一带的谢尔德曼、季奎股匪实施清剿战斗 8 次、歼匪 160 余人；在哈密地区实施清剿战斗 18 次、歼匪 280 余人；在

伊犁地区，剿除塔里木股匪 300 余人。

从以上部分粗略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我剿匪部队战斗频繁，战绩可观。

1954 年 8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复新疆军区，同意第 1 兵团第 2、第 6 军及第 5 军大部连同第 22 兵团全部，同时转业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从此，我军第 1 兵团和第 22 兵团，正式转入屯垦戍边、保卫国防的伟大历史时期，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的光荣历程。

第五章 祁连风

第 17 节 夺西安，克兰州，马步芳寄希望胡宗南将我军主力吸引至大巴山一线，以保青宁两省平安，无奈如意算盘落空。

陕中战役中，我第一野战军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县，并于 5 月 20 日攻入胡宗南经营大西北多年的老巢——西安。

我军攻占西安之后，又挥师追击，凤翔、岐山、眉县相继解放，在麟游消灭胡宗南集团第 57 军 1 个师。

陕中战役，我一野部队共歼敌 35600 余人。

1949 年 5 月 25 日，彭德怀总司令回到野司。

彭总为了彻底粉碎胡宗南集团在西北的重点防御，1949 年 6 月，又命令拨归一野建制的 19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大军，开始进军西北。

根据中央军委和一野司令部制定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7 月 4 日，彭德怀发出了关于实施扶（风）、眉（县）战役的电令，号召一野全体指战员，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英勇作战，以西北战场的捷报，响应三大战役胜利的喜讯。

剿匪大纪实

根据扶眉战役的部署，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 19 兵团担负了钳制青海、宁夏“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的作战任务，而王震指挥的第 1 兵团，许光达、王世泰指挥的第 2 兵团全部及周士第指挥的第 18 兵团主力，则按彭德怀所说“首先歼灭胡宗南三四个军，再集中全力歼击青、宁二马”的指示，迅速投入行动。

此阶段，彭德怀针对胡宗南虽兵力集中，但已没有战役预备队等致命弱点，要求部队采取迂回歼敌战术，实施两翼牵制，大胆深入敌人纵深，断其退路，实施分割聚歼的战术原则，使敌人陷入既不能防也不能逃的绝境。

5 月 26 日，由周士第率领的进军西北的 18 兵团，自太原沿同蒲路南下，一路急行军，兵团前卫部队于 6 月 7 日进入西安。

胡宗南并没有死心，在西安老巢被攻占后，决心趁我军防守兵力不足的情况，组织其主力与我军展开西安争夺战。

一野第 18 兵团前卫部队刚刚到达西安及咸阳，便遭到青海马步芳主力第 82 军 3 个师和骑兵第 8 旅的凶猛反扑，部队经过连续强行军 10 余天，连极短休整的机会也没有获得，就投入了“打马”战斗，与敌人激战一天一夜，歼敌 2000 余人，胜利保卫了刚刚获得新生的古都西安。

马步芳、马鸿逵此次联手主动出战，意在帮助胡宗南稳定陕中阵脚，吸引我一野主力，以保青、宁两省老窝平安。此时见势不妙，担心再打下去会赔光老本，于是立即抱头鼠窜，命其部火速撤往乾县、永寿以北观望动静，而同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的胡宗南部主力，龟缩到了渭河两岸驻守。

“二马”溜了，剩下“一胡”。为了保存实力，胡宗南内心十分希望“二马”能够为自己的“机动防御”多支撑一阵子。然而，奸狡巨滑的“二马”早已尝到了解放军的厉害，岂肯轻易把自己那点血本拼光？

“二马”与胡宗南各怀鬼胎，虽互相打气，但谁也不愿上阵。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彭总的计划中，早已为他们排好了“座次”——“先胡后马”。

为了打好扶眉战役，一野集中了四个兵团的强大兵力，弃“马”扑“胡”，一下子将结集于扶眉两县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围了个水泄不通！

7月初，周士第的第18兵团担负正面攻击任务。7月10日，我迂回包围的部队也已打响，扶眉战役正如彭总所预料的那样：“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整个战役进行得十分顺利，仅一天多时间便歼敌四个军约43000余人。

扶眉战役经5个昼夜激战，取得全胜。扶眉战役的全胜，如一盆冷水浇头，使赌徒般红了眼的胡宗南的头脑终于清醒了。以他手中那点成不了气候的兵力，似乎已不可能再侈谈什么与共军在陕中决战的大话了。

为了保存实力，免遭进一步的打击，他匆忙收拾残部，十万火急地退向陕南汉中一线，准备以五个军的兵力，以秦岭为屏障，开始“固守大西南”。

扶眉战役结束后，为了保障我一野主力部队西征“讨马”战役的顺利实施，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周士第的第18兵团进驻宝鸡，监视已经“上山”的胡宗南，为配合二野主力入川作战做准备。

剿匪大纪实

扶眉战役打怕了胡宗南，但尚未遭到沉重打击的“二马”，此时却仍不知天高地厚，积极调动兵力，囤积粮弹，妄图孤注一掷，死保其多年盘踞的领地。

作为长期统治青海的土著军阀，马步芳还担任了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土崩瓦解之际，他突然跳出来一表“忠心”，公开叫嚣什么“要与共军决战兰州”。

1949年8月4日，彭德怀代表野司领导，向一野所属各兵团下达了攻击兰州的预备命令。

扶眉一役，胡宗南主力被歼而“二马”北逃。“二马”没有也不可能挽回胡宗南主力被歼的命运。而胡宗南自身不保，更无法解除我军在扶眉战役后给予“二马”之威胁。因此胡、马联盟实际上已被我军强大攻势所粉碎。

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其残部退守秦岭，仍控制着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四川及陕南、陇南广大地区，继续压榨人民。但其拉兵抽丁、整补兵力尚需一定时间。

因此，我军痛歼胡军主力后，乘敌惨败之际，对“二马”集团发起进攻显然已是十分有利的时机，也是我全而进攻作战计划中歼胡后的第二个步骤。

青、宁“二马”在扶眉战役中，实际上并没有援胡，其借口是“来不及”，说穿了，其本质是害怕被歼灭的命运。

“二马”十分清楚，我军歼胡宗南主力后可能立即对“二马”进攻，因此当我军围歼胡军之际，只得集结其兵力，摆出一副意在援胡的架子之后，即返身向西北逃走了。“宁马”除第81军原驻守西峰镇、固原外，第11军、第128军则退守泾川东西地区；“青马”之第82军、第129军和骑兵第8师，退

守平凉以南之安口窑、华亭地区，以骑兵第14旅驻守陇县。

“二马”退于陇东地区后，处于进退两难之窘境。继退则失甘、宁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之势；不退而抵抗我军之大规模进攻，又觉没有把握，恐遭聚歼。在此紧急关头，青、宁“二马”又各有企图：“青马”较猖獗而阴险，又掌握“西北军政长官”大权，在政治上较“宁马”优势。于是“青马”企图支使利用“宁马”兵力在平凉与我军决战，有利则乘机取胜，不利则牺牲“宁马”而保全自己；“宁马”保守谨慎，对“青马”时存戒心，因争甘肃省主席不逞，而对“青马”心怀不满，因而对“青马”之命令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内心自有主张，见机行事，以保存实力为主。

7月24日，“二马”在静宁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由“青马”主持，制定了平凉决战计划。“二马”预计：我军先沿西兰公路夺取平凉之可能较大。因为宝鸡至天水虽有铁路但早已破坏，山大人稀，不便大兵团行动；而西兰公路交通较方便，公路两侧人烟较多且富庶。“二马”又预计：我军虽在扶眉获胜，然西安、宝鸡数百里地区，均在秦岭山下，胡宗南虽损兵4万余众，但尚有十数万部队，我必分兵巩固后方，因此不能以四个兵团全部西进。于是他们决定以宁马第128军、第11军共6个师加上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由十四里铺、安口窑、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企图积极抗击以消耗我军主力。青马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其弧形防御地带之右侧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我左翼，以击败我之进攻。

剿匪大纪实

敌人企图策划决战，对我军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歼敌良机，彭德怀当机立断，发起陇东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7月23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认为：进行陇东战役十分必要，甚好。

为打好此役，彭总会同一野指站员进行周密研究后，决定陇东战役的部署为：

以我军第18兵团（欠第62军）牵制胡部，采取积极防御姿态，向敌活动，使敌误以为我军有进攻秦岭之企图，我集中三个兵团及第62军进攻平凉。以第19兵团连战连胜，及陇东地方部队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首先歼灭泾川之敌，然后协同左翼围歼平凉、安口窑、华亭之敌；以第1、第2兵团为左翼；第2兵团并指挥第62军沿汧阳、陇县大道进攻，第1兵团在其左侧，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准备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配合第19兵团共同完成歼灭“二马”的任务。

我第19兵团于7月21日、第1兵团于23日、第2兵团于24日先后由乾县、凤翔、宝鸡等地出发，挥师北上，兵锋所至，青、宁“二马”节节后退。

我第19兵团连战连胜，24日收复邠县，25日占灵台，26日克长武，27日占泾川、正宁、宁县。

左翼我第1、第2两个兵团于25日占陇县。此时宁马已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除骑兵第14旅在固关掩护外，主力亦撤至静宁地区。根据这一情况，我军判定，敌已放弃在平凉决战的计划，于是我一野指挥部对作战计划也迅速进行了修正。二

马不在平凉作战，必各保其家，我军则变一举歼灭为各个击破的方针：第19兵团继续追击宁马，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追击；第2兵团由安口窑、华亭向西经莲花镇并向通渭进攻；第1兵团由陇县经固关向天水、陇西发动进攻。

右翼陇东地方部队于7月28日解放庆阳及两峰镇。第19兵团7月30日解放镇原，并进入平凉；第2兵团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华平等地。

在我军解放平凉并逼近天水时，马鸿逵接到了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电令。宁马以退却争到了甘肃省主席的职位，但却并不显得十分高兴，因为这显然是命令其坚决作战。如宁马不加抵抗则与青马矛盾更深，若抵抗一来为时已晚，二来损兵折将换取一个空名主席，得不偿失。宁马认为，稍事抵抗对自己也有好处，因为我军已追过平凉，如固原失守则宁夏大门洞开，形势更为不利，于是宁马决定在三关口、瓦亭、任山河等地区稍事抵抗，一可缓和“二马”矛盾，二可掩护宁马主力退却，迟滞我军向宁夏之进攻。

宁马用了五个团的兵力于任山河地区抵抗。8月1日，我第19兵团之第64军及第188师、骑兵第2旅将其击溃，歼敌5000余人。2日解放固原，11日前出到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第65军8月1日占领瓦亭、三关口，控制六盘山，3日解放隆德，6日克静宁。第2兵团8月3日进至莲花镇地区，6日解放通渭。

我第1兵团消灭固原之敌后，青马再未抵抗，一直西窜华家岭。我第2军于8月3日解放天水，守敌第120军弃城北逃陇西。我第1军于4日解放秦安，5日第2军继续占甘谷，10

剿匪大纪实

日解放武山。敌第 199 军第 274 师之 1 个骑兵团及武山自卫总队起义。至此，我北上大军发起的陇东追击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我军连续追击近 20 天，前进 1000 余公里，歼敌 1.1 万余人，解放县城 20 余座及陇东广大地区，并迫敌“二马”分化，创造了今后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歼敌四个军共九个师的扶眉战役结束后，胡宗南拖着他的残兵败将急忙撤向秦岭一线，其架势，与其说是建立秦岭防线，不如说是在寻找退路，企图在四川立足，偏安一隅，再作顽抗。

胡宗南彻底敞开了陕中腹地，把马步芳、马鸿逵推到了前台。

多年来，青宁二马长期与胡宗南面和心不和，即便是在对付我一野的进攻时，也是谁都想将对方推到前面去打头阵，一有风吹草动，更是望风而逃，绝不肯使自己的实力受损。

但我军在八百里秦川得手后，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9 年 7 月 21 日，我第一野第 19 兵团在杨得志、李志民的率领下，沿西（安）兰（州）公路展开追歼“二马”的战斗。

我 19 兵团 64 军攻占了固原后，即按兵团指示留驻原地钳制宁夏的马鸿逵部，以切断“二马”之间的联系，使马鸿逵部无法增援兰州的马步芳部，为我军顺利进攻兰州赢得主动权。

第 64 军驻守固原后，8 月 8 日，第 19 兵团的 63、65 军继续沿西兰公路追击一路向兰州方向奔逃面去的马步芳部。

平凉、天水、庆阳、通渭、武山、定西、临洮、榆中、临

夏等 20 余座城镇和广大地区的解放，使自恃驽悍的“二马”无法呼应，自身难保。

1949 年 8 月 20 日，我第 19 兵团与 2 兵团会师兰州城郊。

兰州是国民党政权在西北长期进行反动统治的中心，虽然蒋介石在西北、东北、华北、华中、中南等地战场的大势已去，但马步芳却是绝不肯拱手将自己多年经营的核心地盘轻易让出的。

眼见胡宗南部撒手南去，马步芳知道迟早会与西征的我军交战，因此，早已利用兰州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对外既有天然屏障，对内又有层层防御工事严密坚固等有利条件，加紧部署，决心与我军决战兰州城下。

在高高的马家山上，马步芳曾多次登临这一防守兰州的核心阵地，向部下训示死守兰州的决心，同时四下派人在回族同胞聚集地区进行造谣惑众，煽动民族仇恨，号召人们聚合在他的“马家军”旗下，“与兰州共存亡”。

然而，尽管马步芳拥兵数万，但他内心却十分清楚，我数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威逼兰州，此役将是一场恶仗，即使暂时守住了兰州，但他的“马家军”也将所剩无几。

他想到了自己在陇县被歼的骑兵 14 旅以及上千匹战马……

每每想到这里，迎着燥热的阳光的烘烤，他在马家山上都禁不住要朝城北那座黄河铁桥多看上几眼。那是兰州惟一通往青海的交通咽喉，万不得已，只有从那里突围逃回青海老家。由此，他曾专门命令手下的高级军官，要重点防卫，切不可失去黄河铁桥。

剿匪大纪实

我第19兵团与第2兵团进抵兰州后，当即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城。

为不使敌人逃走，我一野参加兰州战役的各部队，顾不得长达近一月的连续追击作战的疲劳，第二天便向兰州守敌发起了全面总攻。

长途奔袭严重消耗了我军官兵的体力，同时，由于在少数指挥员头脑中存在着轻敌思想，认为胡宗南美式装备的“中央军”都不在话下，何况打马步芳这个土军阀。攻城准备、侦察敌情、掌握敌防御配系等工作都没有过细。因此，21日总攻战斗打响后，接连两天，我军攻势一时受阻。

马步芳果然不是块“豆腐”。

战况汇报到了彭德怀处。

“暂停攻击，通知两个兵团，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彭德怀在野司指挥所里，对部队攻城受阻给予了及时的指示。

第19兵团和第2兵团受命暂时停止了攻击。

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两个兵团各级指挥员认真检查了实施兰州战役各个阶段的准备工作以及大小环节的处置方法，同时在部队中开展了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勇于流血牺牲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到了战斗的残酷性和艰巨性。

“决不能让敌人溜过黄河！”

“以实际行动庆祝兰州解放！”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勇于承担最艰巨的战斗任务！”

……

战士们请战决心响彻在各个战前动员会上。

经过3天的战前动员和组织准备，8月25日拂晓，我一野第19兵团和第2兵团再度向兰州城郊敌军防御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

兰州城外各制高点，均有敌人长期修筑的永久性作战工事掩体，火力配系也相当严密完善，加之“马家军”多为亡命之徒，因此，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这是一野主力西征中的第一场攻坚战，也是最后一场攻坚战。

8月25日下午4时，第19兵团第63军189师以勇猛顽强的攻击，一举拿下敌军核心阵地马家山。当日夜间，65军193师也攻占了敌古城岭防御阵地。

兰州城此时已丧失了外围屏障和反击的支撑点。

“马家军”的官兵，于恐慌中不少人开始趁黑夜的掩护向北逃窜，争取在惟一的退路——黄河铁桥尚未失守之前突出重围。

趁敌人乱了阵脚，我第2兵团第6军的战士像下山的猛虎，一鼓作气杀入城内，与仍试图顽抗的部分敌军展开巷战，逐一歼灭。而我第19兵团的第63、65军指战员，紧紧追击已逃出20余里的敌军，将其在东梢门一带消灭。

战斗至8月26日中午12时，一野两兵团部队已全部夺取了兰州城内外各个重要据点。黄新廷的第3军兵力同时也迂回敌右翼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了黄河铁桥，占领了北塔山，彻底切断了敌“马家军”的退路。

妄图负隅顽抗的“马家军”主力23000余人，就这样遭到

了全歼。

兰州战役是我军继扶眉战役之后，在西北战场的战略大进攻中取得的第二个回合的重大胜利。它预示着：在一野滚滚西征的铁流面前，将不再有什么对手可以匹敌！

我军经过激战，强攻兰州获得胜利之后，西北敌军已成惊弓之鸟。

甘肃的马步芳部，在西北纵横驰骋多年，连胡宗南的“中央军”都要让其三分，没想到一夜之间，竟土崩瓦解，这个打击的确震慑了西北的各股敌军。

他们在窥测方向，希望既不损失实力，又不丢掉地盘，这个中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寄希望于胡宗南退守秦岭大巴山的重兵集团能够将我军的主力部队吸引过去，好给自己留下喘息休整之机。

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我第7军彭绍辉部此时正配合第18兵团将胡宗南牢牢控制于秦岭及大巴山一线，以保证二野主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行动。因此，我一野第19兵团西征部队，不可能回师陇南面减轻对西北宁夏方向的军事压力。

打下兰州后，我西征部队迅速进行战斗间隙的补充和休整，随后即于9月5日直取青海省会——西宁。

这下，宁夏的马鸿逵慌了。他们原以为能征善战的青海马步芳主力能在甘、青重镇兰州和西宁一线阻滞我军进攻势头，消耗疲惫我军战斗力，争取时间等待战场发生对其有利的变化。如今，这一希望彻底破灭了。

第 18 节 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马家残兵败将密谋“应变”，万余残匪疯狂反扑，我数座县城被匪攻陷，英雄战士血染磨儿沟。

青海省会西宁解放后，被我西征大军击溃的马步芳部队，官无法指挥兵，兵也找不着官，自知大势已去的败兵沿途抢劫百姓财物，携枪牵马，纷纷逃回原籍。

当然，马步芳是不甘心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青海拱手让给共产党，其属下的顽固干将同样抱着誓与共产党为敌的信念。西宁失守后，敌 82 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190 师师长马振武、骑 8 旅旅长马英及马步芳的妹夫治华生等人，即在大通县桥头镇开会密谋作了“应变部署”。

所谓的“应变部署”，就是马步芳之子 82 军军长马继援逃往香港时留下的一封信。或许是走得仓促，或许是万念俱灰，总之，这位 30 岁的马家大少爷，尽管已领中将军长之衔，但在马家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之际，也只是草草为属下留下了短短的几行字：“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待机而动……”。

捧着这张字迹潦草的纸片，马家军的老班底 82 军剩下的几位将领强作镇定，互相打气，以示忠心。

“咱们当年搞‘剿匪第二防区’，杀了共产党西路军几千人，共产党这下子打进青海，非报此仇不可呀。”少将副军长赵遂哀叹说。

“部队全打散了，现在是无法再搞起来的。”少将参谋长马

剿匪大纪实

文鼎哭丧着脸道。身为参谋长，他历来自视排兵布阵有一套，可与解放军一照面，手下的部队却是那般不经打。

“我看，还是按军长的意思办。”190师师长马振武如今已成光杆司令，提议还是暂时不收拢部队。

“弟兄们分散下去也好。不管谁坐天下，青海还是姓马不姓共。”骑8旅旅长马英是个粗人，他不相信马家军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只要多派人联络，在下面串一串，时机一到，部队随时都能拉起来。目前，我们至少还有万把人，在远离西宁的沿边地方发动反攻不成问题。”

几人密谋了一夜，制定了向各地派遣联络员的方案，总算完成了马继援布置的“应变计划”。

然而，“应变计划”墨迹未干，赵遂、马文鼎、马振武等人却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应变计划”，于1949年10月兵困被围，只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投诚。

尽管制定“应变计划”的人不在了，但这一计划还是很快落实了。其中，前往青海北部与甘肃交界处的门源县的联络员冶生贵，已与门源匪首马成彪、马国范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秘密据点，为此后青海最为严重的一起匪乱埋下了伏笔。

其时，青海与宁夏相继解放，新中国刚成立不到20天，盘踞在甘肃与青海交界之处临夏的匪首阿里马免，与马步芳残部的马金山、马保等股匪3000余人，并纠集“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回民支队”的铁秀戈、马积福匪部近千人，迫不及待地大举出动围攻我临夏、定西两县的新生人民政权。

接两县的告急后，驻青海西宁的我一野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等军领导当即决定派1师前往清剿。1师师长

游好扬率部于10月28日赶至临夏、定西，至11月底，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次，全歼阿里马免股匪，并击溃其余各路股匪，歼匪2000余人。为临夏、定西两县解了围。

此后，为保障青宁交界沿边地区的社会秩序，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第2兵团第4军第11、12师和军骑兵团相继开往临夏和定西，该军同时还抽调出一部分兵力参加修筑天（水）兰（州）铁路。

第4军接防青海剿匪部队第1军1师在临夏、定西的剿匪任务后，立即开始组织分区驻剿残匪，至12月，“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回民支队”被一举歼灭，匪首铁秀戈被俘，马积福投降，马保等马步芳残部只得狼狈北窜逃回青海化隆地区。

马步芳残部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暴乱，大多发生在青海省会西宁周边地区，而且气焰嚣张。

青、宁交界的临夏、定西武装叛乱于11月被我军平息后，“二马”残部纠集近万人，又于12月初先后在西宁以北的大通、门源两县，西宁以东的平戎县、小峡地区、西宁以西的湟中等地发动了大规模暴乱。

湟中县被匪首马彦率领的千余土匪攻占，土匪们进城后枪杀我党政干部，抢劫民财，纵火焚毁建筑物，而匪首韩海如率领的数百土匪则占领了平戎县和小峡地区。

12月5日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暴乱中，以原马步芳骑8旅旅长马英和门源匪首马成彪率领的6000余匪为主力，同时围攻我大通、门源两县，酿成了震惊全国的“10月匪乱”（时为农历10月）。

马英、马成彪匪众对门源县的进攻，开始于门源县卡子沟

剿匪大纪实

区政府。

9月5日西宁解放后，我第1军1师2团副团长张星垣奉命率师侦察连及2团侦察排不足200人的兵力，经桥头、大通、广惠寺、卡子沟子9月12日开抵门源，门源即获解放。12月初，我军仅在卡子沟区政府驻守有一个班的兵力。

12月5日，班长王义高带3名战士在前往上阴田二区政府开会，途中行至上措隆沟时遭土匪袭击，王义高击毙1名土匪后，被大批匪徒包围，身负重伤的王义高奋力游过浩门河突围赶到卡子沟乡政府。

这时，土匪们已开始向卡子沟乡政府聚集。门源县政府接到二区的紧急电话后，当即派公安局长兼武装科科长宋信忠率县大队一个骑兵排于当日下午赶至二区，并与二区干部及民兵共50余人前往卡子沟搜山剿匪，6日，在措隆滩抓获沈家湾、马九爸、马孝、白永成4名土匪。宋信忠命将4名土匪押回上阴田二区政府，准备于7日押回门源。

此时，匪首马成彪已得知有4名土匪落网，于是一面派人通知各地土匪当晚集中在大沟口马场槽，一面与几名小头目策划暴乱行动。

“不能让共军把我们的弟兄抓走，我们得在半道上截住他们。”马成彪说。

“磨儿沟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只要事先埋伏好，吃掉这几个共军是不成问题的。”马乾献计道。

“这两天马英旅长在小峡、大通已经动手了，势头旺着咧！解放军现在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我们要快动手。”马成彪随即对属下的大小头目进行了分工。

6日当晚，100余名土匪在马成彪的主持下召开了暴乱大会，会后即前往磨儿沟潜伏。

力增强实力，马成彪又联络了几股土匪前来助战，使武装匪徒增至200余人，被胁迫群众数百人。

“咱们的人，分别在磨儿沟、旱台、黄田前崖根、黄田南栅门、红山顶埋伏，让共军过得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各沟用机枪把守，绝不能放跑一个共军！”自任总指挥的马成彪带着马志杰、马国范、高登基等大小头目，在山头上一一布置了火力点，并确定由马国洪和高登基负责前线作战指挥。

12月7日上午8时，我军骑兵排由二区出发返回门源。进入磨儿沟时，宋信忠带领3名战士打前站，二区区长张二小带领大部分战士在后面押解匪徒。部队全部进入磨儿沟后，突见山头上闪过一串耀眼的信号弹，未等宋信忠等人判明敌情，埋伏在山头、林间的匪徒们便已向我军战士们猛烈开枪射击。

宋信忠从密集的枪声和机枪的数量上，已判断判出土匪有数十倍于我军的作战力量，且又占据有利地形，于是，命令战士们隐蔽还击，同时准备抓住时机突围。

激战中，二区区长张二小及18名解放军战士当场牺牲。宋信忠只得带着几名战士策马向旱台庄子方向突围。

“打马——”马国洪命令手端机枪的匪兵向宋等一行扫射。

这时，数百土匪见我军火力稀疏，纷纷怪叫着从山林间扑下来。

宋信忠刚一冲出火网，战马即中弹倒地。宋信忠将手枪内的最后几粒子弹射向追来的匪兵。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大骂土匪，最后，被匪兵祁光元开枪杀害。

剿匪大纪实

这是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浴血奋战。

磨儿沟我骑兵排受伏的情况传到门源县时，县上马上又派出一个骑兵班前往增援。

该骑兵班的前锋 7 人刚一进磨儿沟，即遭土匪机枪扫射，4 名战士当场牺牲，2 名战士突围渡过浩门河后在大沟脑庄被当地群众营救。

率领前锋入沟的该骑兵班班长杨秀潭，救战友心切，独自与土匪死拼，战斗中身中 7 刀，浑身血肉模糊，昏死在林间。当晚苏醒过来后，坚持爬到了大沟脑庄，被当地群众发现营救。

12 月 8 日上午，门源县县委见杨秀潭等人失去了联系，又派出一个骑兵班前往接应。这个班在行进至大沙沟途中得知磨儿沟战斗我军已失利的消息后，即撤回县城。

第 19 节 三路进攻，攻打县城，匪首放言：“谁不去就杀谁的头！”门源县城失守，副县长等 40 余名中共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被杀。

马成彪等匪众在磨儿沟连续两次伏击我军得手后，利令智昏，命令手下的“前线指挥官”马国范连夜率众匪攻打门源县城。

马国范与马成彪长期生活在门源，对门源各方面情况极熟，为了营造气氛，他召集全体土匪训令：“现在就去攻打县城，如果谁不去，就杀谁的头，抄谁的家！”

马成彪和马国范胁迫群众有一套十分毒辣而残酷的方法，

即所谓的“杀父逼子”，谁不服从匪令，就先杀了谁的父母。

“这次打门源，咱们兵分三路行动，共军守城部队人少，一齐动手才有利。”马成彪虽为土匪，但对打仗调兵却并不陌生。作为暴乱的总指挥，他倒也是精明：“这次攻城，一路攻打北城和西北城角，一路占领东城，另一路拿下南城和西南城角。这样三面同时进攻，解放军防守兵力一定顾不过来，到时候谁也跑不了”。

12月8日下午4时，三路匪众千余人马开始攻城。

由于磨儿沟之战失利，门源我守军兵力已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此时守卫县城的部队已不足百人，偌大的一座县城要靠不足百人的武装来保卫，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在土匪攻城的前一天，门源县副县长翟鸿儒等领导与我驻军干部开会商议，仍决定坚守县城，并在各要点作了战斗部署。

翟副县长率我军骑3排防守北城和西北城角，骑二排防守东城，以钟楼和鼓楼为据点，步兵排则负责防守南城和西南城角。

门源驻军仅以不足百人的兵力抗击上千土匪的猛攻，其战斗场面无疑异常激烈。

至天黑时，我各防守要点部队已击退土匪大小十余次进攻，使之无法夺取我军阵地。然而，城内的恶霸地痞见土匪攻城，趁混乱引导土匪小头目张仁窜至我军背后开枪射击，使我军腹背受敌，战况遂呈恶化。

“看来不能再坚守了，要组织部队趁天黑突围。”翟鸿儒召集三个排的负责人研究决定，晚8时，全体突围。

剿匪大纪实

“我带3排冲出西门，2排走北门，步兵排担任掩护。同志们，这是一场生死考验，土匪们是不会对我们讲仁慈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冲出去！”

布置完毕，3排和2排开始分西北两个方向突围。

我步兵排的同志接到掩护命令后，毫不迟疑的继续坚持战斗，以吸引土匪兵力和火力。在城墙上的4名机枪手牺牲后，该排一直坚持到当晚10点左右，有利地掩护了战友们的突围。

3排突出西门后，由于天黑，部队边打边冲，很快被土匪截为两部分，与翟鸿儒失散的一部分15人，其后撤至大通县城。2排从北门突围后，一部分人经寺湾马场、平羌沟进入甘肃境内，另有少数同志被群众营救躲藏。

突围中，翟鸿儒身边一直带有23名战士。10月8日拂晓，翟等一行原本想在吊沟清真寺找阿訇王占恒了解情况。王在门源解放后为各界群众代表，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可惜当时没有找到。

天亮后，土匪后们探知解放军已突围到吊沟，于是迅速调兵遣将扑向吊沟。

翟鸿儒等20余名我军战士因对吊沟一带地形不熟，一路行进竟走进匪徒的包围圈，遭其伏击。激战中，1人牺牲，多人受伤。翟副县长只得率战士们向东翻越山梁突围。部队行至夏日莫（地名）时，又遭土匪包围。战斗中，我军仅有1名战士突围，其余包括翟鸿儒副县长在内的19人全部牺牲。

暴乱土匪中，有许多马步芳的散兵。这些老兵不但作战经验丰富，而且凶悍过人。攻入门源县城后，县政府的枪枝弹药及各种物资即被洗劫一空。

门源县失守后，我二区政府干部仍顽强的坚守在区政府内，以极少数兵力抗击着数百土匪的围攻。

副区长张发亮沉着指挥着区干部们利用建筑物为掩护，打得土匪一时无法攻入区政府大院。

马成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命令土匪“前线指挥官”高成基：“二区就那几个鸟人，你去给我拿下来！”

高成基领命后便带着机枪和八人从门源赶往二区政府所在地上阴田。

尽管高成基调来机枪和以马步芳散兵组成的土匪主力，但张发亮等人仍英勇顽强地一直打到当日下午。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区政府一名通匪的炊事员悄悄将子弹全部扔出墙外，并借向张发亮报告情况之际大声给土匪们报信：“区长没子弹了！”

高成基一听，认为活捉二区干部的时机到了。

“给我用火攻，把里面的人全赶出来！”几名土匪立即在区政府大院门外四周泼上汽油，堆上干柴，点燃了熊熊烈焰。

“把后墙挖开冲出去！”张发亮眼见弹尽，房屋也快被烧塌，于是，冒着滚滚浓烟，指挥着几位区干部挖开了后墙，冲出区政府，向黑刺滩突围。

然而，此时二区附近各主要通道已有土匪设伏，在黑刺滩，张发亮带出的7人中，除勤杂工马尽忠负伤躲藏起来之外，其余6人全部牺牲。

张发亮在土匪们要他投降的狂呼乱叫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将枪砸坏，纵身跃入河中，拼力游向北岸，在土匪们密集的弹雨中，不幸中弹牺牲。

剿匪大纪实

高成基命匪众从河中捞出张发亮的尸体，将其剖膛抽肠，并将肠子挂在黑刺滩的荆棘上示众……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10月匪乱”中，仅两天时间，县长翟鸿儒、副区长张发亮等中共门源县委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共49人牺牲，成为青海省暴乱规模最大、夺占我政府机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门源失守的16天时间中，青海省政府、省军区决定，抽调第1军第3师一个师的兵力，重兵彻底清剿马成彪匪部。

第20节 重兵出击，两路围剿，我第1军3师开赴门源。众匪内乱，试图顽抗者全部被歼。

土匪攻下门源县城的第二天，匪首马成彪即在门源南关大清真寺召开了由各路股匪数百人参加的“祝捷大会”。

会上，大滩、吊沟、浩门镇等各地区匪首纷纷要求制定一项防范解放军进剿的办法。

马成彪说：“这下祸已闯下了，要过关，就得承担责任。大家看是回、汉族合担还是怎么办？”

“只有回、汉族合担了。”匪首马金龙提议道：“回族、汉族都参加了闹事，现在咱们也不能乱哄哄的没个章法，最好还是成立一个组织，把队伍聚拢在一起，还要任命正、副县长”。

马金龙的意见被采纳了。与会者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所谓的“门源县治安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自卫总队，由马成彪与浩门镇匪首李复元为正副总队长，总队下面又辖五个大队。

关于大队长的人选，马成彪决定在攻打门源及在各地袭击解放军最为卖力的土匪头目中论功行赏。

“这次攻城谁的功劳最大？”马成彪问。

“当然是张仁啦！”瓜拉镇的匪首马国仁站起来大声提议道：“没有他在城内开枪接应，南城就攻不下来。”

“那好，张仁当第一大队大队长。”马成彪当即表态。

李复元自然没有意见，因为张仁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接着，又任命在吊沟伏击解放军突围部队的匪头目包元宝为一大队副大队长。

此外，攻城先锋马国范以及攻打我二区政府的高登基等人，均担任了其他各大队的大队长与副大队长之职。

按马成彪的部署，每个大队编制要达到500人，由三个分队组成，每个分队相当于营的兵力。

在会上，马成彪等人还推举门源县匪首李复泰为县长，马国仁为副县长，妄图恢复伪政权。

组织编制完成后，马成彪等匪首预感我军肯定会很快派兵清剿，便调集兵力在老虎沟设卡，同时加紧组织人力在各地搜寻我突围失散的解放军战士。

尽管门源县解放时间不长，但一些群众对匪徒们的暴行却早已切齿痛恨。虽然马匪一再四处鸣锣通告，私藏解放军将杀掉全家及烧毁房屋，甚至整个庄子都要“连坐”，但我军失散的58名战士，还是被当地群众冒死营救下来。

回族老乡马万德，在土匪攻入城内之际，将我军战士陈岱忠藏在家中，直到我清剿部队入城的第二天探明情况才护送回部队。蒙古族群众哈连奎，舍身营救了我军3名战士。藏族牧

剿匪大纪实

民贾安勒，将我7名战士藏在家中，当土匪多次前来搜捕时，他又将战士们连夜转移到其弟家中……

不少群众为了对付土匪，给战士们拿来便装，白天藏进山里，夜晚接回家中。门源县政府秘书崔仑，甚至被群众经甘肃一直护送到西宁……

我军这58名突围失散指战员的安然无恙，充分说明土匪是不得人心的，青海省各族群众是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

为了防止我军清剿，马成彪等匪首时常吊打群众，派粮派款，拉马抓人，逼迫群众轮班守卡，昼夜值班，弄得群众不得安生，怨声载道。

正当马成彪部部署守城阵地之际，我西北军区第1军下达了以3师进剿大通、门源之匪，2师进剿湟中、西宁附近小峡、平戎县之匪的作战命令。

自12月21日开始出击后，一路打得各路股匪鸡飞狗跳，很快便将兵临门源城下。

这时，土匪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汉族匪首李复泰利用回族参加暴乱和出头露面较多的情况，欲将罪名推给回族，四处煽风点火说：“回回反了，要杀汉民啦。”而门源县当地的一些回族旧军官和恶霸乡绅也造谣说：“解放军回来要杀回灭教，谁也跑不了。”

解放军尚未到达，门源县回汉民族关系已趋紧张，一部分听信谣言的回族群众甚至全家跑到河边，准备解放军“灭回”时投河自尽……

然而，当我3师部队于12月22日进城之后，一切并不像

传言所说的那样。解放军宣布，凡受胁迫已放下武器的匪徒，一律宽大。对宗教寺院坚决保护，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对不了解我军政策而躲藏的人，动员其亲属将其劝回。

我军当时的政策是除主要匪首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其他协从者一律宽大处理。为此，我进剿部队在门源县内举办了匪首集训队，令其交待问题，互相检举罪行，并将李复泰、杨发泰、郭毛兰等人拘押审查，揭露和打击了匪首挑拨民族关系、推卸罪责、企图蒙混过关的阴险伎俩和嚣张气焰。

在我党民族政策的感召及上层回族开明人士的动员说服下，门源、祁连等地 100 余土匪携枪向人民政府投降。

门源“10月匪乱”被我军平息后，仍有少数残匪窜入山区继续顽抗。除烧杀抢劫，还大肆奸淫妇女。

除了危害群众，土匪还对我村干部及人民代表进行疯狂的野蛮报复。采用拔舌挖眼、扒肚抽肠、铁丝穿肩，以及五马分尸等手段残杀。

为彻底平息匪乱，我军依靠当地群众，对这些漏网的残匪坚持继续清剿，予以打击。其中，较大的两次剿匪战斗分别发生于 1950 年夏季。

6月22日，冶子明、马乙思麻、哲马录等股匪 700 余人袭击我皇城区政府，打死该区副区长翟理才和三名解放军战士。这是“10月匪乱”被平息后，残匪对我基层政权发动的又一次较大的进攻，也是自我剿匪部队 3 月于巴里哈图、那子海口消灭了冶子明匪部 200 余人后，冶匪勾结其他股匪对我军的一次反扑。而对土匪的进攻，我军迅速调集部队，对这 700 余土匪进行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务求全歼土匪。尽管残匪垂死挣

剿匪大纪实

扎，但在我清剿大军面前，其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这群土匪很快就被我军全部消灭。

8月间，剿匪部队又在珠固寺口截击土匪鲁国佐、马金龙等部800余人。击毙匪首马金龙，活捉匪首马占清等多人，鲁国佐单骑逃走，其匪部全部被击溃。

漏网的冶子明于1951年冬在老虎沟被活捉，马二不都、马乙思麻亦先后被击毙……

经我军驻门源部队的20余次清剿作战，门源地区的主要股匪均被消灭。

至1951年冬，我军基本上肃清了青海各地的少数股匪。

平息门源“10月匪乱”及西宁周围地区的土匪暴乱，除击毙一批匪首外，共歼匪4305人，其中毙伤1374人，俘虏1874人，迫其投降1067人。

第六章 贺兰雪

第21节 反动军官、山匪蠢贼，依托险关要隘切断交通，为祸商旅，宁、青大地岂容悍匪自称“小台湾”？

打下兰州后，我西征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补充和休整后，于9月5日直取青海省会——西宁。

这时，宁夏的马鸿逵慌了。他们原以为能征善战的青海马步芳主力能在甘、青重镇兰州和西宁一线阻滞我军进攻势头，消耗疲惫我军战斗力，争取时间，等待战场发生对其有利的变化。谁知，等来的却是我西征部队进军宁夏。

事实上，我军在积极实施军事战役准备的同时，也有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因为宁夏毕竟是回族同胞的聚集地，国民党政权的压迫和军阀纷争带来的战乱，已使广大回族同胞饱经苦难，在他们对解放军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大举用兵实为下策。

为此，兰州战役结束后，我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多次到当地开明人士、原国民党甘肃省参议员郭南浦老先生家中探望，将我军准备向宁夏挺进，并愿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等情况告诉了他。

郭老先生见杨得志、李志民两位我军高级将领态度诚恳，

剿匪大纪实

言辞真切，而且几度到家中看望，甚为感动。

“请两位长官放心，老朽虽说年纪大了，但还能坐车出门，就让我到银川走一趟，告诉马鸿逵和马鸿宾，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郭南浦老先生捻动着花白胡须，神情激动地说。

“郭老先生说得对，再打下去，马鸿逵和马鸿宾绝不会在军事上占便宜，而且会祸及广大回族群众，希望他们能够清醒的认识这一点。”杨得志站起身握住郭老先生的手托嘱道：

“此事如果得到上级的批准同意，就有劳老先生了。”

“哪里，对马鸿逵这家伙目前还说不准，不过我那堂兄马鸿宾倒能做上一些工作，”郭南浦老先生在送我军两位高级将领出门时，再次表示了前往银川劝降的决心。

马鸿宾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授陆军中将军衔。他11岁即随叔父马福祥从军，当过侍从武弁、马队队官。1915年任甘肃新军司令兼炮兵营长。1921年初，马福祥离宁夏赴绥远任都统，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兼新军司令。1927年4月，宁夏镇守使建制取消，其部政为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第22师，他任师长，驻防甘肃。1927年9月，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方面军第24军军长，进驻陕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又委任他为宁夏省主席。冯战败后，马鸿宾又倒向蒋介石，被委任为暂编第7师师长兼甘、凉、肃边司令、甘肃省代理主席和主席。1934年9月被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爆发后，西北划为第8战区，马鸿宾部与马鸿逵合编为第17集团军，他担任副总司令兼第81军军长。1946年后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告别了郭老先生，回到司令部后，杨得志、李志民等人再

次讨论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部署及作战方案，并将这一情况及时上报野战军司令部。

彭德怀对杨得志、李志民兵团的请示表示同意，提出了以“北平方式”和平解放宁夏的建议，并同意委派以郭南浦老先生为首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尽快赴银川会见马鸿逵及马鸿宾等人。

我方派出的“和平代表团”到达银川后即向对方说明了来意，晓以民族大义，希望马部能够认清时局，接受“北平方式”，为宁夏人民造福。

然而，马鸿逵这个宁夏的“土皇帝”和他的儿子、国民党驻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父子俩，却不为我方的诚意所动，仍对蒋家王朝和自己的军事实力抱有幻想，态度顽固地拒绝了和平解决方案。

因此，我军在和平解决宁夏未果的情况之下，于1949年9月9日，从兰州、定西、海原兵分三路出击宁夏。

马鸿逵嘴巴虽硬，但他的马家军却硬不起来。因为马步芳的部队遭到的歼灭性打击，已在其属下的官兵中，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厌战情绪。因此，我三路大军锋芒所至，均未遭到较大抵抗，敌基本上以逃窜为主，只有少数马家军的死硬分子与我军交火顽抗，但也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我第19兵团在10天的进军中，先后顺利夺取了靖远、同心、中宁等城，近逼中卫。

9月18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派其子——敌81军军长马惇靖亲自到中宁与我第64军军部谈判，表示愿接受和平解放宁夏的全部条件，率部立即起义。我第

剿匪大纪实

19兵团由此开进中卫，并以此为通道，先后攻占了青铜峡、金积、吴忠、灵武等地，并在进军中歼灭了马鸿逵的128军和第8军各一部分，使马家军更加惊恐万状。

眼见大势已去，马鸿逵之子马敦静这位宁夏兵团司令，干脆来了个临阵脱逃，扔下其属下，乘飞机逃之夭夭。

主战派首领已溜，再打下去也不是对手，马家军从上到下顿时乱作一团。

9月23日，经过反复考虑，马鸿宾派出128军军长卢忠良等3名谈判代表来到中宁，与我第19兵团领导人洽谈，表示接受我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宁夏的条件。

杨得志、李志民代表我军与马鸿宾的代表签定了《和平协定》。

协定签字后，当天夜间，我一野第19兵团先头部队便进驻银川。

1949年9月23日，随着“和平协定”生效，26日宁夏解放。

此时的宁夏，因和平解放使人民避免了战乱和流血，但同时也留下了一定的隐患。众多反动军官、特务分子、帮会头目、恶霸土匪等均以种种伪装暂时潜伏下来，他们在等待时机、窥测风向，暗中进行着一系列密谋推翻共产党新生政权，迎接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收复”大西北的准备。

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同心、海原、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20余股，约500余人。其中马绍武、张海禄为首的两股土匪，因马绍武担任过“同、海、固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故势力最大，其他股匪除与之有联系外，还听命于他。

马绍武生性狂野，占山为王，并极端仇视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任“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期间，仅1949年7月，在固原县王家湾一次突袭我根据地的行动中，打死打伤我游击队战士20余人。8月，又率匪在甘肃会宁县抢劫我边区政府步枪50余枝，打死打伤我军战士各一人。宁夏解放后，马绍武为逃避我军打击，于当年12月假意率部向我军投诚，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却又逃上山为匪。此时，他手下共纠集有200余名土匪，在同心县高崖子西南的庙山上建立了山寨据点，并将庙山封为“小台湾”，同时公开贴出布告，宣传效忠于台湾蒋介石政权，叫嚣要率部“反共到底”。

1950年1月中旬，马绍武率土匪在银（川）平（凉）公路上连续多次抢劫过往商运汽车，抢得大批商品物资及骡马20余匹，并公然伏击我军骆驼运输队，打死打伤我押运战士，抢走骆驼33峰，轻机枪2挺，步枪7枝及大量军需物资。此后，马匪又夺取了我地方政府储存在高崖粮库中的小麦、面粉共10000余公斤、饲料45石、饲草30000余公斤。抢劫中，其匪部还奸淫妇女多人，使附近群众纷纷弃家出逃避祸，严重威胁了我区、乡政权的稳定。

与马绍武勾结在一起为非做歹的张海禄，原为马家军的一名军官。宁夏解放后，他逃窜到同心、海原一带，召集原国民党军的游兵散勇，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部合并，编为一个团，下设八个队，由张海禄任团长，公开打着国民党旗四处抢劫。为了笼络人心，张海禄匪部甚至将从国家粮库和解放军运输队抢劫来的物资分送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宣称他们是只抢共产党的东西，不扰百姓的“仁义之师”。因此，在一段时期

剿匪大纪实

内，张海禄确实蒙骗了不少群众。

宁夏同心、海原、固原三县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加之土匪熟悉当地情况，因此很难对其实施打击和搜捕。

尽管我军解放宁夏不久，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由于马绍武、张海禄两股土匪频繁袭扰我银凉公路运输线，先后打死打伤我军官兵多达170余人，故宁夏军区决定以独立1师为主，对马、张两股匪进行军事清剿。

1950年1月25日，独1师侦悉马绍武匪伙正在庙山集结，于是师长黄罗斌亲率该师驻灵武县的1团轻装奔袭庙山。

独1师1团部队于1月25日晚从灵武出发，从山间小路彻夜疾行，于26日拂晓抵达豫旺地区。根据作战需要，1团在此派出哨卡，封锁消息，部队全部隐蔽在山村中休息。该团两个营夜晚共行军100余公里，按上级指定时间开至庙山附近。

指挥此次奔袭庙山马匪战斗的是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与独1师师长黄罗斌。部队出发前，原计划从东、西、北三面包抄庙山，但因地形不熟，不得不在庙山脚下的王家团庄找了3名当地人当向导。岂料，这3人中竟有2人通匪，带着1团部队在山里转来转去，最后溜到土匪那里去了。此刻天已渐亮，庙山上的土匪已发现解放军赶至，于是利用山上有利地形突然向1团开火，一部分匪众甚至从山上挥刀舞枪地冲下来向我军攻击。

这时的土匪不知道我军实力，仍以为是他们过去打过的搞运输的“小部队”，因此，都抢功似地大胆往前冲。

随团出击庙山的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与独1师师长黄罗斌见状，当即命令1团炮兵连向匪群开炮轰击，同时指挥骑兵连前往庙山东南方向截断马匪退路，1团1营和2营分两路向南北两侧包围，务必全歼马匪。

战斗打响后，1团炮兵连几发炮弹均准确的击中庙山上的马匪指挥部，而我三面包围匪群的骑兵连和1、2营的轻重枪枪也以猛烈火力扫射敌群，当即击毙匪徒30余人，击伤20余人。部队发起冲锋后，又活捉10余人。仅两个多小时的围歼，马匪200余人伤亡过半。

“快撤——”马绍武此时已被我军击伤，他现在才开始后悔与解放军主力硬拼简直是自寻死路，于是忙下令分散突围逃命：“李成富中队随我走，其他人跟马青云走。”

匪中队长李成富此时也受了伤，听到马绍武发令，当即招呼手下边打边撤。

马青云带着一部分人向高崖以西逃窜，而另一小头目郝福祥则带着少数人向豫旺方向逃去……

“紧守各路口，搜——”独1师师长黄罗斌向1团指挥员下达了搜剿命令。

当时，部队并不知道这一个“搜”字，竟连续进行了7天7夜，日行百里，忍饥挨饿，露宿荒野，最后硬是在川口地区的一个废弃的破窑洞里，活捉了匪首马绍武和李成富。2月中旬，我追剿部队又在海原和盐池两地歼灭了马青山股匪20余人，2月下旬在豫旺地区击毙马匪小头目郝福祥等4人，通过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工作，又迫使王彦福等百余匪众缴械投降。

1950年3月上旬，宁夏同心地区的马绍武股匪基本被肃清，“小台湾”一朝覆灭。

马绍武落网后，少数残匪不敢再在同心袭扰，只得南下潜往海原投奔匪首张海禄。但是，在我宁夏驻军全面展开清剿土匪的铁拳打击之下，随着群众的发动与基层政权的稳固，土匪的生存条件日益艰难。张海禄匪部不久即被我军歼灭，彻底根除了宁夏南部山区的匪患。

第22节 少年绿林，拉竿剪径，火并匪首，独霸贺兰山。马鸿逵变剿为抚，终于当上保安司令。

宁夏解放后，由于马鸿逵的长期统治，封建迷信与宗族关系，使一些顽固反共的敌对分子不断挑起叛乱，匪患在一些地方不断发生。其中惠农县（今石嘴山市）贺兰保安大队大队长郭永胜率部叛变上山为匪，是较突出的一个事例。

郭永胜原在马鸿逵部任平惠贺兰保安司令，《和平协议》生效后，他作为宁夏马部的一支地方起义武装，被改编为该县的保安大队，改任大队长。

郭永胜时年42岁，自认为已“飞黄腾达”，应尽享荣华富贵之际。马鸿逵集团的土崩瓦解，人民政权的建立，使他这惯匪出身的绿林强盗深感是共产党打破了他生官发财的美梦，故在宁夏仅仅解放了不到半年时间，便按捺不住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仇视，率部在驻地叛变，拖枪上山，继续其早年的土匪生涯。

郭永胜祖籍宁夏平罗县，少年时随全家迁居内蒙左旗呼鲁

斯泰地方背炭，倒也是个“苦娃”出身。他19岁后开始在当地放牧，饥一顿饱一顿。由于逐渐学会了蒙语，他结识了山里的一些打家劫舍之徒，眼见此行当能够“解决温饱”，于是身为家中长子的他又将三个弟弟拉入伙，自任这个仅有数人的小山贼团伙的头目。

郭永胜在贺兰山区以放牧为名，掩护着小打小闹、鸡鸣狗盗拦路抢劫的罪恶行径。这时，他心目中最为羡慕的人物就是自称“贺兰山大王”的悍匪周墩子。一想到他人强马壮独霸一方的快活模样，他便暗暗立誓：“终有一天老子要拾掇了你！”

郭永胜心里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先是主动结识这位山大王，并在他的面前处处表现出俯首听命，惟其是尊的模样，为此，在他率手下在周墩子的地盘上“找吃食”时，没有受到周的武力威胁，彼此相安无事。大概在周墩子眼里，这几个放牧的野小子毕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吧。

岂料，郭永胜正是利用这几年的“相安无事”，四处游说，拉拢了众多不守规矩亦无视周墩子存在的窃贼小盗和为非作歹之徒，纠集成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土匪武装，公开在贺兰山一带抢掠民财，强奸妇女，绑票勒索，似乎大有与周分庭抗礼之势。

周墩子这下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正当他开始考虑如何擒灭这支敢于“虎口夺食”的异军之际，为巩固宁夏自己地盘的马鸿逵为骗取民意，不得不下令挥师剿“匪”了。

1931年底，经老匪梁凤惠从中撮合，周、郭两支人马正式合并，以周为首领，郭为副首领的这支贺兰山土匪武装，从此长期与马鸿逵的剿匪部队相抗衡，最终以“出师不利”的马

剿匪大纪实

家军息兵罢战收场。

郭永胜是个颇有心计之人，岂甘长期受制于周墩子？趁马家军进剿战事一松，当即找几个兄弟密谋，重金收买周的心腹做内应，一夜之间干掉了周墩子并将其亲信打散。

从此，郭永胜独霸贺兰山，一个新的山大王又诞生了。

由于郭的百余匪众为害地方甚烈，当地乡坤富豪及过往商贾被杀被抢，弄得马鸿逵十分恼火，大军进剿又劳师动众，于是，马鸿逵使出中国历朝数代惯用的“招安”之计，派出谈判代表许以升官发财，终于以册封郭为“平罗县保安大队大队长”之职打动了郭永胜，使之接受了全部谈判条件。

一个小煤黑子，盗马贼，土匪头目，摇身一变成了马家军的军官，郭永胜乐不可支。4年后，郭永胜又升为平惠贺兰保安司令。

自1938年当上“司令”至1949年宁夏解放，郭永生共娶了五房太太，过足了吃山珍海味，住豪宅大院，出行前呼后拥的“司令”瘾。

然而，10年一梦，竟被我军解放大西北的炮声所彻底埋葬。如今，尽管起义了，接受了改编，但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共产党和解放军所施行的那一套。解放军讲究官兵平等，爱护群众，艰苦朴素，经济公开，这一切都是他在起义时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堂堂一个“国军司令”，现在竟编为保安大队，而且凡事还要请示解放军派来的党代表指导员，分队长以上的干部也得听他的。这叫什么事儿？为此，他时常背地里骂娘，喝闷酒，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

1950年3月3日傍晚，郭永胜一反常态的热情邀请大队指

导员杨景国和分队长以上干部到家中“过元宵节”。

席间，郭永胜频频举杯劝酒，说着拥护宁夏解放，自己欲洗心革面，酒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指导员欲离去时，郭永胜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他说：“杨指导员，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同志的婚礼，准备带两个人去，我只有一把手枪，把你的枪借我用一下吧？”

指导员杨景国对郭此举并未在意，当即把腰间的手枪摘下递给了他。

指导员一走，郭便对留下的三位分队长说：“今天叫大家来喝酒，主要是想与你们说几句心里话。”

分队长张进义、王文章、沈学仁都是郭的旧部，这时见大队长似有话说，便异口同声道：“司令对弟兄们有话尽管吩咐。”

“好，你我也不是外人了。”郭永胜见三位手下神态恳切，于是叹口气道：“最近我去银川，见到了不少老朋友，他们对我说，过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把宁夏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全部赶走！”

“这——”三位分队长一时不无吃惊的怔住了。他们没想到大队长会找自己来说这种“心里话”。

“你们不信？”郭永胜被酒精烧得两眼充血，脖颈泛红：“想想看，银南有卢忠良军长，河东有田福祥团长，北边有左明道军长，西面还有投必成的蒙古骑兵团，我们还没完，我们还有人嘛。”他一口气将马家军的几位战将一一点出，大有希望的鼓动3位手下：“老蒋在外面打，我们在里面配合，加之有美国人支持，也许十几个小时西北就能收复了。”

“司令的意思是——”张进义问。

“尽快把队伍拉上贺兰山！”郭永胜一拍桌子。

“上山？”

“对！愿意的就跟我走，不愿意也不强迫。但谁也不准把此事透露给共产党。”郭永胜审视着对面3人，他又瞄了瞄面前还放着的指导员杨景国临走时放下的那枝枪。“如果泄密，可别怪我不讲交情！”

“我们愿意跟司令走。”张、王、沈3人一致赞同道。

见时机成熟，郭永胜连夜对下一步行动作了布置。

第23节 匪性难改，企盼“变天”，借开会之名煽动叛乱，宣称“共军是从华北平原来的，山里打游击没有我们有经验。”

3月4日一早，保安大队指导员杨景国、副大队长张仁奎和管理员刘荣耀3人要去银川市军区开会，并为大队干部战士领回夏季军服。见3人一走，郭永胜立即派车将他的两个小老婆和金银细软秘密转送进山。

上午9点来钟，一切安排停当的郭永胜从家中赶到大队部后，便以外出开荒种地为名命令全大队集合。

“这次外出开荒，一下子也用不了许多人，年龄小，身子弱的同志就暂时不去了，留下看家。”他逐一把认为可靠的人叫出队伍，共带出了58人。

队伍离开营房后，行进了几个钟头，来到西山坡米家沙窝地中。

这时，分队长王文章按郭的预谋命令机枪手将机枪架到沙丘上对准正集中坐在一起的官兵，然后站在沙丘上大声宣布：“现在，郭大队长要给大家讲话。”

正在众人迷惑不解时，郭永胜已大步来到队员面前：“弟兄们，我们这次是出来开荒种地吗？不，我们从今往后再不为共产党干事儿了。我把大家带到这里是有要事相商——”他见众人认真的听着，认为队伍是稳定的，便决定把话讲长一些：“现在，不少人也听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宁夏的民主势力也在作准备，计划在约定的时间举行大暴动。我们要抢在他们的前头，决不能落在他们后边。我在银川见到一些老同事，他们说都计划好了，山里游击战我郭永胜是有经验的，共产党的部队都是由华北来的，他们人地两生，拿不住我们，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别看他们能打败马鸿逵，但却对付不了我。大家相信，跟着我是吃不了亏的，将来有一天，在坐的都可以弄个官当。”亢奋之际，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又重新荣登“司令”宝座时的风光，提高嗓门儿紧紧追问了一句：

“愿意跟我走的欢迎，不愿走的放下武器回家，我郭某决不阻拦，有不愿走的没有？”

队员中一片沉默。

王文章急了，又大声提示道：“有不愿跟司令走的没有？”

这时，郭永胜朝分队长张进义使了个眼色，张心领神会，马上站出来：“大家兄弟一场，应该跟着司令干一番大事业，将来也好有个出息，司令当年也是这样滚打出来的。”

队伍中终于有了几声应合，郭永胜见无人明确表示反对，

一挥手：“那好，队伍出发。”

郭永胜领着这支约 60 人的叛变队伍，一路疾行，当晚在贺兰山下的韭菜沟宿营，并在此等到该大队另一分队长吴成玉匆匆率 10 余名愿意入伙赶来的队员，一行 70 余人于次日到达黄草滩。

在黄草滩驻有我军一个人数不多的生产分队。作贼心虚的郭永胜先下手为强，与我生产分队打了起来。生产分队见郭匪人多火力强，边打边撤，摆脱了郭匪的追击。

“先在这儿住下，把计划研究好了再行动。”郭永胜见打跑了我生产分队，显出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态，命令将被占据的营房当做下榻之处，组织召开“军事会议”。

在这个会上，郭永胜宣布成立了一个名称颇长的所谓“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部”，由他本人任司令，张进义为副司令，安禄为司令部参谋，秘书徐光义，配随从 4 人。司令部下辖三个队，1 队队长沈学仁，2 队队长吴成玉，3 队队长王文章。

同时还制定了行动方针，一是通过私人老关系加快扩大队伍；二是突袭区政府以下基层政权，抢劫企业财物，夺取枪支物资，扩大影响；三是联系富有者和回族上层人士中对共产党不满之人，以取得支持，征集粮草，解决给养；四是指定专职人员担任侦察联络工作。

惯匪出身的郭永胜担心遭我军清剿，决定将队伍分成两股活动，以时合时分来完成上述计划。

3 月 6 日，郭永胜率众匪来到古拉本煤矿，在此，又有经吴成玉联络的 23 人入伙。短短 3 天时间，郭即聚集了匪徒近

100人。7日晚，郭、吴开始分头活动。

吴成玉早在郭永胜为匪时即是其得力干将，此番又是在郭率部叛变后急赶而来，甘为郭匪的急先锋。

自分手的当天，吴成玉便率2队50余匪赶至崇岗堡，妄图突袭该区政府机关，夺取枪枝弹药，无奈该区已有防范，只好转而扑向该区税务所，将所内收缴、换取的银元，鸦片及库存现金全部抢劫一空。

郭永胜当晚也没闲着，率1、3队匪徒攻击了位于大武口的光华瓷厂，绑架杀害了驻该厂军代表兼厂长刘万忠，主任李振亚等3人，抢走大米20余石，人民币20多万元（旧币）以及银元数十元，布料5匹等。其后，又抢劫了汝箕沟煤矿。

两支分头活动的股匪，不仅对我平罗、惠农、贺兰三县基层政权建设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还严重破坏了我刚着手恢复生产的一些工厂及广大群众社会生活的稳定。由于郭匪先后派出了10余匪徒四处联络串通，一些蛰伏的惯匪山贼也开始蠢蠢欲动。

在惠农县，组织起了马奎、马福山领导的匪众100余人，在宝丰组织起20余人，在平罗和贺兰境内组织起80余人，而老土匪梁凤惠此时也已出山，在西水固一带拉起了50余人的队伍，这些被郭永胜联络起来的土匪，均表示愿意积极配合郭匪攻打我黄渠桥区政府和当地解放军。

4月17日夜，各股匪按郭布置，分东、西、南、北四路向我黄渠桥区政府所在地扑来，以较多兵力主要进攻驻地解放军。

我军当日下午已获悉情报，作好了充分准备，众匪刚至黄

剿匪大纪实

渠桥，即遭到迎头痛击。郭永胜见占不着便宜，慌忙下令全线后撤。

尽管此仗我方无人员伤亡，但此事却无形中扩大了郭匪的影响，扰乱了人心。不久，匪势迅速扩大，郭匪部很快发展到了300余人。

第24节 打死营长，夺走机枪，我军向前方运送给养的部队屡遭伏击；“黑虎军”逞凶一时，我区乡党员干部多人惨遭杀害。

郭永胜率众匪袭击我黄渠桥区政府事件发生后，土匪的反动气焰更是嚣张，四处传言放风说：“惠农县让郭司令打得不敢住人了，解放军和惠农县政府要撤到平罗去了。”

一些土匪还在群众中造谣说：“山里一仗我们就消灭解放军5000余人，194师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

194师为我第19兵团第65军编制，师长赵文进。第65军参加兰州战役后确实在宁夏驻防，但赵文进此时仍在他的师部（赵文进80年代初担任着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土匪太不知天高地厚。区区300匪徒，一仗能消灭5000解放军？这支参加平津战役的功臣部队岂不成了一堆豆腐渣？

事实上，郭永胜的手下在这段时间，进行的就是土匪活动——烧杀抢掠，强奸妇女。

土匪头目丁福山、毛金虎率10余匪徒先后抢劫了惠农县五区沈皮匠、周大吹、吕宝善等6户人家，平罗县张福元、张春、郝廷芪等3家。其中郝家男女老幼7口人被活活烧死。这帮匪徒

在抢劫沈家时，毛金瑞、马五子、马万兴等3名匪徒还将沈家13岁的幼女轮奸……

除了疯狂为害百姓，郭永胜还布置各县反革命分子“积极复党”，为恢复国民党组织大肆活动，并派人前往黄河以东的内蒙地区联络土匪。

1950年4月17日，随着刘同禄、王梦元、丁福山等大小股匪的上山人伙，郭永胜感到这年头召集人比当年自己同马家军打仗时还容易，而且这些人是自愿听命于己的。

“弟兄们，现在为了证明我们有力量打大仗，我们首先要打解放军，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影响。”郭永胜在布置人夏活动时说。

“解放军经常外出搞生产，人数也不多，咱们可以搞他一家伙。”土匪头目任自强附和道。

“对，搞些好枪好炮来今后也好打大仗。”几名土匪头目均表示同意。

一个阴谋计划由此而产生。

4月24日，有土匪密探来报：“解放军正在侯家嘴大武山上打柴。”

郭永胜问：“有多少人？”

小匪：“30来人，可能是一个排。”

“带什么武器？”

“有机枪、冲锋枪、步枪。”

“有当官的带队吗？”郭永胜问得十分详细。

“好像有两个背手枪的。”

“好，就在大武山下手！”郭永胜向手下指令道。

土匪的消息是准确的。在侯家嘴大武山打柴的确为我某部

剿匪大纪实

教导队的一个排。

得到郭永胜指令后，匪首任自强、马维元等当即率百余匪徒下山，向大武山林区秘密行进。

当土匪们悄悄从四面摸近我打柴部队时，部队正在分散劳动。

“打！”匪头目任自强一挥手，匪徒们一齐开枪射击，并啸叫着向我军战士们冲杀而来。

发现敌情后，该排一面收拢部队，一面组织还击，与匪激战，但由于地形不熟，且部分战士为背柴面没有带枪，因此火力较弱，加之匪众我寡，根本无法组织起反击，先后牺牲干部2人，受伤16人，近2/3的兵力伤亡，剩余的10余人只得边打边撤。

在这次土匪的偷袭中，该排被土匪夺去轻机枪1挺，冲锋枪1枝、手枪1枝、步枪2枝、子弹数百发。

郭永胜袭击我打柴部队得手后，曾得意洋洋的向手下吹嘘：“怎么样，我说从华北来的共军打游击战没有我在行吧？我叫郭永胜，就是永远都会得胜！”

“对，郭司令是天上黑虎星下凡，刀枪不入，百战百胜。”老匪梁凤惠是贺兰山上群匪中的“三朝元老”，由于见多识广，大小土匪对他也敬重三分。

梁凤惠在山上为庆贺任自强等人得胜归来大摆的酒宴上，竭力吹捧郭永胜：

“大家知道不——”他端着一大碗酒，吓米似地勾着腰，一条罗圈腿搭在木凳上，颤抖着花白胡须侃道：“当年我为什么要撮合郭司令与周墩子合并？那是因为我早就看出来，周墩子不是块干大事儿的料，最多绑个‘肥猪’，搞几个娘们。郭司令就不

同了,看看今天,宁夏地面上,谁有他这么大气魄?将来老蒋打回来,郭司令的前途就不可限量啦!”

“对呀,讲得好!”

“喝酒,喝酒……”

“祝郭司令步步高升!”

……

群匪在一片狞笑声中杯斛交错,嘻笑打闹。

“大家都静一静,我还有话说!”梁凤惠酒过三巡,这才又召出一个人来。此人是惠农县一贯道的坛主。

“我们今天要设坛讲经,为郭司令这个黑虎大将军祈福,祝他吉星高照,普救宁夏众生!”梁凤惠跌跌撞撞,指手划脚的张罗开来。

郭永胜望着眼前这一切,有些陶醉了:“多谢诸位弟兄们捧场,今后我郭某人如鸿运当头,一定不会忘了大家,到时候论功行赏,每人官升三级!我决定,从今天起,我们就叫‘贺兰山黑虎军’好了!”

“行,就叫‘黑虎军’!”

“我们‘黑虎军’要打败解放军!”

“干杯!”……

山寨里乌烟瘴气,闹了一个通宵。

郭永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第一次偷袭我在黄草滩的一支生产部队后,第二次又在大武山袭击我打柴的一个排。因此,在他眼里,“以多打少”的偷袭战术简直成了一大法宝。

4月29日,郭永胜又获悉我军一支向前方运送给养的小分队正向玉泉沟一带行进。他认为又有有机可乘,当即命令手下头

剿匪大纪实

目米三贵率 30 余匪出动伏击。

当我军这支小分队行至玉泉沟时，即遭到土匪伏击，当场被打死打伤 11 人。其中包括 1 名带队的副营长，夺去轻机枪 1 挺、步枪 11 枝、子弹数百发。

其后，郭永胜又连续两次伏击我军运输队，打死我军干部战士 2 人，打伤 1 人，抢去步枪 4 枝、子弹数百发，骡、马 70 余匹，并将一名为我军赶马的群众阎玉厚抛下山崖活活摔死……

匪焰如火，愈演愈烈。

继多次袭击我军小分队之后，郭匪手下吴成玉还率匪先后袭击了我平罗县五区区政府，抢去手枪 1 枝、步枪 5 枝、子弹上百发。

4 月 29 日，郭又派米三贵率匪下山，绑架枪杀了我平罗县 4 区区政府下乡催征公粮的民政助理刘元生。

5 月 5 日，郭又令匪小头目王梦元等人下山绑架了我平罗县 4 区马家高庄乡乡长马彦清，并将其抛入黄渠内活活淹死。

5 月 14 日，郭令匪小头目毛金瑞等人下山，秘密杀害了平罗县五区三乡乡长班希珍。

……

一系列的残杀事件发生，使得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也有一些落后群众胆怯了，不敢主动接近干部，不愿为公家做事。

“我们这次打击，最主要就是先把那些‘二油子’打怕，看谁还不老实！”郭永胜常把我乡村干部和群众中的拥军积极分子称作“二油子”，好像他这个惯匪倒成了正人君子。

在贺兰山区，一时间将这支“黑虎军”传得神乎其神。

第七章 灭黑虎

第25节 自立军区，拼凑旅团，四处烧杀、奸淫，狂呼有朝一日“打宁夏”。

匪势的扩展，使郭永胜开始考虑如何进行组织改编问题了。当初他之所以把自己这支队伍定名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目的就是想让大西北及整个宁夏的人，都知道是他在“党国”危难之时擎起了宁夏武装反共这面大旗，日后讨赏也好有个依据。为此，他将手下头目张怀忠和伪乡长阎廷芳两人封为“宁夏军区”副司令，安禄为参谋长，周炳文为司令副官。

这些由郭永胜手下土匪拼凑起的部队，为了尽快扩编，曾先后派人到黄河以东的内蒙境地招兵买马，联络当地土匪，以及在永宁县和宁朔县山区拉人派款，逞凶一时。

由于相信“黑虎星”下凡，更有利于欺骗群众，郭永胜只得忍痛将“宁夏军区”更名为“黑虎军”。因为“军区”这个编制太大，普通老百姓也不知是何机关，不如“黑虎军”听起来实在和威风。

但郭永胜心里非常清楚，凭这点力量和解放军大部队硬拼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他在制定其作战策略

时，曾明确地指出：

“我们目前还不能大打。大打占不了便宜，我们既然是游击战，就要化整为零，在几个县同时活动，一来人少目标小，二来又可以分头拉队伍，招收兵马，扩大影响，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一旦有事，我们分散的人又可以迅速集中，吃掉小股共军部队，这样积少成多，又安全又有把握取胜。”

“司令，我们也要快些和台湾取得联系才好啊！”匪首吴成玉十分关心“宁夏军区”今后是否会被蒋介石政权所承认。

“这自然。”郭永胜知道匪众中有许多人在指望将来国民党政府的论功行赏。于是宽慰说：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军区’也好，‘黑虎军’也好，我们都要上报台湾，并按台湾的指令行事，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电台，有了电台一切就好办了。”

“那快搞电台啊！”吴成玉焦急的催促道。

“电台都在县里，打县城，我看我们的能力一时还达不到呀！”郭永胜叹道。

“电台在县城又怎样？还不一样给它打进去！”吴成玉发狠说。

“只要弟兄们有这个决心敢打，那就打。”郭永胜见吴成玉一再表示愿意为搞电台而打头阵，立即表态支持：“不过，事先要踩好点，把情况闹清楚。”

“我这就派人外出打听。”吴成玉领命而去，连夜布置耳目下山。

第26节 县府被攻，电台被夺，县委书记一行开会途中遇匪惨遭杀害，军事打击刻不容缓。

不久，消息反馈回来了。在河东的内蒙左旗政府有个广播电台，每天都在向牧民们播音。外出的探子甚至将电台的位置和防守兵力都详细画了一份草图。

“看来，这回我要亲自出马了。”郭永胜看过草图，琢磨了一阵子，终于下决心亲自率领众匪下山，东渡黄河杀奔左旗政府抢电台。

1950年6月10日，郭永胜将分散活动的土匪全部召回，下令“黑虎军”倾巢出动，进攻左旗。

“弟兄们，这次打左旗，人人要卖命，谁也不许偷奸耍滑。左旗没有解放军的大兵力，那些机关干部和民兵都不中用，大家不要怕，谁拿到电台，本司令就要重赏谁！”郭永胜特别爱在队伍前训话，这是他的“例行公事”。

“其它东西怎么办？”队伍中，一些土匪最关心的还是财物。

“老规矩，谁抢到的就归谁。”他决定先把“定心丸”给手下们吃了再说。

经郭永胜首肯，众匪们的眼睛都发绿了。他们的本意就是想抢银元和大烟土，至于什么电台，好像与己无关。

200余土匪在郭永胜的指挥下，晓行夜宿，迅速过了河，并按事先的分工，一到左旗旗委所在地定远营即分头行动。

枪响后，郭永胜从左旗政府回击的火力上判断，这儿显然

剿匪大纪实

早已有了准备，不像一些没有防范的区乡政府。枪一响，除了一些零乱的回击外，对自己的队伍并无实际的威胁。左旗的情况则不同，土匪们在几个主要路口均遭到猛烈火力拦截，看来是左旗政府事先有部署。

“王梦元，你领人集中力量往东街打！”郭永胜叫来干将王梦元吩咐：“打进去先占电台，拿到电台就往回撤。”

“是咧。”王梦元双手提着一挺机枪，扭头朝身后的喽罗大喝一声：“都跟我上——”

机枪吐着火舌，王梦元这个亡命之徒一边狂叫“杀呀！冲呀！”一边用机枪向东街两边横扫。

左旗政府的自卫兵力主力并不在东街，因为东街方向仅有广播电台，不是机关的核心部位，故配备的火力并不充足。当然，其事先也并不知道土匪们的目的是要抢电台。

郭永胜见王梦元领着几十名匪兵已经打进了东街，便又叫来吴成玉：“传我命令，其他几个方面要加紧进攻，一定要打进去！别让共军跑了。”

然而，除了东街的进展较为顺利外，其他几个方面的进攻都被打退了。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这时，王梦元等匪已将抢到的电台和密码本以及绑架的电台台长及一名工作人员带到了郭永胜面前。

“司令，要不要我再带人冲他一家伙？”王梦元为自己抢了头功而自鸣得意，亢奋之中，竟还想去攻占左旗政府。

“算了，时间太长了。估计外面的共军已收到了左旗的告急电话，打久了对我们不利，撤退——”郭永胜命令道。

目的达到的郭匪部，很快撤离了左旗。

“他妈的，老子从来都是吃肥肉的，这笔账一定要算！”临离开时，郭永胜仍不忘发誓要报复左旗。

郭永胜认为自己此次挂帅亲征，打下左旗较有把握，没想到“黑虎军”竟被打得趴在地上不能动弹，这多少有些让他感到脸上挂不住。

果然，一个多月后，当他得悉左旗旗委书记曹动之仅带了一名通讯员将由银川开会返回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到两人回旗的必经之路贺兰山范家营一带埋伏，一阵黑枪将曹与通讯员杀害。

血案震惊了贺兰山。

第27节 政治争取，军事为辅，土匪利用政策空子“跑宽大”获得喘息。群众不解，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担心匪患日甚。

我党我军对于贺兰山区土匪的清剿，最初是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尽量争取匪众中受蒙蔽的普通群众。

自郭永胜拉队伍上山为匪的当天，惠农县委即专门开会研究了此事。会后由省军区干部高立、郑维田及四区区长田宝丰三人专程到县保安大队处理此事。

在找过大队指导员杨景国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他们又找副大队长张仁奎和管理员刘荣耀谈了话。张原为马鸿逵部队的一名团长，刘则是马部的少校军需官，两人为此顾虑很大，担心共产党把责任怪罪到自己头上，但在随即召开的全大队会议上，省军区干部和四区区长仍态度和蔼的让他们放下思想包

剿匪大纪实

袱，相信政府会妥善安排他们今后的生活，但有一点要求，现在要坚守岗位。

几十号人的情绪稳定了。这次会后，张仁逵和刘荣耀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其余 30 余名队员表示愿意回乡务农，经请示上级批准，同意他们返回原籍，并发给了路费。

“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看到政府果然兑现了会上的承诺，大队中不少从旧军队过来的人都非常感慨。

“我们是害怕受牵连才提出回乡的，早知共产党这样宽大，就不走了。”

善后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处理完贺兰保安大队事件后，县委和当地驻军领导再次开会分析了情况，并确定了下一步清剿郭匪的作战方针及政策原则。

1. 以政治争取兼军事清剿为统一行动原则。
2. 军事清剿任务由黄桥渠驻军 194 师 582 团担任，其他部队待命。
3. 平罗驻军相机配合，如何协同视情况变化而定。
4. 定期召开军队、地方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互通情况，研究及制定清剿方针。
5. 为使军地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及时传递情报，各级政府派专人与 582 团联络。

在军地领导机关制定了清剿原则之后，地方领导又多次组织召开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及上山为匪者的亲属召开座谈会，向他们宣传介绍党的方针政策，做分化瓦解工作。

3月8日，为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中共惠农县委政府和

当地驻军在黄渠桥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会上，军地负责干部及群众代表都表明了政府对待郭永胜等人的态度。肯定了他们在宁夏解放之际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率部举行起义，并在地方上保护仓库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功劳，同时进一步阐明了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贯政策，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希望郭永胜及属下尽快放弃与人民为敌的立场，改恶从善，争取新生。如果继续执迷不悟，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有决心、有能力将其彻底消灭的。

万人大会开过之后，经一个多月各方面的积极争取工作，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初随郭永胜上山的一些人思想动摇了。眼前的现实是严酷的，郭永胜自己转移了财物及家属，可他们这些人呢？在山上没吃没喝，只有靠抢劫老百姓的羊和少量粮食度日，住的是山洞、羊圈，而且还要时刻担心遭到解放军的围剿。这种日子一长，他们觉得郭永胜吹的那些什么“等待蒋委员长反攻”，“今后人人升官发财”以及“把宁夏的解放军打跑”等等，不过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实使他们看到了郭永胜及“黑虎军”甚至连一个区政府都打不下来，还说什么要去打银川呢？

上山仅一个月，当初在郭家参加叛变预谋并随郭永胜上山的张进义和沈学仁就清醒过来了，跟着郭永胜过这种为匪作恶的日子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乘郭不备，带领48人下山向政府投降。

郭永胜当初从大队拉走了58人，可一个月后，又跑回了48人，这说明我党制定的政治争取为主的政策方针的英明。

张进义等人下山后，政府仍以“既往不咎”的原则，将他

剿匪大纪实

们遣返回了原籍。

当然，此时能够铁心留在郭永胜身边的，无疑就是那些惯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了，这是一伙死心塌地要与人民为敌的人，他们甚至还把我党的宽大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更加疯狂地危害四方。

如惯匪出身的丁福山、马奎海等人在抢劫群众后，逃跑途中被我公安人员抓获；几人当即表示愿意投诚，不再作恶，经教育释放后，却继续纠集在一起抢劫杀人。用他们的话说，这就叫“跑宽大”——你抓住我，我就投降，你一放我，我照旧我行我素，看你怎么办？

“跑宽大”使一些土匪头目和敌特分子获得了一定的喘息之机，活动也更加猖狂。

这一现象，使一些群众有意见。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纷纷将各地土匪强奸妇女、烧杀抢劫的罪行向县委反映，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打击这些钻政策空子的土匪，为受害群众作主。

为此，我军地领导机关根据第一阶段政治争取的效果和当前匪患的具体情况，再次讨论研究制定了第二阶段的清剿作战方针。鉴于当前的匪患已是以少数不肯改悔、疯狂与政府对抗的顽匪、惯匪及国民党敌特分子为主，故应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的原则，不能让土匪们再逞凶作恶。

坚决实施军事清剿的方针一定，在惠农、平罗、贺兰等三县党政机关的密切配合下，时兼甘肃省军区之职的一野第65军开始投入较大兵力集中扫除贺兰山区的匪患。

清剿作战以驻黄渠桥的我194师582团为主，从北面出击

贺兰山，而驻平罗的 193 师，同时抽调部分兵力从南面配合，南北夹击，步步紧逼，力争将郭永胜“黑虎军”一网打尽，全歼于贺兰山内。

为了保障清剿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在发起合击的前一个月，我军即派出人员进山侦察，对土匪的活动规律，住宿地点，经常出没的要道等基本上都有了大体上的掌握，同时还绘制了贺兰山的详细地形图，为部队的开进和战斗实施作了周密的部署。

解放军与“黑虎军”的一场较量，即将开始。

第 28 节 步步紧逼，合围聚歼，匪首奔突败落山洞，吃人“猛虎”终被我进剿部队一举生擒。

出动兵力清剿贺兰山郭匪的我第 65 军是华北军区的一支主力部队。第 65 军在参加平津战役后，又投入了太原战役，其后于 1949 年 6 月间随第 19 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执行解放大西北的作战任务。当年 7 月至 10 月，第 65 军相继参加了扶眉、陕中、兰州、宁夏诸战役。

宁夏解放后，第 65 军机关兼任宁夏省军区机关，开始协助地方政府加强政权建设以及维护社会治安。

从编制隶属关系上来说，郭永胜起义后被改编的贺兰保安大队，即为省军区所辖，因此，郭永胜才知道第 65 军原为华北军区部队，清楚其大多数指战员是长期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翻身农民。正是由于他对我军的驻防分布和一些内部管理情况较为熟悉，所以他才有可能编造出许多谣言，如“194 师师长赵

文进被打死了”，“肖应棠参谋长被活捉了”，说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以此糊弄老百姓。

第65军仅在解放战争中即歼敌12万余人，其军师领导干部多为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参加红军的久经战火洗礼的优秀指挥员，郭永胜胡吹一仗能“消灭第65军5000共军”，实在可笑。

第65军兼行宁夏省军区之职，郭永胜多次偷袭我外出执行任务的生产小分队和运输部队，抢夺枪枝，残杀我军指战员，激起了省军区领导的震怒。65军还能让个惯匪小瞧了？

经过慎密侦察部署，清剿贺兰山郭永胜等股匪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剿匪部队投入团以上作战单位，决心给予一心想当“宁夏王”的郭永胜匪部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套输沟、剪泉子山等地，郭永胜匪部数度被我军包围，一经交手，匪伙即被打垮就歼。

“看来我们只有钻到松山去，那儿山险林密，可以跟共军周旋。”郭永胜带着少数突围匪徒从剪泉子山沟里逃出来之后，又想起了早年贺兰山土匪躲避马鸿逵追剿的老根据地——松山。

松山又分大、小松山。当年郭永胜同意受马鸿逵招安时，其手下的惯匪张怀忠、谢占奎等少数不愿受招安的人，即潜往此地的深山老林继续为匪。

“他妈的，没想到10来年后老子也来到这儿了！”郭永胜对张怀忠不胜感叹地说。

“司令，你被马鸿逵招安，又被共产党招安，到头来又怎

么样？”张怀忠自1934年以后即在大、小松山活动了16年，原本以为此番能跟着郭永胜在山外大捞一把，没想到又让解放军给赶回了松山。

“这儿地形你熟，你说现在怎么办？”郭永胜问。

“多派探子，只要共军前脚一到，咱们后脚就走，跟他兜圈子，拖也把他们拖疲拖垮。”张怀忠此时也无甚高招，说出来的办法还是对付马鸿逵那一套。

“就这么着吧，埋锅作饭。”郭永胜望了一眼身边的大小家眷，见她们浑身是土，灰黑着脸，于是下令安营扎寨。

皓月当空，入夏的山林倒也凉爽，望着抱着枪靠着树干入睡的一干残兵败将，焦虑惶恐的郭永胜一丝睡意也没有。

他踏上一块青石，环顾四周黑漆漆的老林，心中不由泛起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天要绝我？”

“司令，睡会儿吧，瞎想也没用啊。”这时，张怀忠走到他身边。

“嗨，现在腿脚不灵便了，又拉家带口的。”郭永胜哀叹道。

“正是，带着他们跟共军打仗，弄不好要赔上性命的。我看司令还是让她们下山的好。”张怀忠深知郭永胜带着家小弄不好会连累自己。前几次要不是为掩护他的家人，也不会死那么多兄弟了。

“让她们去那儿？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她们吃的。”郭永胜说。

张怀忠有些不快：“咱们是匪，腿长才能活命，司令当年——”

“别说了。”郭永胜猛地打断他的话：“老天不会绝我。否

则我也活不到今天。”

两人都沉默了。

随后，郭永胜拍拍张怀忠的肩头：“兄弟，你我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大哥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全靠你和弟兄们卖力了。”

“司令，这可没得说的。”张怀忠忙表态道：“当年我们几个虽然没跟大哥去保安队，可你大哥用得着我们兄弟时，你看，不都又跟着你鞍前马后效劳吗？”

“那是，那是，这样就好。”郭永胜给张怀忠的一番话说得有些感动，心里也稍觉得踏实了几分。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便各自找地方和衣而眠。

正当郭永胜迷迷糊糊快要进入梦乡之际，一声令人心悸的枪声响起。这是林中的岗哨发来的报警。

他本能的一翻身爬起，忙向四下喊了一声：“弟兄们，抄家伙——”

拂晓的山林间顿时枪声大作。

众匪乱作一团中，又夹着女人和孩子的惊叫。

郭永胜没想到解放军来得这么快，连口气都不让自己喘。

刚刚向郭永胜表述忠心的张怀忠，这时一边开枪，一边招呼谢占奎等几个当年的松山惯匪，一瞬间竟消失得踪迹全无。

郭永胜恨恨地骂了几句，命人拼死抵抗，自己也带着 20 余人和家眷沿着后山小路溜了。

郭永胜毕竟是贺兰山滚大的惯匪，昨夜露营，安排好岗哨之后，他就四处转悠着详细察看好了地形，将两个小老婆等家眷安置在紧靠后山小路边的几块大岩石下，这样一旦受到攻击，即可从大岩石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溜掉。

事实上，或许正是张怀忠等人夺路而逃吸引了解放军的火力和兵力，郭永胜才得以保全一命。

从松山逃跑后，郭永胜带着 20 余人和家眷北窜至呼鲁斯太，又被清剿部队追上。这时，郭永胜的头脑清醒了，知道再带着家眷行动早晚会被解放军抓住，于是在突围时只带着 20 余名土匪一路狂奔，丢下家眷和财物而不顾了。

从蒙地呼鲁斯太又往南逃的这 20 余名土匪，是郭永胜所谓“黑虎军”第 2 旅旅长蒙古族人杨格娃和参谋安禄所领之部，倒也个个强悍。

郭永胜本想窜往内蒙境地，但一想到那里的草原不易藏身，于是又决定重返贺兰山区。

“司令，我看张怀忠他们是不会离开松山老窝的。”经参谋安禄一提醒，郭永胜感到正是此理，解放军清匪部队一走，绕山转的张怀忠肯定仍在松山。

于是，不顾饥渴的郭永胜一行，又马不停蹄的窜往松山。

果然，在熟悉的“老地方”，郭永胜又与张怀忠率领的 20 余人碰头了。

“司令，不能再和共军硬拼了。准备好吃的，先找个地方藏起来才行。”张怀忠劝慰道。

“这儿你熟，就按你的意思办。”郭永胜几经解放军合围奔袭，此时早已丧魂落魄。

“这几天我已经在西福沟找好了一个山洞，有水有粮，躲它几个月不露面，解放军就收兵回营了。”张怀忠的话赢得了众匪的一致赞同。

可是，这支 50 余人的股匪刚一会合，情报灵通的我清剿

剿匪大纪实

部队又将大网从北往南回拉，牢牢地罩住了整个松山。

我清剿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郭、张二匪可能回窜松山做好了充分的估计，因此，自以为高明的张怀忠，这回打错了算盘。

我军进入松山西福沟后，郭张 50 余匪即被紧紧地压缩在极小的山林地带之内，经几次规模不大的交火，便歼灭其大部，而那个被郭、张视为避风港的山洞，最后也自然成了他们的囚笼。

1950 年 8 月 11 日我军突袭郭匪松山营地之后，1950 年 9 月 24 日，“黑虎军”头目郭永胜、张怀忠、杨格娃、谢占奎等人全部被我军活捉。

1950 年 11 月 19 日，经审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宁夏银川市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会后，将郭永胜、张怀忠、杨格娃、谢占奎 4 名罪大恶极之匪首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此后，我军将继续清剿贺兰山区残匪的任务交由地方政府承担，仅抽调一个连的兵力组成武工队协助各县公安局及当地民兵沿山边的村庄进行搜捕工作。至年底，又追捕匪徒 20 余人，基本上扫清了贺兰山匪患。

1951 年 2 月，随着全国性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至 5 月，贺兰山区先后逮捕了 300 余名匪徒，并于 7 月底连续两次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对原郭永胜“黑虎军”的骨干成员王梦元、丁炳南、丁万福等 17 人执行枪决，另对匪首马文礼、毛金瑞等 10 余人分别判处 10 至 20 年的有期徒刑，其余犯罪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贺兰山，终于恢复了宁静。

第八章 走秦川

第29节 占领西安、夺取宝鸡，敌第19绥靖区布置地方武装实行“联防”，大土匪周寿娃自封“司令”拉队伍。

1949年4月下旬，盘踞西北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眼见我军已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太原并全面控制了华北战局，为防备被我军聚歼，从4月25日开始，胡宗南即令所部从铜川、蒲城、龙阳镇、羌白等地迅速后撤，至4月底，已在三原、泾阳、高陵，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一俟风吹草动，便可退守汉中和进入四川。一野指挥部早在胡宗南开始动作之前，即已发觉其企图，并摸清了其部署：敌第19军守泾阳、第36军驻咸阳，第17军扎营于西安城外，而第57军和第38军则分别后撤至永寿和礼泉、第69军亦撤至蓝田，第1军更远，已全部乘车撤退到了宝鸡。

针对此态势，一野指挥部决定，为防敌南逃西窜，立即实施迅猛进击，将敌歼灭于运动之中。若敌主力西逃，仅以2至3个军作掩护时，我即以二兵团第4军向礼泉、乾县方向追击前进，同时加强右侧侦察警戒，随时准备打击青海的“二马”援兵，而分配给二兵团6军的任务，则是大踏步的向西安方向

剿匪大纪实

追击前进。

果然，至1949年5月17日晨，胡宗南集团全部西撤。一野指挥部当即命令担任作战的各军全线展开追击，决不能让敌人主力逃掉。战役发起后，二兵团4军于5月18日攻克礼泉，19日解放乾县，24日进占关头、永寿等地。6军亦经咸阳直扑西安，20日拂晓在咸阳以东抢渡渭河，突破敌暂编第2旅的防御，兵临西安城下。此时西安守敌第17军主力已向西安以南的秦岭山区逃窜，我6军以一部兵力进行追击，在行进间歼敌第48师、第12师一部及暂编第2旅大部，解放了郿县，主力于20日1时进入西安城内。

西安，作为胡宗南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老巢，一夜之间便不复存在，在摧枯拉朽的进军号角中，胡宗南部队如惊弓之鸟，节节败走。

5月22日，敌第57军及第30师在逃窜中被二兵团4军及一兵团1军追歼于凤翔县东北的姚家沟，俘敌8000余人。至5月31日止，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全部被我军解放。

面对我军大举西进，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坐不住了，他们深知胡宗南集团一垮，或者南撤四川，青海、宁夏势必难保，为了拉住胡宗南，青宁二马决定孤注一掷，出动全部兵力与胡宗南联合作战，向我军实施疯狂反扑，欲重新夺回咸阳和西安等陕西要地，以阻止我军向青海、宁夏进军。

其具体部署为：以第82军（第100师、第190师、第248师）、骑兵第8师及骑兵第4旅，组成陇东兵团；以第11军、第128军、第81军之第294师、骑兵第10旅37团，第257师769团，组成援陕兵团。这样，青宁“二马”组成了陇东、援

陕、陇南三个兵团，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统一指挥。胡宗南见二马重兵来援，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当即令其第38军、第90军、第65军、第36军、第17军、第69军、第3军等部队暂停撤退，摆开一副与二马联合，向我军展开大反击的架势。

对此，一野指挥部立即作出部署，命二兵团4军以一部兵力控制阳峪关、铁佛寺、关头、临平等要点，主力由东向西围歼援陕敌军，兵团第6军则迅速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由赴陕的华野18兵团先头部队182师，集结礼泉以北，从我一兵团第3军右翼攻敌左侧。6月9日，我18兵团61军赶到西安，接替了6军的防务，紧接着18兵团60军也开进西安。值此，我一野为保卫西安的兵力调动陆续到位。

从6月11日开始，马继援集团即向我军发起全面反攻，其30余个师20余万人，加上胡宗南集团的近18万人一时尚处于优势，但当敌进至咸阳后，遭我军顽强抗击，同时我18、19兵团已开赴西安，没讨到便宜马胡集团不得不又开溜了。

这场以保卫西安，全面展开解放大西北为目的的陕中战役，我一野部队共歼敌35600余人。

一野二兵团第4军在扶眉战役结束后，马不停蹄的迅速乘胜西进，大军所向之处，连克蔡家坡、岐山，并一举拿下宝鸡。

宝鸡自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二兵团第4军在宝鸡进行了短暂休整。实际上该军自1949年1月起便处于边打边完善编制的状态。1月，西野警备第4旅才拨归第4纵队建制，2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

剿匪大纪实

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军长孙超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辉照，参谋长张文舟。其第10师为警备第1旅与骑兵第6师1个团合编而成。警备第3旅改称第11师；警备第4旅与骑兵第6师（已拨给第10师1个团）合编成第12师，全军约1.9万人。

第4军和第6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奉兵团总部命令向甘肃挺进。此时退守陇东的“二马”，仍企图凭借平凉一带的险要地形阻滞和消耗我军，以阻止我军解放甘肃、青海和宁夏，由此，中央军委决定，暂不进攻汉中胡宗南残部，而是集中兵力歼灭“二马”，解放兰州，打开宁夏的大门。

胡宗南部虽仓惶后撤，但却并没有忘记对地方武装势力的“留守布置”。敌第19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行政长官谢辅三在撤离前即亲赴商县，召集各镇镇长及地方武装头目召开了一个“联防会议”。在这次会上，谢辅三当面委任为害商洛地区多年的大土匪周寿娃为“商县西北地区联防办事处主任”，同时将随车带来的14箱步枪子弹送给了他。

临别时，谢辅三对属下的这些地方武装头目们布置道：“现在时局紧张，你们要组织起来，准备打仗。诸位都是当地人，打仗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共军来后，你们必要时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钻进秦岭深山去打游击，至于枪械弹药，我们可以随时提供。”

“可以扩编队伍打自己的旗号么？”周寿娃见谢辅三以绥靖司令长官的身份亲自前来看望自己，十分得意，为了在众头目中炫耀其与谢的关系非同一般，连连发问。

“当然可以。”谢辅三一口应允，并鼓励道：“只要你有足

够人马，要当团长、师长都行。”

“那我就干。”周寿娃裂嘴一笑，环顾众人：“有谢长官给咱们撑腰，大家就放手干吧！”

会议结束后，周寿娃送谢辅三上路。

谢辅三拍着周寿娃的肩膀：“老弟，我们就要走了，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第19绥靖区警卫二团团长，这辆美国吉普车，也送给你了。”

“谢长官的座车我怎么敢要？”周寿娃受宠若惊，假意推托。

“此行一去，长路漫漫，所到之外多不通公路，要车也没用了，留给你吧。委任状过两天我就叫人送来。”谢辅三心里十分清楚，解放军能够一夜之间攻占胡宗南的西安老巢，蒋军兵败如山倒，今后是凶多吉少。

“请谢长官放心，我周寿娃决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今后谢长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谢长官多保重！”他双手抱拳，与闷闷不乐、愁云满面的谢辅三分手了。

两天后，由谢辅三签署的第19绥靖区的委任状送到大荆周寿娃的“团部”。周寿娃尽管口头上对谢辅三殷情备至，极力讨好，但从心底里讲，他对谢辅三委任他这么个官衔并不十分满意。

“团长算个啥？还这般公事公办？”他随手将委任状往桌上一扔：“老子有几千人枪，干脆当司令，给弟兄们封个团长干干，大家见官长一级！”

“好哇，大哥说的是。”手下的头目一听有团长做，都乐了，一个劲儿应声附和。

剿匪大纪实

“那好。下面我宣布——”他清了清嗓子，把胸脯一挺，遂高声念道：“参谋长——王哲夫，第1团团长——周培云，第2团团长——杨全林，第3团团长——潘建都，另外，本司令部还下设一个特务营，特务营营长——周金铭！”

一场封官闹剧伴随着当晚的酒宴令周寿娃忘乎所以。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大进军脚步声已越来越近。

第30节 拜把换帖，兵匪合编，征粮派款、贩运鸦片、占山为王，坐待“胡长官反攻西安”。

周寿娃经过10余年时间的土匪生涯，队伍已经发展成有步枪2500余枝，短枪近300枝，轻、重机枪36挺，六〇炮2门的大股武装势力，难怪以往不可一世的第19绥靖区司令官谢辅三会在这风雨摇飘之际，亦欲靠其来维持其反动统治。而周寿娃这个大匪首，则欲借此机会实现自己占山为王，继续鱼肉人民的美梦。

周寿娃又名周兴文，外号“周狼”，1911年出生于陕西商县大荆镇周岭村。周寿娃幼时家境贫寒，靠走乡串集挑担卖苞谷糖为生。24岁时入腰寺镇联保主任李建中手下当团丁，后又给镇自卫队长王益三当护兵，但他眼见这些地方武装头目肆意胡做非为，横行乡里，便心生恶念，密谋杀死王益三篡夺自卫队的权力，不料事败，只得与同伙周兴武、周金升、苏世恒等人流窜马角山、大荆一带，持枪抢劫，并开始纠集人马，霸占地盘。

1937年，商县上秦川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古世珍部千余

人进占西荆、黄川、大荆等地，并将刚形成势力的周寿娃股匪赶到洛南保安一带。

周寿娃受到打击，心里非常不服气，于是派人潜回大荆侦察。当年4月中旬，周寿娃在摸清大荆古部情况之后，于当夜赶到古部驻地附近，趁黑夜摸入其营房内，一阵乱枪齐射，将古部打得人仰马翻，死80余人，伤20余人，抢夺走长、短枪100余枝，弄得古部很快撤离了大荆。

周寿娃此仗打出了声威，大荆终于成了他的地盘。

由于其势力日益扩大，时任陕西保安15团团长的族兄周维华便开始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并委任他为大荆镇保甲自卫队长。然而，周寿娃匪性不改，时常与外地保甲武装冲突，而且疯狂抢劫当地商号、米店及私营企业，弄得当地人士纷纷向上告发，陕西省政府不得不下令蓝田、渭南、华县、洛南等县联合派兵围剿。但在周维华等人的周旋下，此事不了了之，周寿娃仍我行我素，为害四方。

周寿娃有6个老婆，除大老婆魏梅系童养媳外，其他5房姨太太均属先奸污后霸占得来。虽然如此，周寿娃仍不满足，还仗势到处奸污妇女。据大荆、黑龙口一带群众反映，周寿娃先后奸污妇女最少也在百人以上，其凶残之状，千古罕见。例如：他在黑龙口强奸一名15岁幼女时，其母心疼女儿，宁愿自己受辱，虽经苦苦哀告，但仍无济于事，其母泪如泉涌，终于在荷枪实弹的威逼下，将女儿抱在怀里让“恶狼”凌辱一番。大荆李××结婚那天，刚吃晚饭，周寿娃便派人装作到李家拉壮丁，进庄之前，有意先放了几枪，等新郎及其亲友全部逃跑之后，周趁机闯进新房，强奸了新娘。由于周寿娃奸污妇

女无论老幼，其兽性已达到六亲不认的地步，所以“周狼”的恶名在当地百姓中越叫越响。

更有甚者，周寿娃还丧心病狂的挖人心为自己治病。1940年，周寿娃眼睛生病，听人说用人的心与胆能治眼病，遂于1941年1月14日派周金升等人在马角山（今商县庙湾乡）将郭树旺杀害，掏其心与胆，后经医生辨认，胆非真胆，又二次去郭家。当时，死者已经装棺入殓，但他们仍不罢休，将死者从棺材中倒在地下，掏出其胆后，扬长而去……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古城西安。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旅副旅长江炳功及其下属400多人（包括军医处、副官处、军需处、参谋处、特务营）和由国民党华州专员张雅宣、大荔专员艾捷三带领的400多人（包括华州、大荔专署以及华县、华阴、潼关、大荔、朝邑、郃阳、蒲城等7个县的部分在逃人员），分别由石头峪、瓮峪窜入商洛，并在洛南县两岔河进行了合编，由张雅宣总领一切，然后经大龙庙窜到黑龙口一带，妄图继续南逃汉中。后因此路不通，张荣顺（系蓝田县铺花子人，团长）即通过他与黑龙口镇长华生辉的私人关系，千方百计勾结周寿娃一伙与保六旅合作垂死挣扎。

当年5月中旬，保六旅张雅宣邀请周寿娃、王哲夫、潘建都、王朝栋等人在韩峪川华生辉家举宴换贴。王朝栋奉劝周寿娃说“人家都是大官，有学问，见识广，与他们换贴，日后必有好处。”席间双方表示“要精诚团结，坚持到底，等待时机，配合胡长官反攻西安”。

此时，崔书田（商县自卫团团副）与其侄毓斌（军统特务、西安绥署二处副处长），专程由商县前往大荆，在杨全林

家与周寿娃、王哲夫、王朝栋、杨全林、周兴康等人秘密会面。

周寿娃问：“县城情况怎样？”

崔毓斌说：“县城情况很好。白旅长（白青云）决心和商县父老同生死，共患难。”崔书田接着说：“我们这次来大荆，是白旅长亲自委托的，他让我转告各位，对解放军、游击队，咱们必须保持一致行动，要提高警惕，防止受骗。白旅长还说，这里有事，他一定派人援助下边（指县城），各位也应随时策应，只要咱们同舟共济，商县大荆万无一失。”

一贯狂妄自大的周寿娃，在张雅宣等人的吹捧下，加上保六旅电台的欺骗宣传，更加忘乎所以。因此，当西北军政委员会联络部派郭志文（大荆人，曾任商县北区民团团长等职，当时闲居西安）和王继武（蓝田人）回大荆奉劝周寿娃要认清时势率部起义，为解放商县出力时，周寿娃继续听信王朝栋、王哲夫所说，先是阳奉阴违，总是说不要急，让我想想再说。嗣后，又避而不见，终未接受劝降。

1949年6月19日，周寿娃率部进驻红岩寨、马角山一带，保六旅旅部警卫营300余人，也先后进驻两岔河，并在大荆、腰寺两镇火速摊派小麦800多石，指定专人，采取暴力手段，加紧催收，限期运送指定地点，妄图负隅顽抗。在此期间，周寿娃一再扬言：“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打他几年游击怕啥，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坐天下。”岂知，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6月30日晚，我商洛军分区部队和洛南支队，先后抵达两岔河西边的七里店和大龙庙麻村一带。洛南支队侦悉敌人警

剿匪大纪实

戒疏忽，队长蔡兴运便命张青山连绕道登上马角山高地，严防敌军外援，自己带领2连（3连打援）趁敌熟睡之际，冲入敌群，于7月9日黎明前后一举歼灭保六旅300多人，生俘参谋长孙英以下1160多人，击毙击伤敌副旅长姜炳功以下百余人。与此同时，我分区五团也向盘踞在秦岭庙一带的周寿娃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周匪四处逃窜，由于土匪都是当地土生土长，人熟地熟，所以很快散伙隐蔽。

周寿娃在其所属武装全部散伙之后，躲进东箭子沟李有娃（李和周寿娃有亲戚关系）家，后由李有娃、李文福（大荆东峪人）护送，翻化岔岭，逃到渭南油火川李忙庄家隐藏起来。后又由李文福护送到河南郑州，先后在郑州市天泰药房和原大荆镇长翟玉山家长期隐藏。

第31节 黑白两道，钩挂三方，恶狼本性难改终落天网，一枪伏法昭天理。

在清剿“周狼”之前，我军和当地党政部门鉴于周寿娃在1946年我军一部进入商洛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时，曾主动找我军联系，表示从此不与共产党作对，同时还派人参加该部（原新四军蓝洛支队），给游击队送吃送穿等情况，故于1949年6月初派人对其劝降，希望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争取新生。

事实上，周寿娃在与蓝洛支队建立联系后不久，又投向国民党，于当年11月开始疯狂残杀我游击队干部、战士。1946年11月下旬，我鄂豫皖军区部队（新四军五师）从大荆经过

时，周寿娃率部追击，于西荆太子寺捕获我军战士8名，将其中一位排长枪杀，其余7人解送商县，亦被国民党政府杀害。1946年，袁树虎（原属周寿娃部下，参加革命后不久被周寿娃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等人参加我军领导的游击队，经常活动在韩峪川大龙庙一线。同年七八月间，周寿娃秉承国民党商县县长杜得霖旨意，千方百计谋害袁树虎，指示部下王绍灵威逼袁的部下赵志杰将袁设法打死，否则，就要将赵一家杀绝。赵深知周寿娃心肠狠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犹豫数天后，趁袁不防，将袁树虎杀害，割其头奉献“周狼”。

1947年6月下旬，西荆群众牛秀儒，暗地联络大荆地区喻白娃、牛靠山、王德保、梅海娃、王孝忠、李时斌、王靠山、郭代娃等人于同年7月9日在西荆小蒜凹山地集合，打算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周寿娃闻知后，派手下干将李元治带头围剿。李元治带人包围小蒜凹后，由于敌众我寡，牛靠山等7人当场被捕（只有王德保持枪越房逃跑），当天送至大荆镇公所，严刑拷讯，午饭后即派周占熬等人将牛秀儒、喻白娃等三人枪杀了。牛靠山、王孝忠同时被拉去枪毙。王因开枪后仅划破头皮，趁势倒向洞下的庄稼地内，乘机逃跑。郭代娃等2人因和周寿娃有亲戚关系，所以当时没有被杀，暂交周金铭管押，后经托人说情，杨、郭二人卖房卖地，拿出50万元才了结了此事。

大荆地区解放后，周寿娃的残余势力继续在腰寺、大荆两岔河一带残害人民。仅1950年2月至4月，大荆、腰寺一带即发生抢劫案24起，地、县党政军领导，亲自参与布置对这一带的搜山剿匪工作。商洛公安处侦察科长韩彬，县公安局长

剿匪大纪实

杜景，带领工作队深入大荆山区，指导剿匪工作。荆寺区第四乡民兵在乡长王景正的带领下，紧密配合，查明了周匪及其余孽在当地一系列罪恶活动，首先抓获惩办了一批，将护送周寿娃去渭南的李有娃送交县公安局后，地、县公安部门火速派侦察员李平亚等人，由李有娃引路，先后在渭南油火川找到隐藏过周寿娃的李忙庄。然后，顺蔓摸瓜，于1950年6月28日，在郑州市有关部门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终于在翟玉山家将周寿娃逮捕归案。以后，经当地群众大会公审，周匪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后，商洛地区社会治安日见好转，一些仍不死心的匪徒也相继落网，受到惩处。

第32节 秦川鏖战，泾渭硝烟，川陕联防追穷寇，不让匪徒一人还。

陕南解放时，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及国民党在陕南的特务组织，窜至川陕边的大巴山，收罗胡宗南部溃逃官兵、惯匪及其他反动武装，共3万多人，编为新编第4、第5、第8军，“鄂陕边自卫总队”，“川陕边人民自卫军”等部，由王凌云自任总指挥，妄图继续与我军对抗。

1949年12月底，我19军55师的两个团，分别由四川万县和陕南的镇巴、紫阳、西乡地区出发，进剿镇巴和四川通江地区王凌云直接率领的3个“新编军”，经过10多天的连续作战，于1950年1月12日全歼该匪8000余人。“陕西保安第4旅”等3股土匪，慑于被歼，先后向我汉中军分区投降。1月14日至17日，解放军陕西省安康独立团和白河独立营，又全

歼了镇坪地区股匪“鄂陕边自卫总队”。其后，部队在当地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瓦解工作，又先后争取了其余20股计6000余名土匪投降。至2月底，基本上剿灭了陕南的大小股匪。

此阶段，实际上为我西北军区全面清剿股匪的第一阶段作战。而第二阶段则是由1950年8月至1952年底实施的。在这一阶段，西北地区漏网的中、小股土匪尚有212股，共计1万余人。他们趁我军大部分部队转入生产之际，利用已经隐蔽起来的地下组织乘机拉起队伍，在边沿山区进行武装暴乱。

为此，西北军区决定各剿匪部队分区对土匪实施联合清剿，各地驻军与地方政府组成“分区联防围剿指挥部”，按照西北军区的统一部署，于1950年8月，对省际、县际和大行政区之间的土匪，展开了联合清剿行动。

此后，陕西省政府、陕西军区与友邻地区组织了川陕鄂、川陕甘两个联合剿匪指挥部，并在省内靠近秦岭的关中各县，组织了剿匪委员会，经过联合清剿，陕北的高怀雄、张廷芝股匪被我榆林军分区歼灭，值此，陕西全省又歼灭残匪1086人。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武装，在四川、西康、贵州和云南各地，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暴乱及各种形式的骚扰破坏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存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平息匪患，解放军第3、4、5、18兵团和第1兵团的第7军，共13个军部、37个师另2个团的部队，从1950年开始，按照合围与驻剿、奔袭与穷追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至1953年止，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

第九章 蜀道难

第33节 战略迂回,刘邓南下,意欲“拼光”的敌5兵团最终投降,30万蒋军就歼于“成都战役”。

1949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二野进军并保卫西南的任务。5月23日,根据全国战局迅猛发展的形势,中央军委指示,二野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的一野协同下,准备进军西南,解放川、黔、康3省。7月16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二野主力应取道湘西、鄂西、黔北,迂回入川,其4兵团在协同四野完成广西作战任务后,西出昆明占领云南,与二野主力及一野一部,共约60万人,完成解放川、滇、黔、康诸省的任务。

当时,国民党军为了保存实力,竭力回避与我军进行决战。根据上述分析,中央军委对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曾多次作出指示。5月23日指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动态。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迁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准备,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针对白崇禧集团和西南国民党军逐步后撤、力避决战等情况,中央军委强调指出:进军华南、西南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插至敌后,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采取大

剿匪大纪实

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便于将节节后撤的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特别是便于将胡宗南集团歼灭在四川境内,不使其逃往国外,防患于未然。

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分析了西南战场的形势,决心先从鄂西、湘西进军川东、贵州,攻占贵阳、宜宾、泸州、重庆,切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逃向黔滇的退路,尔后视战局发展情况,进军川中、川西,会同由陕南、陇南南下入川的我一野部队,全歼胡宗南集团等退入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为实现上述战略决心,二野前委作出了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4兵团仍按军委指示,协同四野完成广东、广西作战任务,然后兜击云南,封锁边境,围歼滇境及由川、黔南逃之国民党军;3、5兵团于10月10日前隐蔽集结湖南常德、邵阳一线,尔后,5兵团16、17、18军并3兵团10军担任迂回任务,由湘潭、桃源、邵阳、武冈一带进军贵州,解放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攻占宜宾、纳溪、泸州一线,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协同3兵团主力作战;3兵团主力由湖北江陵、湖南常德一线西进,在川、湘、鄂边境地区会同四野部队,歼灭宋希濂集团,尔后占领川东黔江、彭水,进击江津、泸县。3、5兵团完成以上任务后,会同由陕南、陇南入川的一野18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等四川境内之全部国民党军。

实际上,早在当年7月中旬,二野前委即已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加强部队思想教育、物质保障、少数民族工作和部队团结会师等问题。7月18日,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据此,参战部队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针对西南的军事地理特点,各部队深入地组织开展山地战斗、河川战斗、水网稻田战斗的适应性训练,以提高

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为了支援解放西南,中央军委从华东地区的后备兵团和地方武装中抽调3万余人补充到二野,使每个兵团的兵力均达到10万余人。还从解放区抽调5000余名地方干部,动员近万名青年学生和职工组成西南服务团,随军开展工作。

10月23日,二野指挥机关率3兵团,由南京抵达郑州,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欢送大军西进。新华社为此还发表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准备进军四川的消息和刘伯承有关向四川进军的讲话,又一次制造了二野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声势。跟随二野指挥机关行动的3兵团,在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率领下,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

川、湘、鄂边界有群山层迭的巫山、武陵山和激流奔腾的长江三峡天险,构成川东的天然屏障。1949年10月,宋希濂将所属10万余人部署在巴东、野三关、五峰、乾城一线和建始、恩施、咸丰、黔江等地区,与长江以北设防的敌16兵团等部相配合,组成“四川湘鄂边防线”,企图依托有利地形,背靠四川,阻止解放军由此入川。

10月下旬,二野3、5兵团隐蔽集结湘西,四野前委为策应其主力进军广西,密切配合二野进行突入川黔的作战,于22日发出作战命令,以9个师的兵力,会同二野部队,在湘鄂西山区对宋希濂集团发起迅猛攻击。二野前委也于29日命令3兵团主力会同四野部队,共同围歼宋希濂集团,尔后迂回四川东南部,协同5兵团作战。

为打垮宋希濂集团,我军重兵出击,周密部署,四野50军和42军主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1、2师组成右路军,由湘北军区第

剿匪大纪实

一副司令员王宏坤指挥,以主力沿川鄂公路直插鄂西南的建始、恩施、宣恩地区,42军一部监视长江以北国民党军16兵团等部;二野2兵团11、12军和四野47军主力组成左路军,由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沿川湘公路和龙山、来凤一线,进击鄂西南咸丰和川东秀山、酉阳、黔江地区,截断宋希濂集团西退川、黔的通路。这次作战,以左右两路大军实施南北钳击,力求将宋希濂集团主力歼灭于湘西山区,迅速打开入川门户。

1949年11月1日,我军实施的川湘鄂边作战和黔东作战同时发起。在北起鄂西巴东,南至黔东天柱,宽约500公里的地域内,我军多路进军川黔,拉开了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西南国民党军、解放西南诸省的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11月3日,在川湘鄂边战场上,当我右路军向野三关敌守军发动攻击时,宋希濂以为解放军投入的兵力不大,自信其阵地不易被突破,遂严令当面20兵团的2个军凭借有利地形阻击。将3个军向龙山、来凤方向南调,企图攻击向永顺地区结集的我左路军。我右路军获悉这一情况后,乘机发起猛攻,击溃当面守军,迅速抢占野三关、建始和恩施,并乘胜向鄂西咸丰挺进。左路军则抓住宋希濂主力调动的间隙,配合右路军发起攻击。3兵团11军相继攻占湘西龙山、鄂西来凤,进逼咸丰,与右路军靠近;12军攻占湘西永绥(今花垣)、川东秀山,直指面阳,同我右路军顺利形成南北钳击的态势。

宋希濂见“川湘鄂边防线”已被我军一举突破,形势十分不妙,便于11月8日下令全线西撤,控制川东龚滩、彭水至白马一线,企图重新扼守入川咽喉,并组织部队依托乌江,构筑新的防

御战线,以阻止解放军西进。

为不让宋希濂集团有计划地撤退和有组织地抵抗,我左右两路大军于同一天开始全线快速追击。

右路军分成南北两路向川东追击。11月11日,右路主力50军在咸丰地区截住由五峰、鹤峰西撤的宋希濂部4个师,经过6天激战,歼国民党军79军副军长肖丙寅以下8500余人。20日,右路军一部进攻石柱,先后截击歼灭国民党军和地方部队各一部,并向涪陵前进,以阻击宋希濂部北撤和在长江以北布防的国民党军16兵团等部南下驰援。

此时,我左路军亦分成多路追击,进展神速。

3兵团12军于11日攻占酉阳后,一部指向彭水;主力直逼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其先头部队轻装前进,于14日抢先占领乌江东岸要地龚滩。接着,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渡过乌江,迎战在马头山布防的宋希濂部1个师,但因地形不利,兵力悬殊,进攻一时受挫,12军36师参谋长安仲琨牺牲。11军于12日进至黔江以东的唐岩河边,歼灭宋希濂部正在熟睡的122军1个师。至16日,我左路军相继解放黔江、彭水。宋希濂部撤至乌江西岸布防。20日,我12、11军主力分别在龚滩,彭水,白马等地渡过乌江,对在白马、江口一线布防的宋希濂部发起全线攻击,敌当面守军一部被歼,一部溃退。21日,我右路47军在涪陵以南的白涛渡口渡过乌江,截歼宋希濂部14兵团直属队及79军残部2000余人,俘获中将司令官钟彬。至此,宋希濂集团在乌江西岸临时部署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彻底摧垮了。宋希濂只得命令残部向南川、綦江方向撤退。

我军进军川黔作战中的第一仗,一举突破敌“川湘鄂边防

线”，基本歼灭了宋希濂集团 14 兵团，解放了湘鄂西及乌江以东大片地区，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

贵州是川、黔国民党军与湘、桂白崇禧集团的接合部。贵阳又是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公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蒋介石部署西南防务时曾认为，湘西、黔东地区山岳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且有白崇禧集团保障“大西南防线”的南翼安全，估计解放军由此进军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民党军在这个地区的防守比较薄弱。贵州境内何绍周指挥的 19 兵团 2 个军，主要正面防守在湘西南的晃县、黔东的天柱、黄平和贵阳及盘县一带，与位于湘西南的通道黔东锦屏、黎平的白崇禧集团之 17 兵团 2 个军遥相呼应，构成“黔东防线”，企图阻止我军由湘入黔。

5 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决心先突破“黔东防线”，打通大迂回的道路，再向纵深挺进，解放贵阳，粉碎白崇禧集团西撤黔、滇的企图，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堵住川、黔国民党军撤往云南的通道，尔后再迂回北上川南，实现中央军委制订的对西南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

5 兵团率 10 军于 11 月 1 日由邵阳、桃源地区出发，所属各军相继在黔东一带与敌展开激战。11 月 4 日，16 军于黔东天柱与黔境敌守军展开激战，击溃敌守军，占领天柱，乘胜西进。黔境国民党军遭到攻击后，被迫西撤，但指派小部队据险节节阻击，并破坏道路桥梁，以掩护主力撤退。17 军于 7 日拂晓在晃县南北一带，发起多路攻击，击溃国民党军，相继解放晃县、玉屏、岑巩，乘胜西追。16 军在连克黔东三稳、镇远后，于 8 日夜

间冒雨激战，攻占黔东险隘镇雄关，接着又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西进，相继解放了施秉、黄平。5兵团等部经过10天的快速追击，胜利突破了敌“黔东防线”，直插贵州首府贵阳。

敌19兵团司令官何绍周见“黔东防线”全线崩溃，决心放弃贵阳，命令所部急速向黔西、安顺、毕节方向撤退，准备组织新的防线，以阻挡解放军西进。

15日，刘伯承、邓小平获悉黔境敌守军这一企图后，遂命令5兵团加速前进，占领贵阳后，除主力北上外，留黔驻防部队应以主力速向安顺方向前进，迫何绍周部继续西撤，以巩固贵阳，掩护兵团主力北上。据此，杨勇、苏振华集合所属部队快速前进，跟踪追击。16军前卫团以强行军向西追击，于12日在湘黔、黔桂公路会合点甘把哨截获国民党军一批汽车，并侦悉有国民党军部队从都匀方向沿黔桂公路驶来。该团参谋长刘凤寺机智地带少数随员化装成国民党军，驱车南下，催促国民党军车队加速前进。驶至甘把哨时，埋伏在这里的我16军前卫团，将这支车队的100余辆汽车、1000余人全部截获。接着，该团乘车疾进，先头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开路，于13日奇袭贵定，14日在龙里击溃敌守军1个团，生俘国民党第49军副军长陈翠秋，并于当夜进抵贵阳。第二天，16军和5兵团兵团部及17军先后进驻贵阳。

18日，16军的先头部队直抵乌江上游鸭池河边。3兵团10军则于11月初先后解放铜仁、江口、石阡等地，15日解放思南城，21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再次截断川黔公路。17军一部于23日进至安顺、镇宁、普定一带，迫使何绍周部继续向普安、盘县地区西撤。至此，我军入黔部队，已拦腰斩断了国民党军的

“大西南防线”，顺利完成了刘伯承、邓小平 11 日命令所规定的作战任务。

兵贵神速，我军一举突入贵州，腰斩了敌之“大西南防线”，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整个防御部署。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由湘鄂川边和贵州直入川境后，急忙重新调整防务，其具体态势如下——

胡宗南集团立即放弃秦岭南撤，以保存实力；

抽调一军到重庆、江津一线布防，加强重庆地区防御；

命令宋希濂全部兵力全力扼守乌江；

调正向川西北开进加强陇南防务的 15 兵团主力速到綦江、南川一线布防，以便策应宋希濂集团撤退，迟滞我军西进，并令该兵团一部到黔北险隘娄山关布防，阻止我军继续北上；

令 16 兵团等部沿大竹、广安西移，加强川中防务。

蒋介石的企图是将川境国民党军向四川内地及滇、康退却，尽量保存实力。

根据西南战局发展形势，刘伯承、邓小平于 1949 年 11 月 11 日和 21 日分别致电 3、5 兵团，强调指出：当前战役重心是截断宋希濂集团和敌 15 兵团向云南的退路，力求在长江以南将其歼灭。从战役全局着眼，从贵州迂回川南的部队极为重要。5 兵团主力和 3 兵团 10 军应确实计算行程和时间，加速迂回北上，求得先敌占领叙永、筠连、盐津之线，并进占宜宾，一部可自遵义取捷径直出川南泸县，截断川境敌守军退滇道路。3 兵团主力在綦江、南川一带，正面牵制宋希濂集团及国民党军 15 兵团，待 5 兵团主力和第 10 军到达预定位置后，再向重庆外围运动，尔后协同 5 兵团西进作战。

据此，杨勇、苏振华决定，5兵团主力和第10军由贵阳、遵义分两路向川南快速迂回。

根据刘邓首长指示，3兵团第10军分两路向川南疾进。

其左路部队，于12月1日解放赤水，继而消灭沿长江抵抗的川境敌守军21军一部，3日晚进占泸县，4日攻占富顺；接着，以日行120公里的惊人速度追歼宋希濂部122军一部，6日解放荣县。右路部队于2日抵达合江后，即于隆昌追击，沿途歼灭川境国民党军15兵团44军大部，6日解放成渝线上的重镇内江，先头部队乘势于次日解放资中。至此，5兵团主力和10军，提前到达预定位置，控制了宜宾、泸州一带的川南要冲和水陆交通枢纽，使我军既可南下康、滇，又可东出黔、桂。占领这一地区，就完全控制了川滇公路和川南长江通道，截断了川境国民党军南逃云南的捷径，对实现中央军委解放西南的整个战役意图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5兵团主力和10军进击川南的同时，进入川东的我军正向南川和重庆方向迅猛追击。3兵团主力和47军，正把败逃的宋希濂集团和驰援的国民党军15兵团，分割包围于南川以北地区。经数日激战，至11月28日，歼灭宋希濂集团20兵团及15兵团的大部共30000余人，并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城市綦江、涪陵和江津，为解放重庆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西南战局比原先预料发展得快的新形势，二野前委立即改变了暂缓解放重庆的决心，命令前面的3个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加速前进，提前过江，解放重庆。47军即由涪陵北渡长江，迂回重庆。12军从重庆、江津之间渡江西进，直指璧山，向重庆侧后迂回。11军进抵与重庆相望的长江南岸。值此，我

剿匪大纪实

军各部队在粉碎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的抵抗后,于29日全面控制了东起木洞、西至江津的50余公里的江防重地,形成对重庆的包围态势。蒋介石深感形势不妙,于11月30日凌晨,带着从广州迁来不足50天的“国民政府”要员,匆忙乘飞机逃往成都。同一天下午,我11军横渡长江,解放了重庆市。重庆解放,使国民党割据西南的美梦彻底成为泡影。

重庆解放后,我军各部队随即乘胜西进,至12月7日,3兵团11、12军先后攻占璧山、铜梁、永川等地,并进至内江、遂宁一线,47军主力,50军、42军一部进占广安、邻水、垫江等地区。3、5兵团两大主力靠拢,形成直捣成都,聚歼胡宗南集团的牢固态势。

蒋介石眼见国民党军大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已极难得到挽救,故于12月7日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委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长官职,全权指挥川、康地区国民党军,而他本人则于12月10日乘飞机从成都逃往台湾。

这时,退集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32万余人。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康、滇方向突围和防止解放军割裂其部队,一面以主力5兵团坚守新津,并部署18兵团于新津、成都之间,加紧构筑工事,抵抗我军的进攻;一面将成都以北地区的7兵团南撤至德阳、三台地区,16兵团置于什邡、广汉地区,50、20兵团残部部署于彭县、广汉地区,向主力靠拢。当时,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官兵异常惊恐,一片混乱。12月21日,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曾揆元率该兵团在金堂起义,预示了川境国民党军彻底崩溃的到来。胡宗南为稳定军心,匆匆于22日在新津召开紧急军长会议,提出“偏师东

突,主力背进”的舍卒保车方案。由 15、20 兵团担任东突任务,于 24 日开始向重庆方向突出,吸引解放军二野主力回援,以保障胡宗南的大部队趁机向雅安、西昌一带突围。

就在胡宗南召开新津会议策划突围逃窜的前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发起成都战役的命令。命令指示:胡宗南退路已断,困兽犹斗,必作最后挣扎,而且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必须十分慎重,严防轻敌乱碰,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作战时仍用先打弱点,集中力量,割开敌军,一点一点吃的战法。特别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并决定由 5 兵团司令员杨勇和 3 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统一指挥两个兵团的所属部队。杨勇,杜义德遵照命令,立即调整部署,压缩包围圈,到 12 月 24 日,我 12、16、18、10、11 军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东南弧形线上接敌展开,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四面包围,胡宗南在 22 日的紧急军长会议上还表示要同他的部下“同舟共济,共赴危难”,可一夜之间,他竟自食其言,也像蒋介石一样,甩下他的部队,于 23 日爬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飞机,溜之大吉。胡宗南的逃跑,更增加了敌众多官兵的背离情绪。我军乘机紧缩包围圈,进行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前线各部队分别向国民党军指挥官发忠告、警告,号召他们迅速醒悟,勿失良机。前沿各分队,则利用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军士兵喊话、送信、散发传单,规劝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面前,被围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24 日,敌 15 兵团司令官罗广文、20 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其残部在彭县起义。25 日,7 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在德阳率部起义,退到成

都、双流一带的 18 兵团酝酿起义。惟独接替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第 5 兵团司令官李文仍执迷不悟，欲继续顽抗。李文为使自已免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赶忙改变胡宗南规定的突围计划，于 24 日黄昏，集中 7 个军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开始向雅安突围。其左路一个军沿新津河岸经蒲江、邛崃之间西突；右路以主力四个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西突；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方向佯攻，牵制该地我军，掩护主力突围。这一夜，敌突围部队处处遭到我军早有准备的勇猛阻击，损失惨重，不得不败阵收兵。

杨勇、杜义德针对李文率部夺路西逃的动向，立即调整部署，命令 12 军在邛崃固驿镇一线构筑工事，扼守阵地，堵击李文兵团西逃；16 军由蒲江地区向北推进至复兴场、寿安场一线，配合 12 军进行侧击；18 军 53 师急进至寿安场，配合以上两军作战；10 军占领新津后，以主力出新津西南，实施尾击；11 军在新津以东至简阳一带堵击可能南逃的国民党军。随后，刘伯承、邓小平又命令 18 兵团迅速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逃窜的国民党军，并准备进占成都。

李文突围受挫，恼羞成怒，25 日再次组织突围，并亲临督战，绝望地向属下叫喊“拼光亦光，不拼亦光”，胁迫官兵反复向邛崃、大邑一线的我 12 军阵地突击，其佯攻部队亦同时向邛崃进攻。我军战士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高呼着“不让一个国民党兵逃走”的口号，互相鼓励，英勇抗击，激战一天，12 军的阵地岿然不动，李文部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此时，我一野 18 兵团正在快速前进，62 军已直逼广汉，60 军也占领新津地区，61 军则抵达涪江东岸，堵歼可能向东北方

向溃逃的国民党军。四野 50 军也日夜兼程抵达简阳地区，并沿沱江一线展开，堵击可能东突的国民党军。在北线、东线步步紧缩对成都地区包围圈的同时，西线、南线之我 3、5 兵团主力，于 26 日凌晨对被困于新津地区的李文兵团发起全线进攻，将其割裂成小块，使其相互间失去联系，节节败退。战至黄昏，逃到邛崃西南的李文兵团已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12 月 27 日，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率 5 万余人向我军投降。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 18 兵团司令官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成都城内的宪兵部队等也相继起义。至此，成都战役胜利结束。胡宗南集团和退缩成都地区的其他国民党军共 30 余万人，除少数溃散后潜往西昌地区外，大部起义投诚，余部被歼，从而使蒋介石妄图背靠康滇，盘踞川西、负隅顽抗的计划彻底破产。

第 34 节 岷江两岸、交通干线，我军以“集中对集中”，6 个师对付川东匪乱，7 个师清剿川西悍匪。

1949 年 12 月成都战役结束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仍抱有一丝丝东山再起的幻想，垂死挣扎中，国民党军大量溃兵与土匪及反动帮会组织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血腥的暴乱活动。

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围攻。璧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

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

剿匪大纪实

掐断；蓉雅、川湘两路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的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

1950年2月3日，正在成都附近石板滩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接到军区通知，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

为了确保朱向璃主任在返回成都途中的安全，179师536团政委让曾获得过战斗英雄称号的赵副排长带领一个加强班担任护送任务。

这时，隐藏在龙潭寺的匪首巫杰，正指挥手下沿途埋伏，企图袭击路经此地的解放军战士。

上午10时许，朱向璃一行来到龙潭寺后一条小河的小石桥旁。桥侧路边的碉堡，突然射出一阵密集的枪弹，一名战士肩膀被击中。以后，又有两名战士被土匪杀害。随着如潮水一般的呐喊声，桥对面的小丘后面，出现了一群举着各种武器、嚎叫着涌来的乱糟糟的人群。枪声，鸟铳声，喊杀声，顿时乱成了一片。

密集的枪弹，压得朱向璃他们抬不起头来，向前冲，过不了那座小石桥，从其他地方绕过去，也难以冲出密集的匪群。

赵副排长充分认识到形势的危急，更清楚自己所肩负的保护朱向璃主任安全的重任，决定集中火力，打开一条通路，掩护朱向璃主任强行从小石桥上突围出去。随着一声令下，全班四支卡宾枪，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以及其他所有的长短火力，一齐向桥对面的小丘射去。

朱向璃把全班分成两组，自己指挥一组，另一组由赵副排长指挥，互相掩护，向桥头接近。可是，不管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无法接近那座小石桥，怎么也无法突围出来。战斗进行到下午三时左右，已有九名同志光荣牺牲，两名战士重伤，朱向璃主任也三处负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子弹也几乎打光了。

除卫生员脱掉军衣，顺河坎边的竹林乘乱突出重围外，朱向璃主任和另外六名战士，全被土匪抓了起来，五花大绑，押到小石桥附近的一个水塘边。匪首巫杰猖狂地叫嚣：“老子是‘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司令巫杰，站在你们四周的这些人，就是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我们是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进行反共自卫，保卫家乡。请问，你们这些北方佬，为什么不在你们自己的家乡，而要跑到我们四川来？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你们今天是自己送上门的。我们今几个就是要拿你们这几个解放军祭刀，为我们川西人民驱除灾难！”

收到突出重围的卫生员的报告，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部果断决定，派川西军区参谋长邓仕俊，火速赶往龙潭寺，为被土匪重重包围、情况万分危急的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全体警卫人员解围。

邓仕俊带着540团及一个警卫连救援部队，当晚7时从成都出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急行军，晚上8时半左右到达距龙潭寺十几里远的一个山坡上时，远远看到龙潭寺漫山遍野的火把，隐隐约约听到鼎沸的人声和各种嘈杂的枪声。

邓参谋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一个侦察排，由司令部

剿匪大纪实

侦察参谋带领，到前面侦察情况，力争抓几个“舌头”回来。

深夜 12 点多钟，参谋及所带领的侦察排，没有一个人回来。邓仕俊又让一个副连长，再带一个排去侦察情况，与侦察参谋接上联系。

副连长走了大约半小时左右，前面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后，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同样没有任何消息，龙潭寺四周数十里范围内，依然是漫山遍野的火把，依然是一片鼎沸的人声和杂乱的枪声。

眼看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天快大亮了，邓仕俊急得直打转。朱向璃主任及全体护送人员已经被围困在里面整整一天一夜了，此刻他们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坚持战斗？

情急之中，邓仕俊和 540 团团团长尚坛商量，决定率二营强行向前推进，力争尽快找到朱向璃及被围困的同志，判明情况，再里外一起动手，彻底救出被土匪围困的同志。

尚坛带领二营强行向火把与人的海洋里冲，直逼土匪重重围困的龙潭寺。

不久，邓仕俊参谋长从步话机里听到了尚团长的报告：“我二营二连刚刚到达龙潭寺北侧一里多地的一道不高的土梁子跟前时，陷入弹雨之中，竹林、田埂、房舍里都有人向我们射击。全营已牺牲了二十多个同志。我们现在已无法前进。因为我们分不清哪个是敌人，哪个是群众，而兵团又命令不能伤害群众，这个仗太难打了！”

邓仕俊命令炮连轰击土梁子，早已准备好的六零炮顷刻间吐出一颗颗炮弹，在土梁子上面炸响了。

这时，天已经亮了。邓仕俊带着全部救援部队往龙潭寺外

围压了过去。

匪徒开始崩溃了。四周层层叠叠的火把和涌动的人头，全都像潮水一般地散去了。等邓仕俊带着部队抵近龙潭寺时，只见除了第一次派出的那两个排几个战士的尸体外，土包上、田埂边到处都是被我方炮弹和枪弹击中的暴徒。

在龙潭寺北侧那座小桥头，部队找到了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和十多名警卫人员当初被土匪围困的地点。可是，除了一堆堆弹壳，几滩殷红的血迹外，什么也没有。

9天后，他们才弄清楚，早在邓仕俊带着救援部队赶往龙潭寺的那天傍晚，朱向璃主任和6名被俘的警卫人员就被土匪杀害了。他们和先前牺牲的战士的尸体被肢解后，埋在小桥前麦地的一个泥塘里面。

朱向璃主任和17名护送人员，有的被挖去了眼睛，割去了舌头，有的被剖开了腹腔，砍去了手脚，有的身体被分成了几段。朱向璃主任身负24处枪伤，皮肤全被暴徒用开水浇烫破坏。

策划这次惨案的土匪巫杰，系国民党旧军人出身，曾在孙连仲部下当过一段时间的旅长，因和他的顶头上司、军部的一个参座争夺一个女伶，发生冲突被贬，巫杰一气之下，带了几个心腹到军部去暗杀那个参座。暗杀未遂，他连夜从国民党军队出逃，回到了老家龙潭寺。

巫的父亲刘于元，是龙潭寺有名的大恶霸，家中有大片田地，镇上有赌馆和茶铺。解放军占领成都以后，巫杰趁我党在农村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利用其在龙潭寺一带的势力，以龙潭寺为中心，勾结附近22个乡、寨的流匪，网罗了国民党的溃

剿匪大纪实

散部队，试图顽抗。

巫杰惨杀了我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警卫班战士后，知道解放军绝不会饶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占据龙潭寺，以龙潭寺为据点，公开打出“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的旗号。

来自周围各乡各村以惯匪、国民党溃兵为骨干的土匪武装，此时趁机放风，“巫杰司令把解放军大官都开膛剖肚了，解放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不要害怕，既然干了，就跟着巫司令干到底！”于是，许多不明真象、弄不清形势的普通群众，或被裹胁、或盲目跟随，一起汇聚到了巫杰的旗帜下。

龙潭寺匪特暴乱发生的第二天，即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同志对剿匪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的中心任务，必须贯彻中央“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剿匪步骤上，要求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之匪，然后推展至边沿贫瘠山区，特别要迅速净化四川股匪。

为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3月15日，西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强调在兵力部署上，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将部队布置在适当地区，切忌无重点地平分兵力，以致力量处处单薄。要求西南剿匪部队在坚持面上打击的同时，采取“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按照“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

两侧地区，后其他地区；先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对付较小的股匪”的原则，集中主力部队有重点地展开进剿和围剿。

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指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级人民革命政权就不能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无法进行。”

根据西南地区匪情的严重性，西南军还指示所属部队，推迟进军西藏的战略行动，全面进剿土匪。

我军在四川的剿匪作战具体部署为——

川东地区由第11军、第12军的6个师负责，由第3兵团统一指挥作战。

川南地区由我10军、18军的各3个师及15军的2个师负责，由10军牵头指挥作战。

川东军区（3兵团兼）自1950年4月开始集中兵力在川东地区剿匪，到7月底，共歼匪9.5万余人。当年9月，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指挥11军31师并汇合川黔边区的涪陵、酉阳、遵义、铜仁等地的军分区部队二十个营兵力，对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等五个县的土匪进行围剿。战斗中，击毙“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总指挥史肇周及部下467人，俘获“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代总司令陈全、国民党67军副军长陈长捷以下5452人，2.2万余名土匪投降。其后我军又以十个营

剿匪大纪实

的兵力搜剿印江、思南、江口、松桃、铜仁 5 个县境内的土匪，经过 11 天的追击，歼灭“西南剿共总指挥部”总指挥周其光以下土匪 4113 人。

截止 1950 年底，川东军区所属部队共歼匪 19.3 万余人。

川南军区（10 军兼）自 1950 年 3 月开始集中兵力剿匪，至 7 月底，全军区共歼匪 14 万余人。并于 9 月初又与 15 军 3 个师及毕节、昭通、泸州、宜宾、乐山、西昌 6 个军分区部队，由 15 军军长秦基伟统一指挥，对流窜于川康滇边区的 2 万余名股匪实行会剿，经我军连续不断的打击，到 1950 年底，川南地区共歼匪 29.3 万余人。

川西军区于 1950 年 3 月 18 日部署 185 师 554 团协同绵阳军区，对起义后又发动暴乱的原国民党 402 师实施围剿，在成都附近的什邡县歼灭其 1340 人。到 7 月底，川西地区共歼匪 5 万余人。8 月后，我 179 师、54 师、186 师并雅安、康定、阿坝、温江等 4 个军分区部队，对上述地区进行了会剿，歼匪 2.6 万余人。到当年年底，川西军区共歼匪 8.3 万余人。

川北军区于 1950 年 5 月要求所属部队“分片包干”剿灭匪患。我 181 师 541 团在一个月时间内即歼匪 6236 人，超过了上级要求包干数的 4 倍。

川西地区土匪虽然人数众多，但多系受欺骗、受裹胁的未觉悟群众。土匪的战斗力的相当有限，在我大军进剿时，匪众迅速化整为零，纷纷逃回原乡村，隐匿枪支，伪装成农民。

少数匪首则带着随从躲进深山。解放军开始分片驻剿，收缴民间枪支，发动群众，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同时，对各大匪首加紧搜捕。川西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是解放军的搜捕部队，匪

首相继落网。

1950年1月在龙潭寺发动暴乱的匪首巫杰，首先遭到镇压。他逃进山中潜伏一段时间后，于4月份又拉起人马发动龙潭寺附近的二十二个乡暴乱，又受到解放军的有力镇压。随后，他于5月中旬第三次发动武装暴乱，同样以失败而告终。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落入解放军搜捕队的罗网。

1950年6月，巫杰在龙潭寺被枪决。7月下旬，剑阁、达县两军分区配合陕南军区部队对流窜于川陕边区的土匪实施会剿，灭匪4000余人。到年底，川北地区共歼匪8万余人。

西康军区所属部队1950年共歼匪1.5万余人。

第35节 “避实就虚”，窜往山区，各股土匪化整为零与我周旋，我军掀起“捉匪首运动”

1950年底，四川境内的残匪，活动地区主要在省县结合部山区，这些残匪极其狡诈，活动分散隐蔽，有些人甚至还混入我区乡基层政权组织和农会等群众团体，他们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农业生产和社会治安，并不断策动反动分子参与暴乱。

在土匪的这些叛乱活动中，尤以川西懋功县的三次争夺战具有代表性。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使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

剿匪大纪实

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原先的潜伏武装也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

此时，蒋介石最看好的根据地是“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大本营就设在懋功县。

四川懋功县，1953年更名为小金县。

这里地处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四面被4000米以上的雪山环抱，冬季常常大雪封山，交通阻绝。北起懋功境内小金川的夹金山，绵延懋功、康定、泸定、宝兴、天全等五县，最高峰5338米。

成都解放前，蒋介石就看好懋功，授给匪首周迅宇“中将游击司令”军衔，许诺“戡乱复国”后让周当“四川省主席”，还通过电报委任了懋功当地的40多名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为“少将”，此外还给他们调拨了大批武器弹药及与台湾方面保持联络的电台等。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大批国民党要员及散兵游勇先后逃到懋功，其中原国民党“少将”级军官就有20多人。较大的匪首有：国民党军统特务、“反共联盟军”总司令刘野樵，国民党第十六战区专员何本初，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部下134师少将师长李福熙，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少将教育长兼“游击骨干训练班”主任王旭夫，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少将政治部主任兼《阵中日报》主编周勉之等，加上当地女匪首杨孙永贞等人，可谓群魔荟萃。而他们属下的土匪，少说也有万余人。12月底，懋功、靖化等地首次被土匪占据。

1950年1月中旬，西南军区曾指示驻川、康的25个师迅速分遣各地，开始全而剿匪。首先集中兵力肃清交通干线两侧

富庶地区匪患，确保交通顺畅，再向边远地区发展。因为忙于川西平原和腹部地区的剿匪，一时无力顾及偏远的懋功，这里的土匪迅速泛滥成灾，土匪人数到1950年5月底。实际已发展到30000余人。

周迅宇逃到懋功后，土匪更加猖獗。他们通过电台频频与台湾联系，在懋功各地自立法规，自收捐税，封锁交通，恢复原国民党县、区、乡、保等各级组织，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叫嚣“共产党五年也休想夺回懋功”。

周迅宇毕业于黄埔四期，是军统创始人之一，又是在上海策划、参与杀害著名进步人士杨杏佛的凶手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统成都站少将稽查处长，是成都地区军统的总头目。成都解放前夕，周迅宇一手制造了成都大屠杀，企图炸毁成都未遂。

成都解放后，周迅宇先后在郫县、崇宁、三汇口等地组织土匪暴乱，失败后，带了30多名心腹和新人伙的伪专员何本初等，逃到懋功县木坡。

周迅宇密谋分三路发动叛乱，由周迅宇负责懋功、汶川、宝兴三县；何本初负责松潘、理县、茂县；傅秉勋负责大金、丹巴两县。

1950年7月2日，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发来电报任命周迅宇为匪“川康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

这时，经过一系列重点围剿，四川腹心地区基本净化，我军开始抽调部队进剿懋功土匪。

8月，川西军区决定，彻底解决懋功极其猖獗的匪患，重新解放懋功。

剿匪大纪实

川西军区兵分三路，从灌县、杂谷垭和西康省的丹巴出发，向懋功、靖化进攻。179师师长吴仁宏率领一个加强营，茂县军分区副司令员门国梁和分区政治部主任姚晓程带分区部队四个连，西康军区康定分区侦察科席科长带558团一部，共三个营两个连的兵力，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开进。

9月19日，我军进入懋功县城，却几乎未见一匪，未发一枪。昔日沸沸扬扬的数万土匪，转眼间全都不见了踪影，留下了一座空城。

重新解放懋功不几天，懋功县委派往沃日等地的工作组，先后惨遭土匪杀害，数十名工作队员在各地连一个回来报信的都没有剩下。

紧接着，近万名土匪，在刘野樵和女匪首杨孙永贞（藏名阿斯曼）等人的指挥下，突然从四面将懋功县城重重地包围了起来。

此时，懋功县城仅留下茂县军分区门国梁副司令员所率的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担负坚守，200名左右干部战士要对付来势如此凶猛的万余土匪的进攻，显然势单力薄而且，整个县城既无据守的城墙，又无牢固的工事。

男匪首刘野樵、女匪首杨孙永贞都是极凶残的亡命之徒。当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重庆各界人士为了庆祝《双十协定》的签订，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到会场捣乱，并当众殴打郭沫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为首的就是特务头子刘野樵！重庆解放前夕，他逃往成都，被蒋介石、毛人凤封为川康游击根据地“副总指挥”。

成都解放后，刘野樵与惯匪罗厚义率人懋功，自封“反共联盟军”总司令，并亲手刻了一枚大印，到处封官许愿，与周迅宇争地、争功。

经过近三天的顽强坚守，部队伤亡过半，而土匪，不仅占领了县城后面的唯一的制高点高家山，而且，城北和城东都已经有数千土匪冲进了城内，眼看县城已无守住希望，门国梁副司令员最后不得不带着仅剩的一百余人趁着黑夜，从城里突围。

人民解放军被迫第二次放弃了懋功城。土匪第二次重新占领懋功县城的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即向全世界发布：“数月来，总体游击战争已取得卓著成果。今天，我‘三边绥靖反共司令部’刘野樵、杨孙永贞部再次收复了懋功县城……。”

9月20日，川西军区党委决定，再次派军区副参谋长温先星偕同川西军区555团，由西康省宝兴县翻越夹金山，直捣懋功。

当温先星、罗志敏所率部队向懋功进发的同时，川西军区电令突围后退守懋功以西丹巴县境内的门国梁部整理部队，回马懋功予以配合。

温先星、罗志敏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后，经美诺沟，直插懋功城下，与门国梁所率的部队以及临时配属的康定军分区558团，于1951年1月29日再一次解放了懋功县城。这时的懋功县情形与前两次几乎完全一样，沿途及到达懋功城下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懋功城内，也仍然是没有遇到一个土匪，城内居民及店铺也全都紧闭。

剿匪大纪实

其实，这是又一场更加血腥的争夺战正在策划之中。这一次，主谋又是杨孙永贞。

杨孙永贞是土司斯道尔顿·王谦（汉名杨春圃）的老婆，又是国民党懋功县长的义女。

她参加军统后，1949年夏秋之际，又到成都参加了蒋介石培训匪首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介石还指使王陵基以“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发给她步枪一百支、子弹三十箱。成都解放前夕，她潜回懋功。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以为正是“复国”的最佳机会，于是代行其夫“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少将司令职权，她选择离县城27公里的达维乡作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一天，解放军驻达维镇一个排的战士和几名工作组成员正围坐在火炉旁学习文件时，突然闯进来一名汉人，气喘吁吁地说：“解放军啊，我卖烟的钱被土匪抢走了。”

排长何玉清忙问：“在什么地方？”

那人指了指西面，说：“火草坪，离这里不远，顶多两里路。”

“土匪有多少人？”

“没几个人。”

小李等三名工作组成员随那“汉人”去了半天，不见回来。排长和工作组长觉得不对劲，于是派一个班前去接应。

这个班一出达维镇就遭到了匪徒的伏击。全班战士没来得及拉开枪栓便纷纷倒在雪地上。

杨孙永贞等匪就是踏着这般红的鲜血杀进了达维。

解放军仓促应战，由于寡不敌众，全排战士除排长何玉清

受伤被俘外，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杨永贞下令将何玉清绑在栓马柱上。一名土匪用尖刀挑开他的脑门，灌进酥油，然后塞进一根细松木作灯芯。何玉清痛昏过去，又被用冰雪擦脖子弄醒。

“点天灯！”杨孙永贞残忍地下令。

土匪点燃松木，何玉清痛得惨叫，杨孙永贞却在狞笑。

与驻达维镇的解放军电讯中断三天后，罗志敏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建议派一个连前往侦察。

这个连出懋功不久又失去了音讯。

部队正准备增援达维时，有几个商人来报：“达维附近战况非常激烈，杨孙永贞的人马不下七八千人。”

温、罗、门立即决定大部队撤出懋功县城，倾师东进，火速增援达维，在城内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

部队到达维附近时，天近黄昏，突然间号角四起，五六千土匪从雪地里钻了出来，顿时枪声大作。

天很快就黑下来，温、门二首长决定就地固守。

这时，杨永贞率领多股匪徒，星夜奔袭懋功县城，凭人多势众的优势和城内的反动基础，又夺回了县城，并“任命”张绍成为县长，同时派人去迎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懋功时逃到绰斯甲森林的周迅宇回懋功。

刘野樵听说懋功又被杨孙永贞占领，立即赶到县城。

周迅宇一听说刘野樵已先期窜入，怒不可遏，大骂“癞皮狗”，决定派傅秉勋、周勉之、邓戈夫三人代表自己回懋功，一则指挥“反共游击战”，二则驱赶刘野樵，并加派两个营的兵力，驰援懋功县城。而他自己，却远远躲在被土匪夺回的靖

剿匪大纪实

化城观变。

懋功县城的第三次失守，惊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自过问西南的剿匪工作，要求“为干净剿灭西南地区残存匪众而奋斗”。

根据四川土匪猖獗的情况，西南军区于1951年1月发出剿匪指示，强调必须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

为此，西南军区要求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充实地方武装的领导，加强对仓库和交通线的守护，维护城市治安，并注意防止和镇压土匪的各种骚乱和破坏活动，以保证土改、镇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1951年2月初，川西军区调集十三个连对懋功匪乱予以进剿，3月中旬又增加二个营参战。至4月中旬，平息了这一地区的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副总司令刘野樵以下土匪3000多人。接着，川西军区在全区加强各级剿匪组织和剿匪武装的建设，提出“肃清匪特，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清匪立功运动。

1951年2月15日，毛泽东在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相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新的剿匪指示，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的经验。此后，西南各地普遍组织了各级清匪

委员会和清匪小组，在情况复杂的县区接合部，还成立了清匪联防指挥所。此外，主力部队及县区武装普遍组织了便衣捕捉队，发起“捉匪首运动”，不分地域地追捕匪特。仅川西军区就组织了186支捕捉队。川南军区内江军分区的侦捕小组，翻越二郎山，往返2000多公里，在康定、犍为捕获土匪纵队司令李明清等7人。西昌的彝族群众将西昌、德昌匪首姚质彬、邹永禄和匪团长姚膺松捉住，送交解放军。此外，西南军区还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结合减租减息、土改和整顿人民武装等中心工作，领导民兵清匪。1951年，川康两省共歼灭“川东北游击第十纵队”司令黄天祥以下土匪7.77万余人。云贵地区共歼灭匪特13万多人。被土匪盘踞一年多的贵州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座县城也全部收复。

1952年和1953年，西南地区剿匪部队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又在川西北进行了两次会剿股匪战斗。这两次战斗，由西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和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负责指挥。一次是1952年7月，调集九个团（欠两个营）和两个山炮营、三个无坐力炮连，共2.1万多人，发起黑水战斗。历时一个月，歼灭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得到台湾空投接济的傅秉勋匪部3000多人，仅有少数匪首漏网。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四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南北夹击盘踞在川西北草地的股匪，将其聚歼。

在对土匪实施军事进剿时，西南地方政府组织的民族工作团随军跟进。每到一地，民族工作团即召集头人和土司开会，揭露匪特谣言，宣传剿匪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对某些有窝匪助匪行为的头人，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与土匪

剿匪大纪实

划清界限。黑水头人苏永和、草地土司华尔功臣烈，在剿匪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两面应付的态度，交出所庇护的重要匪首周迅予、何本初等人。四川凉山地区的大小头人也主动交出所藏匿的匪特 40 多人。至此，流窜于西南边沿地区的股匪基本上被歼灭。

经过 1951 年至 1953 年的清匪斗争，川康云贵 4 省共歼灭残匪 24 万多人，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第 36 节 川康草地，“游击走廊”，敌特组织股匪妄图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解放初期，位于当时西康省南部的西昌地区处于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政权在成都战役遭受毁灭性一击后，蒋介石仍将西昌视为一根挽救危局的救命稻草，绝不轻易放弃西昌，他亲自委任其亲信贺国光为西昌警备司令，同时令已逃至海南岛的胡宗南于 1949 年 12 月 28 日重返西昌，重新打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牌子，要胡宗南部队务必：

- 一、固守西昌 3 个月，等待国际事变；
- 二、收拢溃散部队，保卫西南大陆。

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对西昌的重视，还派蒋经国和参谋总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一道飞往西昌督战。

胡宗南接受此项使命后，为了表示“效忠”，一到西昌，即着手制订出了一个所谓“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的计划，收编了溃散的国民党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 1.2 万余人，妄图把西昌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

胡宗南在西昌的军事部署，意味着国民党军在大陆还有最后一个据点，其政治影响无疑大于其军事存在。为此，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以解放军第14、15、62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区纵队一部，共13个团的兵力，立即实施西昌战役。

我军对西昌之敌采取南北夹击，誓必拔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

北线——以62军一部由川西经富林（今汉源）、冕宁南下；

南线——由滇东北、滇北分左右两路进军，右路以15军一部由巧家北上，左路以14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禄丰、宾川北上。

1950年3月12日，我62军一部由温江地区向西昌开进，23日攻克富林（汉源），歼灭国民党第3军残部一部，随后渡过大渡河，追击拼命南逃的敌残兵。62军指战员连续作战的，越雪山、穿原始森林，于26日逼近越西、冕宁地区。

南线的我15军一部也已由云南曲靖向西北猛插，于3月19日渡过金沙江，23日解放会理、宁南两县，歼灭国民党军守备部队及其第2军、第27军、124军残部各一部，26日进至西昌城外围地区，与北线我62军一部形成对西昌强有力的夹击之势。

解放军兵临城下，西昌城内顿时乱作一团。大小官员各自携带家小细软设法逃窜。胡宗南此时亦将“保卫西南大陆”的重任丢在脑后，命令参谋长罗列严守城防，而自己则与警备司令贺国光坐上事先准备好的飞机，直飞台湾逃命。

剿匪大纪实

罗列眼见曾信誓旦旦表示欲在川康与共军打游击周旋到底的胡宗南都只管逃命，那还有心思“与城共存亡”，胡宗南前脚一走，他便慌忙率部弃城开溜。

罗列实际上早在解放军向西昌挺进之时，就曾考虑过必要时西逃的计划，即经木里窜往西康藏区，并由此逃出国境……

罗列率部于26日夜间出逃后，27日晨我15军便抢占了西昌机场，全歼警卫机场的敌军，缴获飞机3架，封锁了机场。此际，我62军一部也迅速解放了冕宁、越西、切断了罗列西逃之路。

罗列后悔自己为何26日不动用一架飞机逃台？在解放军多路追击部队的夹缝中求生能捱多久？

他一路骂着，这个时候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烂摊子全部担在自己肩上，机关不像机关，部队不像部队，行动迟缓，看来是在劫难逃了。虽然罗列心里这么想着，但他得知先期逃出西昌城的一些军政官员正向小相岭彝族聚居区逃窜时，认为这倒不失为一条生计，于是放弃西逃藏区的计划，改向彝区行动。

3月30日，罗列部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机关人员共6000余人在越西以南的喜德甘相营一带被我南北两路大军包围，经连日逐山清剿，至4月5日，除少数人员逃跑外，被歼5800余人。

3月20日，我14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云南禄丰、宾川等地出发，至4月1日，解放川境内的盐边、盐源县城。逃至会理一带的国民党军第124军和第2军残部共2000余人，则乘我军北上之际，南渡金沙江，企图向滇西逃窜。我14军

一部当即回师追击，经连续 8 昼夜，翻越横断山脉 11 座高峰，行程 300 余公里的艰苦行军，于 4 月 10 日下午将逃窜的敌 124 军和 2 军残部歼灭于宾川之平川街地区。13 日，又将另一股国民党军残部包围在邓川之姜营街，迫使其投降，俘敌军长以下 1600 余人。

3 月 27 日，我 62 军一部由雅安西进，翻越二郎山、大雪山，渡过大渡河，相继解放泸定、康定，聚集在该两地的国民党军 127 军残部大部被歼，少数逃散。

西昌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残部 1 万余人，解放了西昌地区及巧家、华坪、康定、泸定等 18 座县城。

第十章 怒江涛

第37节 兜击云南，一路横扫，陈赓率四兵团组织滇南战役，下令全军“敌逃必追，追必到底”。

广州解放前夕，中央军委分析国民党广州守军的逃跑方向：一是沿西江西逃广西，二是沿珠江南逃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不论其西逃或南逃，都对我军以后的作战不利。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2日给林彪和叶剑英、陈赓、邓华、赖传珠的《关于向广州进兵以断敌后路的指示》中指出：如国民党军守广州或解放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歼灭其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其西逃之路，不使广州守军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国民党军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守军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17日，毛泽东又电示林彪和叶剑英、陈赓：广州国民党军的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四兵团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以歼灭逃跑的国民党军

剿匪大纪实

一部或大部,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国民党残军,平定全粤;二则是对于入桂作战提供机会。

中央军委的意图在于力求把余汉谋集团的主力歼灭于粤境,减少尔后作战的困难。

当15兵团进入广州市区时,四兵团的先头部队也进抵广州西郊。陈赓当时判断,国民党军由于船只不够,肯定不会从珠江口逃跑;他们逃跑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越过佛山、开平,沿海边经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另一条是经三水、高要,逃向广西。因此,陈赓命令四兵团所有部队一律不进广州,立即马不停蹄地向西南追歼逃军。

从广州逃出的国民党军,除63、109军等沿西江向粤桂边境逃窜外,其余的21兵团、13兵团残部、39军均向阳春、阳江方向撤退。17日凌晨,陈赓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由14军军长李成芳统一指挥14、15、13军中的6个师,兼程向阳江追击,包围敌逃军;并命令13军主力向茂名(今高州)前进。为了争取时间,李成芳根据各部队当时的态势,决定以42师(欠124团)及40师120团为右路,由三水经高要向新兴、阳春方向追击;以41师(欠123团)及40师118团为中路,由西南经高明直插阳江;以43、44师为左路,由佛山经鹤山向恩平追击;以38师为预备队,随右路跟进。

四兵团从江西出发,连续行军作战二十多天,广州解放后又急速追歼逃军,部队相当疲劳。但是,当传达毛泽东关于乘胜追歼逃军的指示后,指战员们士气高昂,以惊人的顽强精神快速前进。陈赓指示各部队,对退逃的国民党军,应以精干部队大胆地高速度地实施平行追击和超越追击,从两翼前出,切断其退路,

协同尾后追击的部队达成合围。只要抓住敌逃军,就能取得胜利。根据这个指示,李成芳在14军解放清远、歼灭国民党23军一部后,即令40师连夜乘船南下,直插三水。40师以118团为先头部队,置北江两岸的国民党军于不顾,利用暗夜,奇兵突进,一夜前进80公里。15日拂晓,该团在黄塘村附近上岸后,立即向三水疾进,迅速占领了该城,当晚又占领了高要,从而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从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创造了围歼国民党逃军的有利条件。

为了追上100公里以外的国民党逃军,四兵团各部队昼夜兼程,有的部队边追边吃干粮,有的部队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但指战员们不顾艰辛,追击作战连续取得胜利。16日,在三水西南镇附近追上掩护主力撤退的国民党39军103师,迫使该师长曾三元、副师长陈一匡率领官兵4000余人投诚。当日,在四会击溃国民党13兵团部,俘5000余人。17日,在高明县松柏坑歼灭国民党39军147师441团全部,俘团长以下1000余人;当日晚,在高要东北地区歼灭国民党70军警卫营全部,俘300余人;在鹤山县宅梧圩,迫使国民党39军91师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率领2700余人投诚。20日,在云浮东南的腰鼓圩歼灭国民党广东省暂编第三纵队,俘纵队司令叶超以下1000余人;当日,在新兴东南地区歼国民党63军一部,俘1000余人。

20日晚9时,国民党逃军拥滞于开平、恩平地区,逃兵距我四兵团中路和左路部队均不远。陈赓急令各部队不顾一切疲劳,向阳江前进,将国民党军围歼于阳江、阳春一带。21日,陈赓命令到达新兴的右路部队,必须排除万难,直出阳春,尔后折向阳江,对国民党军形成包围,协同中路、左路部队将其聚歼。

剿匪大纪实

当日晚,中路部队进至恩平东北的圣堂圩,左路部队进至开平,均与国民党逃军的后卫部队接触。22日,陈赓命令各部队,坚决歼灭逃抵阳江、阳春地区的国民党军。他在命令中特别指出,右路部队的行动迅速与否至关重要,到达阳春后应继续猛进,取捷径直出阳江的程村圩占领阵地,堵住国民党军的西逃之路。当日,右路部队解放阳春县城后,一部即乘船顺漠阳江向阳江疾进。

被解放军昼夜追击的国民党逃军,有从江西中部被赶过来的,有从粤北败退下来的,一路上被打得丢盔弃甲,无力抵抗,相继投诚。仅10月间,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起义、投诚的就有45起,其中属于师级的有8起。22日,国民党保安三师2000余人,在恩平县城东南郊投诚。同日,国民党军广东省暂编第二纵队3000余人,在江门投诚。23日,解放军43师127团3营副营长、战斗英雄刘子林,带领前卫连进至台山县那扶镇附近,从抓获的国民党军哨兵的口供中,得知守镇的国民党保安四师师长的住址和晚上的口令。当晚,他带领两名干部和12名战士,由抓获的国民党军哨兵带路,连闯几道关卡,巧妙地摸进敌师长关中岳的住房,没费一枪一弹就迫使他命令全师2700余人投诚。

右路部队23日晚追至阳江西北15公里外的双捷圩时,得知国民党21兵团等部当夜宿于白沙圩地区,准备在24日早晨沿阳江至电白的公路西逃,指挥员当即命令125团和120团连夜飞兵前进,断其逃路。125团不顾连续追击的疲劳,向白沙灯以西的江电公路北侧疾进,占领了有利地形。120团在白沙圩以北的公路上与国民党军遭遇,俘其180余人,缴获汽车6辆。

该团一部即换乘汽车,快速插至海岸边的旱禾庙。这样,右路部队便全部控制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陆上道路。与此同时,左路部队从恩平向阳江疾进;中路部队由合山圩向阳江压缩;38师亦进至阳春以北地区。至此,解放军经过七昼夜连续追击,终于完成了对逃至阳江地区的国民党军的三面包围。

国民党军发现被包围后,立即渡过漠阳江,企图从西面突围,沿江电公路向雷州半岛逃跑。已进至江电公路东段的解放军43师125团,堵住了国民党军的退路。24日拂晓,125团尖兵连,越过江电公路,发现国民党军正以数路行军纵队,从白沙灯向公路涌来,其先头连已接近公路边猫头岭的50高地。该连2排迅速抢占50高地,掩护3营主力展开,以猛烈火力将国民党军打下去。9连和7连从左、右两翼加入战斗,国民党军慌忙后撤。125团乘胜追击,将国民党军压至白沙圩以西约2公里的佛子岭一带,形成对峙态势。当时,解放军主力部队尚未赶到,125团要阻击数万名企图突围西逃的国民党军,这确实是一场恶战。125团指挥员命令各营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组织防御。9时许,国民党军以一至两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125团2、3营阵地猛攻。2、3营指战员待国民党军进至二三十米距离时,一齐猛烈开火。7连动员刚俘虏过来的6名重机枪手向国民党军扫射;9连集中几十枚手榴弹向国民党军掷去;4连的子弹打完了,就从国民党军的尸体上搜取子弹和手榴弹,继续进行战斗。当天,125团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6次进攻。至16时,国民党军因多次突围未成而暂停进攻。125团指战员利用战斗空隙,调整编组,补充弹药。黄昏时刻,国民党军又发动猛烈进攻。沿公路防守的4连因伤亡过大,一段阵地被突破。

剿匪大纪实

紧急关头,3营营长石占标命令7连由侧翼向突入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7连指导员程钱垒身先士卒,身负重伤后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战士们将突入的国民党军一部歼灭,收复了4连的阵地。至24日晚,被阻击和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退缩到白沙圩至平冈圩之间东西约5公里、南北约3公里的狭小地域内。

25日,国民党军向西多次突围不成,转而向南移动,企图沿海滨向西逃跑,但逃路已为解放军所控制。解放军120团在由旱禾庙至平冈圩的追击途中,歼灭国民党39军通信营及50军36师一部,俘700余人。当39军残部600余人逃至平冈圩以西海岸边的石牌村时,被120团4连追上。军长程鹏及副军长慌忙乘小船逃跑,其余全部被俘。接着,120团进至上园头、南山岭地区,歼灭国民党50军直属队一部,俘500余人,占领了南山岭高地,切断了国民党军由平冈圩至南海边九羌埠的逃路。

在我右路部队抗击国民党军向西突围的同时,中路部队从阳江向南压缩;左路部队一部占领海岸边的北津港,主力于阳江西南的渡头地区强渡漠阳江,向平冈圩以南推进;38师进至白沙圩加入战斗,该师112团沿岗头、廉村直插九羌埠。这时,南面的解放军已把道路封死,国民党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26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十多支突击部队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国民党军阵地冲击。国民党军丧魂落魄,纷纷举手投降。

阳江围歼战,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生俘3万余人。27日,四野给四兵团发了嘉奖电:“庆祝你们全部歼灭由广州向西南逃窜之敌主力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崖和解放广西均有重大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精神,特予表扬!”

阳江围歼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解放军进抵阳江前后,粤中纵队和阳江地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各区、乡、镇成立支前站。人民群众在漠阳江抢架浮桥,准备船只,派出船工和向导,还为解放军筹集 610 万斤大米和大量副食品,250 万斤木柴,24 万斤马草。阳江县县长姚立尹亲任担架大队大队长,带领 2000 多名民工,跟随部队抢救和运送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作战。

在阳江围歼战期间,国民党胡璉兵团被迫撤出潮安、汕头地区,乘船从海上逃往金门、台湾。10 月 24 日汕头市解放。15 军 45 师在粤中纵队配合下,于 10 月 22 日解放江门市。25 日,江门以南海上的国民党第四巡防联合舰队 11 艘舰艇 500 余人,宣布起义。

四兵团在阳江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后,立即以 13 军向粤桂边地区挺进。至 11 月 4 日,相继解放云浮、罗定、信宜、茂名(今高州)、化县(今化州)、廉江等县,封闭了广西白崇禧集团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逃跑的道路。

广东战役从 10 月 2 日开始至 11 月 4 日结束,历时 34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 6.2 万余人,其中生俘 4.2 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 17 人,解放了除钦州、合浦地区(今属广西)和雷州半岛以外的广东大陆。人民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 1700 余人。广东战役的胜利,是继衡宝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这时,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省,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蒋介石极为恼怒,晋升先期逃到云南曲靖地区的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乘解放军尚未入滇之际,指挥驻防霞益

剿匪大纪实

(今沾益)、开远地区李弥的第8军、余程万的26军进攻昆明。

卢汉的起义部队同当地的工人、农民、学生一起,在桂滇黔边区纵队的配合下,展开英勇的昆明保卫战。在此紧急时刻,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在贵州境内的五兵团17军一部火速驰援昆明。该部昼夜兼程入滇,相继解放蔗益、曲靖、陆良等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8军一部。汤尧部遭到打击后,于12月下旬南撤至滇南的开远、建水、蒙自一带。该地区在国境线附近,又有铁路、公路及空中航线通往国外。国民党当局设想:如能控制这一地区,既有支持作战的潜力,可与共军进行周旋,又可随时从陆上逃往国外,或由蒙自机场空运台湾。1950年1月初,蒋介石把汤尧、李弥、余程万召到台湾,密谋策划建立滇南“反共基地”,并将26军空运台湾整训,将8军与拟新建的9军编成八兵团,由汤尧任兵团司令官,坐镇滇南指挥。

1949年12月11日,我四兵团提早入滇,策应卢汉,解放云南。25日,驻广西百色地区的四野38军主力归四兵团指挥,赶赴滇南。27日,38军奉命从百色向滇南挺进。

28日,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在南宁就实施滇南战役作出具体部署:以38军两个师为南路,由百色出发,经富宁、文山,直插马关、河口、金平地区,封锁中越边境,断汤尧集团逃往国外的陆上通道。以13军为中路,由南宁经百色、富宁、砚山,直插开远、蒙自,并抢占蒙自机场,断汤尧集团空中撤退通路;北路17军一部在平奕(今富源)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另以桂滇黔边区纵队主力一部配合卢汉起义部队坚守昆明,另一部配合野战军各路部队作战;兵团部机关和14、15军分两路经贵阳、盘县方向及百色、陆良方向,进军昆明。

1950年1月1日,四兵团主力由南宁出发,以每日75—100公里的急行军,迅速赶到汤尧的前面。1月11日,提早入滇的38军主力进占南溪和边防重镇河口,15日占领河口西北的曼耗渡口,摧毁了国民党军架设的浮桥。16日,攻占屏边。至此,蒙自以南的交通线和重要关口完全由解放军控制,封锁了中越边境。13军37师于15日晚逼近蒙自,包围了蒙自机场。突击部队营长安玉峰率300名勇士首先发起冲击,打散了守卫机场的国民党军。经六小时激战,于16日凌晨占领机场,截住准备运往台湾的26军,但李弥、余程万已先期逃跑。13军主力乘胜进击,至17日相继攻占蒙自、个旧,歼灭国民党军26军大部,并与38军主力会师于蒙自以南地区。

解放军在河口、蒙自一带的突然出现,堵死了汤尧集团陆上和空中的逃路。汤尧于极度恐慌中率部分路向建水方向溃逃。陈赓判断,汤尧虽有4个师,但已成惊弓之鸟,军心涣散,无心恋战,其主要企图是迅速通过元江,取道思茅,逃往缅甸。元江水流湍急,不能徒涉,惟一通道是元江城北的铁索桥,占领该桥是断其逃路的关键,于是决定,解放军分三路迂回追击:中路13军前卫部队留一部控制蒙自机场,以主力沿建水、石屏方向急进元江,抢占铁索桥,断汤尧进路,力争将其歼灭于元江以东地区;左路38军一部控制河口、金屏之线,主力沿元江西进,迂回汤尧集团左侧;右路桂滇后边区纵队一部配合卢汉部分起义部队,经峨出向墨江前进,堵击可能西逃之汤尧部。

38军主力于18、19日,将由蒙自南逃的26军残部歼灭于元江流域的蛮板、宜得地区。13军前卫部队于20日攻占建水、石屏,迫使国民党军第8军副军长田仲达率一部投降,继而急趋元

剿匪大纪实

江城。22日拂晓,13军前卫团在元江城东的营盘山附近追上汤尧的第8军后卫部队。此时,已逼近铁索桥的国民党军因昼夜逃命,疲惫不堪,正原地休息,不少人已朦胧入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火攻击,势必逼其大部过桥逃跑;如果绕道迂回,又耽误时间,团长顾永武当机立断,命令2营副营长秦三须,利用拂晓前的短暂黑暗,带领一个连伪装成国民党军,机警地穿过人群,快步插至对方前头,控制营盘山制高点,向正在休息的汤尧部展开猛攻,将国民党军截为两段。侥幸逃过元江铁索桥的部分国民党军,不顾他们的汤司令尚未过桥,竟炸桥毁道,以防解放军追击。汤尧见逃路无望,乃举残部沿元江东岸南逃。解放军多路迂回追击汤尧残部。24日下午,汤尧率其兵团部、8军军部进到元江城东红土坡、二塘山一带,两次组织抢修铁索桥未逞,却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25日,13军追击部队在桂滇黔边区纵队挺进支队和卢汉部分起义部队配合下,向被围困的汤尧残部发起四面进攻,连续战斗5个小时,打退汤尧组织的8次反扑。最后,全歼被围的敌八兵团部和8军残部,俘汤尧及兵团副司令官兼8军军长曹天戈。这场围歼战打得十分艰苦,解放军因连日作战,供应不继,日食一餐,且以马肉充饥,但指战员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创造了一个班歼敌800人的范例。汤尧,这位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任陆军副总司令,当了俘虏后说:“贵军来得太快了,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13军遵照陈赓关于“敌逃必追,追必到底”的指示,从追击部队中抽调2个营组成轻装分队,在桂滇黔边区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于28日开始,分两路追歼6天前逃过元江的国民党军170师等部。右路于2月4日将170师包围于镇沅县

的黄草岭和勐统地区,迫使师长孙进贤率 2400 余人投诚。左路由思茅南下,渡澜沧江,以日行 75~90 公里的速度急进,于 17 日将国民党军 1000 余人歼灭于南峪(今属勐遮),仅少数残余逃出国境,19 日解放边镇打洛。至此,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20 日,陈赓率四兵团机关进驻昆明。14 军、15 军亦于 2 月中旬先后进驻滇西和滇西北地区,云南全省遂告解放。

滇南战役,人民解放军连续征战 50 余天,追击前进 1800 余公里,越过无数山峦荒野,通过人迹罕至的瘴疠地区,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歼灭了以汤尧为首的国民党军 2.7 万余人,解放了滇南、滇西广大地区。

第 38 节 2 军 7 师,“分片包干”夺回被匪攻占的 10 余座县城。滇越边境,强盗遇上打劫的,国民党第 26 军财物落入匪手。

陈赓兵团于 1950 年 2 月进驻昆明后,即开始部署剿匪。4 兵团先后以 2 个军部、7 个师暂时转为地方武装,并分别兼滇南、滇西等军分区的领导机关。

当时,我军一部主力仍在滇南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对土匪武装打击不力。1950 年 4 月,土匪趁机而起,煽动群众抗粮抗税,勾结恶霸地主和散兵游勇,抢劫群众财物,杀害干部,袭击区乡政府,甚至攻占了新平、易门、牟定等县城。至 5 月中旬,云南的土匪发展到 4.5 万多人。面对严峻情况,云南军区作出决定:各剿匪部队自 5 月中旬起,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赴各地区清剿大股土匪。驻滇南的 13 军的 9 个团、驻滇东北的 15 军 43 师和

剿匪大纪实

驻滇西的 14 军 42 师等部队,先后对盘踞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的股匪展开围剿。至 9 月底,歼灭杨永寿等主要股匪 8000 多人。随后,剿匪部队将锋芒转向边沿地区。10 月,云南军区由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副司令员郭天民等组成剿匪委员会,指挥边沿地区的剿匪作战,并组织腹心地区的剿匪部队,大力清剿残散股匪,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部;发动群众,捕捉匪首。至 1950 年底,全省共歼匪 6.2 万多人,收复了一度被土匪占领的新平、镇雄、威信等 10 多座县城,残存的 1.3 万余名土匪,绝大部分逃窜至省、县结合部及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

在滇南地区,面对少数民族约占 70%,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封建势力也比较强大,且又与越南、老挝接壤,国境线漫长的情况,国民党军李弥残部趁我解放滇南不久,县、区、乡人民政权尚示建立起来,利用某些群众对我征粮政策不了解,凭着滇南山大、林密,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民族杂居,出入国境方便等条件,与当地地方恶霸反动势力相勾结,以抗粮抗税为名,组织了几百股、1 万余人的土匪武装暴动,在滇南各地烧、杀、抢掠,破坏交通,围攻县城,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保卫国防,1950 年 5 月初,滇南卫戍区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拟定了三个阶段的剿匪方案:第一阶段剿灭最反动最猖狂的股匪,第二阶段打击小股和分散之匪,第三阶段结合反霸清查暗藏之匪。同时要求匪变我变,灵活机动,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并针对匪情,明确了任务,划分了区域,组织了北、西、东南三个机动进剿集团。我 114 团(缺三营)与 39 师 115 团为西集团,负责剿灭建

水、石屏、龙武、曲溪、个旧之匪特，112团（缺2营）、113团及文山分区独立1团1营为东南集团，负责剿灭马关、河口、屏边、金平间之匪特。北集团由玉溪分区、军直、39师部队组成，负责剿灭玉溪地区之匪。会后，部队立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和战斗动员。

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我军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的方针，运用多路合围，长途奔袭和穷追猛打的战术。4月初，我114团、一、二营进入龙武剿匪，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政策，团结了各族人民，争取受骗之匪回家生产，然后对大黑山土匪采取分割合击、袭击、包围清剿等战术，狠狠地打击了顽匪。同时，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农会，组训民兵。进入金平、元阳、河口等县的剿匪部队，积极发动群众，组建联防。参加联防者近2万余人，配合部队站岗、放哨，搜捕隐藏的散匪，维持社会治安，成为部队剿匪的有力助手。对要组织暴动，妄图袭击我俘虏团的通海县城匪特，我114团及时赶到后，与当地驻军密切配合，将全城包围，实行户口清查，搜缴武器，捕捉坏人，保证了我俘虏团的安全。5月15日，我114团在华宁以北的灯龙山，包围了飞自平、林同其、张成堂等股匪，经半小时战斗，全歼该匪，毙敌24人，俘敌73人，缴获各种枪58枝。我军无一伤亡。5月下旬，特务李康和恶霸金绍云、金绍禹在江川浪广镇一带组织土匪暴动，我114团即对该敌进行围歼。28日，在沈家桥、白龙潭及大小龙潭进行合围，经过一场激战，歼敌200余人。29日该团4连勇猛追击歼匪，在小松山附近战斗6小时，后在3连1、2排，团警卫排，炮兵排和机炮排增援下，经过顽强战斗，将匪全歼，生擒自称“滇中剿总”的匪代总指挥金绍禹，毙伤匪总副

剿匪大纪实

指挥金绍宽以下 416 人。5 月 28 日,国民党起义部队暂编 34 团,在反动团长王耀云的操纵、欺骗下,于江川县浪广镇以北地区叛变,杀害我军代表 20 余人,然后向西逃窜,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大批区、乡干部和群众被其杀害。我 114 团奉命追歼该敌。为了追上和歼灭叛逃之敌,全团轻装前进,取捷径,经峨山、新平,由戈沙渡江,直插冬瓜岭,截住逃敌。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匪 150 余人,缴获八二炮、六 0 炮各 3 门,轻重机枪 6 挺,长短枪 700 余枝,骡马 60 匹。余匪逃往山林,后被友邻部队全歼。

对分散在金平、元阳、红河、建水、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之匪,由 112 团、114 团实行进剿。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各部队抓紧时间,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积极宣传我党各项政策,开展了为群众做好事的活 动,如看病、理发、砍柴、挑水、喂猪等,解除了群众思想顾虑,建立了军民鱼水情。广大群众主动积极地向我报告匪情,并带路消灭匪特。如一贯拦路抢劫,危害人民,群众恨之人骨的惯匪马有兴,一天天黑时,到他姐姐家搞饭吃,他姐姐立即向我报告,并带领我军立即赶去,将村子包围,马有兴被我击毙,为民除了一害。建水县民兵主动为我军带路,打击土匪普万有,由于路熟,行动隐蔽,迅速将普匪包围,击毙普匪,全歼该敌。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土匪大队长肖文英、朱家富率领 190 余人,轻机枪 1 挺、步枪 180 余枝,子弹 2000 余发,向我缴械投诚。11 月,114 团一营进入建水县岔科剿匪,股匪以险洞藏身,洞前有堵石墙,枪击不着,弹投不进,不易接近。股匪凭此顽抗,我军接近沿口的 2 名战士牺牲。战斗英雄、模范共青团员雷长富同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主动请战,抱起炸药包,机智勇

敢地通过 20 米开阔地,接近洞口,先向洞内投了两颗手榴弹后,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线,投入洞内。一声巨响后,石墙倒塌了,雷长富同志亦被震昏倒。当他醒来时,听到部队的冲杀声,高兴地说:“敌人快完蛋了。”当他发现两位同志抬着他时,他说:“不要管我,消灭土匪要紧。”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甩开担架,继续投入战斗。在雷长富同志的英雄气概鼓舞下,全营奋勇杀敌,终于将该匪全部歼灭。岔科地区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经过一二阶段的剿匪作战后,土匪残部及漏网匪徒妄图化整为零,垂死挣扎。我军除对腹心地区的散匪继续清剿外,对边沿一带的土匪,采取了“以分散对分散”的方法,进行围剿。在政治上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在军事上以班、排为单位,组织小型捕捉队,结合反霸、减租退押等任务,充分发动群众,组织联防自卫,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检举和搜捕隐藏之匪特,以求净化内地,巩固边疆。1951年3月下旬,我114团3营围剿红河县瓦渣、甲寅地区钱振祥、刘智敏等顽匪,先后激战39次,歼匪250余人,争取自新土匪607人。经过剿匪工作,红河的各族人民政权逐步恢复建立,生产逐步发展,群众生活、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

4月中旬,114团1、2营及113团2营配合友邻部队,发起了对盘踞在西萨西村的余启佑、刘范吾匪部的会剿。114团1、2营为北路,113团2营与文山军分区基干团为南路,116团为中路。该处位于滇、桂、黔三省交界处,交通不便,山大林密,是匪特余、刘盘据的老巢。余启佑逃往该区后,与吴中坚、刘范吾、陈尔福等匪会合,达3000余人,自称“滇、桂、黔边军政长官公署”,又称“14兵团”。他们同封建势力相勾结,威胁群众,征粮派款,

剿匪大纪实

训练匪干,建立反动政权。将该地当作反革命基地,幻想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13日,我各路进剿部队,分别由黄泥岗,兔街、那林出发,16日,113团2营协同文山基干团,在合围中歼灭敌滇、桂、黔副司令谭莫宁以下60余人。这时,余启佑匪部1800余人,窜至广南境内,妄图经董干逃向越南,113团2营与文山基干团直插田蓬、董干地区进行堵截,114团1、2营会同中路116团,对该敌进行尾击。25日,在董干歼匪一部。后来113团2营及114团1、2营与文山基干团迅速追到麻栗坡,在民兵及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铁厂村附近将余匪紧紧包围,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歼敌指挥官蒋中固以下800余人。余匪600余人逃到西畴普弄,又遭我尾歼200余人。余匪继续逃窜,113团2营两个排跟踪追击,最后,除余匪只身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我歼灭。至此,滇、桂、黔边会剿胜利结束。

在滇越边境的剿匪作战中,悍匪赵小安的落网及被严惩,为当地人民除了大患。

1950年1月下旬,我军解放蒙自后,国民党军第26军残部由个旧逃往滇越边境。在这股溃军中,有一支由几十匹马组成的驮队夹杂其中,一般人眼里,部队行军,自然拥有运输驮队,就连该军残部的普通士兵,也不知马匹上的大木箱中究竟装了什么东西。

然而,这支驮队却被一双贼眼盯上了。

他就是盘踞个旧地区长达10年的悍匪赵小安。

这天,当国民党第26军残部的这支溃军来到滇越边境附近的一条山林小路中时,突然一排密集的枪声响起,早已被解放军追歼得丧魂落魄的国民党军士兵,一听枪响,立即四散狂奔,一

哄而散，保命要紧，谁还顾得上那几十匹马背上驮的东西。

赵小安双手提着驳壳枪，率领百余匪众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掠走了国民党第26军在云南搜刮的大批财物。

“大哥，解放军来了——”赵小安正兴高采烈地嘱咐手下人拉马卸货，不料一名匪兵慌慌张张的前来报告道。

“好快呀！”赵小安暗自吃了一惊，忙命令：“把东西运到雀山去！”

雀山是赵小安的匪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匪众们自然不甘心到嘴的肥肉又飞了，纷纷上前吆喝赶马，将驮队拉往雀山。

赵小安担心此举被解放军察觉，认为一走了之不如主动登门，兴许可以蒙混过关。

“白老么。”他叫那名报信的匪兵近前，对他面授机宜道：“你去对解放军说，欢迎大军进山，告诉他们，我们是以前的地方红军，是自家人，现在正打国民党哩，千万别搞误会了。”

那名匪兵领命后飞身上马，一路朝江边挥鞭而去。

尽管赵小安主动派人与我军接头，我军却早已从当地群众口中得悉了其长期冒充红军及烧杀抢掠等一系列暴行，岂能轻信其自我吹嘘？

赵小安的“红军”来历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1948年初，赵小安在蒙自等地匪势日众，不仅抢劫普通百姓，而且残杀当地民团武装头目，搅得几县乡坤不断上告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国民党云南省主席的卢江，命令当时驻防蒙自的保安第2团团团长张仲强负责处理此事。

张仲强对付赵小安也没有什么新招，他作了两手准备：一是

招安,二是围剿。

为防不测,招安前,张仲强强调一个营作后盾外,又从个旧调地方自卫队的一部协助行动。

然而,这位曾随60军开赴华北抗日战场的滇军团长,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全然没有将赵小安这类草民出身的“山大王”放在眼里,这一去,竟会遭致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

张仲强大咧咧地带着一个排的护兵由蒙自坐着英国人修建的窄轨铁路小火车,一路晃荡而来。

按照出发前的部署,驻扎在蛮板地方的保安团的一个营在张仲强出发前已经启程,该部与团长的会合点定在逢春岭,同时,个旧自卫队的一个分队人马亦由蛮铁过江,在蚌翼地方待命。

应该说,张仲强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官,排兵布阵还是很有一套的。此番出动的兵力,也不算少,但他吃亏就在于轻敌,轻敌对一个军事指挥官来说,是致命的大害。

张仲强与手下一营人马在逢春岭会合后,随即将部队在赵小安活动的雀山、翼娘一带摆开,以示威慑。然后前往新城安排自己的指挥部,并开始与当地土司龙健乾商议招安赵匪一事。决定由龙做中间人,负责安排双方会晤谈判之事。

赵小安见到官府派来的牵线人,态度非常随便。“既然土司大驾光临,我就走一趟。”

龙健乾没有想到赵小安会这般干脆,于是随即返回,将张仲强与赵小安的会面地点——新城后山一处洼地落实妥当。

次日,双方见面。

“龙先生把我们的条件都对你说了吧?”张仲强带着一排护

兵，威风凛凛的打量着其貌不扬的对手。

“张团长远道劳师而来，赵某岂能硬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我是识时务之人，只要张团长不为难我们弟兄，一切条件好说！”赵小安爽快的抱拳答道。

赵小安人虽不高大威猛，却机敏过人。其父早年从四川到猛丁营盘街经商，因识文断字又在衙门里当上了师爷，因此，赵小安可以说是在商人兼师爷父亲的调教下，变得能说会道的。1940年，赵小安开始吃粮当兵，给家乡和邻乡乡长当背枪护兵，两年后又到滇军21师陇耀团当差，从事贩卖烟土、粮食及各种货物，从中捞了不少好处，亦懂得了行伍打仗之事。1945年秋，滇军人越受降日军，赵小安不愿随军出征，经上下打通关节，谋得金平县新安乡乡长之职。新安盛产鸦片，为丁争夺税收，赵小安的乡长位置不久又被人行贿由新来的县长撤掉，于是他心怀不满拖人带枪离开乡公所窜入越南境内，直到1947年才返回。

张仲强见赵小安并未与自己过不去，于是说：“既然你愿意招安，那就选个吉日把枪交丁，我们也好丁一桩差事。”

“行，就交50条枪吧。”赵小安表态道。

“就这样说定了。”张仲强说罢，打着哈哈领着人打道回府了。

岂料，一连过了多日，限期早已过去，仍然不见赵小安派人前来交枪。张仲强不由恼怒万分，叫龙健乾前往催缴，赵小安这才叫人拿出一些已经破旧不堪的枪支敷衍。

张仲强一见这些枪，拍案大骂：“好个赵小安，竟敢戏耍老子，来人——”他叫了传令兵：“命令队伍集合，立即包围雀山！”

一营兵马出发了。

剿匪大纪实

当日下午,队伍来到一处叫“观音座”的地方。崖下沿江有一条极其狭窄弯曲的通道,只能容一人行走,张仲强到此,只好命令全营拉成一线,自己也下了轿子步行。可是,正当全营人马全部进入这条悬崖峭壁下的小路时,突然崖上泼下密集弹雨。原来,赵小安佯装逃走,却候在这险要之地打起了官兵的伏击。

保安团陷入了绝境。全营人马像似立在半山岩壁上的靶子,头顶上面弹雨纷飞,而江对岸的密林中又排枪齐放,一时间,中弹倒地或跌下江中的保安团士兵竟如“下饺子”一般。

张仲强拔出双枪,左右乱射,嘴里还大骂赵小安祖宗八代,抵抗片刻,他见手下非死即僵,一些士兵还在江中哀嚎挣扎,自知不好,忙跳下河滩,朝上游方向狂奔,直到找到一处水流不急的地方游过了江。

赵小安大败保安团后,当即派人四处打扫战场,收缴了大量枪枝弹药。这时,有手下来报,说江边一间茅草房中有人,可能是保安团长张仲强。

“走,去看看——”赵小安听说围住了张仲强,心中不由大喜,忙带领一帮人赶了过去。

张仲强一路上早已打光了枪里的子弹,逃跑中又不识路,因此成了瓮中之鳖。

“把他拖出来!”赵小安喝道。

几名手下进入茅屋,把狼狈不堪的张仲强架了出来。

“张团长,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废话少说。老子让你给耍了,怪我太小看你,要杀要剐,痛快些!”

“那好,我今天就成全你——”赵小安冷笑一声,抬手一枪,

将张中强打倒在地，接着又上前补了几枪。

“大哥，尸首怎么办？”手下有人问。

“扔在这儿喂狗。”赵小安吹吹枪口，转身而去。

张仲强命丧“观音崖”，损失了一营兵马，令卢汉大为震怒，连毛贼山匪都不把自己的保安团放在眼里，今后还有何颜面见人？

于是，卢汉出动大军，四处围剿赵小安。保安团名义上是剿匪，但这些地方武装的行径也与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凡与赵小安匪帮有牵连之人，均须“罚款赎罪”，抗拒不交或交不起的，被捆被打，掠走家中粮食或牛马，一些人甚至不经审讯便被枪杀……

赵小安部连遭打击，被抓获者，均被砍头报功。赵小安仗着心细胆大，侥幸漏网，但其父亲和妻子却被抓到蒙自关押。

赵小安逃脱后，只好逃到偏远山区藏匿，以后又拉起一支小队伍后，才窜回老窝。他深知受害群众痛恨土司及保安团的心理，于是打出“打倒土司”的旗号，不断扩充队伍。1949年，当地组织起一支反蒋的“人民自卫军”到处联络人马，赵小安见有机可乘，表示愿意接收改编，被任命为独立团团团长。由于这支队伍反蒋，赵小安便自称是“红军”，利用群众渴望解放的心理，迅速将队伍扩充到了1000余人。

这便是赵小安“红军”的来历。

然而，尽管赵小安主动派人与解放军接洽，但他的这一套惯用的鬼把戏还是被我军识破了。

他刚将那批从国民党26军残部处抢掠来的财物运到雀山，解放军便将其团团包围了，令其交出武器及赃物。

赵小安明白此时来硬的不行，连忙表示遵命。

我军根据“缴枪不杀”的原则，决定对其给予宽大，并准备将这支队伍拉至盘溪地区进行改编。

队伍到了盘溪后，根本不愿走悔过自新之路的赵小安，却利用我军不备，连夜只身潜逃。在他心里，仍打算窜出国境蛰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可惜，他的黄粱美梦只作了一半，便在逃跑途中被我军战士抓获。

1950年底，赵小安被押解到个旧市，经法院审判，这个为害人民长达10年之久的匪首，被判处了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第39节 台岛下令，李弥挂帅，逃缅“国军”发动两次“大反攻”，云南军区打响围剿残匪战斗。

1950年1月滇南战役中被我四兵团基本歼灭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下属的两个团的残部侥幸逃脱后，惶惶逃入缅甸境内。

他们长期盘踞缅北，利用中国军队不能出境作战，而缅甸政府又对其无力清剿等条件，不断对大陆境内进行武装窜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台湾当局认为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临了。因此，将窜犯大陆的视线转移到西南边陲，决定利用逃缅的国民党军残部充当配合力量。

奉台湾军事当局之命，国民党原第8军军长李弥到缅北整顿残部，并打出旗号“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

“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成立后，李弥被封为“总指挥”，直属台湾“国防部”领导。

李弥走马上任后,为了突出战绩,不断指派这支逃缅国民党军残部对云南边境实施武装袭扰,搜集情报,策反破坏。

1951年夏季,正是大陆军民全力进行抗美援朝之际,边境地区以剿匪和土地改革为中心展开工作。逃缅国民党军残部利用边境地区一时尚未能全面展开边防工作之机,对云南西南边境地区实施了中等规模的大举武装窜犯,妄图攻占云南澜沧、沧源、西盟等县建立“反共根据地”,待站稳脚跟之后,再迈出“反攻大陆的第一步”——攻占耿马、孟撒机场以及缅宁、双江等县。

为此,云南军区先后两次集中优势兵力,对入境的逃缅国民党残军进行大围剿。

1951年5月初,李弥受台湾“国防部”之命,亲自指挥盘踞缅北地区的国民党军10000余人向云南西南的边境地区集结。云南军区在获悉李弥部的动向后,以7个团的优势兵力,迅速开赴到指定位置,待机围剿。不久,李弥果然派出6000余人兵分四路开始突入境内。

这四路兵马,一路从云南西盟县缅境内的允恩越境,一路从孟连县腊福,一路从勐海县打洛以北,一路从镇康县南伞附近等地先后越境。

这批国民党的“正规军”多由老兵组成,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越境后,分别占领了耿马、孟连、勐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

1951年6月3日,云南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布了歼灭越境武装窜犯的国民党军的作战命令。

命令要求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灵活战术,在国民党军进入到国境内一定深度时断其后路,并以优势兵力对其进行围剿、追剿和清剿,首先歼灭其中危害最大者,而后再集中兵力全歼其他

窜扰敌军。

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主要是出于中国军队不能出国作战，如不将窜扰的李弥部队放到一定纵深地带，就很难形成有效合围。

6月上旬，云南军区12军39师117团的一个营兵力奉命向腊福方向出击，14军41师121团一部分兵力向耿马县青塘出击，意在封锁窜扰敌军越境的入口，切断其后路。

6月下旬，14军120、121、123团和13军115、117团以及公安第二团，思茅军分区基干二团，分别奉命进剿窜入耿马、西盟、沧源、孟连、勐海等县的李弥部队。

14军121团一路急行军赶到甘塘时，尖兵于6月20日发现窜入境内的李弥第八军的先头部队，为了不失战机，未待其有所动作，便毫不犹豫地展开了战斗，交手仅10分钟，便抓获国民党士兵10余人，而另外的敌兵则窜入密林，四散逃命。

这时，赶到甘塘的123团3营马上插入密林，跟踪追击，终于在国境线附近将敌包围，经过短暂时间的战斗，共击毙敌兵6人，击伤14人，俘虏1人。

6月27日，121团2营经耿马县勐定街插至沧源西北国境线附近的班洪，又与偷越国境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一名国民党军团参谋长被我军战士生擒。

6月28日，连续追歼国民党军的14军121团干部战士，又以一个出其不意的快速迂回，在边境附近的党坝地区截阻南逃的国民党军第8军残部，30分钟内即击毙其团参谋长及下属20余人，抓获2人，缴获机枪2挺，其它枪枝12枝。

这次追歼战中，执行作战任务的几支部队共歼敌549人，敌

26军残余部队800人见反攻无望,只得窜入孟连以北地区的苍莽原始老林之中,准备长期坚持“打游击”。其余各路窜犯敌人,于6月底纷纷逃往境外。

半个月后,被击溃的国民党军经过短期整顿及重新编组,分两路再次越境窜入云南省。

这第二次“反攻”的兵马,一路由国民党第8军193师师长李国辉率领,1000余人于7月10日攻占了我沧源县城。

另一路是以国民党第26军军长吕国铨率领的1300余人,他们从境外的孟片攻入,于7月20日攻占了孟连县城。

攻占了境内沧源、孟连两座县城之后,坐镇境外的总指挥李弥见“反攻”有所进展,当下委派国民党中央“第二行政区专员”廖蔚文秘密入境,与第一次进犯受挫时被迫逃进孟连以北深山老林的敌26军取得了联系,并亲自指挥这800人的残部向北突袭,于7月13日攻占了境内我方又一县城——澜沧。

三座县城距我军第一次追歼战结束后仅20天便相继被国民党军攻占,看来,李弥似乎要大干一场了。

为此,云南军区决定再次抽调115团,117团,121团和123团4个分属于13军及14军的战斗部队,于7月21日奔赴边境战区,分别对这三路进犯的国民党军实施围剿。战斗中,我军共歼灭敌军200余人,侥幸逃脱的敌人在7月下旬又逃往境外躲藏。

云南军区1951年夏季实施的两次围剿作战,击败了逃缅国民党军残部上千人的武装进攻,打击了他们不断破坏边境建设的进攻气焰,粉碎了其欲在云南开辟游击区的企图。

经过1951年夏季的两次战斗之后,逃缅国民党军的越境窜

扰活动有所收敛。

1951年10月,李弥将总指挥部由缅北的班阳向南撤往缅泰边境的孟撒,在这块新开辟的地方修建机场,并开办了一所所谓的“反共抗俄军政大学”,在这里扩大地盘,补充兵员,进行休整。

随着朝鲜战争的日益白炽化,1952年2月,台湾国民党当局为加强逃缅残部的作战指挥,提高窜犯云南边境的战斗能力,向孟撒空运了基层骨干军官和专职特务700人。这批骨干的到来,为大伤元气的李弥残部鼓了气。

由此,李弥残部对我边境地区的小股偷袭活动的次数又开始增多。仅1952年上半年,越境的小股国民党军就对云南的腾冲,龙陵,镇康3县窜犯达60余次,杀害边境地区我乡干部和群众100多人。最为疯狂的一次——1952年3月22日一夜间,他们便在龙陵县境内杀了82人。

逃缅国民党军在大规模窜犯中吃了大苦头,于是将战术改变为小群多股的偷袭,对我边境地区的目标,实行“打了就跑”的偷袭战。而此时,逃缅国民党军在其异国的“根据地”的实力也有了不小的发展。截止1953年1月,他们共有—个总部、—个指挥所、三个军区、四个师、十六个纵队、总兵力达1.85万人。

面对防卫力量不断增强的云南边防线,昔日动辄可以窜犯攻占境内几座县城的逃缅国民党军,自知靠不足2万兵力已很难再与我军交手,而这时缅甸政府亦不断对其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还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提出控诉。迫于种种压力,台湾国民党当局感到缅北“根据地”这块“反攻”的跳板,不能再堂而皇之地存在了,于是只得被迫将原逃缅“国军”的番号改为“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并于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分期分批

将李弥总部人员以及原第8军、26军的部分兵力共5400余人撤往台湾。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50年开始,中国边防部队在民兵及地方公安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逃缅国民党及武装特务进行战斗1302次,歼灭2.98万余人,其中击毙4208人,击伤1656人,俘虏7696人,迫降1.6万余人。另外,还争取了7193人投诚。

第40节 作恶边境,为害部帮,十年偷袭与反偷袭大战,中缅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我军两度入缅作战清除匪乱。

这一时期,留在缅北继续活动的主要是不愿撤走的原云南省的地主恶霸武装,他们在云南边地长期生活,对去陌生的海岛台湾感到前途渺茫。打又打不赢,走又不愿走,空虚与绝望时刻困扰着这支“部队”。

另外,从大陆败退逃入缅甸境内的未撤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残部士兵中间,不少人并不甘心为台湾当局死心塌地地卖命,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反复耐心的政治攻势下,留在缅甸的国民党残部官兵共有3000余人陆续返境回国,向当地政府及驻军投诚。

到1954年6月,逃缅国民党军只剩下5800多人。

其中逃缅国民党军“总指挥”柳元麟所属的4500余人,于1954年11月再度更换旗号,自称其部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妄图纠合不愿去台的原云南地主武装分子做最后的挣扎。

除了柳元麟部,还有以吕维英为首的1300余人也自立山

剿匪大纪实

头,将原名称改为“滇南人民反共救国第一军”,将驻地安扎在缅北的三岛地区。

这两支较大规模的逃缅国民党残部,各自活动了一阵子后,在台湾方面的协调下,吕维英部归属柳元麟总部指挥,合二为一。

1957年6月,台湾当局又要求进行组织整编,将柳部改编为三个军部,十个师,七个独立团,共计兵力3824人。

尽管逃缅国民党军残部经过多次整顿,但由于内部混乱,军心涣散,矛盾较多,部队的逃跑事件层出不穷,因此,为了保存实力,对云南边境袭扰的活动,有所下降。

1958年8月,我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起大规模炮击。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炮击金门作战行动开始后,逃缅国民党军总指挥柳元麟接到台湾当局指示,命其在中缅边境地区展开反攻,争取有所战绩。

于是,柳元麟1958年8月底率领该部1480余人窜至滇南孟连县至勐腊县境外伺机行动。

在总部部署进攻任务时,柳元麟计划兵分4路,奔袭纵深在边境内50—60公里之间,妄图拿下一些较有影响的目标,向台湾方面邀功。

然而,与雄心勃勃的柳元麟的意愿相反,担负窜犯作战的4路指挥官却各有打算。多年来,他们奉命不时偷袭境内,但每一次均碰得头破血流,早已斗志消沉,此外,实力是他们在异国长期生存的基础,岂肯轻易赔掉?

更为可笑的是,为了给畏战怕死的土兵壮胆,他们诡称演

习,仅实际动用了500人左右的兵力对境内进行了11次小股袭扰,而且每股仅有10—80人,越境纵深即使在密林的掩护下,也都不足10公里。11次中,还有4次是在边境线附近打伏击,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就这样,昆明军区也没放过给予这些窜扰之敌以沉重打击的准备。在接到敌情通报后,立即从五个公安边防团中各抽调一批精干力量,展开了对人境偷袭的国民党军的围剿和堵击。

整个围歼战斗规模都不大,偷袭的国民党军除被歼者外,其余的又逃回了境外。

1959年,又有了“风吹草动”。

西藏叛乱爆发后,台湾当局见有机可趁,欣喜若狂地命令逃缅国民党军调集兵力,准备进攻云南边境,以在边境地区煽动叛乱。

逃缅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195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军委呈报的一份反映逃缅国民党军试图在云南边境扩大武装袭扰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指示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就作出了关于加强边防对敌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扬成武上将去云南检查和指导反袭扰工作。昆明军区据此也迅速调整边防部署,命令各边防部队制定和修改反窜犯作战方案,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加强

剿匪大纪实

战备。

在境外摇旗呐喊要大举“反攻”的国民党逃缅残部，侦悉到我军已全面作好反击准备，始终未敢贸然进行较大规模的窜犯，仍是使用其拿手的小股越境偷袭进行破坏骚扰。

从1950年开始至1960年已经过10年时间，我军早已不像1950年在对边境战区地形、气候、民俗等等情况没有摸索出一套有效方法时那样大打击溃战了。

随着边境政权的建立巩固，人民群众觉悟的极大提高，部队实战锻炼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边防部队指战员打击国民党残部的作战“艺术”有了极大的提高。

针对境外国民党残军小股越境的作战特点，边防部队改变了过去的战术，开展“以小对小”的作战方式，组织了10多支10余人小分队，分地区游动作战，依靠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深入原始森林，机动灵活地捕捉战机，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围歼仗。

昆明军区边防7团侦察员毕家庭带领的一支作战小分队，就是完成游动作战较为出色的典型。

有一次，他们得知一小股逃缅国民党军从沧源县羊弄黎附近入境，当即赶往搜剿。战士们在一个山坡前方发现一堆篝火，判断敌人不会走远。毕家庭果敢地将分队分成4个战斗小组，从不同方向勇猛地包抄过去，在距国境线70米处将敌兵包围，俘敌9名。毕家庭分队在1959年1月至5月所进行的7次反击逃缅国民党残部小股骚扰的战斗中，每一次都获得了胜利，共歼灭越境偷袭者29人。

自1952年至1959年，我云南边防部队对逃缅国民党军实

施的大小军事打击中，共歼敌 7256 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政治攻势，瓦解逃缅国民党军取得显著成绩，共争取 4672 人投诚。

1960 年下半年中缅两国政府还达成边界勘察和树立界碑协议，协议就勘界的警卫问题明确了我云南边防部队可进入缅甸 20 公里对国民党军作战。

1960 年下半年，中国与缅甸边界联合委员会开始进行中缅边界的勘察和树立界桩工作。

对于中缅两国政府制定的勘界工作，台湾当局指示逃缅国民党军残部要在缅境内尽最大可能进行破坏与阻扰，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工作确实受到了严重影响。

逃缅国民党军又猖狂起来了！

当年 7 月，台湾当局将其特种作战部队 400 余人从台湾空运到了缅北。同时还空运来大批武器装备，使实力已经大大削弱的逃缅国民党军残部从人员到物质又有所扩充。到 1960 年 11 月，其兵力增至 9400 余人，编成五个军、十五个师、六个纵队、六个独立团、三个独立支队和一个所谓的“军区”。

这时，逃缅国民党军总部又开始制订一系列入境窜扰的行动计划，然而，在早有准备的云南边防部队的严密防卫部署及监视下，他们又不得不一再推迟实施行动计划，没有进行大的窜犯活动。

下半年，当中缅两国政府开始进行中缅边界勘察工作时，藏匿于缅境内的国民党军开始了疯狂的破坏，使一些地段的勘界工作无法进行。

为此，经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双方协议，由驻守云南的中国军队担负捕歼受到严重干扰的旧 30 号界桩

剿匪大纪实

至 62 号界桩地段的国民党军的作战任务,并获准在执行任务时可进入缅甸境内 20 公里。后来,根据中缅双方新的协议,中国军队又担负了与缅甸国防军共同对逃缅国民党军联合作战的任务。

中国军队担任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任务,一直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为了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1960 年 11 月 6 日,昆明军区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前方指挥所,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黎锡福,陆军 13 军副军长崔建功分别担任正副指挥。

1960 年 11 月 11 日,前方指挥所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正式成立。

11 天后,中国军队为保证中缅边界勘界的安全,出动 5 个团及 1 个营的兵力,于 1960 年 11 月 22 日至 1961 年 2 月 9 日,先后两次奉命出境作战。

第一次出境打击的对象是逃缅国民党军的第 1、第 4 军军部和 2、3、5、6 师师部及所属的八个团及八个行动组。这些国民党军残部在缅北边境附近设有二十二个军事据点,总兵力约 800 人。

我军 11 月 22 日越过国境入缅后,即按预定行动方案对逃缅国民党军进行迂回包围,搜捕聚歼。

奉命奔袭国民党军曼俄乃据点的中国边防 9 团 2 连及边防 10 团 2 连,于当日拂晓抵达指定位置,发现据点内的敌军已于两小时前逃跑了。指挥员判断其可能向孟马方向逃窜,当即决定改变原来的作战方案,留下一个小分队继续就地搜索,然后率领四个连分头向孟马方向跟踪追击,终于在曼俄乃以南 10 公里

处将逃窜之敌阻截。战斗中，边防9团7连战士金静泰被国民党军第5师师长李泰开枪打伤后，以顽强的毅力忍住伤痛，猛冲上前将这名负隅顽抗的“师长”击毙。

经过连续的追击，出境作战部队首战便歼灭从曼俄乃及其它据点逃窜的国民党军33人。

11月23日早晨，中国军队117团、118团及116团1营近一个师的兵力对国民党军第4军及第1军部分在缅甸掸邦孟马地区的各个据点展开突袭，同时，又以三个边防团的兵力围歼第1军在孟瓦地区的各个据点。战斗进行的当天，中国军队全歼驻扎在踏板卖据点的国民党军第2师师部60人，全歼驻孟歇据点的国民党军第7团团部62人。在第2天的奔袭战中，国民党军第2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第3师上校副师长叶文强被活捉。从当年现场拍摄的照片上看，叶文强从两棵参天大树下举着双手向我军两名战士缴械投降，浓密的树丛遮掩了他的大半个身躯。

在这次出境战斗中，中缅边境沿线国民党军残部除部分被歼外，大部逃散，解放军随即在战区展开清剿。这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467人，其中校级以上军官22人，缴获60毫米追击炮4门、机枪27挺，长短枪247枝、电台7部，牲口289匹。

中国军队第二次出境作战的打击对象是柳元麟总部及所属第1、第2、第4军等部队的3152人。

根据中缅双方协议，中国方面以步兵117团、118团和边防10、11团于1961年1月25日和26日，先后攻占了巴西里，叭坝亮，索永、南昆、孟白了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歼其一部，其余大部分国民党军于1月25日夜间渡过湄公河，撤往老挝境内，另

剿匪大纪实

一部则逃往泰国境内。

1961年1月26日后,中国军队在作战地区搜剿国民党军残部一直进行到2月9日,中国出境作战部队全部撤回境内。

在第二次出境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74人,缴获81毫米以下口径迫击炮10门,各种机枪21挺,长短枪330枝,电台4部,汽车3辆,牲口73匹。

中国军队的两次勘界警卫作战,在缅甸政府,缅甸国防军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共歼灭逃缅国民党军741人,捣毁了逃缅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协助缅甸政府解放了拥有30多万人口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较好地保证了中缅联合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两次出境作战中,中国军队共伤亡230人,其中牺牲79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作战行动结束后,逃缅的国民党军柳元麟总部被迫撤往台湾。

1961年5月至1963年初,留踞在缅甸、泰国、老挝边境地区的国民党军共计5000人,分别由李文焕、段希文、马国俊3人率领,各霸一方,自谋生路,已无力再对云南边境进行窜扰破坏活动。

但1962年底以后,逃缅国民党军相继回窜缅北老巢,抢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对此,台湾当局见又可利用,当即派人前往视察和“宣慰”,以恢复补给为诱饵,鼓动他们坚持对云南边境进行窜犯活动。

1963年3月至1966年9月,逃缅国民党军先后对滇西潞西、镇康、沧源、孟连等县边境地区进行了8次小股窜扰,其中有

4次遭到云南边防部队打击,歼敌38人。

此后,逃缅国民党军又撤至泰缅边境地区,停止了对云南边境的武装窜扰。

中缅边界反国民党军残部窜扰时间长,作战范围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史上,占有着一页令人永远难忘的英雄篇章。

第十一章 黔山雨

第41节 隐蔽集结,兵发贵州,杨勇率5兵团插入黔境。贵州解放后,国民党残军、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将原有的8个保安团扩编为6个师番号,欲为“游击战”创造条件。

1949年8月底,为挽救败局,蒋介石亲临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员,密谋固守西南防务。

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一再向他的几位心腹交待,必须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并扬言:“如果在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

此时,退守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17万余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所辖各部27万余人(其中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约10万人,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部约4万人,云南绥靖公署卢汉部约3万人,贵州绥靖公署谷正伦部3万余人,十五兵团罗广文部3万余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及副长官兼重庆市市长杨森的部队4万余人),共约45万人,占当时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的60%。此外,加上川、滇、黔、康4省的警备

司令部、保安团等其他杂牌部队，总计约 90 万人。

11 月，国民党当局制订了持久作战的计划：确定西南地区以四川为核心，观时待机，维持现有战力；竭力培植新生力量，以攻为守，保持现有地区；将有力兵团机动控制战略要地，对进军西南的解放军，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为实现上述计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决定以机动防御配合游击作战，进行持久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北面依托秦岭、大巴山、米仓山、摩天岭防线，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东面配合华中国民党军，力争将解放军歼灭于湘西地区，使其不能进入贵州、四川两省。

南京、武汉、上海、长沙等城市解放后，蒋介石判断，解放军在向华南进军的同时，必将主力一部入川。他认为，川东方向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且有湘、桂白崇禧部 20 余万人，广东余汉谋部 10 余万人，既可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又可保障云、贵两省和胡宗南部侧背的安全，解放军由此入川的可能性不大；而川北方向则是入川捷径，况且背靠中共老解放区，有陇海铁路，交通顺畅，补给方便，解放军极大可能由陕南、陇南入川。加之 6 月份以来，进抵陕南、陇南的解放军缓慢向南推进，并进行一系列佯动。因此，蒋介石对上述判断更加坚信无疑，于是调兵遣将，以四川为核心、以川陕边界为重点设防，构成了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并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

具体部署是：以主力胡宗南集团五、十八兵团等部 8 个军，依托秦岭主脉，沿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一线，构成第一道防线，以其 7 兵团六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解放军从陕、甘入川；以宋希濂集团 14、20 兵团等部六个军及地方部队，位于鄂西、湘西的巴东、五

峰、乾城(今吉首市)一带及其以西地区,并同位于巫山、巫溪至万县地区的16兵团等部三个军相配合,构成“川湘鄂边防线”,阻止解放军从鄂西、湘西入川;以谷正伦部19兵团二个军配置在贵阳至晁县(今新晃)地区,扼守黔东门户和湘黔公路沿线要点,阻止解放军从湘西入黔;以8、26军配置在滇黔边界和滇越公路沿线,主要对付中共领导的桂滇黔边区纵队和控制、监视卢汉指挥的74、93军;以直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15兵团三个军配置在南充、达县、大竹地区,作为二线兵团,准备向川北、必要时向川东机动;以21、72军、重庆市市长杨森部20军驻守重庆,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部95军驻守成都,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部24军驻守雅安、康定、西昌地区,担任警备任务。

在实施上述部署的同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川、康诸将领,要密切配合,背靠云、贵,坚守“大西南防线”,阻歼解放军于境外。胡宗南把“大西南防线”吹嘘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依托这条防线,西南大可“高枕无忧”。其实,不少国民党军将领,对实施反攻,东山再起,重建蒋家王朝的一统天下,感到毫无希望,对能否顶住解放军的进攻,并无信心。一部分将领主张避免与解放军作战,保存实力,不得已时退往云、贵,进山发动游击战,若再无法存身,就逃往国外。一部分将领则积极派人与共产党联络,接洽起义。

1949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二野进军并经营西南的任务。5月23日,根据全国战局迅猛发展的形势,中央军委指示,二野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的一野一部协同下,准备进军西南,解放川、黔、康3省。7月16日,中央军委进一步

剿匪大纪实

指出,二野主力应取道湘西、鄂西、黔北,迂回入川,其4兵团在协同四野完成广西作战任务后,西出昆明,占领云南,与二野主力及一野一部,共约60万人,完成解放川、滇、黔、康诸省的任务。

当时,国民党军为了保存实力,力避与解放军决战。根据上述分析,中央军委对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曾多次作出指示。5月23日指示:“胡宗南率军政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而进军断其退路不可。”针对白崇禧集团和西南国民党军逐步后撤、力避决战的情况,中央军委强调指出:进军华南、西南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插至敌后,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便于将节节后退的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特别是便于将胡宗南集团歼灭在四川境内,不使其逃往国外,为患未来。实践证明,这一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有力地保证了解放西南各次战役的胜利。

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分析了西南战场的形势,决心先从鄂西、湘西进军川东、贵州,攻占贵阳、宜宾、泸州、重庆,切断川境国民党军向黔滇的退路,尔后视战局发展情况,进军川中、川西,会同由陕南、陇南南下入川的一野部队,全歼胡宗南集团等退入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为实现上述决心,二野前委作出了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4兵团仍按军委指示,协同四野完成广西、广东作战任务,然后兜击云南,封锁边境,围歼滇境及由川、黔南逃的国民党军;5兵团于10月10日前隐蔽集结湖南常德、邵阳一线,尔后,5兵团16、17、18军与3兵团10军担任迂回

任务,由湘潭、桃源、邵阳、武冈一带进军贵州,解放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攻占宜宾、纳溪、泸州一线,切断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协同三兵团主力作战;三兵团主力由湖北江陵、湖南常德一线西进,在川、湘、鄂边境地区会同四野部队,歼灭宋希濂集团,尔后占领川东黔江、彭水,进击江津、泸县。3、5兵团完成以上任务后,会同由陕南、陇南入川的18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等川境国民党军。

1950年,大西南解放之后,也与全国各新解放区一样,立即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肃清残匪、打击封建势力、建立革命秩序的伟大斗争。而贵州匪患的猖獗和持续时间之长,在西南云贵川三省中,尤为突出。

贵州从1950年春季开始全面展开剿匪,到1951年夏秋之间,大股土匪陆续被歼灭,重要匪魁相继落网,从攻占土匪最后盘踞的罗甸、望谟、册亨三个县城,到全省地区全部获得解放止,我军剿匪作战总计约一年半的时间。

贵州匪患之所以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我军进展迅速,解放较快,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还未来得及触动,广大的乡村仍被其所统治,大量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等)和民间枪枝仍为其所掌握。

二是在西南作战中,一些封建势力代表人物,乘混乱之机,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继续保持其反动统治。

三是由于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当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贫富悬殊等因素,也给土匪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是贵州土匪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反动地主封建势

剿匪大纪实

力作后台,依靠封建关系,拉拢号召,出人出枪;以叛军惯匪为打手,并欺骗裹胁部分群众,啸聚附合而成的。其主要匪首的成份中,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几乎占90%。如黔南大匪首,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盘踞黔东南雷山地区直接与台湾匪特保持电台联络的大特务柏家华、匪“黔东南绥靖区总司令”谢世钦、匪“黔东南总指挥”史肇周、匪“第14兵团司令官”蔡世康、匪“反共救国军第8兵团司令”罗湘培、匪“国民党革命整理委员会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彭景仁、匪“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副司令”牟开荣和石阡县的两大封建势力代表并称“西吴”、“东吴”的吴登仁、吴河清等,无一不是身兼多种反动身份,集国民党之军事、政治、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动本质之大成。

贵州匪乱猖狂,除这一总的阶级根源外,更直接的还是国民党匪特长期豢养、精心策划和一手炮制的结果。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曾任宪兵司令)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就应召飞往南京领受反共使命,妄图把蒋介石从1935年即伸入魔掌的贵州,经营成为最后抗拒解放的根据地。在蒋介石这一反动战略意图的指导下,谷、韩等匪帮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勾结一起,共同制定了一套“应变计划”。先是从上而下加强政治方面的“反共”宣传教育,灌输所谓“反共救国实施纲领”,传授“反共游击经验”等,从思想舆论上做准备,以坚定其“反共意识”;随即扩充部队,把原来的五个地方保安团,扩编为八个保安团,继又扩充为六个师的番号,同时正规部队也迅速招兵买马,成立第19兵团,下辖第49军和第89军两个军,从人力上直接为开展所谓“游击战争”创造

条件。

谷、韩等匪帮为更好利用吴河清之流的封建势力，还开办训练班，把贵州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那些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和“党团有力分子”都大量收罗组织起来，把他们培养训练为“反共中坚”，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骨干。这个极端反动的“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从1949年8月15日在贵阳雪涯洞开办，3期共轮训了1600多人。这帮匪徒遍布全省，成了后来土匪暴乱的元凶祸首。

谷、韩等匪为进一步利用封建地主阶级多年来对农民群众的直接统治关系，又提出所谓“政务下乡、党务下乡”，直接派遣特务下乡加紧同封建势力的勾结，以便控制农村，组织叛乱。为麻痹欺骗农民群众，他们还大开烟禁，公然号召各地广种鸦片烟，妄图给我埋下定时炸弹，挑起群众对我禁烟不满，以便乘机裹胁欺骗群众为匪。

临近解放，谷、韩等匪帮在仓皇逃跑之前，除慌忙进行破坏黔东及贵阳附近公路桥梁、焚烧隐藏大量档案、资财和屠杀大批革命爱国人士等罪恶活动外，再次布置一批匪特骨干携带40余部电台秘密疏散、隐蔽潜伏，并从监狱中放出800余名惯匪小偷配合行动，指示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即按原定“应变计划”组织发动其蓄谋已久的所谓“策应反攻大陆”的游击战争——土匪大暴乱。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农村的封建地主势力不了解我党具体政策，亦在窥测等待。当时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较好的，到处是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景

剿匪大纪实

象。但为时不久,当我军主力继续进军,一部入川作战,一部进滇歼敌,只有少数部队留黔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而广大乡村尚未占领,群众尚未发动,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便纷纷蠢动起来。他们四处奔走串联,造谣欺骗,煽动蛊惑,封官许愿,不久土匪便陆续开始叛乱。先由零星小股作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而公开扯起“反共”旗号,专门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由袭击我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我班排部队,发展为攻城掠镇,占领地盘,进而疯狂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争”,妄图与西南几省土匪相呼应,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罪恶计划。

第42节 城乡隔绝、政令不通,五分之二县城被匪占领。我五兵团司令员杨勇途中遇伏,141团200名干部战士牺牲

在贵阳地区,首推“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潘方侠匪部。潘方侠原为蒋介石侍从室副官,军统特务,曾在中美合作所任职。贵州解放前夕,潘匪以做大烟生意为护身符,潜伏花溪,拉拢社会关系,为发动匪乱作准备。贵州解放后,潘匪遵照蒋介石“拯救黔众,同艰共生,坚持发展壮大游击力量,配合国军反攻大陆”的电令,四出串联,来往于贵筑(今花溪)、惠水之间,并两次潜入贵阳,将贵阳四周及黔南地区之各股土匪统编为“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由潘方侠任总司令,总部设于离贵阳仅30公里之青岩。该集团军下辖九个军,其活动范围包括东至雷山、黎平,西至紫云、罗甸的整个黔南地区。潘匪还与贵阳潜伏的特务共同

组织了“贵阳市策动委员会”，潘任主任，两次预谋采取里应外合手段，配合贵阳各郊区股匪大暴动，妄图攻陷贵阳。但两次计划均为我军侦知，将市内潜伏特务捕获，并缴获其策动计划及委任关防，潘匪攻陷贵阳之阴谋才未能得逞。

1950年4月11日，潘匪又率土匪1000多名攻打贵筑县，打死打伤贵州大学学生及工友8人，绑走66名。为营救贵大学生，我贵州军区参谋长潘焱亲率部队奔袭青岩，将潘匪总部300余名匪徒捕获，歼其总部。潘匪本人外出，侥幸漏网。以后，潘匪召集各匪首会议，妄图重整旗鼓，但各匪首眼看潘匪力量日拙，屡遭失败，各怀二心，纷纷另找靠山或自树旗帜。潘匪只好仅带70余人逃向望谟，“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番号就此空留。

在贵阳地区继之而起的是“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曹绍华匪部。曹绍华系平坝县平凯乡干何村人，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中统特务，曾任国民党保三团中校副团长，贵筑、惠水、安顺、平坝、紫云、长顺、广顺、罗甸8县联防主任，是国民党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的得力助手。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在逃离贵阳时，委任曹匪为清镇、平坝、织金、修文、黔西5县游击司令。贵阳解放后，曹匪将原平坝县保警队的300名武装拖到马场进行暴乱，为黔中一带暴乱的首起分子。到4月份，该股匪发展到2000余人，在贵阳西南部的几个县内猖狂进行破坏，炸毁公路桥梁，拦截车辆，攻打平坝县城，抢劫二铺粮仓，在穿洞一次杀害我区、乡干部28人。该股匪始称“西南游击反共自卫军”，与潘方侠“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勾结合股，后窜至长顺、广顺一带，改番号为“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曹任总司令，韦毓英为副司令，下辖7个师，并委派了清镇、平坝、安顺、厂

顺、长顺等县县长。该匪部在其盘踞的区域内建立了完整的政权组织和军事体系，并在匪师团驻地竖有旗杆，每日清晨集合匪徒出早操，举行升旗仪式，公开进行割据，妄图长期与我对垒。由于该匪部势力较强，我军又一时抽不出更多部队进剿，致使该匪部在贵阳西南部得以长期盘踞，为黔中人民切齿痛恨。直至1950年11月，我军举行长顺、紫云、惠水合围，才将该股匪歼灭。

与曹绍华在长、紫、惠地区鼎足而立的是“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挺进军”屠占廷及“89军游击指挥部”刘逸群两股。屠占廷匪部原是国民党广西保安第一团，广西解放时窜来贵州，与紫云县长姚聚五结合，收编当地各股土匪，先被潘方侠委为第7军军长，后改番号为“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挺进军”，屠任军长，下辖2个纵队，活动于紫云、望谟之间。刘逸群原系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之弟，曾任89军师长及安顺地区专员等职，解放后南逃罗甸为匪，被潘方侠委任为第五军军长，后又与长顺大地主结合，组成“89军游击指挥部”，刘任总指挥长。除以上两股土匪外，还有许多小股匪，如由原贵阳市警察局长陈一鸣为首的“戡战建国军”等。由于股匪甚多，山头林立，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往往发生矛盾。陈一鸣与曹绍华为了争夺一个乡的统治权而动了刺刀。陈一鸣匪部是抢劫贵阳武器仓库而发展起来的，装备精良，为人垂涎。当他率部路过紫云时，“挺进军”屠占廷对其伏击，发生火拼。我军在进行长紫惠合围时，正是利用股匪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将此一地区之各股土匪全部消灭。

在水城、安顺地区，最大的股匪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八兵团”罗湘培部。罗湘培原为贵州保安第四旅旅长，解放前夕升任独二师师长。后在水城起义，但其又于1950年3月叛变，逃窜

郎岱，勾结地方封建势力，成立“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八兵团”，罗任司令，杨如森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辖1个师及3个纵队，活动于郎岱、普定、织金地区。7月，我军围剿匪巢郎岱岩脚，罗匪率部逃往水城、赫章，重整队伍，仍以“八兵团”为番号，成立21军、22军、23军、94军。又将所盘踞之地域划分为4个游击区，建立匪政权，委任了纳雍、水城、大定（今大方）、毕节、赫章、威宁等县县长，妄图长期盘踞整个黔西地区。9月3日，川南叛军田动云率部3000人窜来赫章，罗匪带500百人亲到赫章欢迎，并在城内召开欢迎大会。罗、田二匪合股后，匪焰大炽。9月中旬，西南军区统一组织云、贵、川、康4省边界会剿，贵州省重点合围威宁、赫章罗湘培匪部，罗匪亲率其警卫团600余人拼死抵抗，我军几经战斗，将其全歼。

在黔西南地区为害最烈的是“滇桂黔边区反共抗俄同盟军”余启佑部。余启佑原为国民党272师师长，在兴仁起义后，又于1950年3月叛变，窜至盘县杨松，将我军145团筹粮队43人包围杀害，占领盘县、普安、水城交界的八纳山区为其大本营，纠合黔西的各股封建游杂武装，编为12个纵队，打出“滇桂黔边区反共抗俄同盟军”旗号，余启佑任总司令，并成立了普安、兴仁、盘县、晴隆、水城各县自治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该股匪为作好长期游击准备，还在其总部所在地水城顺场乡开办了“反共抗俄军官学校”，将各地恶霸地主、惯匪流氓集中施以游击战争训练。为了和盘踞黔西北之匪第八兵团互相配合，余启佑和罗湘培相邀，在水城杨梅树区举行会谈，划分势力范围，以盘江为界，南部归余启佑，北部归罗湘培。余匪行事狡猾，我军多次进剿都漏网逃脱。后又窜至兴义、安龙、册亨一带，建立“滇桂黔边区军政长

剿匪大纪实

官公署”，余任军政长官。1951年我军组织滇桂黔3省边界会剿，才将该匪部歼灭。

1950年3、4月份，贵州全省性的匪乱达到高潮。除各地反动封建势力纷纷自树旗帜，占山为王外，原起义的一部分蒋军（约15个团）和各地的乡保武装亦相继叛变为匪。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计约460余股，武装土匪达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他们到处抢劫、破坏、杀人、暴动，劫行商、打军车、围攻我区乡人民政府和县城，残害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1月14日，我军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和兵团副参谋长潘焱，率兵团指挥机关参加成都战役后返贵阳，途经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亦遭土匪伏击。杨勇司令员亲自指挥随行干部战士奋勇还击，经激战始将土匪击溃，安抵贵阳。

3月5日，我16军47师供给处长张维友同志和46师供给处副处长李俊峰同志，专车到军区领取经费，归途中，在离贵阳仅10来里的三桥以北之李家坟遭土匪伏击牺牲。

4月6日，我141团团直属一营，被叛匪保安1、5、12等3个团包围在水城、纳雍之间，激战3昼夜始突围，牺牲干部战士200余人。

4月下旬，省委和兵团领导到重庆西南局开会，在川黔边界处再次被800余名土匪伏击。据不完全统计，在那土匪四起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我军、政工作人员牺牲即达2000余人。当时全省被土匪控制三十一个县，我军占领的四十八个县，也多是县城和少数乡镇。翻开当时全省的剿匪形势图，整个贵州就像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桑叶，我军控制的几条主要公路沿线好像几根残存的叶茎。在那一两个月中，全省大部地区，交通被

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形势相当严重。

党中央曾指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反霸斗争。”但由于当时对土匪的力量和破坏性估计不足,部队从大兵团作战转为分散剿匪,对战士的思想教育还不很深入细致,一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着麻痹松懈思想,不少人认为:“大江大海都过了,还在乎这几个毛毛匪?”经过一系列血的教训,大家的头脑才清醒一些。此时,党中央针对全国类似贵州的一些新解放区陆续发生的匪情,于1950年3月18日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号召新解放区的军民立刻转入剿匪斗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和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等首长具体指示五兵团: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要求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剿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要求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迅速学会新的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首长的一系列指示,贵州省委和军区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认真分析了贵州省匪乱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制定了剿灭对策。首先加强了领导,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苏振华、省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杨勇为首,成立了25人的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动员全省党政军民,积极参加和支援剿匪斗争。二是在军事上重新调整部署,暂

剿匪大纪实

时主动收缩一部分不易控制的县城和边沿地区(二十三个县),加强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此时,我军区部队,除留少数警备城市和参加接管工作外,均就地分散剿匪。此外,还专门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2个集团,东集团由138团、142团组成,西集团由141团和139团、140团及45师135团各一个营组成。军区决定,东集团由5兵团副参谋长潘焱指挥,西集团由47师师长兼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同志指挥,均在军区直接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有重点的重兵清剿。

在我军事进剿全面展开以前,我军已综合各方面情报,查明土匪叛乱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为斩断魔爪,3月23日,我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的大搜捕,查获美蒋特务钱济渊以下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省城贵阳的罪恶阴谋。

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6月21日至7月10日,我东集团首先组织了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战役开始前,对于选取哪股土匪作为首战打击对象,我军事先均作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当时,叛乱最早、对省城贵阳威胁最大的,是曾经攻到花溪的曹绍华匪部;但危害最烈、政治影响最大的却是叛变的起义部队。他们原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兵力装备远超过一般土匪,不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剩下的起义部队也将不稳。为此,我军决定以盘踞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叛变的王福堂部作为首战对象。潘焱当时把这一意图和实施方案向省委、军区作了报告,上级表示同意。为保证首战必胜,我军集中了136团、138团、140团和16军一部兵力,在三个县的范围内拉开大

网进行合围。主力突破股匪盘踞的中心据点后，迅速兵分三路，到处搜山设卡，追捕逃逸散匪。整个战役历时 20 天，一举活捉叛匪“392 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匪主力 3172 名。7 月 5 日，西集团组织金沙战役再传捷报。25 天时间，歼匪“中国国民党反共自救军西南联军川黔边总指挥部”、“息(烽)、开(阳)、修(文)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第八兵团川黔边游击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金(沙)、仁(怀)边区总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西南军区总指挥部”等 5 个匪指挥部，活捉匪首罗维舟等以下 5000 余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给土匪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6 月以后，匪焰日趋下降，我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此时著名的匪首，如石阡的吴登仁、吴河清，雷山的谢世钦，黔南的曹绍华，黔西北的罗湘培、廖兴序等，虽受到震动，但尚未直接受到打击，气焰仍很嚣张。他们针对我军的战略战术，重新制定对策，以分散对集中，继续负隅顽抗。我军认真总结上两次合围战役经验，提高剿匪作战能力，东集团从 7 月中旬开始，又持续 80 天发起了对石阡两大封建堡垒，所谓“东吴”和“西吴”的合围清剿。在我强大兵力分进合击下，号称“西吴”的“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匪部首先被我击破，一举歼匪 4241 名。吴匪和少数亲信骨干化装逃脱，我 138 团以全团兵力沿着吴匪逃逸路线，圈圈相套，层层包围，山山设卡，村村搜索。该团保卫股长张作仁、政治指导员赵彬带侦察排 24 人，全部化装成便衣，跟踪追捕，穷追紧逼连续 7 昼夜，终将“西吴”这一罪魁元凶拿获归案。消灭“东吴”之后，为追捕匪首吴河清，也专门动员了 140 团全团的兵力，实行三线封锁。该团团长曾长柏亲率一支精悍部队，在吴匪老巢——石

剿匪大纪实

阡、岑巩、江口 3 县交界的大顶山一带方圆五六十里的高山密林中,兜捕搜剿 16 天,行程 1100 多里,终于将吴匪俘获。

东集团对石阡 80 天合围结束后,军区叫潘焱回去作了一次全面的汇报。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对连续几个战役的胜利表示满意,要求一定要把成功经验很好地总结出来。东集团剿匪的机动部队随即集中到黄平旧州搞了 20 多天的休整和总结。

在 20 多天的总结中,围绕如何贯彻执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宽严相结合的政策,在军事上着重总结了集中优势兵力,长途奔袭,分进合击,分片包干,梳篦清剿,小分队捉匪首等战术和方法上的经验;在开展政治攻势上着重总结了如何正确执行宽严政策的问题。实践证明,凡是我們及时对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坚决进行镇压,对胁从匪众大胆释放的地区,那里就会很快出现匪属妻子叫丈夫,父母叫儿子,促其迅速改恶从善,踊跃向解放军缴枪投诚的热烈场面。在发动群众方面,着重总结了如何把捉尽匪首和发动群众联系起来的问题。“擒贼先擒王,刨树先刨根”,一个地区匪首没捉尽,等于没有掀掉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群众有顾虑就很难发动起来。但是要捉尽匪首净化一个地区,不发动那里的群众,完全靠部队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捉匪首和发动群众,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广大干部战士有很生动的创造和发明。如每到一个地区先提出“三不走”,即匪首不捉尽不走,地区不净化不走,群众不发动不走。使群众放心,大胆靠近我们,帮助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总结出必须“一身兼四员”(战斗员、侦察员、指挥员、宣传员)和“三勤三起”(口勤、手勤、腿勤和与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只有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团结群众,

依靠群众，群众才会真正相信我们是他们的亲人，才能主动靠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在发动群众中，我军指战员还普遍学会了访苦、引苦、领导诉苦、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农协等工作方法。通过以乡村为单位，召开农代会，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他们直接参加剿匪斗争并亲自捕捉匪首，这样一个地区就更容易净化了。这些经验，省委和军区的领导都给予了肯定，并让军区的《连队生活报》宣传推广，还给刚到贵州帮助剿匪的 186 师部队作了介绍。

9 月以后，贵州全省剿匪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从整个西南地区看，川滇两省著名股匪多数被歼，匪风已开始平息，而贵州形势仍比其他两省严重。大股土匪不仅仍控制着我 21 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且均与台湾特务机关保持着密切的电台联络，企图长期挣扎，负隅顽抗。

为彻底剿灭上述匪特，争取年底肃清贵州全省股匪，除 45 师早已于 4 月份来黔助剿外，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军区调 186 师，川东军区调 31 师入黔会剿。9 月 16 日到 10 月 10 日，兄弟部队 186 师在镇远（后改称凯里军分区）、独山（后改称都匀军分区）两分区部队的协助配合下，在黔东南雷山地区展开合围，一举歼匪 5590 人。围剿中，师、团干部亲率 30 多个排约千人的兵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辗转清剿，追捕匪首，终将贵州重要特务头子柏家华和匪“黔东南绥靖司令”谢世钦两匪首活捉。与此同时，我 45 师对黔西北封建反动堡垒——威宁赫章地区之罗湘培、廖兴序、田战云、安纯三、李成举、潘厚昆等股匪展开围剿，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该役共歼匪 8000 余人（师以上匪首 61 名），并收复了股匪盘踞的广大地区。在此期间，我 31 师在川黔

剿匪大纪实

也展开合围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兄弟部队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贵州省军区部队全力以赴,各分区机动部队除自己分别组织一些小型的合围会剿外,入冬以后,又配合军区直接指挥的东、西两集团和友邻部队,进行了9次较大的合围战役。经过这样反复会剿,到1950年底,中心区内的股匪基本消灭,重要匪首多数落网,全省除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县城和一些边沿地区尚为股匪盘踞外,广大地区已为我军控制,城乡治安逐渐稳定,人民生活日趋正常。

1951年元月28日,贵州省委、军区给向剿匪部队传达了毛主席对西南军区剿匪工作的嘉奖电,全省军民更加斗志昂扬,信心倍增,坚决表示一定按照党和毛主席的要求,继续努力,为剿灭残匪而战斗到底。这时,贵州省委适时提出了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省从地区、县到区、乡、村各级先后建立了清匪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清匪,实行重点戒严,山山搜捕,路路设岗,使残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仅遵义地区从元月2日开始,半个月时间,就歼匪3148名,俘匪“川黔边反共自救军总司令”卢杰等中队长以上匪首126名。

广大人民群众由积极支援剿匪,发展为勇敢拿起刀矛火枪直接参加剿匪。全省除土匪盘踞的少数地区外,人民武装自卫队普遍建立起来,从1950年9月的6万人,发展到35万余人。这些武装自卫队员不仅勇敢地为我军传送情报,侦察匪情,探路带路,协助捕捉漏网匪首(重要匪首如屠占廷、罗湘培、廖兴序、彭景仁等的落网,都是由群众参加捕捉的),而且直接参加和股

匪作战。水(城)南地区的碗场,人民自卫队与股匪张少恒部数百人血战一昼夜,队员伤亡70余人,仍毫不动摇,终于打退了土匪的进攻,并配合我军将该匪歼灭。安顺分区人民自卫队,随我军到百里外去参战。大定(大方)县人民自卫队单独组成几个连去边沿区清剿散匪。兴仁分区人民自卫队千余人配合部队进入广西参加剿匪。

在全省群众性清匪运动展开的同时,我军主力部队的矛头,由中心地区指向边沿地区。在川、湘、桂、滇友邻地区兄弟部队的协同下,先后对省与省边界结合部地区大股土匪,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边地会剿和围剿。1月13日至2月3日,独山分区部队发起荔波合围战,历时20天,歼匪“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总司令”陈与参等以下8200余名。接着,我138团和151团,又于2月24日,发起对长期盘踞黔桂边境平塘和广西天峨、南丹3县交界处的最大股匪莫树风、莫景芬、莫廷义等匪部的合围进剿,全歼该匪部1000余名。广西军区为此专门给贵州军区发来贺电。在中心地区发动群众清匪的部队,为除恶务尽,对个别漏网的大匪首,一经查到线索,不辞千难万险,都要追捕归案。贵州军区警卫二团副连长孙显君、副排长蔡增敏和正安县公安局刘佩山三同志组成飞行队,追捕60天,经贵州、四川、云南3省,行程4800余里,捉住“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司令”冯铭钊、参谋长冯铭清和“黔北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冯庆丰。145团3营排长于清泉与侦察干事杨瑞华,带领武工队追捕逃匪至云南平彝(富源)柏街村,在当地农协积极分子帮助下,捉到匪支队司令何仁明等几名匪首,进一步了解到另几名主要匪首已潜逃昆明,又立即带领武工队员10人和民兵5人,连夜赶赴昆明,昼夜查捕,

剿匪大纪实

终于捕获匪“七路司令”纪肃帮、“副司令”胡少云、“27师师长”董玉衡、“228师参谋长”陈护松等15名重要匪首。

贵阳分区部队配合151团、152团等部队于3月23日至4月20日对罗甸进行清剿，兴仁分区部队配合安顺分区部队于5月13、14两日至5月21日对册亨、望谟三地区发起了合围进剿。两次战役共歼匪2000余人，俘历次漏网投奔该地存身的大小匪首数百名。至此，被贵州土匪最后盘踞的3个县城重见天日，贵州全境宣告全部解放。截至7月，贵州全省虽尚存残匪2000余人，但已是苟延残喘了。

第43节 全面清剿，主力出击，坚决镇压顽固匪首，迅速扑灭黔东黔北两地匪焰。

1950年，在黔东南一带的土匪主要有两大股：一为盘踞雷公山的“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部。谢世钦为雷山人，毕业于贵州军官团高教班，曾任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保10团团团长等职。黔东南解放后，谢匪率部窜到雷公山区，被潘方侠委为“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第4军军长。潘匪失势后，谢匪纠合剑河、台江、丹寨、黎平、三都等县股匪，建立“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任司令，下辖17个纵队及1个独立师，盘踞雷山、剑河、黎平、榕江，其活动范围可达从江、台江、炉山、麻江、丹寨、三都等县。该匪部有较严密的组织，官兵皆佩带标明“绥×”字样的胸章，“绥”为该部总称，第二字为各部主官姓名的最末一字，作为部队代号，胸章后面皆有佩带者的职务，姓名。谢匪还办了两期干部学校，分军士、军官、政工三个大队。第一期毕业300人分

到各部充当骨干爪牙。谢匪为加强其统治,在其师、团机构及所控制的区域内设有政工组织,广泛印刷标语传单,宣传反共纲领,妄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忍受暂时艰苦迎接反攻”,以拢络匪众。凡被我军俘虏释放的人,须进“青年服务营”学习交待。由于谢匪统治较严,又有一套游击战术,我军小部队几次进击皆未奏效。直至1950年9月,西南军区调186师入黔助剿,大军压境,合击雷山,才将匪巢捣毁。

在黔东南之另一大股土匪为“湘桂黔边区民众自卫救国军”杨锦标部。杨锦标系惯匪出身,多年来带200余名土匪在湘、桂、黔边界打家劫舍,抢夺行商。广西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也未使杨就范,后在白崇禧“化阻力为动力”的手段下,收买加委杨锦标为“湘黔边界剿匪司令官”。解放前夕,又给他装备了一部分武器,命其开展游击活动,与我军进行周旋。贵州解放时,杨匪伪装进步,与路过黎平县城的我四野部队取得联系,组织黎平支前治安委员会,趁机收缴黎平、从江报警队及保安营的武器,查抄国民党县长的家产及枪枝,使该匪部武装发展到1500人,机枪20余挺。我军接管黎平县城时,邀杨开会,被其拒绝,并图谋攻打县城。我军被迫撤出,行至茅贡山,被杨匪伏击,伤亡30余人,黎平遂被杨匪占领。杨设番号为“湘桂黔边区反共救国军”,自任司令,辖4个纵队,以黎平、榕江为中心根据地,其势力可达湖南靖县和广西三江县。杨匪在盘踞的地区建立了匪政权,委派了4县县长,还在农村各乡中建立匪基层组织,各配备一名指导员,以加强其统治。杨匪还和雷山的谢世钦、荔波的陈与参、三都的都堪、广西的伍英等匪首广泛联系,并于5月中旬召开会议,商讨游击应变方针,划分活动范围。该股匪存在时间较长,

剿匪大纪实

直到 1950 年底我军进剿黎平、从江、榕江,才将该股匪歼灭。

与黔东南的谢世钦、杨锦标这两大股匪遥相呼应的,是长期盘踞荔波县城的“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陈与参部。陈与参原为国民党少将师长、广西第十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广西解放时,陈匪带其武装潜回荔波老家,拉拢地方封建势力,收编游杂武装,编为 3 个支队,陈任边区军政长官。陈匪与广西匪首莫树凤勾结,以荔波为根据地,在铁路沿线大肆进行骚扰破坏,抓丁派粮,群众稍有不从,即被杀害。陈匪曾袭入麻尾车站,杀死 2 名工人,抢走一批妇女。陈匪还制造了杀害民主人士英凤楼家 40 余人的大惨案。1951 年元月中旬,我军围攻荔波,始将该匪歼灭。

黔北地区的土匪派系甚多,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不断组合。先是国民党 89 军起义后在余庆、瓮安叛变的 4 个团被我追歼,流窜于德江、思南、印江、石阡、余庆、瓮安、凤岗等县,与当地封建势力结合,组成各股土匪。其中 982 团残部逃往石阡本庄,勾结被称为“西吴封建王朝”的吴登仁组成“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983 团团团长蔡世康带残部北窜德江,收编当地股匪,活动于德江、思南、印江一带。127 团团团长吴牧周带残部逃往石阡西南。7 月我军进剿石阡,该匪又逃往松桃,与惯匪高竹梅结合,盘踞梵净山区。128 团团团长闻羽军带残部逃窜凤岗,配合史肇周匪部攻打凤岗县城,后又窜至乌江沿岸,活动于川黔边界的沿河地区。以上各股叛军经我多次打击后,大都麋集于黔东北一带,由叛军头目彭景仁、杨通贤收编,成立匪十四兵团。彭景仁原为国民党 49 军 327 师师长,起义后在调往重庆学习途中潜逃为匪。杨通贤为国民党 82 师副师长,在湘南战役中被我军俘

虏释放。杨回沿河后，贼心不死，拉拢沿河封建势力与我对抗。彭、杨二匪将各地逃到黔东北来的叛军，加上松桃、沿河一带原有的惯匪、保警队、治安大队组织起来，统一编组为“十四兵团”，彭景仁为司令，杨通贤为副司令，下辖一个军四个师。该匪部以梵净山为依托，勾结四川土匪，窜扰川黔边界及黔东北各县。1950年11月，我军会同川东军区部队进行黔东北会剿，歼灭了该股土匪。

在黔北地区的土匪还有“人民自卫军”史肇周部和“川湘黔鄂边区民众救国军”黄守英部。史肇周原为国民党凤岗县参谋长，由土匪起家发迹，是凤岗头号恶霸地主。凤岗解放后，史匪一面伪装进步，一面暗中策划，于1950年3月发动凤岗7个乡武装暴乱，与89军叛军攻打凤岗县城，经我打击后，又北窜德江、务川，与黄守英合股。黄守英原为国民党道真县参议长。道真解放后，黄匪看见我在道真的兵力不强，便于1950年3月，组织全县乡保武装，发动大规模暴乱，打进道真县城，恢复了旧政权。并在全县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强制手段，征集壮丁，威逼群众为匪，成立“川湘黔鄂边区民众救国军”，黄任司令，下辖12个纵队及4个支队，武装人数发展至2000余人。后又与凤岗匪首史肇周结合，将川黔公路以东、乌江以西的黔北数县全部控制。

1950年10月，川东军区用两师兵力与遵义分区部队共同进行黔北大合围，将史、黄二匪部歼灭。

在川黔公路以西的黔西北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是由遵义地区的各股封建武装与叛军合股组成的“十九兵团剿共游击军”赵龙翔部。赵龙翔原为国民党十九兵团军官大队长。贵州解放

剿匪大纪实

后,赵匪带 300 余人潜伏金沙县境,勾结遵义、黔西等县封建武装,发展至 1000 余人,于 1950 年 2 月 10 日攻打金沙县城。我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在两座碉堡内坚守 3 天,待援军赶到,才将赵匪击退。4 月我军被迫撤离,金沙为赵匪占据。赵匪将各股土匪、乡保武装统一编组,建番号为“十九兵团剿共游击军”,赵任总司令,周天乙为总指挥,下辖八个纵队,约 3500 人,活动于金沙、遵义、仁怀边境。7 月,我军合围金沙,歼其大部。赵、周二匪率千余人窜至川黔边界,直至 1951 年上半年才陆续被歼。

对于上述各股重大土匪的清剿,我军经历了被动应付,重点合围,全面清剿,边沿会剿等几个阶段。1950 年上半年,由于匪风上涨,起义部队大规模叛变,我军仅能守卫重点目标的安全,保护交通运输,防止土匪的袭扰,机动作战部队则集中追歼叛匪。89 军 4 个团叛变后,贵州军区从遵义、毕节、镇远 3 个分区抽调了 3 个团赴余庆、瓮安追剿;在普安叛变的 272 师由兴仁分区调主力追剿;在普定叛变的独二师由安顺分区部队追剿;在水城叛变的 271 师由路过毕节的兄弟部队追剿。对这些叛变部队的追剿击溃较多,很少全歼,以致这些叛匪流窜各地,与当地封建势力结合,成为一股股匪帮。这些匪帮在 1950 年 6 月以前,除“新编第一集团军”潘方侠部因直接威胁贵阳市的安全,我军集中力量在贵筑县将其总部摧毁,从此再无完整的组织系统,其余的均未受到沉重打击,而盘踞在某一地区,建立“封建王国”,造成了贵州的割据状态。

1950 年 6 月以后,贵州军区集中 5 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剿土匪比较集中,危害又较大的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带和金沙两个地区。进剿采取合围战术,先撒开大网,大面积将匪包围,然

后深入纵深清剿,使匪无隙可乘,无路可逃,力求剿平一地,净化一地。瓮、余、湄合围一举歼敌 3000 多人,重要匪首“392 野战部队”副司令王福堂化妆藏在一家老乡牛圈里,被我军战士揪了出来。此次合围,使贵阳东北部的腹心地区实现了净化,取得了首次合围成功。金沙合围,歼敌 5000 多名,将从贵阳、遵义、毕节 3 个地区逃来之匪一网打尽,消除了贵阳西北部地区的一大隐患。这两次合围大大震动了各地土匪,也有力地鼓舞了全省军民的斗志,我军由被动转向了主动。接着,我军又进行了石阡、江口、岑巩、施秉中间地区的两次合围,将被称为石阡的“西吴”和“东吴”的两个封建王国彻底捣毁。“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和 113 军军长吴河清在合围中,带着少数亲随,到处躲藏,均被我从大山中擒获。9 月以后,我军在全省广泛开展合围进剿。为在 1950 年底完成腹心地区净化任务,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和川东两军区抽调 186 师和 31 师入黔助剿,大大增加了贵州剿匪力量。当时我军具体任务分配如下:45 师负责黔西地区,31 师负责黔北和黔东北地区,186 师负责黔东南地区。贵州军区的机动部队则负责整个黔南地区。这些部队到达各地后,各军分区部队皆共同参加清剿,实行统一指挥。全省共进行了 8 次大的合围战斗,即:威宁、赫章合围,歼“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八兵团”罗湘培部。罗湘培在合围中被打伤,只身潜逃,后被追捕,走头无路,自毙身亡,嚣张一时的“第八兵团”就此覆灭。雷山、台江合围,歼“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部。谢世钦逃进雷公山,被我军在一堆烂草中搜出,“黔东南绥靖区”就此被消灭。

黔东南另一大股匪杨锦标部是在黎平合围时被歼灭的,杨锦标漏网逃入广西三江县,化妆成乞丐在小镇上行乞,被民兵认

剿匪大纪实

出,捕回贵州。务川、道真、正安合围,歼“川湘黔鄂民众自救军”黄守英和“人民自卫军”史肇周部。在合围时,黔北大匪首史肇周和叛军头目蔡世康被击毙,黄守英部大部残余逃窜川黔边界,川黔公路以东地区实现净化。都匀、贵定、麻江地区合围是我军向黔南进剿的开始,歼罗钩、潘治平、莫如兰等几股土匪。扫清外围后,即在长顺、紫云、惠水对“反共自卫救国军”曹绍华部、“反共挺进军”屠占廷部、“89军游击指挥部”刘逸群部、“戡乱建国军”陈一鸣等股匪进行合围。此次合围,是全省剿匪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也较为成功的一次,主要匪首除陈一鸣当场击毙外,其余匪首曹绍华、屠占廷、刘逸群皆被生擒,匪魁曹绍华被押解贵阳示众3天后,公审枪决。长、紫、惠合围以后,我军又进行惠水、平塘合围,将“国民党讨共委员会”副主席兼一军军长王志诚俘获。从此,黔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1950年12月进行的梵净山合围,歼灭最后盘踞在黔东北的“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彭景仁,49军军长吴汝周被生擒,黔东北地区此后再无较大股匪。

经过以上八大合围,贵州全省中心地区重大股匪皆已被歼。1951年元月,剿匪斗争进入会剿边沿地区的最后阶段。我军首先合围长期被“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军政长官陈与参和纵队司令都堪盘踞的荔波,将陈与参和都堪活捉,消灭了黔南的这大大股土匪,荔波重获解放。我军乘胜进入广西,将危害黔桂边沿地区安全的广西大匪首“黔桂边区国民反共救国委员会”主席莫树风歼灭。解放罗甸以后,我军开展对贵州土匪最后的一个巢穴——册亨、望谟合围。这一地区聚集了从各地漏网逃来的若干土匪,头绪纷杂,无统一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从盘县、兴义窜来

的“反共抗俄同盟军”总司令余启佑，该匪盘踞于兴义、安龙、册亨南部，建立“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匪徒达4000余人，长短枪2400多枝，为贵州最后一支重大股匪。经过合围，歼匪近6000名，中队长以上匪首就有1340名，余启佑的“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被摧毁。册、望合围以后，贵州全境解放，结束了持续一年半的剿匪斗争。

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从1950年元月到1951年8月，我剿匪部队共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4246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397名，匪众263739名，共歼匪278136名，缴获各种炮298门，轻重机枪1247挺，步短枪116866枝。股匪悉数被歼，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第44节 直捣匪穴，无路可逃 贵州剿匪取得全面胜利，最后一个顽匪巢穴李家寨据点灰飞烟灭

在贵州的剿匪作战中，当属1950年12月8日贵州省军区所属的镇远军分区侦察连奉命对盘踞在雪洞地区的匪穴发起的攻击战最为精采。雪洞是贵州三穗县东部与湖南凉伞交界地的一个大山区，被我军打击后逃窜到这里的土匪约有600人，其匪首为周治权。

镇远军分区侦察连领受作战任务后，在连长袁宗武的率领下，连夜出发，奔袭雪洞。

当这支剿匪小分队疾行至一个叫黄土坎的地方时，路遇一山民。

“大军同志，部队是去打雪洞的吗？”山民显然对部队情况很

剿匪大纪实

熟，迎面拦住走在队伍前面的袁宗武问。

袁宗武心头一惊，此人怎么会想到部队的作战意图？忙拿话掩饰：“不，老乡，我们是去桐林有任务。”

“莫哄我，你们是去雪洞。”山民肯定的说：“同志，我们见过面，在烧巴乡，我是民兵咧。”

袁宗武这才隐约记起，面前的山民好像姓宋，是烧巴乡的一位基干民兵。

“去雪洞我来带路，那里我有亲戚，人熟地熟，以前我就带解放军去打雪洞。”

“你去了，家里怎么办？”袁宗武不放心地问。

“不要紧的，顺道回家说一声就行了。”年轻的山民俏皮地笑道：“不过，打完仗送我一枝枪好吗？”

“行。打完仗好枪随你挑！”袁宗武有些喜欢眼前这个朴实的山民了，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侦察连来到桐林后，在区政府里，由分区设在此地指挥部的军首长布置了作战任务后，于凌晨2时由桐林直奔雪洞。

部队走出半溪沟，又爬了一座大山。袁宗武问向导到了什么地方，向导说到了撂鸡坡，下了山，就是雪洞。于是袁宗武立即命令全连飞快下坡，来到雪洞附近一处叫老寨的地方。

老寨，雄踞在一个小山包上，位于雪洞街的南面，约10多户人家。向导指着前方说：“对面是猪场，土匪在上面修有碉堡，战壕直通银寨。”袁宗武放眼望去，土匪盘踞的地方的确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按照在桐林的分工。侦察连3排担任尖兵排；1排在右，下了田坎，越过小河，埋伏在碉堡东侧；副连长龚谦让带2排居中，沿着大路直插雪洞街上；指导员带4排走左边，越过

雪洞下边小河,对土匪进行迂回包围。

天刚拂晓,我尖兵排悄悄摸进雪洞街,见一伙土匪还在屋里赌钱。他们破门而入,巧妙地抓来了2个土匪,摸清了街上和阵地上土匪的布防情况。部队随即向土匪阵地摸去,很快接近了敌人。这时,土匪哨兵发现解放军来了,慌忙放了几枪,就缩进了碉堡。见行动已经暴露,3排9班班长陈金明冲在最前而,不等后续部队跟上,就带着战士蓝宪坤首先向敌人冲击。当他冲到离敌堡70多米的地方,端着冲锋枪就向敌人的碉堡扫射。这时,敌人集中两挺机枪进行疯狂的还击,封锁我前进的道路,陈金明暴露在敌人阵地而前,不幸被土匪击中倒下。战士兰宪坤见班长倒下了,端着冲锋枪又想冲上去。袁宗武看地形不利,一面命令他就地隐蔽,一面叫机枪手对准碉堡猛烈射击,又命令炮班班长宋启斌架好六〇炮,对准敌堡轰它几炮。第一炮打在敌堡后面一点,敌人开始恐慌。宋启斌接着又是两炮,不偏不倚,正好打中敌人碉堡,把敌人的碉堡炸塌了。土匪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伤,乱成一团。

此时,土匪们只顾集中火力对付我军的正面攻击,而没顾及其侧面。直到我迂回部队在机枪掩护下,从侧面上来后,土匪才发现,有的慌忙乱扔手榴弹,有的抬腿就跑。战士们端着刺刀,象离弦之箭冲了上去。9班战士兰宪坤第一个冲上敌阵,端着冲锋枪对准还来不及逃跑的敌人就是一梭子,一下打倒了10多个匪徒。

土匪被打得纷纷溃退。

当我侦察连在街上打响时,参加剿匪作战的7连在坪桃一带也打响了。他们很快歼灭了那里的敌人,迅速占领高地,堵击

剿匪大纪实

从街上溃逃的土匪。这时，从碉堡、阵地上和从雪洞街上逃出的土匪，汇合到了一处，蜂拥着向平关方向的山沟逃跑。西面坡上，我149团2营3连2排的阻击部队及时对那些逃跑的匪徒射击，打得敌人喊爹叫娘。我侦察连也居高临下，对着溃逃的土匪猛烈开火。顿时，在阵地上、半坡上及河沟里，打死打伤不少土匪。未被击中的土匪变成了惊弓之鸟，到处躲藏，战士们呐喊着大抓俘虏，追击散匪。

我军一举攻下了土匪巢穴雪洞，虽然杨汉章、魏德茂等几个主要匪首漏网了，但击毙匪徒36名，活捉100多名，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数10枝。连长袁宗武叫向导宋启烈去枪堆里挑选了1枝最好的“中正式”步枪，满足了年轻小伙子的要求。

我军攻下雪洞后，群众主动给解放军送信，报告几个匪首逃亡的方向。特别提供了湖南凉伞大土匪头子杨永清也窜到贵州边境的消息。“前指”对匪首窜逃方向作了分析后，命令侦察连在几天之内，务必将杨永清、杨汉章等几个主要匪首捉拿归案。

该连马上进行了分工，指导员带队留雪洞，袁宗武和副连长龚谦让挑选了两个精干的班，进行化装，穿上便衣，扛着夹板枪，外出侦察。当天吃过晚饭，龚谦让带一个班向晃县橙寨、凉伞一带侦察搜捕匪首，袁宗武带另一个便衣班向平关方向搜索。

两个班搜索了一夜一天，一无所获。第二天下午6点多钟，来到了镇远县境的一座大山沟边。袁宗武带队进入村寨，接连敲了几家门，均无人答应，只好撤出村外休息，观察动静。

天色渐渐黑下来。隐蔽在树林里的哨兵跑来向袁宗武报告，说有个老妇人从山沟里来了。袁宗武抬头一看，见一个老太婆慌慌张张地向寨子走来，便叫一个贵州籍的战士去问：“大妈，

你们这里有九路军过路没有？”(土匪自称九路军)

老太婆反问到：“你问这个做哪样？”

“我们被解放军打散了，准备从这里突围出去！”

“你们是哪部分的人？”

“我们是周司令的人！”那个老太婆见战士们都是土匪模样，便信以为真，说：“在背后山上有一个杨大队长，他冷得很，又饿得很，你们走就带他一起走！”

“这深山老林鬼都没有一个，为哪样不叫他来寨子里烤火，找东西吃？”贵州籍战士气汹汹地说。

老太婆说：“他只一个人，怕下山来！”

“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外人！”

“好，我领你们去找他！”老太婆说完转身就走，袁宗武叫两个战士跟上去，稍后全班也跟了上去。走了两里多路，来到一道瀑布坎下，沿着毛毛路，攀藤而上，便是一小块平地，平地的那头，用树枝临时搭了一个简单的窝棚。老太婆进去了，只听那个匪首说：“大嫂，你是怎么搞的，把人引到这里来，不怕要送我的命。”

老太婆忙解释说：“不，他们是周司令的人，找你哩！”因为距离不远，两人讲话袁宗武等人听得清楚。贵州籍战士马上接口说：“杨大队长，我们几个是周司令的人，准备突出去，特地来找你！”那匪首蹲在山沟里既冷又饿，听说是周司令派人找他，又是本地口音，就出来了，贵州籍战士迎了上去，说：“杨大队长，事不宜迟，赶快走吧！”

那个匪首糊糊涂涂地同袁宗武等人摸了一段黑路。袁宗武怕在半路出问题，使用手枪顶住他的背后，大声说：“不准动！”两

剿匪大纪实

个战士立即上前,用一根结实的葛麻藤将他捆起来。

“别误会,我是12纵队副司令杨汉章!”

“什么司令不司令的,我们是解放军!正在找你呢。”袁宗武厉声说。

杨汉章这条狡猾的狐狸,此时如巨雷轰顶,绝望地叫了声“我的天!”再也说不出话了。

侦察连活捉了匪首杨汉章后,从西折回向东,进入晃县境内搜捕大匪首杨永清。到了第三天下午,在蛤蟆塘外几里路的一个山沟里,捕捉了杨永清的警卫大队长以下20多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枝。战士们押着匪徒向雪洞方向走了五六里路,凑巧在半路遇见副连长龚谦让也押着几个匪徒过来,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袁宗武忙问:“副连长,他们是些什么人?”

副连长笑了笑回答说:“杨永清和他的老婆。”

匪首杨永清,芷江县黄土坡人,大地主出身,原任国民党湖南芷江警备司令,又是楚汉帮会寨主,是芷江、晃县一带的地头蛇,有“湘西王”之称。解放后,杨永清按照蒋介石的“应变计划”,组织土匪,当上了匪“湘黔桂边区反共游击联军总司令”,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1950年8月,我军对芷江土匪实行铁壁合围,杨匪率数百人突围至凉伞、橙寨一带,被这里的土匪推为首领,统一指挥晃县、三穗、天柱、玉屏、镇远等几县的数千土匪,妄想作垂死挣扎。

12月8日上午,我军攻下雪洞、凉伞后,匪首杨永清、姚大榜、汪昌仁、杨德庄、周治权、杨汉章等各逃一方,谁也顾不了谁。8日下午天快黑时,袁宗武与龚谦让分手以后,各走一方。他带着小分队在崇山峻岭中搜捕了两天多,毫无匪踪。下午他们来

到蛤蟆塘，见各村寨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一户人家冒烟。一行人走到烂泥沟时，突然见寨子里有一家冒出微微的青烟。他们感到奇怪，就叫贵州籍战士戴胜福向冒烟的地方搜索。副连长和班长焦志林则埋伏在村寨附近，以观动静。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不见戴胜福回来。是怎么回事？莫不是出了问题？但又没听到枪声。炊烟越来越大，最后一下又消失了。龚谦让和焦志林分析，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果然不出所料，一会一个妇人在前引路，戴胜福端着一盆红苕出了村寨。戴胜福把手一挥，班长焦志林率两个便衣战士紧紧跟了上去。他们转过几个弯，翻过几个山坳，向一个小山坡走去。

原来“雪凉合围”打响后，云集在这里的 3000 多名土匪迅速土崩瓦解。杨永清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率领残匪向西潜逃。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又甩开了不少警卫。当他逃到蛤蟆塘时，只剩几个心腹了。他在这里躲藏了半天，见没有动静，饿得实在捱不下去了，才让他老婆化装成一个农村老太婆，下山去搞吃的。他老婆正在屋里煮红苕，恰巧被戴胜福遇上。戴胜福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慢慢与这妇人周旋。他十分殷勤地帮忙找柴火，煮红苕，还说自己是周司令派来约杨总司令准备突围的。那妇人半信半疑，最后终于将戴胜福带到杨永清的住处。

杨永清躲藏在两座大山中间的一处小山坡上，山上是茂密的森林。匪徒们在此用树枝给杨永清搭了一个临进窝棚，窝棚后面是悬崖，悬崖下面有条小溪，一条小路可通上去，地方十分隐蔽。杨永清为了万无一失，又布置了三道暗哨。

焦志林等 4 人跟着那妇人，来到半山，放哨的匪徒立即跳出来盘问，那妇人摆手说：“莫误会，这是周司令派来的人。”就他们

剿匪大纪实

这样顺利通过了三道岗哨,很快来到杨永清躲藏的那片林子。

那妇人停下脚步:“你等一下,我去找杨司令!”焦志林使了个眼色,4人一齐往前走。突然从窝棚侧面跳出4个黑脸大汉,拿着二十响手枪,命令他们把夹板枪放下。焦志林他们把夹板枪放下,来到窝棚门口,见里面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中等个子,眼窝深陷,脸色憔悴,腰插手枪,笔挺挺地站在那里。戴胜福为了不使杨永清生疑,忙把红苕端到他的面前。虽然略带热气的红苕,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使得这个已两天没吃饭的匪首馋得直流口水,但杨永清仍然笔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双贼眼不停地转动,盯着每一个战士,右手紧握着一枝二十响加拿大手枪。戴胜福毕恭毕敬地说:“请,杨司令!”杨永清仍不伸手。

戴又说:“请吃,杨司令!”

杨还是不伸手。

戴心想:你不吃,我吃给你看。便说:“总司令不吃,我们先吃啦!”他们几人吃了一个又一个,很快就吃了一大半,那妇人好不容易才弄得这点红苕,生怕别人吃完,伸手去抢。4个卫士也饿得受不住,看着到口的东西就要被别人吃光,再也顾不得什么了,与杨永清的老婆一道抢红苕吃。几个土匪只顾你争我夺,把红苕拼命往嘴里塞。焦志林见匪徒们抢得热闹,使了个眼色,4人一齐掏出手枪,大声喊道:“举起手来!”杨永清见势不妙,转身要往悬崖坎下跳。焦志林眼疾手快,左手揪住杨永清的衣领,右手把手枪顶住他的背心窝,厉声说道:“谁敢动,先打死谁!”两个匪徒刚想蠢动,焦志林用手枪一点,“啪啪”两声,两个匪徒应声倒地。其余的匪徒和杨永清老婆如梦初醒,站在那里高高举起了手。龚谦让副连长闻枪声赶到,山上的土匪无一漏网,全部就

擒。

在这次“雪凉合围”战斗中，镇远军分区侦察连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奔袭，歼匪 374 名，其中生俘杨永清、杨汉章等以下匪首（中队长以上）56 名，缴获机枪 3 挺，长短枪 122 枝，各种弹药 1700 余发，以及若干军用物资。

除雪、凉地区的匪穴之外，李家寨亦是黔北地区最大的土匪老巢之一。该寨位于习水县南部的黄泥堂乡，与仁怀、赤水两县交界，座落于海拔 1400 多米的高地，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米。东、西、北三面是高 200 米左右峭壁悬岩，南面是 60 度左右的陡坡，向下延伸 1000 多米，蜿蜒的小径从半坡横穿而过；南面两侧，沿山埂有两条 2 尺余宽的石梯路，直通大寨南门。

此外，李家寨还有三道防护墙，墙厚 1.5 米，高 10 米，寨门厚 1 尺许，门面钉有铁皮，寨外周围有阎王刺，倒挂刺等附墙面生，盘根错节，交织如网，人畜难近寨墙，墙上约 3 米高处，射孔密布；在第三道防护墙上设有一岗楼，可掩护三道寨门，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西北角还有一石砌碉堡，可容数十名士兵把守。

进第三道寨门，是一块长约 120 米、宽约 10 米的大草坪，草坪过后正面是大厅，左右两侧，是匪首李正科的住房，后面是另一匪首李正开的住房，寨内最高处是寨主李德三的斋堂，亦称紫云堂。紫云堂下面是掘土砌成的石拱道，暗通寨外秘密小路。除此之外，李家寨内还设有兵房、弹药房、粮仓、招待所、马棚、猪栏、蓄水池等。

遵义解放后，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收集人马向黔北边区习、仁、赤三县边境溃退，企图以李家寨为据点，东山再起，卷土重

剿匪大纪实

来。此时李家寨群魔聚集，寨主李德三在上峰的授意下，建立了“兴隆反共委员会”，委任李正开为主任委员，李正科为副主任委员，宣传委员有黄绍良、张荣州、邓栋才等，他们在寨子附近的鞍龙山歃血盟誓，密谋反共到底。

1950年3月初，卢杰、蔡维新、戚文彬（川匪司令），先后溜到李家寨。他们称李家寨为“保险寨”、“安全寨”。

卢杰把持李家寨后，暗中操纵各股土匪，坐地指挥，组织了川黔边区各县股匪“联合办事处”，自命为“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委任魏文青为第3纵队司令；张华清为第4纵队司令；李正开为第6纵队司令；韦映辉为8纵队司令；冯友伦为第10纵队司令；何海荣为第12纵队司令；杜伯符任情报处长；袁明德任人事处长；陈光正任经济处长；李正科任外交联络处长。卢杰亲笔从“司令”委任到连排长，委任状上还加盖有“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印章。为了鼓舞士气，卢杰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柳州已经收复”，“美军开始登陆，上海已被占领，我们大有希望”。

1950年3月底，李正开参加了官店沙溪的土匪会议，商议攻打东皇、温水，后因弹药不足，戚文彬怕得不偿失而不愿出兵，卢杰为此专程到川黔边界联络各股土匪，回来后即倾巢而出攻打仁怀县城。

李正开从李家寨出发，经二里、观摩、冯家嘴、三合到水圪，沿途扩充队伍。在观摩陈松柏处，搬了一门用10多人换抬的土炮，每炮装两升火药（重约16市斤），在观摩大河场放了一炮，以振军心。到冯家嘴后，一路已集中了500余人。

李正开匪部刚到水圪，即与从县城赶来剿匪的解放军部队

遭遇，刚接上了火，匪众一听有嘎嘎嘎的机枪声和轰轰的迫击炮声，心惊胆颤，各自逃生，土炮抬到簸箕坝时，为了轻装逃命，也丢了就跑。

尽管卢杰、蔡维新、戚文彬、田华宾及桐梓、古蔺等地汇合的土匪 2000 余人，冲入了茅台镇，但心虚胆怯，不敢久留，即返回原地。

当天晚上，解放军渡河反攻，匪众见我军来势凶猛，不敢抵抗，连夜退回几十里，从沙坝过河，经二郎返回桑木垭和李家寨驻扎。

群匪返至桑木垭集中时，卢杰再次主持召开大会，进行整编，增设了特务营，委任冷彬武为特务营长，罗跃艰、周树荣为连长，妄图凭借山寨之险与我军继续对峙。

1950 年 8 月 18 日，李正开派人鸣锣通知，煽惑群众，说什么“共军要来打寨，杀进来鸡犬不留！”

“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凭险守御，不要乱跑，才能保住自己的妻室儿女。”“李家寨是天生险要，粮食枪弹充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军是攻不进来的。”

……

8 月 21 日晚，解放军某部 8 连和 5 连清扫了桑木垭的残匪后，到了李家寨，分别驻扎在靠近李家寨的兴隆场街上张少武家和锁口寺庙内。

22 日早晨，剿匪部队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后，即托人到李家寨送劝降信，叫芦、李等人缴械投诚，悔过自新。土匪叫来人捎了回书带回。这种文字上的谈判，曾来回三次。我军指挥员在信上指出：“凡投诚者，保护全家安全，负隅顽抗者，一定

剿匪大纪实

予以歼灭。”

李正开召集寨内班排长会议，横下了心，准备孤注一掷。李正开还到营门楼上，给土匪们打气：“你们要沉着气，不要怕，到了紧急关头，外面自然会有人来援助我们的。现在二里场的张银久，习水的任栋梁，火焰的邓清恒，都已整装待发，将来我们内外夹攻，还不稳操胜算……”

23日上午，李正开站在紫云堂左侧的岗楼上，用土望远镜观察解放军的动静时，被我军战士“砰”的一枪，击中了他的右嘴角。

我军围攻李家寨数日，群匪拒不投降，8连和2连遂请示团部派炮兵增援，协助攻击。

24日，团里派来了迫击炮排，协助步兵攻击。4班副班长宋常志登山侦察敌情，确定炮位，行至乡公所拐角处，被寨内岗楼上的匪兵发现，不幸中弹牺牲。

卢杰、李正开为了收买人心，每人发一块银元，并杀猪慰劳，李正开还狂妄地说：“壬戌年（1922年）1000多狂徒来围攻李家寨40多天，都没有打进来，现在，共军不过一二百人，人少势单，我们怕什么！待他们人疲粮尽，自然不战自退。”

25日10时许，解放军在离寨门右侧约500米的地方，架起一门平射炮对准寨门；在朱家坡山埂半腰距寨约400米处的黄瓜埡口，架起八二迫击炮和六〇小炮，构成了一个锐角三角形的炮兵阵地。几挺重机枪架在郑家屋角一带，5连的一个主力排，则隐蔽在石鹅洞的高石柱，居高临下，密切监视外围土匪的动向。8连尖刀班，抬着云梯，秘密运动到距第一道寨门约50米处的土坎下隐蔽，准备攻寨。

12 时许，部队首长下达了总攻命令，三颗红、绿、黄信号弹从兴隆场的新街升上天空，顿时，炮火齐发，震天动地，炸得土匪鬼哭狼嚎，血肉横飞。重机枪吐着火舌，压得南门岗楼上的敌人抬不起头来。8 连尖刀班在班长韩炳银的率领下，抬着云梯，冒着弹雨，向寨门冲去。

云梯在南门右侧竖起，副班长罗义和急速爬将上去，但还未翻上寨墙，就被匪兵用乱石、木桩打了下来，与此同时，寨门右侧那门平射炮的插销突然断了，停止了轰击，幸亏战士们急中生智，用“铁钉”代替，大炮很快又发挥了威力。战士们第二次竖起云梯，仍被匪兵打倒下来。但在我军炮火轰击下，寨内水池被炸垮，房屋着火，顿时浓烟笼罩，烈焰腾空，群匪焦头烂额，东躲西窜，乱成一团，一部分匪徒用粪池里的清粪扑灭了南门岗楼上的烈火，粪坑舀干后，匪徒又利用它作掩体，用火封锁第三道寨门。匪部主力这时已转移到紫云堂高地，一挺轻机枪，不停地向下射击。李正科的加强班，固守着寨门左侧，群匪又稳住了阵脚。

我解放军战士夏海清、赵忠相再次把云梯竖起，他俩刚一露头，又被密集的弹雨连人带梯打倒下来。

第一道寨墙距第二道寨墙不过 2 米远近，寨墙之间的岗楼，已成我机枪、火箭筒的主攻目标。在强烈火力的掩护下，战士梁敬喜、张焕明、曾树清等再次竖起云梯，先向墙内投掷一排手榴弹，趁匪徒惊慌之际飞越寨墙，向内猛攻，岗楼上的土匪立不住脚了，在不到 10 米外的掩体内，用火封锁寨墙。第一个突击队员翻上墙头，中弹跌了下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接连 5 个战士躺在血泊里。这里，韩炳银用木棍顶着军帽在墙头摇晃，把群

剿匪大纪实

匪的火力引向左侧,果然,群匪都向韩班长竖起的“假目标”疯狂扫射。战士张明喜乘机腾身跃起,翻越寨墙,不幸左腿中弹倒进墙内。张明喜侧身卧着,抱起冲锋枪向敌人火力点扫射,终于把土匪机枪射手周兴顺击毙。

此时,我军的冲锋号响了,5连、8连分别从南门的左右沿山埂冲上,到南门汇合后,于下午2时许攻破了李家寨。此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匪徒们更加晕头转向,直往地道里钻,而匪首卢杰不知什么时候,丢下老婆、儿女,已溜之大吉。李正开见状心慌意乱,决定寻路逃走,当他转身窜到自己住房的走廊转角,见其弟李正科与张光栋、许洪华等人还在负隅顽抗,忙靠进窗户急迫地叫道:“老弟!快,快逃走啊!”

李正科哭丧着脸说:“我们走了,这一屋子人怎么办?”李正开焦急地说:“顾不得了!你不走我走了!”说完李正开转身从悬崖预开的一条秘密小路逃跑了。受伤的李正科拉下一床棉絮裹在身上,卧在门口,端起枪顽固射击,被躺在寨墙下的战士张明喜发现,对准李正科就是一梭子弹,李匪当场毙命。

战斗进展顺利。四散奔逃的匪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捉。最后在一个地洞里,战士们抓到了匪部第18纵队司令杜甘堂、参谋长李世朝及卢杰的老婆等等人。在李家寨的最高点上的“紫云堂”,当我军战士冲上来时,78岁的“堂主”李德三还在念经求菩萨保佑,但仍没有逃脱当俘虏的下场。

李家寨战斗,我军共歼匪110余人,俘虏75人,缴获机枪、步枪约120枝,手榴弹10箱及1部电台。

